

文壇史料

楊之華編



上海中華日報社出版

文壇史料

楊之華編

中華副刊叢書之一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一日排印・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文壇史料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主編者 楊之華

發行者 中華日報社
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印刷者 中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初版發行：一——三〇〇〇 定價國幣三十元（不折不扣）

總發行所 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電報掛號九一六〇號 中華日報社

目次

序

楊之華（一）

關於魯迅

導言

編者（七）

可記的舊事

戶一（一〇）

我認識魯迅的經過

內山（二三）

魯迅・佐藤・內山

陶晶孫（二八）

魯迅先生的遺像

姚克（三一）

魯迅先生對於我的啓示

蕭劍青（三六）

憶魯迅先生

內山（四五）

微微的苦笑

內山（四八）

作家評傳及印象

關於魯迅·····	周越然(五一)
魯迅小祭·····	柳雨生(五三)
魯迅先生·····	馮三昧(五五)
關於魯迅二三事·····	真原(五九)
紀念魯迅·····	路易士(七〇)
附：魯迅書簡拾遺(均未在他處發表者)·····	魯迅(七二)
先母事略·····	周作人(七六)
魯迅著譯及其編校輯錄年表·····	編者(七九)
魯迅遺墨(原稿一頁·書簡兩封)·····	(九〇)
關於藥堂·····	柳雨生(九五)
知堂小記·····	陶亢德(一〇〇)
周作人先生近作·····	薛慧子(一〇八)
周作人與路易士·····	胡蘭成(一一二)

目次

周作人和我	夏 享(一一六)
記胡適之	希 平(一一九)
記劉半農	蕭頌恩(一二三)
記沈尹默	潤 榮(一二六)
郭沫若	諸 以(一二八)
記郁達夫	希 平(一三〇)
王獨清	悅 華(一三三)
張資平訪問記	迅 俟(一三五)
田漢	迅 俟(一三九)
白采	悅 華(一五三)
憶朱自清	野 丁(一五七)
俞平伯的散文	迅 俟(一四五)
馮文炳的小說	余 拯(一四九)
沈啓无印象	紀果應(一五八)

文 壇 史 料

懷茅盾·····	沈志堅(一六四)
記葉紹鈞·····	希平(一七〇)
記老舍·····	慶餘(一七二)
老舍·····	虞城(一七七)
記趙景深·····	希平(一七九)
李金髮·····	穆爾(一八一)
朱湘的詩·····	余拯(一八三)
王統照·····	章則(一八九)
王任叔·····	余拯(一九一)
王了一·····	野丁(一九三)
汪靜泉·····	迅侯(一九五)
曹聚仁·····	迅侯(一九七)
黎烈文·····	張祥沅(一九九)
瞿秋白·····	迅侯(二〇一)

目次

記劉穆	黎嵐(二〇三)
如此劉穆	何若(二〇六)
李健吾	諸以(二一一)
記鍾敬文	希平(二一三)
盧冀野	海一(二一五)
關於巴金	一統(二一七)
錢香邨	余拯(二一九)
蔣光慈	何倪(二三二)
關於蔣光慈	楊劍花(二三四)
記華林	頁公(二三七)
關於華林	何若(二三〇)
穆時英	迅俟(二三一)
記劉呐鷗	一統(二三三)
關於冰心	諸聯(二三五)

文壇史料

冰心小評·····	劍青(二三七)
關於蘇雪林·····	孔尊(二四〇)
黃廬隱·····	蕪南(二四三)
白薇·····	年(二四六)
鳳子·····	何倪(二四八)
沈茲九·····	梅野(二五〇)
記子岡·····	任川(二五二)
記柳亞子·····	希平(二五五)
記周越然·····	希平(二五九)
郭一岑·····	唐捐(二六二)
記蔣伯潛·····	希平(二六三)
記潘光旦·····	希平(二六五)
夏征農·····	任川(二六八)
路易士·····	胡蘭成(二七〇)

文壇逸話

魯迅與林語堂·····	陶亢德(二八一)
魯迅『兩地書』的鑰匙·····	孔宣(二八五)
胡適與哲學史·····	如蠅(二八八)
胡適在廣州·····	廖士(二九〇)
胡適之尊重女權·····	孔尊(二九四)
郁達夫一氣走南洋·····	孔尊(二九七)
達夫與金縷曲(附新蕩陽詩)·····	張祥沅(三〇〇)
謝六逸在神州女校·····	孔宣(三〇五)
鄭振鐸與版本·····	孔尊(三〇八)
汪靜之寫『北老兒』·····	孔尊(三一〇)
許欽文的『無妻之累』·····	孔尊(三一四)

關於「無妻之累」	陶亢德(三一七)
南國社的茶花女	孔尊(三一九)
孫毓棠與鳳子	野丁(三二二)
顧頡剛與古史	余拯(三二八)
馮淑蘭與陸侃如	孔尊(三三〇)
錢杏邨亡命著書	孔尊(三三三)
劉大杰寄情春波樓	孔尊(三三六)
黃廬隱迷戀小丈夫	孔尊(三三九)
謝冰瑩與顧鳳城	孔尊(三四二)
鍾敬文自願入獄	孔尊(三四五)
矛盾的小舅子——孔另境	苟生(三四八)
章依萍談編輯心理	孔尊(三五一)
向培良與邵維	緒璧(三五四)
記常白和沈洛	路易士(三五六)

文藝社團史料

新青年社·····	(三六一)
新潮社·····	(三六三)
少年中國學會·····	(三六五)
文學研究會(附「小說月報」「文學旬刊」及「詩」)·····	(三六七)
民衆戲劇社·····	(三六九)
創造社(附「洪水」與「幻洲」)·····	(三七一)
瀾灝社·····	(三七四)
南國社·····	(三七六)
淺草社(附「沉鐘」)·····	(三七八)
語絲社·····	(三八一)
未名社·····	(三八三)
莽原社·····	(三八五)
奔流社(附「萌芽」)·····	(三八八)

朝花社……………(三九〇)

太陽社……………(三九二)

現代社(附「文藝風景」及「文飯小品」)……………(三九三)

文學社……………(三九五)

太白社……………(三九七)

論語社(附「人間世」)……………(三九九)

譯文社……………(四〇一)

文學季刊社……………(四〇三)

文季月刊社(附「文叢」及「生活文化出版社」)……………(四〇四)

附錄

記創造社……………陶晶孫(四〇七)

關於「未名社」……………楊之華(四一九)

記現代社……………楊之華(四二七)

後記……………(四三七)

序

楊之華

自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到今日已經二十多年了，在這二十多年的過程中，新文學運動的進展固然經過了好幾個階級，就是現代的作家，也產生了不少。然而遺憾得很，至今我們也無法找出一本能够概括新文學運動全體的史料，有的只是個別的編述或輯錄，如要檢查起來，真是費時費力。這較之日本及歐美各國的文藝史料整理的工作，實在相差太遠。別的我們暫且不問，單以日本每年出版的『文藝年鑑』一書而論，我們便沒有。（但在這裏得聲明一句：以前北新和現代都有過『文藝年鑑』出版，但就其內容說，只可稱爲『年選』而已。）

就編者個人所知，在過去關於我們新文學運動史料方面的專著，實在不多，就其較佳者說，首推李何林所著的『近二十年來中國文藝思潮論』（一九三八年生活版）和阿英編的『新文學大系』中的『史料·索引』。（一九三六年良友版）但是前者僅限於文藝與時代的檢討以及新文藝思潮的演進；後者則祇是把有關

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個十年的史料的輯錄（其中遺缺的不少）而已。至於王哲甫所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及張若英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料』二書，也只能做到各時代文學論爭的記錄和清算；至於文學社團的調查，作家評傳及逸事的輯錄，則尚未有人出來做這項工作，要之僅阮无名（錢杏邨）編過一冊『新文壇秘錄』（南強版）而已。但這書的內容，也僅限於幾位作家的『秘』事，至於文藝社團的調查，仍是沒有。

現在我們着手輯錄的，自然不敢說是一本包羅萬象的史料書，更不敢自稱為完善的史料書；不過我們却抱有使它能夠成為一本完善的史料的志願。如今所輯錄在這裏邊的，僅是自一九四二年一月起，至最近期止的，并且都會在本報『文藝』及『中華副刊』這兩個小小的副刊上所發表過的文章。自然，在事前我們並沒有預料到今日可用之來編書，而那時所以發表這一類的文章，無非是報答作者惠稿的厚意和滿足讀者一時的欲望而已。而現在竟然編起集子來，主要的原因倒是爲了本報當局最近所決定的『中華日報叢書』計劃要付之實施了，我們才着手編選的。

事情正是爲了事前我們不知道今日有出『叢書』的可能，所以一些也沒有什麼準備。現在編選起來，自然頗費心思。於是：首先託本報資料室許君把過去一年來的『副刊』統統檢出來給我，從頭至尾翻閱一遍，第一個映入我腦子裏的印象，便是關於作家評傳，逸事，傳聞以及文藝社團調查之類的文章。因此，我便決定副刊叢書中的第一種，就定爲『文壇史料』。於未着手剪貼，校勘，編輯之前，在我理想中的是書，其內容至少都要包括（一）作家研究（二）作家評傳（三）作家逸事（四）社團調查（五）作家著作總目……這幾項。但當我剪貼下來，從事校閱訂正的時候，才知道現在收集的材料，還未足以成書，遂另爲補充『社團調查』以及『魯迅著譯編校輯錄書目』，作爲附錄，以成此集。自然，這個集子距離『完善』還很遠；但我們却希望全國各地的作家，能因這個小集子的出版而供給我們更豐富更好的材料，以待再版時補入，三版時補入……逐漸增加，務使到這本『史料』，能够成爲完善的書本。那麼，我們編印這本書唯一的目的，也就如願達到了。

至於本書編選的體例以及輯錄的來源，均於本書的『後記』詳之。這裏不必

文壇史料

一一贅述了。是爲序。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楊之華序於上海中華日報社。

關於魯迅

原书空白

導 言

編 者

每逢魯迅先生的誕辰（八月三日）或其死忌（十月十九日），在近幾年來的文壇上都出過不少的一紀念特輯」，但其內容，倘不是流於如何如何崇拜魯迅，敬仰魯迅……之類的八股式的論調，便是曲解魯迅先生的言論，抹殺其一生正大的言行，甚至假借了先生的言論作爲他們的盾牌，天天在宣揚什麼「聯合統一戰線」，什麼「新民主主義」之類。其實，他們對於魯迅先生的偉大，何曾知其百中之一二呢？

我們今日紀念魯迅先生，便不能不要客觀地指出先生的言行及其偉大之處。

第一，在最近的四十年間，可說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而魯迅先生正是活在這個大時代中的一個，他爲了要挽救中國的青年，不惜以其一生的全力放在指導青年的責任上，從先生最初的創作中，便喊出了「救救孩子」（一）的呼聲（見

「狂人日記」），其後更以自身的一奶和一血」（見「野草」中）去喂哺青年，教育青年，以期他們成人長大，而作時代的前驅，直至他臨終之前，仍從其病體擠出自己的血汗去喂養後代的青年，其對青年的熱愛，誠是人類中最偉大的愛。

第二：魯迅先生是以提倡新文學，介紹外洋文學兩者而見稱於近代文壇上的，但同時他也從事中國舊文學的發掘和整理，且以此三者為其終身的事業，給予今日中國的文藝界與偉大的貢獻。其對新文學的創作，有着「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愛憎」，在「可咀咒的地方擊破可咀咒的時代」；其對舊文學的研究，并不像其他的學者教授之流誇大舊文學的價值，更不會宣揚過任何古籍的珍寶，反之，一本其嚴肅而不苟且的治學精神，給予科學的分析，使人們易於瞭解，不致為古籍所惑。像這種嚴肅而不苟且的治學精神，誠值得我們好好地去學習的。

第三，魯迅先生的偉大，在其思想的前進以及眼光的敏銳。其對時事的觀察，常以冷靜的頭腦去分析，所得的結果而反映在他的文章裏的，往往成為時代的預言！（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的，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序言裏說：「一定要

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然無言。」其對中日兩大民族的前途，早就有過肯定的解說：「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見『活中國的姿態』序言最末一段，該書係日本作家內山完造所著，開明有中譯本）如今便是中日兩大民族由互相瞭解進而攜手合作共保東亞的時候了。我們今日紀念魯迅先生，便不應輕輕地忽略了先生在七年前的遺言。

總而言之，魯迅先生之爲魯迅先生，其成就并不是偶然的。蔡元培氏曾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八字讚譽先生。誠然，先生的學問文章，正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先生的偉大也在此！吾人常以「學習魯迅」一語勉人及自勉，我想，我們應該學習的，便是先生的學問，文章與偉大的品格和言行。（十七日夜半稿於中華編輯室）

可記的舊事

尸 一

有幾次當我和人談及魯迅，接到的疑問是，「你也和魯迅相識嗎？」發出這疑問的人如果不是偶然忘記我原是個新聞記者，便是根本不懂得新聞記者的職務是怎樣的。我和魯迅確曾相識，但够得上稱他爲朋友與否，這才是個疑問。本來朋友之稱是很泛的，祇因有過「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樁公案，假如我把魯迅拉起朋友來，恐怕文壇名宿要費點精神來查究我和他交情的深淺，況且魯迅早已去世，無可對證，有點麻煩，但我又以爲假令魯迅在世，我大胆地說句「我的朋友周樹人」，他也決不會擺起架子來加以申斥的。

x

x

x

x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是國民革命軍從廣州誓師出發後第二年，用魯迅的話，青天白日旗已插得遠了；但是一面是北伐勝利，一面是極大的矛盾隱伏着，爆發而爲這一年的清黨。如時人愛說的，某一個時代是大時代，民十六這時代就

不可謂不大了。魯迅恰在此時住在他以前沒有到過的廣州。

魯迅是那一天到步的，記不清了。查『兩地書』第一百一十三通是他在『蘇州』船上寫的，船泊香港，說『現在是十七夜……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午後四時可到黃埔，再坐小船到長堤，怕要八九點鐘了』。這所謂十七夜當是民十六年一月十七日，因為前一書是一月十一日在廈門寫的，有『則到廣州當在十九日或二十日』一句話。至於他是那一天離開廣州的，我也懶於細查，『三閒集』中回顧頤剛的信說，『八月中仍當行』；又同書『匪筆三篇』也說，『許多人已知道我將於八月中走出廣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謂學者的信』。他離粵總在八月中或九月初。那麼，魯迅在廣州的時間，約計是七個月。

我和他在廣州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永漢路碰到，我詫異他還沒有走，他却問我要用什麼方法把多件行李由市東的白雲樓運到市西去落船，我告訴他總交給旅店代運好了，問了他上海的通訊地址就分別了。我理應爲這事幫幫他的忙，無奈那時我也是行蹤無定的，往來省港，有點彷徨，因爲那時是『大時代』。

附帶一提，那年秋天，我到過上海，在良友圖書公司和他一會，除許廣平，

孫伏園也在座之外，我第一次見到許欽文，伍聯德却第一次見到魯迅。不久我又南歸，從此沒有再見過魯迅。

x

x

x

x

民十五六年頃，我不能做個「革命軍馬前卒」，却在後方廣州做個搖旗吶喊者，也算是參加革命。在那時那地，要日夜工作才算做努力，日間從市西跑到市東，工作在黨部，夜間跑回市西，工作在黨報。大約黨報有兩家，一是「民國日報」，一是「國民新聞」，我是後者編輯之一，魯迅將到廣州的消惠，自然是知得頗早的。「國民新聞」的社長，正是共同玩過文藝的舊同學。於是我被指派為打聽魯迅消息的專員。又因為「國民新聞」的一個副刊要改善，我便兼任副刊編輯，因為拉稿，便和鍾敬文熟識了；鍾敬文其時在嶺南大學中國文學系做個小職員，似乎是個書記吧。一天，他對我說，「魯迅快到了，我們何不等他到後去訪問一次」？這在我是容易的事，一個新聞記者，什麼人都可以去請見的，而鍾之一定要我同去，也許就是因為我有這種便利，於他也就便利。

我認為兩個人去，一來寂寞些，二來也不見得隆重，最好是糾合幾個平日信

仰魯迅的青年朋友一同去，有點像團體行動，而魯迅又是喜歡青年的，這才熱鬧有趣。

我知道魯迅的前驅是孫伏園，又知道他是個和易可親的老頭兒，要找個人先容，自然非孫莫屬。在中山大學那鐘樓上初見，孫一接到名片，就問我，「你就是『國劇本』編者之一嗎」？我說，那不過是一種宣傳品，一夜起了初稿，三個人商量修改過就付印，急就章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孫滔滔不絕，談到電影，談到美國的林肯劇，法國的拿破崙劇，因此一談，結果就答允介紹我們見周先生了。等到魯迅到步，我便和鍾敬文尋孫約定日期，他說，「明天早上七時先到我的房間，周先生就住在隣房，等他起來，就可以請見」。

x

x

x

x

那天同去的有五六個人，待聽到隔壁的咳嗽聲，大家便有點肅然之態。魯迅拿着烟捲走過來時，我覺得很面善，沒有什麼奇異之感。新聞記者有時要向人亂箭射去般發問，但有時却要靜觀，我那時是無寧採用後一法。鍾敬文却發言最多，原來他負有一種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的任務，就是受顧頡剛函囑或電囑，因為魯

迅初到，人地生疏，必有些不便，要隨時効點微勞。我也以為這是顧的好意，也就是鋪的好差使，殊不料魯迅祇冷靜地答一聲「哦」！絕不作道謝語。鍾再說一次，魯迅又是一次「哦」，孫伏園對此也不插嘴。顧頤剛要和魯迅在廣州打真正官司一事後來完全明朗化了，但為什麼叫鍾敬文幫魯迅的忙呢，我至今還沒有明白。談到將近中午，我請大家上館子吃茶點，廣州的點心是精美的，魯迅樣樣都試試，廉價的烟捲一枝復一枝點着，在座的廣東青年不大能用國語，周孫二人却談笑風生，惟有鍾敬文有些納悶。

* * *

* * *

* * *

* * *

回到報社，照例報告訪問經過，但我早已決定暫不寫什麼訪問記，因為我以為湊熱鬧或非魯迅所喜，如寫得不好，將來再去訪問時，魯迅也許有些戒備，不再和我深談了。新聞記者有時討人厭就是有聞必錄，有見必寫，況且魯迅不是過客，多見幾次再寫未遲，這不過是我的策略。但在這時期，我們的友報「民國日報」就不然，在它的副刊上，魯迅的照片登出來了，批評魯迅的文字也發表過了，那作者實在是一個稍讀過點書，留心文壇消息，又能分析政治派別的人，不論

其立論怎樣，總不是沒有意義的文字。關於魯迅的問題，可以說是從此開端，其表現出來的手法，不外是拉，捧，打。我爲維持我報的面子起見，把我們幾個人和魯迅合拍的小照登出來，加點訪問記一類的無關痛癢的文字，而其時「國民新聞」的副刊名字已由「國花」改稱「新時代」，這新名是我定的，也曾問過魯迅，他說很好，我以爲這樣籠統而大方，沒有什麼色彩。「新時代」第一期第一篇文字是姜仇的「拆掉象牙之塔」，甚至有人誤爲魯迅所寫的。

再過些時間，「新時代」總沒有魯迅稿，關心的人，旁觀久了。先來一個好意的忠告，說我去拉攏魯迅是自費力的，魯迅正有許多人包圍着，男的還有女的，他怎肯向我們的黨機關報投稿。社內一位同事和我談起魯迅時，必稱「周魯迅」，我說魯迅就是魯迅，他說是周魯迅，我說魯迅固然就是周樹人，他說周樹人就是周魯迅。那時是宣傳大綱，標語，口號的時代，不讀文藝書，不知有所謂筆名的人，原也無害其爲一個革命者。況且無政府主義者主張過廢姓，而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反革命者，那就無怪這人稱呼周樹人時也不敢廢去那人的原姓了。

我之常常去訪魯迅，既非拉攏，更非勾結，就拉稿也沒有過，祇有過兩次說

「如周先生要在此間報紙發表文字，可以送到『國民新聞』，寫我的名字收」這原也是新聞記者的應酬話罷了。人家去找魯迅，或各有其政治立場，我的却文學立場，但不為旁觀者所了解，嘲笑便隨忠告之後紛然而至了，認我為失敗。

三閒集「在鐘樓上」有一句話說：「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我想，我和我的幾個青年朋友都應該包括在內吧。

x

x

x

x

想拉攏魯迅來自張其軍的，就是完全沒有什麼政治立場的，也不是沒有，也許有很多。舉我所知的第一件事為證。

當我第一次去訪問的時候，來客却不止我們，在擠滿了人的孫伏園的房中，一位世界語提倡者黃尊生博士說，「明天有一個大會，是為歡迎一個步行全世界的世界語學者而開的，特來請周先生去參加」。孫伏園和在座的都在被請之列。魯迅似乎不表熱心，以不認識廣州市的路來推却。黃博士很敏捷，即指着我說，「我是老廣州，就請我領路。我不便推却，祇說，『如果周先生明天去，我便來這里陪行』，魯迅也就答應了。黃氏對魯迅又恭維一番，說魯迅前在北京，曾極力

提倡世界語，魯迅連忙否認。說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開會，黃登台致詞，又恭頌魯迅以前提倡世界語之功，即請魯迅演說，而魯迅一登台就又聲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在我覺得有點難爲情，而在黃尊生，却不是白忙一場，因爲魯迅參加這個會，而且演說過了。至於「新青年」雜誌唐侯致錢玄同一書，黃尊生當然沒有看出，唐侯即魯迅。

×

×

×

×

魯迅本來不是個慣於辦事的人吧；即使他也有辦事的能力，却不應該使他當教務主任，這是我當時的意見。在「中大」見他幾次，知道他確是很忙，現在看『三閒集』裏面的「在鐘樓上」便知其詳。在革命時期，一個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三件事：開會，演說，作文；其餘的時間才用在處理職守內的事務。如果要魯迅這樣做，真是辦不了，我對他確有點同情。但一個名人到了革命策源地而不這樣做，在那時確容易被人目爲不革命的。

我因事辭去黨部的職務，仍然恢復教書生活，但晚間在報社編輯副刊的工作不變。宋雲彬原是天天可以見面的，一天晚上，他忽然專人送來一封三十萬火急

（即是在信皮左上角寫三個十字）的信，拆開却是一篇稿子，題目是「魯迅先生那裏躲」。我略經考慮，就發表在「新時代」。這一來，魯迅就不能不發表文章了，幾天之後，魯迅答復的稿子到了。這篇文章題目是什麼，早忘了，好像沒有收入全集，記得文中有說到跌傷腳一事。附在宋雲彬一篇之後的，案語是我寫的還是姜仇寫的，也忘了，有時我事忙便請姜仇替我代編「新時代」。

他在廣州不但很少發表文章，而且連投稿「語絲」也很少，「三閒集」裏說過。在廣州的演講詞，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的「革命時代的文學」為最長。那四月八日晚上，軍校的小講堂擠滿了人；大約是因為魯迅的聲音不大，那時又還沒有播音機，所以不能在大禮堂開會，因此，聽講的多是軍官，學生頗少。我留意那幾個振筆疾書的速記員，很想他們趕快整理好，印出來，給沒有到會的人一讀。但不久就清黨，我以為這講稿也一同被清了去，不料那年秋間，當我從上海回廣州後，在一家書店裏發見這篇長文在軍校的出版物中，細讀一頁，覺得和幾個月前聽到的演講詞一樣，知道這確是速記下來的，原意沒有失却，即買一冊寄給住在上海的魯迅。現在收入『而已集』的有沒有經作者刪改過就不得而知了。

魯迅雖然忙於事務，遇着休息日我去大鐘樓看他時，他却很清閒；一次我坐了很久，竟然沒有一個客進來。他問我在各校擔任的是那一門功課，我說多是西洋史，他聽了似乎首肯。但我一轉便問到五四以前的一點掌故。我說，「那時便疑心唐俟就是你，現在從一本刊物中證實了。」他笑着說，「可知化名也是徒然，總給人看破」。後來談到電影，他拉開抽屜，檢出一張從報紙上剪下的電影廣告，說「斬龍遇仙記」不可不看，這是德國古老的民間故事。又談到中國的電影，他以爲壞處在中國人面目呆板，不善表情，古人以喜怒不形於色爲難能，演員如此就失敗了。「略論中國人的臉」當是那天閒談後寫的。我那天晚上就去看「斬龍遇仙記」，果然看到以前沒有看過的好影戲，但那時還是默片時代。

x

x

x

x

進出過大鐘樓魯迅寓室的人們幾次問過我，「許廣平女士和他的關係，你知到嗎」？我是一向自守不談別人這一類的事之戒的，總是答以不知，祇說這是「弟子服其勞」，不必大驚小怪。上文說過，我也是個革命工作人員，放棄黨務而法教書的理由是「革命不忘讀書」，所以教書也是革命工作，很邏輯的。許女士

在民十五下半年做過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訓育主任，我曾在該校教過幾星期的課，所以可以說，我和許做過同事，不過在學校時大家還沒有談過話，原因是工作不相涉，而我又祇是個鐘點教員。關於當日那學校的情形，『兩地書』說得頗扼要的。魯迅搬入大鐘樓之初，許女士怎樣替他佈置臥室、掛窗簾，買東西一類的事，我早已看在眼內。某一星期日下午，我去『中大』訪友不遇，改爲看魯迅去，其時全樓靜寂得很，魯迅房門大開，我問了一聲，聽裏面說「請」，是魯迅的口音，我就進去。室內只有他和許二人，許手中的小本線裝書還未放下，起來招呼我。就相對坐談書的情形看來，二人的超過師徒的感情，是不待想而知的。原來那時『兩地書』已寫到第一百一十三通，還有二十二通未寫罷了。坐定長談之後，烹龍井茶，出西洋餅乾饗客的，都由許女士辦理，這是超過弟子對老師應做的工作。後來魯迅遷居於廣九車站附近的白雲樓，我第一次去採訪時，他談話之間，好像故意要使我明白他們倆的關係似的，其實我早已明白，祇是一字不提。

x

x

x

x

白雲樓寓室的陳設，自然比大鐘樓的宿舍整潔得多，最觸目的是靠壁的一列書架。是上塞滿土紙木版的毛書，一瞥便知是廣東廣雅書局版的。廣雅版的書，頗有名於世，好讀舊書的人都知道。但經史子集中魯迅不買的不知是那一部，是那幾種。我問，「周先生也買了許多這種書嗎？」我原想和他談談版本。聽聽他對廣雅版或其他廣東版的批評，但他微笑着說，讀讀舊書總比抽鴉片好些。不知他是把我視爲一般新青年，還是當時沒有心情談到這些道理呢，因爲那時的廣州，像他在「而已集」上的題辭，還有一許多血和許多淚，而且還有許多謠言。謠言說他躲藏了，逃走了，他聽到這一種警告，他寫信向廣州市公安局長報告他的住址，表示隨時聽候逮捕，雖然公安局長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證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點憤悶，煩躁。他告訴我，黃埔軍校的某一高級軍官就住在他寓所的上層樓，那軍官也認識他，他住在這種地方，怎能說是躲藏呢？我安慰他說，「那軍官我也認識，好像是你的同鄉，他當然了解你，你住在這裡是安全的」。這嚴重問題便代替了毛邊書問題，談話也就終止於此。除素馨，楊桃兩種花果之外，魯迅在廣州賞識到的好東西怕就是這些書。

清黨一事，早在民十五年已可以預想到的，問題在用什麼方式，却沒有人知道。十六年春間，情形一天一天的嚴重，但黃花節和總理逝世紀念日，都安穩地渡過了，這時的問題是時間。到爆發那一天，在我却舒一口氣，因為事前等待得焦灼，緊張之極，到也便弛緩了。事發的第一天，究竟實際情形怎樣，我還不大清楚，只知是「來了。」一個平日有踴黨嫌疑的人，我特向他一問，他很冷靜地說，「如果沒有變化，就不是革命了。」兩個月後，我聽到他死在別處的消息。但魯迅在事前沒有想過這些事吧，所以「被血嚇得目瞪口呆。」在事發之前不久，那個湖南青年畢磊是個什麼人，知道的人很多，他辦的小小的期刊叫作「做什麼」的是異軍特起的赤色宣傳品，看過的人都曉得。幾個擁護國民黨的青年看不過眼，便也出一本期刊，式樣和「做什麼」差不多，取名「這樣做」。這兩種刊物當然是對立的，他們的出現，正是決裂在醞釀中的一種表徵，甚於此的現象自然還多着。報紙的一段話（見三間集怎麼寫）。我想不是刊於「國民新聞」，但實在記不清了。魯迅對於這兩種刊物「全不知情」是對的。那時明爭暗鬥的現象，自有其整個性，兩種小刊物以對立的姿態出現，只是全盤的一角落，主流的一

小支，如報上的話，偏要把魯迅拉進去，確是很無聊的。然而魯迅在此時此地，對政治絕無一點表示，好像超然事外，不藍不赤，便被人稱為灰色，這又難怪宋雲彬問他那裏躲了，我想魯迅先生，精神上的痛苦，以在廣州幾個月中為最甚。他在清黨前雖然不停地為自己辯護，但以一個剛從對舊勢力作戰的戰場退回到後方大本營所在地，便放下武器，已經是不合時宜；一到內部發生這樣大的變動的時分，別人都是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而他只住在鐘樓上，這確是時代所不許可的。他却是很堅定的，七個月中，態度一致，看他那個時期中的遺文就可以看得出。魯迅是軟弱抑或是堅韌，我在這里不下斷語，留待研究他的人去批評。

x

x

x

x

鍾敬文編的「魯迅在廣東」是應時的書，初時我勸他不要出版得那麼早，他却不管，剪貼一完，便付排印。這書的銷路相當好，但只可當閒書看；十六年秋末，我想自編一冊，把魯迅在廣州發表過的文章和講詞都收入，自己又就關於魯迅的見聞記下來，補上一篇長的文字，但不久共產黨暴動於廣州，隨着政治再起一次變動，我又奔走衣食，無意做這不急之務。就使我當時編成了這本書，也未

必能够吸引幾多讀者，第一是廣東人對他漸漸淡忘，第二是別處的人也不高興再來追問他在廣東七個月的往事了。可惜的是我沒有把魯迅見聞記寫成，到現在要追寫就祇能够寫出以上的幾段。本來我有厚厚的兩本懷中記事冊，密行小字，民十四，十五，十六年的國家大事，時人動態，都就所知一一提要的寫在裏頭；只因世事滄桑，不能不犧牲我著作的自由來換取或保全我身體的自由，早已把它燒掉。

x

x

x

x

以上所寫的是我自己的資料稿之一種，備將來寫回憶錄或自傳時用的底稿，行文也極草率，爲應編者之催索，在本刊發表了。因爲這絕不是爲紀念魯迅逝世而寫的。所以處處以我自己爲中心。

還有一事要聲明，我爲「新時代」寫稿時，署名「尸一」，久已不用，現在正是思舊，故再用一次。這不是筆名，而是注音符號，做名的音是這樣讀的。魯迅也曾問過，我說明了，他也笑起來。

我認識魯迅先生的經過

內山完造

在還未死的十年前，魯迅先生從廣東的中山大學回到上海。那個時候，我設店於福民醫院對過的露地上。在那裏出現一個人，在我的理想中，以爲是與衆不同的，但不認識他就是魯迅先生。

那次之後，他常常來店購書，有時帶着幾個人同來，必定買了書才回去。日本話也說得相當流利。

這是某一天的事情，找了很多書，叫送到他家裏去。問了地址，才說「東橫浜橋路景雲里的露地裏」，即現在電話局後面的露地裏，問他的姓名，他就寫了周樹人。「啊！你就是魯迅先生嗎？」我第一次才曉得。以後漸漸搭起話來。他又帶了各種的人來，坐在椅子上交談起來了。

以後在長久的交情上，還沒有談過政治，文學的話。

適巧那時，帶了現在居住在法租界的夫人同來。那時還未結婚，夫人是稱爲

祕書的許女史。

是在北京的五四運動時，魯迅担任北京女子師範的教授，運動相當熾盛時，許女史站在女學生之前頭，搖旗吶喊，颯爽的發揮了女鬥士的面目。

有一天、魯迅先生到我家，他說：「老板，我已結婚了！」因此我即問他「和那位？」他又說：「那個姓許的，因為人們都在造謠，我本不想結婚的，因為對她不住，所以結婚了」。

『夫人不是在北京的嗎？』我這麼的問他。『唔！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他清脆的回答。

誠然，在中國的結婚舊俗中，沒有見過新郎，新娘的場合占多，在本人的實感上，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母親的妻子的觀感比較強大。

魯迅先生關於家庭革命，在白話文運動中最先的寫了『狂人日記』，但這已是指着舊的家族制度革命而寫的，所以我以為他洩漏了有抱懷的思想的那麼冷不防的言語。

那時，急遽的由景雲里遷居了。但在那事的背後，漸漸魯迅先生的身邊，已

有危險相迫了。

因爲說要搬家，我就回答：『在那裏找找吧！』那麼他又說：『不能緩慢的』。我向他說：『那麼就搬到我的家裏來』。但他又說：『你那裏中國人出入的很多，不甚方便』。在現在興亞院對過的拉摩拉公寓，住着服務於海關的友人，但因快要轉勤到青島，不久房子會空下來，我問他這裏如何，他回答：『這裏很好，很好』。就用我的名義租下來，他也空身的搬進去了。雖然貼了一張我的名片，但因爲隔壁是一個英國人，所以一向沒有人知道。

對過兩間房住着日本人，但一向不曉得，在不知不覺中魯迅先生的學生，給人追趕，跑入那裏。不知什麼事情，感覺到危險，房子不動的又遷到『花園莊』去了。因爲沒有房間，就住在茶房的房間裏。那時，生了一個孩子，父母子三人，就住在移身也會碰頭的窄房子裏了。這樣，沒有一個人知道魯迅先生就在這裏。他日常差不多潛伏於地下。

後來這樣事發生了三次，而毫無辦法，結果搬到我家的三樓，在狹窄的地方起居，過着和軟禁無異的生活。

魯迅·佐藤·內山

陶晶孫

魯迅搬到大陸新邨之後，因為這個房屋比較好，我們覺得這是爲他的健康有好影響了。這時社會情形雖並不好，可是魯迅却有一部份羣衆，即他的門人在跟着，常見他在內山書店坐坐，或馬路上走過，此時他正在弄着些板畫。

內山完造氏爲上海內山書店主人，他留滬已很久，他的書店中所陳列者爲新刊的比較所謂高級的書，他對於我國文人買書，給與種種利便，尤其對於一二文人之缺少利便者供給更利便。他對魯迅也如此，魯迅找房子，付自來水自來火，各種小事都很幫忙，往往我國人辦不到的事，他出來辦，情義之深，有如親戚，他也極會弄文學，往往比彼國內某種文士還超上，但當然不能談進一步的我國文士之事。魯迅一九三二年給他的信謂：

得四月二日大翰，暫時到日本去居住之事，是我早就夢想的，不過現在我想着那不是十分好，所以決定不去了。第一，此刻離開中國，就要弄到什麼都不曉

得，結果什麼也寫不成功了。第二，如爲生活而寫作，則必須爲一個賣文者，對隨便那一方都不中用了，那麼佐藤先生增田君都要爲我。稿子奔走，這種討厭的人物跑進東京真不對，我覺得日本也還不能夠講真的話，一不留心，要給大家迷惑了，如或爲了生活而寫讀者所需要的東西，那麼又要成賣文生活。

各位的好意，我誠感謝。因爲不知道增田君的地址，所以請轉達他，也請轉達佐藤先生，致我的謝忱。前天我回到家，周圍很冷靜，當然社會之不景氣也要影響到我，但我也試來寫作吧，如果再有大砲轟來，那麼再逃走罷。

書店每日仍去，但已沒有漫談，所以很冷清，你什麼時候回到上海，希望早些回來。（大意如此）

那時內山主人正在日本，與佐藤春夫等商量如何請魯迅到日本去居住的事。佐藤春夫是日本有名的作家，日本明治以來初期之作家，多合出些錢辦一小小什誌，二期文士貧病而苦在煩惱憧憬之中，三期文士漸漸有稿費可以生活了，四期文士收入大加，如菊池寬先生等可以造屋宇開公司買賽馬了。以後文士生活總不至於過分困難了。一九三二年魯迅在上海困苦，內山，佐藤等覺到日本可

以安定寫作，商量結果，索性叫他到日本去。佐藤與芥川龍之介是兩個很能了解中國古典，愛中國文學的人，再加一年輕之增田涉氏，他們不比近時日本文士之慣於富裕而不理解我國文士之又窮又不能用功，很能看出吾輩之思想的苦悶及生活上困難，所以想出這個辦法，不過魯迅爲種種關係把他拒絕了，我們在上面信中可以看出一切。

佐藤，內山，能知社會上苦勞，有意爲吾輩文士出力，他們中老，知社會，知同情，或者是應該，但也須感謝，勿罵他們老朽，反要謝謝他們的友情。

魯迅先生的遺像

姚克

堅銳沉着的眼睛，正直的鼻子，堅強的顎肌，寬大而緊闔的嘴唇，上面覆着濃厚的黑鬚——這一幅魯迅先生的遺像，以前，凡是到過萬國殯儀館去憑弔他的人們是不能忘記的，對着這一幅遺像，我禁不得惘然回想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魯迅先生攝這張像的那天。

事情是這樣的——

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我和一個美國青年作家，計劃着翻譯魯迅先生的作品，同時我就寫信給魯迅先生，請求他給我們「翻譯的特權」，這種請求是必需的，否則就是侵害版權，（在中國，作家的著作權似乎是沒有人理會的）但也因此認識了魯迅先生。

我陸續在「吶喊」，「彷徨」，「野草」等集中選出了許多篇，一面開始把他們譯成英文，一面向魯迅先生要了幾張他的照片。他給我的幾張都不很好，不

能把他的性格傳出神來，所以我就請他在便中重新攝一張比較好的。他答應了，但過了些時仍沒有攝成。

五月二十六那天下午我到內山書店去訪他，閒談了半天，他說他想出去買些東西。我們就同趁一路電車到南京路。在路中我又提起了照像的問題。

「不瞞你說，上海我雖住了好久，但實在太不熟悉了，連街道都不很認得清楚，我也不知道那一家照相館比較好，所以至今還沒有去照。」他笑着告訴我。

「好的照像館倒不少，但價錢很貴。此外也有幾家價錢不很貴而技術不錯的，回頭可以去試試。」我提議着。

「那麼，回頭買好了東西去試試看。」

我們到南京路下車跑了一二家公司，也並沒有買什麼東西。最後跑到新新公司的玩具部，魯迅先生說要買一點玩藝兒給海嬰，他所鍾愛的四歲的兒子。

「他吵了幾次要我買玩具；也吧，我就揀兩件給他吧！」

所買的是那幾件，我可有些記不清楚了；內中好像有一件是一個洋鐵娃娃翻槓子。那玩具部中陳列着的玩具種類繁多，有許多是很精緻，很有教育意思的。

魯迅先生最愛一套鐵的「建築玩具」，那是各種形式不同的鐵片，輪軸等等，上面都有圓孔，可以搭成各種東西，例如房屋，汽車，輪船等。這是英國貨的玩具，價錢是一百多塊錢。

「中國人根本就不注意小孩娛樂，」魯迅一邊鑑賞這一套精巧的玩具，一邊感慨地說，「這裏的東西倒有十分之九是外國貨。可是，便在外國，像這樣貴的精巧玩具也只有外國富翁的兒子們可以享受吧！」

走出了新新公司，我提議到雪懷照相館去攝影，一來他離新新公司很近，二來價錢也很便宜。於是我們就走到了雪懷。魯迅先生進了攝影室，很幽默地向我說：「我想我是照不好的。五十開外的人了，要我照得像這樣（他用手指着壁上掛的一張女像）好看，恐怕是不成的。」

但是他這一次照的像，照得總算不錯，在我所見過的他的照像中要算最好的了——至少是最精神飽滿的一幀。這次萬國殯儀館靈堂正中的魯迅先生遺像就是從這一幀放大的。

攝好了這張像之後，他又和我合攝了一張照，以留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之後

，我曾趕到雪懷照相館添印幾幀，但照相館的女掌櫃說這膠卷照相的底片早已沒有了。

「我們不知道這是魯迅先生的照相呀！」，她抱歉的說：「早知道是他的，我們早就保存起來了。」

那天攝影之後，我們就分手各自回家。後來有一陣風聲很緊，他不能出來；我有幾次翻譯上需要詢問他，也不能去找他。六月十八日他有一封信給我，是這樣寫着：

「華農先生：

來信敬悉。近來天氣大不佳，難于行路，恐須蟄居若干時，故不能相見。譯文只能由先生自行酌定矣，照片如能見寄一枚，甚感。

其實以西文介紹中國現狀，亦大有益，至於發表中文，以近狀書，易招危險，非詳審不可，此事非數語能了。未知何日南歸，屆時如我尚在滬，而又能較現在稍自由，當圖暢敘也。專此奉復，順頌

時綏。

迅啓上六月十八夜」

此後我就回鄉一次，整理行裝準備到北平去，動身之前又到上海來，并到內山書店去訪他一次，順便把上次照的相送幾份給他，又請他在照相上簽名。這張照相，後來我又送了另一張給美國青年作家 Edgar Snow，他在美國「亞細亞」雜誌上（一九三五年一月號）發表一篇「魯迅評傳」就用了這張照相，那是這張照相見於印刷的第一次。

現在這張照相還依然無恙，而魯迅先生已經與世長辭多時了！追憶那天同去照相的情景，還彷彿歷歷在目，可是祇剩下了一些追憶，要想再親先生的聲教是不能的了。

夜是這樣地冷靜，我寫到這里不覺惘然感覺到一種的 ancient 悲哀把我淹沒了，一魯迅先生，我願你安息……」

魯迅先生對於我的啓示

蕭劍青

在過去，啓發我底藝術與人生的意識，具有最大影響的，可以說是魯迅先生了。記得早十年的時候，我由南洋到上海來，偶然的在虹口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裏，由光華書局經理張松濤君及金民天君的介紹，我才認識了這一位中國偉大的導師！

那時，我到上海，僅僅八個月的時間，在這八個月的時間中，是值得我畢生地紀念的。因為這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我得林漢達先生介紹至世界書局任事，結識了許多許多的文化人。同時又得到了魯迅先生許多次的啓示，使我在著作上藝術上，認清楚了最大的目標！

爲要紀念魯迅先生給予我的啓導，不得不先來介紹我這一位亡友金民天先生。當我在南洋和廣東的時候，是有兩部詩歌的稿寄至光華書局出版，所以後來到了上海，就去拜訪那位出版接洽人金民天先生。金先生和魯迅先生是鄰居，因此

我們在成爲深交後，時常就會談起魯迅先生來，我因爲一向醉心於魯迅先生的著作，且更景仰他偉大的言行。故而時常都懇請着金君爲我介紹。

某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張松濤及金民天在內山書店裏翻閱雜誌，不久，有一位面貌慈藹身穿長袍的中年人進來，金民天見了，就很快地向我說：

「魯迅先生來了，魯迅先生來了！」

我馬上斂下了正在談說之笑容，非常莊重地站立着，等候金君的介紹。果然，不失所望，由這一天起，就算是認識了魯迅先生！

第二次和魯迅先生在施高塔路見面，他就很關心地問起我的生活來，我告訴他已經在書局裏受職，不過，自己對於這重大的工作是感到十分惶恐，這是因了自己的學術程度底關係。魯迅先生說：「在書局裏工作，好的就是有和書本接近的機會，但是，讀書要有正確的目標，像你們這種優秀的青年，就應該多選一點和社會密切關係的書來讀」。魯迅先生這話，雖然是十分平凡，然而他那種誠懇與摯愛的精神，就十分堅定了我求學的志趣。

第三次是在電車裏遇見了魯迅先生，那時，我因爲著作了一部「灰色集」，

內容係詩文小品及木刻，在匆匆巧遇的時間裏，我就約略將原稿給魯迅先生看，他看了一回僅說出一「很好」兩字，在這一次遇面後，我就將這「灰色集」的原稿再寄至內山書店轉給魯迅先生，並要求他爲我寫一篇序，大約是隔了五天工夫，原稿是寄回來了，序是沒有寫，但是信却有一封，是說他沒有空代我寫序。當時，我很有點失望。

第四次我又在內山書店裏見了魯迅先生，這一回他才注意到我的繪畫。他把我那本「合衆書店」出版的「抒情畫集」翻了又翻，說：「繪抒情畫不如繪社會勞動羣的寫像，你的繪畫線條很美，祇是取材過於柔弱，以後最好能把筆鋒轉向社會的內層上」。最後，他又對我說，他很感到欣賞繪畫的興趣，同時更願致力於藝術革命的工作上云。臨別時，魯迅先生更對我說：「有空時，可以到我的家裏來談談」。

我是十月間到上海的，到了次年五月，我便收到了南方的來信，說父親的商業已遭遇着慘變，於是我就準備下一個月整裝南返，我想起魯迅先生曾說過：「有空可以到我的家里來談談。」因是我又將一部新著「衆生相」寄至內山書店轉

送給魯迅先生，要求他爲我寫序及批閱，我在信裏並說明四日後親往取回。過了幾天，我便到魯迅先生的家裏，很巧的他沒有出去，他就對我說：

「你來得真巧，『衆生相』一稿，本想派人送回給你了。」

「先生可有代我批閱過和作序麼？」我問着。

「序還沒有寫，原稿已拜讀過了。有幾篇文字很不錯，畫更好，不過其中有一兩幅我以爲抽出來比較妙。」魯迅先生說着，並把原稿遞回給我。

我知道魯迅先生確曾審閱過那一本稿子的，故而唯謹唯誠的接了回來。在這一次會面中，我得着魯迅先生的啓示更多，更大。我記得我把藝術的至上主義（Art for Art）和功利主義（Art for Life）的分別與對社會的影響如何向他請求確正的解釋，他於是就向我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魯迅先生說：「爲什麼在藝術的整個園地裏，有了至上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潮？因爲藝術是由社會環境底影響所形成，在他中間的觀念，感情，思想，意志等，都不能超脫了社會生活物質的基礎的。」

「藝術至上主義，在十九世紀末及廿世紀初，是盛行於詩歌，戲劇，小說，

或別的藝術，音樂，繪畫中。他們的主張，認為藝術的製作目標，全在藝術的自身上，絕對不滲入任何的目的與手段，完全是藝術家創作慾的表現，除了純粹美以外，不能以其他外部的事情而影響及其創作的。那麼，藝術家爲什麼有了至上主義的藝術傾向呢？因爲藝術家本身是社會產物之一，所以他的作品無疑地是要和社會取着一致的行動，然而當了社會組織起了變革的時候，他們若不感覺到或不希望這種突異的變革，他們便自然地會和四周的社會環境不能合流，同時也一定發生與社會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於是便在藝術園地中追取那美的美 *Beauté de la beauté* 底表現，來滿足自己；他們寧可像在孤島中籠閉在美的天地中，擯絕了政治經濟及其他人生的活動。這樣一來，在他們思想中的藝術，就變成以狹義的美爲生命了。

「藝術至上主義的藝術家，每每都以爲自己是人類中挑選出來的英俊，他們不管多數人的頹於危難底呼喊聲，以爲祇有他們這一般英俊者才能傲然踏進這藝術園地的象牙之塔，他們存有這種狹窄的思想，所以對於社會，對於人生或人，全部抱着取樂的態度。至於人類生活應如何改進及社會應如何變革，這些問題全

不存於他們的觀念中。

「至於抱藝術功利主義的藝術家，他們認為藝術的產生及發展，絕對不是基於自身內心的要求，也不是以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為目的。他們承認藝術常是被社會的政治形態所決定，且是直接向人生改造路途進行的。他們以為每一個時代裏成功的大藝術家，有大部份是和他們處身的時代底精神和支配勢力相調和，所以他們的藝術，都是受着當時社會的支配者的指使而創作。這一般藝術家，不但是會成為政治的保守者，且帶着違背歷史的反動性質。

「功利主義的藝術家，簡切地說，他們的藝術底創造，是澈底代表支配者的支配思想和信仰特權的，所以他們對於社會的發展，實在與支配階層中的一切政治，法律，思想，觀念等同樣成為社會進化的障礙物。

「總而言之，藝術至上主義是為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 Sake 的，藝術功利主義則可以說是為人生而藝術 Art for life Sake，要是我們以自身站立在大時代中，以明敏的眼光去檢討和觀察他們的優拙比較，很容易地顯出這兩種主義都不正確。尤其是以藝術至上主義為荒謬更甚。無論如何，藝術的現象作用，總是基於

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而把握着整體的意識的。他斷不能超出社會所需要的階層而存在，更不是由一小部份的享樂者所能佔爲已有。

「我們可以用結論的方式來結束這段話，大藝術家的意識與其時代的意識兩相調和的時候，他所產生的表現，必然地是在功利主義的範圍中的。反過來，藝術家的意識背棄了時代的意識，他所產生的表現，就必然地歸入藝術至上主義的範圍中，然而，這兩種絕對不同的主義，有時在一個人的環境中，往往因爲受着生活的影響，會先後經過兩種主義的歷程——即是有時抱着藝術至上主義，有時抱着功利主義。由這點我們可以證明大部份的藝人底意識，是由環境而決定的。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判明「功利」和「至上」的誰是誰非，而再把握着新的社會底意識去做一個時代所需要的藝術家了。」

魯迅先生這一段話，雖然不是當時就筆錄下來，然而八九年來，總會澎湃於我的腦海之間，且對於以後我底藝術工作，發生了莫大的影響，我永遠地銘記着，合乎時代之藝術是不應保守那社會的殘餘渣滓，同時更不應做了社會支配層的工具，來阻礙社會的進展。

在那一次的會面中，我獲到許多的藝術底正確意識，及後，我別了魯迅先生回家後，把「衆生相」原稿打開一看，第四頁「聖母像的跪拜者」一篇短文和畫稿中，都有了魯迅先生的批示。

可惜那一篇短文後來寄至星洲日報而不知所終了。

不久，我離別了上海，離別了祖國，回至那白色帝國主義的鉄蹄下——南洋以後，不幸的事件是連續着使我發生了莫大的刺激：父親的商業是完全宣告破產了。我們歷代蟄居在南洋的家庭，就開始遷回可愛的祖國底旗幟下。

民國廿三年以後，我由香港飄泊至日本，流浪半年返至申江，是時，慈愛的父親，離別了人間世而返至天國；再隔不久，回至華南，渾渾噩噩的當了中山縣立天涯藝術學校校長，而魯迅先生逝世的悲訊亦接踵而至矣！我因了久歷名山大川，不慣羈身於學校生涯，又開始棄絕了學校生活，置身中華世界旅行團中，而適於團體在杭州奠旗出發的時候，老友金民天亦以政治身亡！

從此以後，三年的飄泊生活，再次到過朝鮮和日本，且足跡遍踏中華各大行省中，直至「八一三」事變後，才安全地回至家鄉與妻兒共守田園。不知不覺間

，魯迅先生的一週年祭，二週年祭，三週年祭是流水地飛逝過去！直至今年，才應了中華日報楊之華先生之命，謹書此文，以爲紀念我匆匆數面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及聊報知交的囑託而已。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

魯迅先生逝世的六週年紀念日十月十九又來臨了，現在我手上的，有一冊「魯迅紀念委員會」編印的「紀念集」，如今把他翻開來一讀，就是：

魯迅先生逝世經過略記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先生逝世於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一三〇弄大陸新邨內九號寓所。當即由蔡元培等組治喪委員會，發表如左之訃告

魯迅先生訃告

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爲各界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

聞。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

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A·史沫德萊，沈鈞儒，蕭參，曹靖華，許季荊，茅盾，胡愈之，胡風，周作人，周建人。

接着以蔡元培爲首的，許多內外的知己友人，都各從其自我的思想和立場，發表其真心的哀悼文，一輯，二輯，三輯的出版了。我的眼前彷彿浮現起先生的遺容和廣平夫人與海嬰的容姿。

在將來的中國，可以看見阿拉伯的沙漠。

所以我要鬥爭。

從今日的狀態來作想，四萬萬人都要站到饑餓的戰線上，那時才是世界的悲慘呀？

中國四萬萬人都患著馬馬虎虎的病症，在日本有適當的療法；就是爲了戀愛而殉情的男女，也有其真面目。

隨着一樣一樣的憤起先生的透徹底言論，我正視着現實，也和許多的知己友

人一樣的，感覺到說不出的寂聊，而各自的追懷先生。二六〇二，十，十五日寫畢，上海。

微微的苦笑

內山完造

『老板！中華日報的雷先生來電話。』馬上拿起電話聽筒，喂喂的談起來。

『魯迅先生死後不覺八年了，本報想請你寫一點東西，楊先生已經托過陶晶孫先生代約，他有沒有對你說過？』雷先生這樣說。其實在昨晚靶子路青年會的中國研究會途次，陶先生（當晚的演講者）就問起『中華副刊』有無囑寫紀念魯迅的文章，因為當時確未聽說楊先生要寫什麼文章，所以回答他說還未有過。大概因這件事，我是早已明白的，果然雷先生的電話，就是爲了這件事。

「是！好的，那麼我寫一點吧！」這樣的回答了。他這次又要些希罕的書翰，或者照片也好，請予爲準備云。

「是！是！好的。」完了電話，應該寫點什麼呢？坐在椅上，閉目迴思，當時光榮的事如走馬燈一般的浮泛着，那時先生曾經這麼的說過，那時先生曾經這麼的幹過。思潮一陣陣的接連地浮起來。對於魯迅先生這些也想寫下，那些也想

寫下。我應從魯迅先生如何受人家欺負處寫下來吧？我應從魯迅先生的生活的矛盾寫下來吧？所謂魯迅魂者即是這麼的一會事就把它寫下來吧？我從人間是怎樣的殘酷地方寫下來吧？然而這樣的思索，結果什麼也寫不出來。可是祇有一件當時發表過的先生的遺言，却很清楚的留着。

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胡塗蟲。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是做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還有兩件已經忘記了，當然都是堂皇的，尤其是，『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一語，果然是魯迅先生的面目躍然如活的存在。但違背了先生的這一語的，竟產生了魯迅紀念事業委員會，我也是其中的一人。計畫了各種紀念事業，但到今天什麼紀念事業都沒有做到。你看！萬國公墓裏的先生的墓碑，他那貧弱

（和宋××一家的墓碑相比較）的祇有一個二尺見方的陶器的碑位，已因事變的破壞，倒塌在中央的先生的玉照，已經不翼而飛了，可是堂堂魯迅紀念事業委員會，並未修葺其陶碑，我想先生於九泉，定罵他他都是些無用的飯桶吧，而私自微笑。腋下流着冷汗的我，又不禁微微的苦笑了。

（真原譯）

關於魯迅

周越然

魯迅先生雖然是我的宗兄，但是關於他的『史』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他名樹人；他有兩位弟弟，一位叫作人，一位叫建人。除建人兄與我共事，天天見面，幾二十年外，其他兩位，我沒有會過。不知道他們兄弟三人，相貌像不像，瘁氣同不同。建人兄是博物學者，專事著述，沉默寡言，從不和我們談家務，從不和我們談到他哥哥的故事，或他哥哥的著作。

魯迅的著作——『魯迅全集』——那一個新派讀書人不知道呀？他從前一本本地出版的時候，我統統買過的，不過沒有全讀。我所最注重的是（一）『阿Q正傳』及（二）『中國小說史略』兩書。前者的文字，相當滑稽，我細細讀過。後者的編輯，相當認真，我常常查考。其他諸書——老實說——我不過翻翻疊疊，沒有細看。其實，我是不願細細看，因為他的書看了使人心悶。英國蕭伯納的劇本，德國哥德的『少年維德之憂悶』，我也不喜歡多看；他們有相似的『毛病』

啊！

我所藏魯迅著作的單行本，都於民國二十一年遭劫了。但是他的全集在四年前（？）預約時，我以八元買到一部，後來北方友人硬硬把牠拿走了。他的全集去年夏秋之間，漲至三百元，不過現在又跌了。

文集跌價漲價，與著者是沒有關係的，魯迅終是魯迅——終是一位勤力的作家，偉大的作家。你看他一生所寫有多少字呀！

魯 迅 小 祭

柳 雨 生

如盤夜氣壓重樓，

剪柳春風導九秋，

路瑟凝塵清怨絕，

可憐無女耀高丘。

此魯迅先生舊時所作悼丁玲女士詩也。時丁玲因思想激左，被禁，繫獄中，外傳已死，而沈從文且因之作『記丁玲』長文。故會稽周翁，亦感慨賦此，與其無題之另一首，中聯云：『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及『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均堪稱一時絕構。曰忍看，曰怒向，其悲憤之狀，溢出言表。慈母最可愛，而大王最可怪怖，以之相偶，適見其哀感之極，慷慨豪邁之極也。此是文學之一相，惟至性中人，乃能有此。雙照樓詞有句云：『光滿處，家家愁幕，一時都揭』。又云：『看分光流影到疎巢，烏頭白』。此又文學之一相也。詞係詠月，而會稽之詩，亦云：『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有光有月，則緇衣終能明徹如水，更能『滌來萬里關河潔』，革命家之抱負

，如出一轍。魯迅之足爲東亞民族文學之靈魂，信矣。

惟至情爲能感人，不必拘於俗態世習也。魯迅之死，噩耗聞於燕京。周豈明先生方在北大上六朝散文課，仍卒篇，徐云，「魯迅死，余將歸省其太夫人」。寥寥數語，而孔懷之恩，死生之感，盡在無言。顏黃門有兄弟篇，推手足之誼，蓋曠古情篤，尤以苦雨翁沖淡之懷，益可見其真悲耳。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記於江甯之存仁堂。

魯迅先生

馮三昧

魯迅先生離我們而到寂寞荒涼的墓園中去，已是整整的八個年了。但他在整個中國文壇，乃至全民族的心中，却還和高山上的蒼松一般，不但在地面的表層，也還在岩隙的深處植下根株，此後將永高踞山巔，蒼翠欲滴的生活着罷。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中，他是永不會被遺忘或疏遠的！他謝世後，治喪委員會爲保存他的遺著而收輯的尋常版『魯迅全集』現在已有人出千元的高價而搜求不得，這就足以證明在精神上和他親炙的人衆多。那年任叔兄在廣平先生家裏主編『全集』，我還以魯迅先生生前講究版本爲由，勸他提高印刷，裝訂和紙張的樣式，以符魯迅先生的素習。但誰知道連這尋常版的『全集』，現在也竟洛陽紙貴，千金難買了。記得幼時到蒙館裏去上學，親友多以『十里紅』，『金不換』等大小毛筆相贈，以討將來寫字作文的彩頭，魯迅先生的筆，怕遠不是『十里紅』，『金不換』等所可比擬罷。

我和魯迅先生相識，是在四川路底一家叫做「東亞會食堂」的會議席上，開什麼會，已早忘懷，我只記得出席者有洪深，陳望道，馮雪峯等一批拿筆桿的無用之人而已。那是，他從北京來滬未久的一個夏季，半新不舊的軟草帽，和似綢非綢的夏布大褂，確是合乎身分和性格的裝束。但在談吐之間時常流出，「是！——是！——」等舊式官僚的口頭禪，頗覺令人不快，使我發生對他的腹議。但這也許是他在北京教育部任事久了，積習難反，「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未可知。後來又在虬江路口的味雅和他在景雲里的寓所裏會過幾次。

但我和他私人之間，實在並無深交。不過他老人家始終對我保持好感，加以厚愛，這是使我非常感奮的。其實他對任何自愛的青年，都是竭誠愛護，樂與提携的，這也是他不失童心而又站在青年前面，永為我們靈魂導師的原因。記得他初刊印大幅的新俄板畫，原因是為提倡藝術，滿足興趣，原都由他個人自掏腰包的，但為印刷術技的關係，非經轉展託人，向本埠的商務印書館定印不可。因此在種種的限制下，所印部數，非常稀少。第一次也只是一百多本，除以少數寄售內山書店以資流通外，其餘只够贈送原作者與各友好。故要弄到一本，可說是相

當的不易的。據說那次連曾替他奔走印刷的某君，也都沒有得到他的贈書，其難得可知。但有一天，却不知是怎的，承他特地託我家馮雪岑君送來一本玻璃版，磁青面，宣紙本的大幅板畫集，真使我有童時獲得偶人兒的一般，看了又看，愛不忍釋。這雖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揆之他老人家來去分明，一絲不苟的脾氣，在我已是勝獲希珍，一大殊榮了。可惜他所送的板畫集，已和所藏錢維城的山水，郭尚先的墨蘭以及近時的名賢手蹟，一同在二十年春的兵火中，付之一炬了。這都是使我非常痛心的事。

又其譯著各書的裝幀與扉畫，一向都是由陶元慶君執筆的，像他所譯的『苦悶的象徵』和自著的『徬徨』，其封面畫都出陶君之手。陶君死後，魯迅先生所出各書，大都由他自己題字，或畫一點簡單的圖案付印，從未假手他人。這也是他老人家不忘舊好的固執的習性之一。他對弱者的熱如湯火，和對強暴的凜若冰霜的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據我想來，就是這習性的一種擴大和發展。

一次他將他所翻譯的盧那却爾斯基的『藝術論』送交我們所辦的大江書鋪出版，適我閒坐無事，就照案頭所見的西藥廣告，給他畫了一幅封面。又誰知我這

一張非畫家所畫的『素人繪』，竟被他老人家看中了。所以第一版的封面內部，還特標有『某某裝幀』字樣。後來却因某種關係，將這不需要的題名抽掉了。可因此我却受過其他書局的囑託，買過幾次封面畫，這也可以算是我生平的奇談之一。

因又遇到魯迅先生的忌辰，不覺想起以往和他的一些瑣事，如果這也算是懷舊之作，就當作我紀念他的一點隨筆罷。

關於魯迅二三事

真原

一 魯迅與柔石

一九三〇年三月左翼聯盟成立前兩個月，有所謂自由大同盟的成立，魯迅雖然也參加，但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同時這自由大同盟也爲政府當局所彈壓，更因浙江省政府的呈請「通緝魯迅」，所以魯迅一時不得不藏匿起來。

除四月時曾一度回過寓所外，未幾，又在五月遷徙至北四川路，這裏就是北四川路底，離內山書店不遠的公寓的三樓上。

可是第二年也發生了一件不得不把住址藏匿的事，這就是魯迅終生不能忘記的一件極悲痛的事。

那是魯迅在北京時代的學生，住在魯迅景雲里時代的附近，有一個青年名叫柔石的，他每日出入於魯迅的家。他是個曾經創作和翻譯過的青年，魯迅和他及

其他的青年，一同担当介紹東歐，北歐的文學，而且爲了介紹外國的版畫，便設立了『朝華社』，出版『朝花旬刊』及其他。柔石是個非常善良的青年，他和同鄉的女性走路時，總是要相距三四尺遠的。可是和魯迅一道走時，却又誠恐魯迅給汽車或電車碰倒，所以緊貼的一同走才放心。稍後柔石受了書局的委託編輯一本雜誌，那時該書店也想出版魯迅的著作，托他向魯迅談論版稅的問題，魯迅接受了條件，立即將和北新書局簽訂的合同，托他帶去，柔石把它放入衣袋裏走了。但，這已是最後，柔石再不出現了，翌日（一月十七日）他便被捕了。

另有一個叫做白莽的青年。在魯迅主編的雜誌『奔流』，他是向不認識的青年，投來了從德文譯過來的『培托夫傳』，魯迅向他取原文，他就親自送上門來了。他是一個黑面，容貌端正的青年，後來魯迅又約他譯些培托夫的詩，他又親自送上來，第三次晤面時，已是夏天，可是他還穿着棉襖，揮着汗。因此才知道他是革命家，釋放不久，衣服也被沒收了，所以從友人處借來了這麼的一襲衣服。

魯迅得聞他的釋放，非常欣慰，給了够買衣服的稿費而走了。這個青年不久

又不見蹤跡了，原來柔石被捕之日，他也被捉去了。

因為柔石和白莽都有魯迅署名的書信書籍的原故，因此魯迅於一月二十日急遽的把友人的書信焚燒，與妻兒避難於附近的日本人所經營的公寓『花園莊』了。

魯迅得了柔石寄給他的同鄉的信，那信是這樣寫着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滬。并於昨夜上了錄，開政治犯從未上錄之記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股夫兄（白莽的本名）學德文，此事可告周（魯迅）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廿四日

又在信的背後寫着左面的話：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轉交趙少雄」。

後來得了更多的消息，有的說有錢可以保釋，有的又說已解送到南京，不知那一說是正確。後來用書信，電報探訊魯迅的人，也一天天多起來了。遠在北平的母親亦因此而憂病了。

寒氣一天天加重，魯迅担心柔石沒有被蓋，沒有飯碗吃飯，思前想後，募憶起前年回到故鄉逗留了一個時期後返到上海曾受友人們的譴責的事，魯迅便把那些事用悲憤的語調說：「我的母親兩目已失明，她千囑萬咐的留我多滯留幾天，所以那能這麼早就回來呢！」他想起柔石母子的眷眷之情，思此想彼，魯迅繼續不能安眠幾夜。

不久突然接到可靠的消息。那就是在二月七日的夜裏，或八日的早晨，二十四名政治犯在龍華的警備司令部槍斃了。柔石當然也在內，聽說他中了十彈才倒。還有白莽也混在裏面，他如李偉森，胡也頻等，共有五個文學者在內。

魯迅感到極度的悲憤，在一個月明之夜，他立於公寓的小園裏，周圍堆放着很多壞的道具，人們都已入睡鄉，萬籟俱寂，在這月影照着蒼白靜寂的小園裏，他想起失去極好的友人，在中國失去極好的青年的事，對斷腸的思潮，苛烈的責己了，在這怨憤中他吟了一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處寫，月光如水照緇衣。

魯迅吟了「無處寫」，真的，在當時沒有地方可以給他發表，後來就寄給附近一位認識的日人山本初枝夫人了。

這首詩在後來，曾得他的對手郭沫若讀絕，他說「富於唐人的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這次事變發生，郭沫若結束了亡命日本十年的生涯，別離妻兒，在這歸國途次步了魯迅的原韻作了一詩，由此亦可見他對於魯迅的詩是如何的醉心了。

二、臨終前的魯迅

六月（民國廿五年）增田涉氏訪問魯迅於上海，也許魯迅已感到相當危機的時候吧！關於當時的事，增田涉氏在「回憶魯迅先生」的一節說：

「去年六月我遊上海，再會了闊別六年的先生，但住宅已變了。躺在病牀的先生，已消瘦得差不多認錯先生的丰姿了。然而精神還很旺盛，他談中國的文壇，洩出憤懣之意，他有蓬蓬勃勃的與某某鬥爭而把它的惡傾向打破的決心。這是作家協會（指文藝家協會而言）成立前的話。比六年前感到更銳利的東西，但

我感到是否由病的精神興奮的相助，而反使我担心。

數天後我又往探病，在病牀雜談，因為問起什麼叫蛋淘飯，他即說就在今晚請你吃吧！這樣我在闊別很久的先生家裏的桌上用膳了。把蛋淘飯吃了半碗左右的先生，我很累先生失陪了，即登樓回牀去，我仰望由景宋夫人扶持，靠着欄干一步一步上樓的先生，看見穿着白衣服的背影，我感到寂聊不安。大概已不能再繼續吧！我含糊的浮起這樣的絕望感。在六年前與先生同桌時他時常用小茶杯的喝着兩杯五加皮，或三四杯的老酒，可是那天晚上，我不能喝酒了，如果你喜歡喝請你自便。他就把玫瑰花製成的酒，叫做玫瑰露的酒，拿到樓下，我獨酌了空虛的玫瑰酒了。

魯迅在那時起一方也由人們的慫恿，抱着在暑熱季節易地的希望。最初因為有須藤醫師的親熱的人在日的鎌倉，所以也曾想過到那邊，但恐離東京太近，担心給新聞記者等的包圍，後來想轉到長崎，但因為無人照料，而且旅店太貴，住小旅店，連找房子居住都感覺不便，這樣一天一天延遲，炎熱的夏天，在不良空氣的狹窄的上海的房子裏渡過了。不能實行前往日本的原故，一個是他的健康

已不能耐得長期的旅行危懼，一個是他的家庭財政已沒有餘裕了。

雖在病中，魯迅對於少數熟人的來訪，時常很歡喜的迎接，他提出各種話柄相談，累的時候倒在藤椅上，閉目養神，經過一刻又談話如舊，朋友們怕想他的身體都要辭別，但却不易給人回家。

魯迅雖在病中，仍不斷的這件事那件事的思慮。有時病狀轉好的時候，須藤醫師想他多多的休息說「肺部已好了許多，這樣十年是不成問題的，過了十年孩子也大了，太太也可以放心了！」魯迅聽了非常喜悅，馬上要翻譯叫夫人筆記「死魂靈」，絕不肯照醫師的意思安穩的。所以會請他注意安靜的事。但魯迅回答：「我總是沒有那麼的習慣，又不寫，又不讀，怎能過一天」最後魯迅向醫師說：我對於病的治療是有條件的。

「第一要醫治病症，要把生命持續」，「第二就是倘若全然不動身一個月可以瘡痊的症，我希望動動多少就是要二個月亦不要緊」，「第三就是倘若無法醫治好，那也沒辦法，但希望用方法延長壽命」

醫師一時窮於答覆。

魯迅的病勢在八月曾吐血痰而惡化，到十月稍好，體重爲八十八磅，比八月一日增加了二磅，因爲空氣甚佳，所以也跑去看電影，探訪朋友等。十月八日又往觀第二次全日本版畫流動展覽會，十七日又往訪內山完造，但當晚病症突然轉變，有很嚴厲的喘氣。

等到天亮，魯迅寫了一封信，由夫人親自送交內山完造。

『老板几下：』

意外的事，夜間又開始氣喘了。所以十時的約不能踐了，請見恕。茲敬懇即以電話代約須藤先生，急速一點。（原文是日文，曾在本刊魯迅七周年忌日發表）

十月十八日 草草頓首 L拜』

內山完造打了電話，馬上往魯迅的家裏。魯迅的右手夾着香烟，臉色蒼白的坐在書桌前的椅上。看他很苦的在呼吸。內山和夫人輪流的按摩魯迅的後背，但不見得怎樣良好。他有喘氣的妙藥是用雞蛋油自製的，他曾經勸魯迅吞服而不允，現在又在勸他服藥，魯迅說了一聲也就服下了。之後內山請他休息，但說臥床很苦依然坐在椅上。時搖動身體，想把上半身豎直。那時他仍未放棄手上的香

烟。因此內山請他不要吸烟，即把吸剩的烟拋棄。不久醫師也來了，立刻在右手注射了，過了幾分鐘仍不見功效。

「怎樣了，一針不見効嗎？」魯迅問，醫師等了片刻，又在右手打了一針，這樣呼吸稍爲良好。內山說八時有約，要回去一趟，即返店去了。須藤先生和魯迅談了一刻，周建人來了，因須藤醫師說大概不至怎樣危險，所以坐了一刻，約定明天再來就走了。之後，須藤醫師亦爲了要請福民醫院松井博士診斷也離開了，但因爲是星期日松井博士已外出而沒有請回來。但石井醫學士偶然到內山書店聽聞魯迅的病，就往探病和診症。

從須藤，石井醫師聽聞已入重態，所以又添了二個看護，每二小時注射，在呼吸困難的時候，要用酸素吸入，這樣受了注意的內山，準備一切後又來了。

在那時，魯迅對於工作依然沒有忘記。

那天他因爲知道了他所譯的『死魂靈』，連載於雜誌「譯文」的廣告，會在當日登載於報上的事，幾次的探詢夫人報紙已經送來沒有，就是聽了報紙已來

廣告上亦已刊載，他的東西亦登載着，但他依然不能滿足，他要取報紙和眼鏡且要用自己的眼睛閱讀廣告的文字。

內山完造再來時，魯迅已躺在牀上，正用酸素發生器，吸進酸素，吸進後呼吸比較好了一點。

「我的病究竟是怎樣的？」

魯迅半是獨言自語，一半向着內山而言。

「靜靜的睡眠爲要緊，醫生也那麼說，請不要胡思亂想，請安眠吧！」內山說。因此在這裏送來了酸素管，所以又從酸素管施行吸入工作了。大概吸後甚佳，魯迅似睡非睡的睡去了。

內山暫時返家，魯迅也很安適的睡去。

夜裏內山和石井醫師來了三次，照石井的診斷，依然沒有脫離危險。所以內山打電話給來過一次的周建人請他再來。不久建人來了。內山把醫師的話轉述給他。在樓下的客廳互談。內山也準備看守通宵。

魯迅依然很安適的睡，所以魯迅夫人，請內山不必留在此請他回家，內山因

此也在十二時半左右返家了。

夜裏，由夫人與建人及日本看護婦輪班的看護。在黎明前不到五時容態急變，呼吸也好像要停。立刻派人到內山那裏，托他請醫師來。但，在那時魯迅已靜靜的斷氣。夫人探探額頭和手，還是很暖，但呼吸已斷，脈已停止。時在上午五時二十五分。內山打了電話給醫師，跑來時已五時三十一分，圍着已變爲屍體的魯迅，建人與看護婦肅然而低下頭，夫人也伏在桌上痛哭了。

紀念魯迅

路易士

『中華副刊』的編者要我寫一點紀念魯迅的文章，這使我沉吟了起來。在我迄今所寫的一切文章裏，從來就沒有提到過魯迅其人及其作品，那是因為提到他的人太多了，而我的怪癖之一是素不愛湊熱鬧。我之所以靜觀那些捧或罵，那些贊成或反對，而沉默着不發一言者，倒並不是由於我對魯迅沒有什麼意見之故。『是不是因為從前魯迅曾經罵過第三種人？』經他這樣一問，我的沉吟倒停止了下來。我說：『不是。我可以寫一點的。什麼時候繳卷？』他說至遲明晚。我說好。明晚就是今晚。今晚就是現在。現在我是正在執筆爲文以紀念魯迅。

『阿Q正傳』的作者，作爲小說家的魯迅，藝術家的魯迅，是受我尊敬的。但是遺憾的是，他的小說，在數量上實在太少，倘和那些著作等身的占世界地位的作家們比較一下，未免顯得淒涼。魯迅的小說，爲什麼如此之少呢？這個原因，不是在於魯迅的創作才能之大小上或題材之有無上，而是在於後期的魯迅終日

爲一羣左傾分子所包圍，所利用，致使其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雜文的寫作上去了。這是可惋惜的，雖則換一種立場來說，雜文這種文體，其社會價值，我是並不否認的。但在這裏，我對魯迅的雜文，不擬表示什麼意見。李長之論魯迅會稱之爲戰士。而作爲戰士的魯迅，他所持有的武器，究竟是什麼呢？是那些雜文嗎？關於這個問題，也不是我想在此討論的。總而言之，我對魯迅的不能多寫幾部小說這件事覺得十分惋惜；而對當日包圍着他的那些被稱爲魯門弟子的一羣，表示憤慨——是他們糟踏了他的。這便是我個人紀念魯迅的兩點意見。

魯迅書簡

(一)

某某先生：

頃收到十三日信，謹悉種種。弟固來厚於私而薄於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非『非私人請託』，而有公於讀者之慮故。近來思想倒退，聞『作家』之名，頓覺頭痛，又久不弄筆，實亦不符；而且示衆以後，讀者驟增，於逛馬路進飯館之類，殊多不便。『自選集』中像，未必竟不能得；但甚願以私誼籲請勿轉災楮墨，一以利己，一以避賢。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承下問，慨然知感，遂輒略有鄙懷，萬萬曲予諒察爲幸。

魯迅頓首。（五月十七日）

(二)

蒙示甚感。其實兩者亦無甚衝突，倘有人罵，當一任其罵，或回

罵之。

又其實，錯與被罵，在中國現在，并不相干。錯未必被罵，被罵者未必便錯。凡梟首示衆者，豈盡『不良份子』也歟哉。

(三)

某某先生：

頃奉到來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開一開口，則『論語』雖談虫二，恐亦難；蓋虫二亦有談得討厭與否之別也。天王已無一枝筆，僅有手槍，則凡執筆人，自屬全是眼中之釘，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專復并請道安。

迅頓（六月廿夜）

魯迅書簡

跋

魯迅先生的書簡，並不是什麼難得的珍品；因為魯迅先生生前，不論其爲相識的友輩或不相識的青年，都一律以其誠懇的態度對之：只要你給他的信中是有着誠懇的詢問，縱令和你素不相識，他也無不一一抽空回答，而且必是親筆的。

據編者個人所知，有許多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其認識魯迅先生，往往是由通信作媒介的。基此，則魯迅先生書簡的平凡，已用不着我來多說，大家也可想見的。

不過，有一點是不能不要告訴讀者諸君的，就是：魯迅先生的書簡雖然那麼多，（倘有人肯來給他作一次統計，大約總在一萬封以上吧？）但大多數都已經發表過的，如『魯迅書簡』（許廣平編，遺墨影印本）一書所收的，爲數已不在少，加之於魯迅先生逝世後，當時的各種雜誌期刊紛紛競載，統計起來，大約也佔全數之半吧？（此以他一生的總量爲比例的約數）此外，加上散失的散失（因

爲時間上的關係以及其他的變故）珍藏的珍藏，那麼如今尚未發表者，最多也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因此，這餘剩下來的十分之一二的魯迅先生的書簡，在今時今日來估計，就未嘗沒有其珍貴的價值。而且魯迅先生的書簡，向不諱言，大膽直揮，其慷慨激昂，悲憤沉痛之情，見於言表。所謂『見其書即見其人』，魯迅書簡，當之無愧。

編者爲此，特走訪各友，從事搜集，費時月餘，僅得五封，其中：中文者三，日文者二，受信人均爲魯迅先生生前摯友，故更較致覆其他不大相識者爲珍貴。今以本社尚無日文鉛字，移譯爲中文，又恐失其真諦，故日文書簡從略了。但爲讀者便於參考起見，特將其日文遺墨影印，供諸同好。尚祈注意焉。民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之夜，楊之華謹識於上海。

先母事略

周作人

先母魯氏，諱瑞，爲外祖父咸豐辛亥科舉人戶部主事魯晴軒公希曾之三女，生於咸豐七年丁巳十一月十九日。光緒六年歸於我先君伯宜公，生子四，樟壽、槐壽、松壽、椿壽，女一，端姑，幼殤。先君爲會稽縣學生員，屢應鄉試不中式，以酒自遺，久之遂病咯血，繼患水腫，臥病三年，先母竭力調護，形神爲之銷損，終不起，於光緒丙申九月去世。先君讀儒書，而感念時艱，思欲有所作爲，乃卒不得志，日者嘗評之曰，性高於天，命薄如紙。居間嘗言，吾有子四人，當遣其出海外求學，一往西洋，一往東洋耳。先母聞而識之。及先君歿，家計益窘，先母乃遣樟壽往南京，易名樹人，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時人尙迷戀科舉，多以改途爲非，相率阻止，先母弗聽焉，戊戌冬四弟椿壽以急性肺炎卒，年六歲，先母痛之甚，令畫師追寫其像，懸之室中，今存作人處。庚子變後一年辛丑，令槐壽往考江南水師學堂，易名作人，入管輪班，丙午奉派往日本留學。

，時樹人亦已先在，至庚戌辛亥始相繼歸國。蓋自丁酉至辛亥十餘年中，樹人作人均游學在外，在南京時尙得乘年假時一歸省，及往東京則六年內未曾一歸，先母唯與松壽卽建人居守老屋。民國建立，樹人供職南京教育部，旋移往北京，六年作人被聘爲北京大學教授，八年冬，先母遂率家人北遷，定居北京，以至於今。

• 先母性弘毅有定識，待人寬厚，見有急難，恆不惜自損以濟人，以是爲戚鄰所稱。平時唯以讀書自遣，古今說部，無所不讀，又喜閱報章，定大小新聞數種讀之，見所記多單調虛假，輒致憤慨，關心時世安危，時與兒輩談論，深以不能再見太平爲恨。近年目力稍減，不便讀報紙細字，始輟讀，改而編織，嘗臥疾而兩手編物如故，勸止之，則曰，我以此消遣，不爲疲也。先母氣體素強，未嘗患重病，今年二月因肺炎轉而爲心臟衰弱。勢甚危殆，以笹間醫師之力，始轉危爲安。

• 作人蒙 國民政府選任爲委員，當赴首都謁 主席，見先母飲食如常，乃稟命出發，及半月後，自南京返，則肺炎復發，據醫師言病本不劇，而年老氣虛，慮不能勝。先母見作人歸，卽曰：『這回與汝永別了，』複述兩次，作人深訝其語之不祥，而不圖其竟實現於五日之內也。時爲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酉時乃遂

長逝，享壽八十七歲。臨終之日，神志清明，不訴苦痛，不見穢惡，漸以入滅，如就安眠。世所謂得天往生者非耶。作人不能爲文，猝遭大故，心緒紛亂，但就記憶所及，略記數行，凡爲人子者，皆欲不死其親，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當世仁人，讀其文而哀其心，則作人之願爲不虛矣。次男周作人泣述。

魯迅著譯及其編校輯錄年表

著作

- (1) 吶喊(小說集)一九一八——二〇年作
- (2) 彷徨(小說集)一九二〇——二二年作
- (3) 故事新編(歷史小說)一九二六——三六年作
- (4) 野草(散文)一九二四——二八年作
- (5) 朝花夕拾(散文)一九二七年作
- (6) 中國小說史略(論著)一九二二年作
- (7) 漢文學史綱要(論著)一九二七——二九年作
- (8) 墳(論文, 隨筆, 詩合集)一九〇七——二五年作
- (9) 集外集(論文, 隨筆, 短評, 詩合集)一九〇三——三四年作

- (10) 集外集拾遺(同右)一九〇三——三二年作
- (11) 熱風(短評集)一九一八——二四年作
- (12) 華蓋集(短評·雜感合集)一九二五年作
- (13) 華蓋集續篇(同右)一九二六年作
- (14) 而已集(同右)一九二七年作
- (15) 三閒集(雜文集)一九二七——二九年作
- (16) 二心集(雜文集)一九三〇——三一年作
- (17) 偽自由書(短評集)一九三三年作
- (18) 南腔北調集(雜文·短評合集)一九三二——三三年作
- (19) 准風月談(短評集)一九三三年作
- (20) 花邊文學(短評集)一九三四年作
- (21) 且介亭雜文(雜文集)一九三四年作
- (22) 且介亭雜文二集(同右)一九三五年作
- (23) 且介亭雜文末集(同右)一九三六年作

翻譯

- (1) 月界旅行(科學小說)一九〇三年譯
- (2) 地底旅行(科學小說)一九〇三年譯
- (3) 域外小說集(短篇小說)一九〇九年譯
- (4)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短篇小說)一九二一年譯
- (5) 工人綏惠略夫(長篇小說)一九二一年譯
- (6) 現代日本小說集(短篇小說)一九二二年譯
- (7) 一個青年的夢(短篇小說)一九二二年譯
- (8) 愛羅先珂童話集(童話)一九二二年譯
- (9) 桃色的夢(童話集)一九二三年譯
- (10) 苦悶的象徵(論著)一九二四年譯
- (11) 出了象牙之塔(隨筆)一九二六年譯
- (12) 思想·山水·人物(隨筆)一九二八年譯

- (13) 小約翰(童話)一九二八年譯
- (14) 近代美術思潮論(論文)一九二九年譯
- (15) 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作, 論文)一九二九年譯
- (16)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論文)一九二九年譯
- (17) 壁下譯叢(論文)一九二九年譯
- (18) 藝術論(蒲力汗諾夫作, 論文)一九三〇年譯
- (19) 文藝與批評(論文, 演說)一九三〇年譯
- (20) 文藝政策(會議錄)一九三〇年譯
- (21) 十月(長篇小說)一九三〇年譯
- (22) 毀滅(長篇小說)一九三一年譯
- (23) 小彼得(童話)一九三一年譯
- (24) 藥用植物(科學論文)一九三一年譯
- (25) 豎琴(短篇小說)一九三三年譯
- (26) 一天的工作(短篇小說)一九三三年譯

編輯

- (27) 山民牧唱(短篇小說)一九三五年譯
 - (28) 錢(童話)一九三五年譯
 - (29) 俄羅斯的童話(童話)一九三五年譯
 - (30) 死魂靈(長篇小說)一九三五年譯
 - (31)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譯
 - (32) 譯叢補(論文)一九二四——三〇年譯
- (1) 莽原週刊(初附北平京報發行，後改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
- (2) 語絲週刊(所編輯者爲在北平被禁後移上海北新書局發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上半。後交柔石接編半年。)
- (3) 奔流月刊(自一卷一期至二卷五期止，共十七期，每期均有編校後記一篇。)
- (4) 文藝研究(此係季刊，由大江書店印行。只出一期，即被禁止而

停刊。

(5) 萌芽月刊(與郁達夫合編，此為「奔流」月刊之後身。)

(6) 十字街頭(此刊為半月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出至第三期，即被禁停刊。)

(7) 譯文月刊(由黃源出名主編，但每期負責編輯者，實為魯迅。)

(8) 藝苑朝花(朝花社出版。共十二輯，每輯十二圖，計開：(1)

近代木刻選集(一)(2) 落谷虹兒畫選(3) 近代木刻選集(

二)(4) 比亞茲萊畫選(5) 新俄藝術圖錄(6) 法國插圖選

集(7) 英國插畫選集(8) 俄國插畫選集(9) 近代木刻選集

(三)(10) 希臘瓶畫選集(11) 近代木刻選集(四)(12) 羅

丹雕刻選集，每輯前後，均有魯迅自撰之「小引」或「附記」。

但以銷路不佳，當時(一九二九)只出四種，後者不復印行矣。)

(9) 文藝連叢(此叢書均為翻譯，但只出四種：(一)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蘇聯·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魯迅序。(二) 解放了的

董·吉訶德（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易嘉（即瞿秋白）譯。
 三）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四）Noa Noa·
 法·戈庚作，羅撫（即魯迅）譯。）

（10）未名叢刊（此叢書專收翻譯，初為北新書店出版，後收歸未名社
 印行。）

（11）烏合叢書（此叢書專收創作，亦由北新書局發行。）

（12）現代文藝叢書（神州國光社版。共十種，計（一）浮士德與城，
 盧那卡爾斯基作，柔石譯。（二）被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盧那
 卡爾斯基作，魯迅譯。（三）十月，A·雅各武萊夫作，魯迅譯
 。（四）精光的年頭，B·畢力涅克作，蓬子譯。（五）鐵甲列
 車，V·伊凡諾夫作，侍桁譯。（六）叛亂，P·孚爾瑪諾夫作
 ，成文英譯。（七）火馬，F·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譯。（八）
 鐵流，A·綏拉非摩維支作，曹靖華譯。（九）毀滅，A·法捷
 耶夫作，魯迅譯。（十）靜靜的頓河，M·峻維訶夫作，候撲譯

•

- (13)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一九二九年，朝花社版。書前有魯迅「小說」說明編選經過。）

輯 錄

- (1) 古小說鈎沉（共三十六卷，輯自周至隋之散逸小說。）
(2) 小說舊聞鈔（輯鈔明清二代各種著作中有關小說史書而成。）
(3) 唐宋傳奇集（輯錄唐宋二代之傳奇文，并考證補訂。）
(4) 後漢書輯本（共五卷，係謝承輯本，但多于汪文臺輯本。）
(5) 唐·劉恂嶺表錄異（共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

- (6)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
(7) 會稽郡故書雜集（輯錄歷代有關會稽先賢史傳及地記之逸文而成）

校訂

(1) 鐵流(蘇聯A·綏拉非摩維支作，曹靖華譯，三閒書屋版)

(2) 靜靜的頓河(蘇聯M·唆羅訶夫作，第一卷，賀非譯，神州國光

社版)

(3) 鐵甲列車(蘇聯V·伊凡諾夫作，侍桁譯，神州國光社版)

(4)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柔石譯。同上版)

(5) 黑假面人(蘇聯C·安特來夫作，李霽野譯，未名社版)

(6) 窮人(蘇聯F·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燕譯，未名社版)

(7) 紅笑(蘇聯L·安特來夫作，梅川譯，商務版)

(8) 十二個(蘇聯A·勃洛克作，胡數譯，北新版)

(9) 爭自由的波浪(蘇聯V·但萊珂等作，董秋芳譯，北新版)

(10) 蘇俄之文藝論戰(蘇聯普沙克寧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

題」)，任國楨譯，北新版。

編
印

- (11) 進化與退化(生物學論文選集，周建人譯，光華版)
- (12)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斐多菲·山大作，孫用譯，湖風版)
- (13) 夏娃日記(美馬克·吐溫作，李蘭譯，湖風版)
- (14) 故鄉(許欽文作，小說集，北新版)
- (15) 心的探險(高長虹作，雜文集，北新版)
- (16)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北新版)
- (17) 忘川之水(真吾作，詩集，北新版)
- (18) 二月(柔石作，小說集，朝華社版)
- (19) 小小十年(葉永蓁作，長篇小說，春潮版)
- (20) 打雜集(徐懋庸作，雜文集，生活版)
- (21) 海上述林(瞿秋白所譯，東京某書店代印)
- (1) 士敏土之圖(德C·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

- (2) 蘇聯版畫集(木刻, 石刻, 銅刻, 粉畫等選集, 良友公司發行)
- (3) 蘇聯版畫選集(蘇聯木刻選集, 珂羅版)
- (4) 鐵流之圖(蘇聯I. 畢斯凱萊夫作, 木刻四幅)
- (5) 死魂靈百圖(死魂靈木刻插圖選集, 影印版)
- (6) 引玉集(中國歷代箋譜, 影印版)
- (7) 北平箋譜(中國歷代木刻箋譜版本, 影印版)

魯迅先生日文原稿之一角（從未在他處發表者）

		ル、	ニ
		字	十
		に	ワ
		マ	ミ
		ハ	ウ
	一	漫	又
	九	法	ド
	五	リ	ニ
	年	後	ナ
	二	ハ	又
	月	方	子
	六	が	リ
	日	オ	ナ
魯	上	モ	ウ
	海	シ	バ
	ニ	に	ル

魯迅先生書簡遺墨（從未在他處發表者）

既奉到臺北芳稿。前出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之
 法。自有打油之心情。而今無何者。蓋此迫壓。令人已不
 能寧氣。除呻吟號泣外。似有他乎。

不惟人間。即此。如論語雖有讀書。然其難。蓋也
 二。有讀書。計厭與否之別也。夫王已多一校單。僅有
 手鏡。則其執單人。自房全。是眼中之釘。難平
 免乎今之世矣。才望並佳

道安。

迅

作家評傳及印象

原书空白

關於藥堂

柳雨生

編者囑作一文，關於藥堂先生的，想來大爲不易，既未承諾，亦不便置筆，因不佞之於先生，常存仰之彌高之感，非但文字上寫不出什麼來，即見面時，亦無可說，時有不遑如愚耳。曩見廢名關於先生的一文，以爲佳絕，可惜不在手邊，不然鈔幾段下來，略略加上幾句議論，雖未足觀，不亦可以繳卷乎。然亦好在不在手邊，不然便近於唐突先生。月前閒步庵到上海來，談及先生狀況，言歷險之日，細丸從袍內洞過，先生夷然說：『不知有沒有打壞了肚子。如果沒有打壞肚子，那不要緊，不然就有點兒麻煩了。』大約臨難不苟，爲廢名所能料而未及見者，這一點不佞或可說說與。

憶龔在塾中受課時，報載魯迅先生病逝，同學們大爲震悼，或者傷心別有懷抱者亦大有人在，因爲不久追悼會也就接着開了幾個，各以其警句揭在牆上，紀念魯迅應不忘云云，魯迅爲中國之革命文豪某某云云，蓋已爲魯迅先生所不及

知了。先生授顏黃門家訓，講的也巧，正到兄弟篇，孔懷之痛，在他深鬱哀感的臉上可以看出，然而終席未作一課外語，此正是先生的不可及處，竊以爲先生之不爲多數青年所瞭解，或亦正在此耳。通常以爲先生的思想，是豁然儒者之風，而學問文章則是隱逸冲淡一派，大約如陶淵明一般，此意我以爲亦是誤解。近見先生手寫懷廢名一文，謂馮君悟道，而道之爲物，自己却不甚懂得，也就不大去談了。而廢名讀論語一文，却云：

陶淵明詩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愚昔閒居山野，又有慨於孔丘之言，『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言真是說得大雅。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人之情總在人間。無論藝術與宗教，其範圍可以超人，其命脈正是人之所以爲人也。否則宇宙一冥頑耳。孔子栖栖皇皇，欲天下平治，因隱居志士而發感慨，對彼輩正懷無限之了解與同情，故其言親切若此，豈責人之言哉。愚嘗反復斯言，謂古來可以語此者未見其人。若政治家而具此藝術心境，更有意義。因此我又憶起『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句，這句話到底怎樣講，我也不敢說，但我很有一個神祕的了悟，憧憬於這句話的意境

。大約猶瓜之爲物，繫而不給人吃的，拿來做「壺盧」，孔子是熱心世事的人，故以此爲興耳。朱註，「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未免索然。

只此更見先生之襟懷，或亦具此藝術心境，至其思想，永遠不離人類求生存與共存的主張，這個觀念，其命脈亦正是人之所以爲人耳。舍間少藏書，惟札記中所錄先生文中可喜語甚多，試擇其一二，如：

我們……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讀經次之，焚書坑儒最下。蓋考八股則必讀經，此外之書皆不復讀，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統一醇正，安尙事殺之坑之哉。至於得到一題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標新立異以爭勝，即所謂人人各異，那也是做八股中應有之義，李卓吾以爲討厭可也，若明太祖……當必能諒解諸生的苦心而點頭微笑耳。……中國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無道，焚書以絕八股的材料，坑儒以滅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運一厄。其後歷代雖用文章取士，終不得其法，至明太祖應天順人而立八股，至於今五百餘年風靡天下，流澤孔長焉。破承起講那一套的

八股爲新黨所推翻，現在的確已經沒有了，但形式可滅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國本位文化之一，可以誇示於世界者歟。新黨推倒土八股，趕緊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識時務之俊傑耶，抑本能之自發，或國運之所趨耶。總之都是舊歷新年之爲世詬病也久矣，維新志士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鄙見以爲可不必也。問這有多少害處？大抵答語是廢時失業，花錢。其實最享樂舊新年的農工商他們在中國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員學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謂終歲作苦，這時候閑散幾天也不爲過，還有那些小販趁這熱鬧要大做一批生意，那麼正是他們工作最力之時了。過年的消費據人家統計也有多少萬，其中除神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覺得有點無謂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玩的東西一方面需要者願意花這些錢去換快樂，一方面供給者出賣貨物得點利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見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假如說這錢花得冤了，那麼一年裏人要吃一千多頓飯，算是每頓一毛共計大洋百元，結果只做了幾大缸羹，豈不也是冤枉透了麼？飯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爲應該吃，但是生命之外還該有點生趣，這才覺得生活有意義，小姑娘穿了布衫還要朶花戴戴，老頭子吃了中飯還想買塊大花糕，就是爲此。舊新年除與正朔不合

外別無什麼害處，爲保存萬民一點生趣起見，還是應當存留，不妨如從前那樣稱爲春節，民間一切自由，公署與學校都該放假三天以至七天。（廠司）

廢名藏不佞所寄小簡積數十通，裱爲一巨冊，令題記之。冊成而廢名歸黃梅去，遂閣置蕭齋中，喜暫得偷懶，待廢名來催時再題未晚也。唯題亦無甚話可說，只是有一件事想提出異議，廢名題跋中推重太過，竊意過譽亦是失實耳。雨後新涼，偶記此語，乃併不待廢名之催而寫了矣。廿二年七月廿五日於北平苦雨齋，知堂。

如此文字，亦正見廢名之言爲不可易，其發端只是平易近人，放之四海而均準，然其深境與闊度，當非管窺如區區者所能盡。先生五十自壽打油詩，「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我最愛它的平易和深遠，以爲都非他人之作所能及，然而這裏所說的，也不過多是隨時雜感，信手寫出，非但讀者看不得入眼，卽以此還寄藥草堂，想亦不過爲煨茶爐子添燃料耳，然而也大有意思了。

知堂小記

亢德

我在『知堂與鼎堂』一文中（刊古今二十，一合刊）曾說：『我與知堂未曾見過一面，這幾天他雖在南京，滬寧相距又不甚遠，搭夜車去，大概一覺醒來已可到石頭城外，然而近來的行旅，不但傷財亦復勞民……總之是入京識荆，這次多半又力不從心的了……』誰知天下事不可逆料，那篇小文還沒刊出，我已在蘇州和知堂相見了。

寫『知堂與鼎堂』是四月七日，第二天早晨接到知堂於四月二日寄自北京的一封信，說：「此次之行，目的只是○○，此外蘇滬杭各處雖亦頗想去一看，唯此刻尚未能實現。大概在京可停留五六日，如有暇能至寧一談，甚所盼企」。於是去仔細一打聽從上海到南京的行旅究竟勞民傷財到什麼地步，結果『確悉』我所謂勞的種痘之類並非必需，財亦不傷得怎樣，前幾天雨生口中的『到南京車票四百餘』，原來是指的來回票價。八日是星期四，星期六有一件事非做不可，乃決

定十日搭夜車赴寧，了此一願，那里知道當九日下午七點餘鐘與雨生在某一宴會席上相遇，告以決定明天夜車去京後不久，他就接到一個南京紀先生打來的電報，文曰：『知翁九日赴蘇，約往一會，轉告亢黎，果庵齊。』這一電報省了三分之二的旅程，我於蘇州又比對南京熟悉到不止十倍，當下就說當晚夜車即去，雖雨生意擬明晨早車，我亦堅持不允，理由是知堂既然九日赴蘇，不見得會從容整頓，要是十日早車即行，豈不白跑了一趟。這一說竟使柳公點頭，就此打了三個電話通知彼此家裏，急匆匆趕往車站而去。

這一班夜車誰知道是班走得很慢的慢車，到蘇州已經午前一時，雖然比火車表上還快了廿分鐘。城門是關了，在一家點心店裏打了一個電話給江蘇日報又知道知堂並沒有到，夜深天寒，我有點發抖，在找旅館去經過的一條小巷中，同行的楊君又說聽到了一聲怪叫。找到了旅館旅館又客滿了。沒有法子只好做一次無賴：對旅館中人說客滿也要住，不客滿也要住，櫃台裏邊有一隻夥計睡的起倒鋪在，我就和衣躺了下去，雨生是據張桌而撰文，楊君則好容易向雨生借了一本小書看。這樣挨到三點鐘左右，旅館裏居然騰出了一間房間讓我們借宿。直到此刻

我還覺得有時無賴之不可不做，不然的話，如找一家旅館聽見回報客滿就另找別家，恐怕那天晚上只好露宿街頭，而我的傷風也必較此刻厲害多多了。

第二天跑到江蘇日報，知道知堂來是一定來的，因為石泉先生也有電報給該報馮社長，而且說同行者有沈啓元龍榆生楊鴻烈諸位等七人，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到，因為電報上沒有說明。我和雨生說電報上未提姓名的七人中的一人，最好是打電報給他。紀公，紀公和我也是通信而未見過面的。

從江蘇日報趕到他們所事先定好房間的一家旅館想休息一個上午，誰知旅館中人回說須到下午二時才能知道有沒有空房間。倦極易怒，我就反客爲主的責他爲什麼昨天來定時說有而臨時則無。他說如直截了當回答不能預定，要得罪客人的。我說接受了預定而臨時沒有是豈不更得罪了客人？他唔唔唔的唔了幾聲就送了我一壺茶，却無茶杯相伴，我就壺嘴吸茶，自然無法再說什麼了。

在我倦欲眠的當兒，打了一個電話給老蘇州的汪正禾先生，問他有沒有辦法弄個房間。後來在車站同接知堂，他說來蘇者一行共有九人其中小說家張資平亦在內。車站里報告車即進站的鐘聲響了，雨生說會不會直到車子開走了之後仍不

見到知堂。車子進站了，到底雨生眼快，已瞧到了苦雨齋與閒步庵，奔上前去。我和閒步庵已經在滬見過一次，於苦雨齋則我認得他（從照片上）而他不認得我，乃由雨生介紹。「噫，亢德亢德」，在人聲嘈雜的車站上，我似乎聽得那濃密花白鬍子掩護下的口中有這麼一句。

在站上照了兩三張相，就相偕出站而去。在月台正中列着一隊歡迎知堂的江蘇教育學院男女學生，在行近他們的瞬間之前，我問了一句知堂：「此行要不要到上海」。「恐怕時間來不及，只好不去了」。「上海真希望你能一去」。話剛說完，但聽得一聲「立正」，歡迎的學生個個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禮的樣子後來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農閒步田間時的偶一俯視新苗」。這句話的意思我却把來着重在老農與新苗四字上。

與知堂同行的人是沈啓无及其夫人孩子，周豐一，蘇瑞成，王古魯，龍沐勛，楊鴻烈諸位，我所渴望的紀果庵却不在內。向啓无一問，他說這個胖子的肥臀上生了一個瘡，臥床喊痛，欲來而不得了。

到了木廣石家飯店時，我等知堂寫好了給中華日報的題句，大家已進屋裏入

席之際，又說起了請他到上海的話。我說：「這一次既然到了蘇州而不去上海，未免使上海文化人方面有點那個，周先生從前寫過一篇批評上海氣的話，此番不去，人家或以爲迄今仍厭聞上海氣，未免太使上海人難堪了。至於時間，蘇州少就攔半天，南京遲回去半天，也就行了。」這時候他對於不去的所以比較切實的說了一點，而且看樣子頗有未嘗不可一行之意，但決定則總於迄席散而未有。

從知堂的談話中，如說到紹興只好僱一隻大船宿夜，從他寫給石家飯店主人的詩句中，如「吾鄉亦有蠟家菜，禹廟開時歸未成，」我想他不但不厭上海氣，甚至連故鄉紹興的烏蓬船亦頗想一趁，他如在吳苑吃茶時的提起此次返京必往薩家灣水師學堂舊址一看等等，無處不流露這個老人的懷鄉念舊之情。他的來蘇不正是只爲了一拜亡師章太炎先生之墓嗎？

靈岩山上的停轎處，有幾個木製玩物攤，知堂下轎後就俯身細看，後來挑了三隻磨子，三隻燭台（？），三隻酒杯，我想起了昔年他被大罵小擺設的往事，就出了十元錢買下送他。在廟里和尚領觀舍利時，他比什麼人都虔敬，第二天早上給鐵公俠兄所寫一首詩中，也有一句與佛有關，寫後還自云據人說他前生是個

和尚。這又使我記起五十自壽詩中的那句「前世出家今在家」來。

知堂今年已是五旬有九的高年，但一無老態可見。說也奇怪，我所認識的幾位老先生中，如錢士青，如包朗生，如周越然諸先生，都已是六七十歲的高年，但腰腳之健，精神之佳，均使我這個小他們二三十歲的後生自愧不如遠甚，今見知堂亦復如此，不禁使我希望時光快過俾能過一年壯健一年起來。在樂鄉飯店夜談時我談起這點，知堂說老年身體壯健，與少年時吃過點苦彷彿不無關係。於是講出了一個他少時寓居杭州偷吃冷飯的故事來。

「我跟祖父住在杭州。祖父的姨太太總把吃剩的冷飯盛在竹飯籃中懸空排起，以免鼠竊。那知好多次拿下來時總是少了幾塊，覺得非常奇怪。原來是我在肚子發餓沒有點心吃時偷吃去的。」

這晚上他兩手放在身後抵着床閒談了不少，談到鼎堂，問起矛盾，說到語堂，他說語堂的天分極高，爲語絲撰文時只覺得一篇比一篇進步。說到許地山的一病不起，他深深歎息中國人少了個有數的人才。據知堂言，許之去港，爲的燕京大學不肯重用，因爲燕京有個壞習慣，不重視本校畢業的人，無論這個人後來留

英留美，學問超羣。要不是楊胖公的愛睡，連說夜深了夜深了，反正房間裏有的是宣傳處買來的立普頓茶與蘇州糖與西式點心，又何樂而不清談達旦呢？

十一日早晨宣傳處又請知堂去吳苑深處飲茶，蘇州人是好喝茶的，而吳苑是最著名的茶室，大家長長的坐了二桌，可口的點心一樣樣的由堂倌送上來，生煎饅頭，盤香餅，蟹壳黃，肉餅，年糕，老人家沒有一樣不吃他一個二個。有一個賣方糕的來了，也要了點，他說和紹興的印糕相仿，我說不同處是方糕內容糖重油多，富貴氣極重，印糕則較清淡。還有一種糕極似紹興所有而我叫不出名字，他却說得出來。對於故鄉的東西，知堂和魯迅二位雖在老年都能不忘，十餘年前讀魯迅先生小說集中描寫到『狗氣煞』時，就覺得迅翁的記憶力之佳，但這或者是他們的老太太常常提起之故，我總覺得人的記性，恐怕也是越到老年反而越好起來的。

吳苑茶散之後，知堂去錦帆路拜太炎先生之墓去了，我和雨生以上海多瑣事待理，早定中午返申，就在吳苑深處向知堂告別。後來在采芝齋買點瓜子陳皮預備歸貽家人時，聽啓无夫人說知堂極愛甜食，就與雨生合購了半斤輕糖松子留送

與他及啓元，秀才人情糖四兩，大概未到北京即已一顆兩顆的吃完了吧。

最後想說一句的，是知堂翁與魯迅先生這一對弟兄，論貌，論文，論談吐，我覺得都真是同胞手足，即略有不同之處，如以酒來作譬，也只是魯迅先生是不加其他飲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則是極了點荷蘭水的威士忌而已。

周作人先生近作

薛慧子

先舉一個例：

一個文藝愛好者，廿歲前愛好巴金，廿歲後始愛茅盾，或沈從文，至三十歲左右就漸漸愛好周作人。

人到中年，世故如藥味，業已備嘗，過去所熾烈地追求的，往往趨之於淡泊了。我決不諱言，自己就是這麼一個。

近年我喜讀「苦茶隨筆」，「夜讀抄」，「澤瀉集」，「風雨談」，「秉燭談」，以至新出的「藥味集」。那些本來擱置已久而從未一看的舊書，如今都翻遍了，而且越讀越有興味。

「鐵的溫雅！」——這四字是他全人格的表現。

與作人先生見面，還是最近的事。其印象曾在通訊稿中約略描畫之。其實，即使讀了先生十年書，還不如見他的一面。他的談話比他寫的文章還要好。關於

中日問題，關於文化意見，他說的全到家，想得很妥當，使人感動，使人接受，一切入情入理。可惜，當時聽得出神了，一些也沒有筆記。即使筆記起來，斟酌目前情形，也有些碍難發表吧。

先生作品久不發表了，引起許多人的渴念。

在南方，許多新出的刊物寫信去要求撰稿，都遭婉拒。最近，除了爲張次溪君序「汪精衛先生蒙難實錄」外，又爲梁盛志君「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一書作序。這一篇序文，南方尚未發見，其中頗不乏看似平淡却甚警闢之處：

「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終致力於日本文化之研究，過去無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爲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現在盡人皆言日本文化，梁君仍屹然守其故轍，此寂寞恐亦與前次不相上下。昔曾有言，在非親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在親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够客氣了。凡對日本事情說真話的，永遠難免此難。」

「余讀國際文化振興會徵文集中梁君之文，甚爲梁君幸，但心中亦實爲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頗深，而意又甚誠，故所言悉從衷心發出，在現今中國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談日本文化之時，梁君獨真率地發表其中國人的意見，其不被視爲謗書

者蓋希矣。

「乃振興會獨有取焉，審查報告中且有人云，願得聞誠實的苦言，勝於廣泛的諛詞，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誇大言之，謂中日相知以至相和即基於此，亦無不可。」

最後又說：「余老而爲吏，於文事日以疏遠，但得見學問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實爲大幸」。

讀此序，恍然如見先生之面，聽其娓娓談吐，覺得親切有味。又彷彿大熱中服一帖涼劑，雖苦澀，亦在所不計。如果說中國真有「日本通」其人的，作人先生應該列入一席地。其不亢不卑，知己知彼的卓見，有誰個日本人不肅然敬佩嗎？

聽說，先生最近罷官而不做了，文士還是文士，然則今後於文事也該不再疏遠了。在我們讀者，真所謂「但得學問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實爲大幸」。在今日中國文壇上，無疑地，作人先生是一個光輝的存在。

先生近作打油詩兩首，一首是托北平何子毅兄寄來的親筆，另一首沈仲光先

生南來，我請他題字時寫出來的，詩如其人，風趣可想。

一

「大風吹倒墳頭橋，杉葉松毛著地鋪。何堪跳山山下路，秋光還似昔年無」

二

「生小東南學放牛，水邊林下任嬉游。廿年關在書房裏，欲看山光不自由」。

周作人與路易士

胡蘭成

聽朋友說起，片岡鐵兵新近在一個什麼會上提議，對於中國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無聊小品，不與時代合拍，應予以打擊云。據說是指的周作人。原文我沒有看見，因為身非文化人，文化界的動態對於我總彷彿是別人的事，不甚關心，而又彷彿全明白了似的，不想再有所發現，這不甚關心於是變成真的隔膜了。所以當那位朋友這麼說了之後，我只應曰「哦！」心裏却想：為什麼要這樣嚴厲呢？或許並沒有這樣嚴厲，也用不着這樣嚴厲的。又想：或許也並非指的周作人。打算去查一查，好知道一個究竟，可是還是懶下來了。

但因此我記起了周作人，去年還在朋友家裏見過一面的，並且送他到浦口上火車。看着他，當時我的心裏只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正如他寫給我的一首舊作，「禹蹟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的那種情味。後來在古今雜誌上又看到他的一篇小品，自說他的文字是有着一種淡淡的憂鬱的，可是讀他的文章的人很少注意到這一節。

淡淡的憂鬱，正是北伐後到現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並非飄逸，他的平凡，並非自在，他的隨緣，並非人生的有餘，而是不足。只有這「淡淡的憂鬱」是最好的說明，並且連帶說明了那次和他在一道時我的那種惆悵。

我是更喜歡他在五四運動到北伐前夕那種談龍談虎，令人色變的文字的，後期的文字呢，彷彿秋天，雖有妍思，不掩蕭瑟。他不是與西風戰鬥的落葉，然而也是落葉，掉在明窗淨几之間，變作淡淡的憂鬱了。

然而我仍然尊敬他，因為他有一個時期是曾經戰鬥過來的。他的晚期作品，雖然把人生收縮了，也還是言其所知，行其所信，誠誠實實的。尚有淡淡的憂鬱，這是周作人的文章始終高出於論語派，不僅在工力上，尤其在氣質上不是俞平伯林語堂之輩所能及的地方。

我也希望周作人的時代過去，可是我以為這不是開一文壇法庭的事。

說到文壇法庭，忽然想起了路易士。也是朋友偶然之間告訴我的，——因為我自己近來對於出版界的情況總是這麼生疏，說是頗有些人不滿於路易士的詩的頹廢，個人主義，與其為人的驕傲，在報章雜誌上已經發表過很多攻擊的文章了。

，而且還要更予以一次徹底的掃盪戰似的。人家要攻擊，要掃盪，本來不干我事而且所說頹廢，個人主義，驕傲之類，我想路易士也的確是的，但我以為不必如此對付他，也不應當如此對付他，那理由非常的簡單：倘使是以色列人，聽到耶穌對着耶路撒冷城慟哭，並且咀咒道：「以色列人哪，你們有禍了！」大家就會把他稱為失敗主義者，然而有人慟哭，偌大的耶路撒冷總算是不寂寞了。又倘使這世界是魯迅的「野草」裏所說的沙漠，則頹廢的歎息，比較看不見的四下裏空虛的笑聲，總還算是溫暖的吧。

路易士的個人主義是病態的，然而不是時代的病態。從他的詩以及從他的人所表現的，都有這種病態的氣氛，然而不是墮落，因為他對於人生是那麼嚴肅，他的病態有時毋寧是過於把瑣碎的事物看得認真而來的。有些人還說他是享樂主義者，這是完全不對的。至於說他頹廢呢，我以為都還有保留。因為，頹廢與積極，革命與反革命，有時候實在也不容易劃定界限。就文學來說，例如夏多布利安在一八〇〇年出版的「阿達拉」勃蘭兌斯稱之為以暴風雨的力量感動了法國的讀書界的，內容却並非講的革命故事，而是描寫一個印第安基督教徒的女兒的戀愛

與死的小說，非常之強調宗教的感情的。然而它仍然可以是代表法國那一時代的偉大作品。諸如此類，形如相反，實乃相成，說來話長，姑且從略，並且所謂路易士的頹廢在與現時代的相反或相成上，是否也和夏多布利安的宗教感情可以作同樣的說明，也姑且從略。在這裏我只想提出一點——

即使是病態的個人主義者，較之啦啦隊合唱的和聲，是要真實得多，也更可尊敬的。

至於個人或與「時代」——其實是流行的風氣不合拍，照以往歷史上有過的例子來說，那是不一定咎在個人，倒大抵是「時代」應當反省的。

路易士的詩在戰前，在戰時——戰後不知道會怎麼樣，總是中國最好的詩，是歌詠這時代的解紐與破碎的最好的詩。正如他之為人。與路易士相處，給我的印象是不安，甚至於不愉快，然而他的一切依然是可敬的。就是最苛求的希伯來人的上帝，對於他也只看作迷路的羔羊，還抱着深切的愛的。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寫作「周作人與路易士」，行文上其實是不能聯結的，所聯結的只有一點，就是我以爲文壇似乎以沒有法庭爲好。

周作人和我

夏亨譯

關於周作人的事情，當我忙碌的時候我不想寫出什麼。但在平心靜氣的心情下，我却願意寫出一些來。我不知道我現在應當怎樣地去描寫他。但我相信着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遇到他，總使我有着好感，有着從內心迸發出來的厚意。

前些日子，邀了島崎藤村，和周作人幾個人在一起敘餐，於是跟從前沒有兩樣，使我有良好的感覺。雖然是那麼地匆匆，連充分談話的時間也沒有，但能够和周作人會面，已經是非常愉快的了。

我最初和周作人發生文字關係，還在三十年以前。那時候我才祇二十七八歲。這大概是一白樺」雜誌出版的第二年，因為「白樺」的臨時增刊「羅登號」餘書無多，在雜誌上刊出購買從速的廣告時，從中國方面，有一個人來預購「羅登號」了。這人就是周作人。當我看見他的信時，因為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感到異常的愉快，以致忘記了旁人的預約，而終於不能忘記周作人的預約。從此以後，

我記得和他通過了兩三回信。

此後更互通書信。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不等，所說都是關於翻譯的事情。記得有一次，他要翻譯志賀的東西，那時，因為我還年輕，不像現在這樣懶於握筆，所以每有來信便立刻回覆。當時周作人和我，確曾相當親密，但第一次的會面，却是在我開始進行新村的事情以後。

周作人贊助了新村的事情，且加入為會員，並答應於北平設支部；當新村在宮崎縣建立完成的時候，他特地到這日向山中的新村來。在我的家裏居住了兩晚。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所以談了各式各樣的話。還請他題寫了不少墨寶。就這樣，我們把周作人當作新村的弟兄似的而相交着，我們不再當他是異國的人了。

周作人理訪問新村時的種種在中國發表，關心在中國建立新村的人便紛紛向他詢問了起來。他是熱心於新村事業的，新村的會費他也常常匯來，不過這以後，信息漸漸地少了，那些要到北平去的人想與周作人會面，我也為他們寫介紹信。因此雖不經常通信，却並非沒有友誼。

對於新村的熱情，周作人現在恐怕已沒有了。然而我想友情是不會改變的，

而對於新村的厚意，也是不會改變吧。

數年前，在東京又遇見了他，他欣然出席新村的招待會。

我同情周作人，而且愛好中國人的風度。但作爲一個日本人，能夠在中國找到像周作人那樣的知己，那是欣喜的，是一種來自內心的欣喜。我想，誰都承認周作人是個有學問的人。我們應該尊敬這位作爲詩人和學者的周作人。用日文翻譯出來的周作人的隨筆，讀來是那樣的清逸，和風趣，而且容易理解。

我盼望着周作人在健康中勇壯地作些事情。

日本和中國將必然的友好起來的。我們還是知心的密友，而且，在那時候，如果再能遇到像周作人那樣的朋友，那麼我的喜悅將是值得誇耀的了。

（武者小路實篤作）

記胡適之

希 平

新文化導師，提倡白話文之祖，人盡皆知爲胡適之先生。隨便在「名人傳記」「作家事略」一類的作品裏，祇要冠有「當代」或「現代」兩字的，無不有胡適或胡適之的大名，似乎可以無須再寫，以免「我的朋友胡適之」之譏；可是胡先生的事實，有爲世人所不知的很多，筆者認爲仍有一寫的必要。

先生原名洪辟，號鐵兒，因爲他的父親號老鐵（名珊曾），所以從小就叫鐵兒，後來也就把鐵兒兩字，當作號了。先生行四，生時他的父親，已有五十餘歲了，時在台灣任事，因此先生在三歲的時候，也曾旅居過台灣。

十四歲的那年，到了上海，入萬竹小學攻讀，（校址在九畝地，該校人材輩出，到如今還是一個有名的小學）。後來考入中國公學。天資非常聰穎，老早就能够自修讀書，尤善英文，因和校長（當時不稱校長，爲行文便利起見，姑用校長兩字）鄭孝胥衝突，全體退學。

先生於是和一班退學的同學，重行組織新中國公學（校址在界路慶祥里），就此中途停學，居然担任四五年級英文，教法優異，頗得學生信仰。

先是組織新中國公學時，先生手草宣言，往見那時執有教育權威的時報館總主筆陳冷血，要求把他那篇宣言登載，那裏曉得冷血把他近萬言的宣言稿子，看了一看，若無其事的擱置一旁，先生受了那一次的感觸之後，益加發憤上進了。辦競業旬報，就從那時起的，提倡白話文，也是從那時起的。

他的白話文的界說是這樣的——白話文，就是人人多能了解的文章，出於口，即可筆於紙，說話不是白說的，才叫做白話文。——時年不過十七歲。

先生既發憤爲文，尤喜讀林（琴南）譯小說。因先生於西文程度甚高，先讀原本，再以林譯作參考，中文更有進境，謂先生之文章，得力於林琴南，不爲過。的。先生平素服膺馬君武，馬亦苦學出身，每日油條大餅充飢，化了二個銅子，解決了一天生活，不論寒暑，赤足步行。先生家道中落，其貧不減其師。先生之修國文，讀林譯小說作爲自修古文之借鏡，都是受馬先生的教訓。謂先生的成功，得力於馬君武，也不爲過。

昔嘗遊先生臥室，室內掛滿了古今名人格言，不但室內，他的床上，也到處可以發見格言一類的文字，寫貼在床的四周，還有那林譯小說中的精微的句子。

先生健談，好飲酒，好吸紙煙，對於紙煙，屢戒屢開，每每自揭格言警戒，可是揭貼的戒烟格言愈多，紙煙的吸量，却與格言成正比，而與日俱增。

後來寰球學生會應清華之託，招考留美學生，先生頗想一試，深恐名落孫山，爲學生所笑，並此教書匠也做不成，躊躇再四，決計改名胡適字適之，以示胡所適從的意思。居然考取，而且名次很高，時年正二十歲。

到了美國，進康奈爾大學，學農，不久改習文科，得柯生獎學金。就在那年改入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於杜威，因著了先秦名學史一書，又得哲學博士的學位。

民國六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聘陳獨秀担任文科教授，陳發刊新青年雜誌。先生和陳獨秀以同鄉關係（先生是安徽績谿人陳係安徽懷寧人）時時投稿，所撰文字，激昂慷慨，頗能吸引一班青年，大爲蔡元培所賞識，電邀先生担任教職，與辜鴻銘同在那年就北大教授之職了。蔡校長得先生與辜鴻銘兩人，認爲北大之光，而

先生之名益噪。

民十八年以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被政府通緝，二十年又創辦獨立評論週報又被當局禁止，此人人能道及者，不贅。先生又嘗辦努力周刊，其稿件，多一手包辦，此不爲一般人所知，似不可不補述云。

記 劉 半 農

蕭頌恩

民國二十三年，在西北一角，殞落了一顆文藝巨星，那便是我們的語言專家劉復博士，劉字半農，生於清光緒十六年（民元前二十二年，西曆一八九〇年），享年五十五歲。

劉氏對於民學革命。功績頗著，他和胡適之，錢玄同，陳獨秀，周豈明等，都站同一戰線上，展開劇烈的文學戰爭底生活。他生平著作及繙譯甚多，其中以「中國文化通論」，「揚鞭集」及「瓦釜集」爲最著。

劉氏除對文學有深得以外，對於美術尤屬愛好，攝影更爲擅長，他雖不會繪畫，但是對於畫理見解及批評，却有獨到的允當。

當劉氏未赴西北以前，有一二事頗爲可記；是年三月間，北平美術學校校長王悅之君，爲他畫了一幀照相，工精而酷似，劉極爲珍愛，且親筆題上打油詩一首如下：

「名師執筆美人參，畫出冬烘兩鬢斑，相眼注明勞碌命，評頭未許穴窩鑽，詩文諷世終何補？磊塊橫胸且自寬！藍布大衫偏竊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二十三年三月，王悅之先生爲余畫像，金耐先女士在旁參謀，以打油詩紀之半農一。

劉氏對這幅畫像，手持不釋，他曾指像對人說：「要是把這像放大兩倍，將來死後，出殯時設在靈像亭中，最是適宜了」。未幾，啓程到綏遠時，許多要好的朋友都設筵和他餞別，席間，有人請他寫打油詩，又於句內有「今生已逾不惑年，何必再留徒供萬人嫌」。想不到七月中，竟捐身於西北方言之考察中。劉氏的死，實爲中國學術界中的一大損失，聞者無不心痛，國內報紙多刊載追悼的文字。

劉氏深愛國畫，書室中，琳瑯滿目，全是張大千，齊白石，凌直友，徐悲鴻等作品，生前題畫詩並不多，但他會說：「作畫難，題畫更難，難在字的佈置，和詩，畫，意四點都要統一呢」。

他是江陰人，法國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歷任國立北平大學文系教授，兼研

究所國學門導師，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職，一生致力文化，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記沈尹默

潤 榮

在現在的讀者羣中，還能記起沈尹默先生的人，大約并不多吧。但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他却是一員新詩的健將。還記得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上，便是中國新詩的開始。在這一號裏，除了胡適一人在「嘗試」新詩外，沈尹默和劉半農也是同時開始嘗試新詩的人呵。

倘如你能記起周作人先生的「小河」是新詩中的「自由詩」的代表作，那麼你也許會憶起沈尹默先生的「三玄」吧。是的，「沈尹默」這三個方塊字所以至今還不令人忘記，都許正是爲了這首衆人皆知的新詩「三玄」；而且有許多初中的國文教本，也把這首詩選進去，和魯迅先生的「秋夜」一樣著名。

但話又得說回來，沈尹默先生雖然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但他的詩，舊詩還要比新詩好。其所以初期作新詩而後期倒回到舊詩詞的路上去者，正是爲了當時作新詩的人并不多。他爲了友人陳胡等的情面，勉強「嘗試」一下，後來見到「

「哎呀呀，我愛呀」的詩人日漸多了，所以便停止了「嘗試」而再回到他的舊路『秋明集』便是沈氏舊詩的合集。至於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新詩呢？他倒不要了，至今還沒有編集子。

沈氏雖一向住在北平，但他的老家却在南方，是浙江省吳興縣人。著名的文字學家沈兼士先生，便是他的令弟。沈氏除了作詩外，對於詞曲也很有研究，而更寫得一手好字。他的墨寶，正是前清的「狀元字」的代表，筆筆正，沒有絲毫草率。求他寫字的人，據說並不少數。在今代文豪而兼書法家中，除了周氏兄弟以外，便要數到沈氏和錢玄同了。

現在談及沈尹默先生的人已經很少了，但在以往，談論沈氏的新詩的却很多。周作人先生在劉半農的「揚鞭集」的序裏，對於沈氏的新詩曾有過恰當的簡明的批評，就是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對於沈尹默的新詩，也有論述。讀者之中，如有要知道較為詳細的，不妨找尋這兩本書看看。

郭沫若

諸以

民國二十六年秋，郭沫若從日回國，在上海一個招待會上，我獲見了他的真面目。

一張同字形的臉，戴了一付眼鏡，兩個耳朵裏套着小銀鈴，據他告訴人，因為幼年患過頗重的腸疝，所以，於今耳朵也稍為聾些了，小銀鈴正是補救這個病的，說話是四川口音，演講時尤其宏亮。

關於郭氏的事跡，過去已有許多人記述過，不過，對於他早年和他哥哥一段交涉，却還沒有見諸記載，這裏所說，是根據一個和他非常相熟的朋友的話。

郭氏本是留日學醫的學生，返國後，在上海泰東書局擔任「創造週報」編輯，他的安娜夫人及二子也在上海，生活相當困難，但是，他們的什誌得到青年普遍的歡迎，還有好朋友郁達夫，張資平等共甘苦的合作，精神上倒很愉快。不過，郭氏的家屬，知道他在上海過着受難似的生活，乃於四川當局創設省立成都醫

院時，由他胞兄的介紹，聘他擔任該院醫務主任，這在郭氏本來是很適合的職業，因為他是日本帝大的醫科畢業的。

他哥哥在未得郭氏同意之前，竟派人遠遠地從成都來滬，並寄來一千元匯票，一紙當作旅費，來接他動身回川，當下，他並無拒絕之意，只是既不歡喜，也沒有不樂的表示，呆呆的接待來人，可是，隔了一晚，再見那來迎他入川的人時，他竟祇說兩句話：「我決不去，一千元旅費請帶回去」，把匯票還了來人，逼着人家很快的離開了他家裏。

事後，朋友們猜測，以為這一定是安娜夫人的關係，因為郭氏在川尚有父母為他娶的妻子，回川去了，那個妻子一定要和安娜發生衝突，所以安娜不許他入川，郭氏也只得拒絕那好職業了，這話傳到安娜耳中，竟大呼冤枉，於是郭詩人說：「他們要我回川，關於那名義上的妻，他們答允一定不跟我見面，所以衝突是不會有的，安娜呢，因為可憐我那個妻，又想從此過安定生活，所以力勸我一夜了，要我去成都就職，但我拒絕了，原因是學了醫科不用倒無罪，去當醫生診治病，却不過是造成由我殺掉幾個人的罪惡吧了。」

記郁達夫

希平

我的認識郁達夫先生，還是他的老鄉蔣伯潛先生介紹的，（前年在滬寓岐山邨著語譯廣解四書讀本，由啓明書局印行，風行一時，蔣先生人極短小，滿腹文章，有暇當另詳。）到了念五年，他的別墅——風雨茅廬——落成之後，過從稍密，可惜他忙於和王映霞女士偕遊湖山找尋詩料，不久又有七閩之遊，官興勃發了。其實他在杭州貢院第一中學讀書的時候。（那時稱府中學堂，就是後來杭高的原址）我從我的親戚，該校的校長鳳橋吳傳先先生（早歲留學日本，現已物故。）口中時常稱讚他：國文做得很好，兩點鐘有七八百字好寫；雖然拖了小辮子有些古怪——脾氣——驕傲。古怪脾氣四字，一直印在吾的心裏，到了蔣先生介紹後，覺得並沒有什麼古怪，到很和藹可親，也許修養有素，不比往年了。

他的小說，得力於石頭記，花月痕；他的詞曲，得力於桃花扇和燕子箋，他的散文，得力於三國志和水滸傳，他和西洋文學的接觸，是在東京第一高等學堂

讀書時代，因為他讀俄國小說過多，不無受了些影響。由俄文轉到德文的作品，乃至於英日法的作品他研究過的更多了，在那時的確十足是個書迷，後來在他的「風雨茅廬」裏，幾乎把所有的房子充滿了圖書，他又愛讀國外新進文學家的處女作品，他竟成了一本活動的外國文學的書目錄，這個名稱，是我們作客杭州時贈給他的，江山好改，秉性難易，在日本是書迷，在中國仍舊是書迷，早年是書迷，現在仍舊是書迷，要知担当得起「書迷」兩字，也不見得容易囉！

到了帝國大學，他學的是經濟科，可是他拚命用功的，却是文學，民國十年「沉淪」出版，不脛而走，洛陽紙貴，（現在編入「過去」這部書裏）他的創作，在沉淪以前確乎沒有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有的還不過吳傳先先生口中所稱贊的七八百字的作文而已。

從日本回國以後，和郭沫若輩創立創造社，編輯創造季刊，他當然是創造社的勇敢的戰士，從民國十一二年起，歷任北京大學法政大學朝陽大學各校的教授，十四年在武漢大學講學，給予他的印像不大好，忽忽的回來了。不久又到廣東，担任廣州中山大學教席，那年冬天又回到上海，在法科大學授課。

他喜歡吸紙煙，不開煙絲的好壞，祇要是紙煙他就吸，每天至少要五十支以上。（其實也不算多）某年害病之後，醫生囑他少吸煙，最好不吸煙，他還說這並不是件難事，對着朋友，盡力地負着「紙煙不可不戒」的義務宣傳。病一天好一天，煙癮也就從「紙煙不可不戒」裏，漸漸要發芽了，用糖菓代煙，一月開結下帳來，不知要超出紙煙多少倍，毅然決然地收回了「戒煙」的成命，乾柴烈火，煙量陡增。

他也喜歡飲酒，雖則沒有魯迅翁那樣厲害，倒也是他一筆大開銷。最可怪的他可以千日不飲，却不可一飲不醉，所以有些人當他不曾飲酒的，有些人當他好飲的。

他的字，也很古怪。用墨筆寫來，遒麗飛舞，深具帖旨，可是用鋼筆寫出來雖似鐵劃銀鈎，可惜有些東倒西歪，橫行寫的稿子，更像鑲寶子磚了。

王 獨 清

悅 華

王獨清，這從敗落的官僚家庭跑出來的青年，他是備着詩人態度，他懂得那種豪華的生活，再回顧他的週遭，前後來一個比較，使他充溢憤懣的情緒，他除懷戀過去官僚的生活外，更詛咒現代的社會，他不願和社會妥協，願意讓他自己給人遺忘。每天在捲烟和咖啡的濃烈的氣味中過活。

王獨清的詩，便以這些作爲出發點，他從長安（西安）出來以後，一直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到過文明的古國羅馬，憑吊過文藝復興時的詩人但丁，他流浪最華麗的國都巴黎，他到過南國的廣州。

我們讀他的「弔羅馬」以及懷念長安的長詩，我們可充分看出他一腔憤懣的情緒，他不單憑弔古代的偉跡，他是在訴出自己遭遇，作不平之鳴。他正像偉大的羅馬和長安，從光榮燦爛的時間，慢慢沒落，以至於剩下殘垣斷壁，只換得路上一聲唏噓的嘆息。這是他懷念過去的詩章。

再讀他那首「我從C.C.出來」，使我們明白他的生活，是在一種濃烈的氣息中過着。捲烟是他寂寞中永遠的好伴侶，關於抽吸捲烟的故事，在友人的文章中，可時常見到的，「我從C.C.中出來」的一首詩，那情調和旋律，絕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他的天才，充分被表現出來。這是他對生活所抱的態度。

說到他對生之希望的話，我們可說他絕對的厭倦現實，他想脫離現實，當他離開廣州時所作的一首詩（作者因隻身來滬，書籍多未隨帶，一時不能查出該詩名稱）字裏行間，流露出依依不捨的情感，有不知何日重相見之慨，這竟是件真的事實，他——我們的流浪詩人在去年逝世了。他「死前」所描寫，所憧憬的死亡情形，很可惜的不能夠如他的理想。

王獨清的死，實為新詩的一大損失，爲了他的奔放的性，和視死如歸的思想，在病中仍然在外面奔來走去，仍離不了他寂寞的伴侶——捲烟，他終於悄然地跟羅馬長安一樣地被人遺忘了。但他所遺留下來的詩歌，却永遠地留傳。

張資平訪問記

迅 侯

提起張資平先生，大約沒有一個讀者不知道的吧。假如是略爲留意一下近二十年來新文學的史料的人們，當你談到『創造社』這個文學社團的時候，那麼『張資平』這三個字是少不了的，因爲『創造社』的結成，便是郭（沫若）郭（達夫）張（資平）成（飭吾）王（獨清）五人，而這五人是被稱爲『創造社五君子』的。

筆者對於張資平先生，坦白地說一句，真是仰慕已久，因爲在中學的時候起，便連續地讀着張先生的大作。自從『創造季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版，便在第一期上讀到張先生的『上帝的兒女們』（因爲在那時的『創造季刊』上，寫小說的作家很少，除了張先生之外，便是郁達夫了）。接着，便讀到『飛絮』，『苔莉』，『明珠與黑炭』……等長篇，因此，張先生所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我平日的職務，本是跑跑新聞的，以前也訪問過幾個名作家，昨天的夜裏，

從外面跑回報社來，兜了整天的圈子，也採訪不到什麼，正在愁着『今天倒要交白卷了』的時候，突然聽到編輯部的總主筆室裏有人在談話，便側耳細聽，原來是梁式先生和副刊的主編者在談着明天去看張資平先生的事。因此，『我也去』這句話便信口而出了，并和梁先生約好了明兒出發的時間。

今天的早上，先回到報社，隨同梁先生前往。張先生的地址雖然早已知道，惟是憶定盤路的門牌，却有幾個不同形狀不同數目的門牌號碼在，因此，憶定盤路雖是熟悉的馬路，但找起門牌的數字來却花去不少的時間。

因為梁先生和張先生是朋友，而且很談得來，因此給予筆者不少的便利：第一可以免去通報，第二也可省却初次會見的寒暄，第三更可不必要說明來意——就在這樣如意的環境下，隨同了梁先生踏上樓，而且是在張先生的臥室裏坐談呢。

自從梁先生把『話匣子』打開了以後，談話的線索便漸漸多起來。筆者和張先生雖是初次認識，但因梁先生的關係，張先生也把我當『一見如故』相看，所以從張梁二先生對談的餘隙中，筆者也插問了不少關於『創造社同人』的舊事及近況來。

其中，最爲一般讀者所關心的，便是郁達夫先生。據張先生得到的消息說，郁氏已回到香港了，而且和葉靈鳳戴望舒等人在從事文化的復興工作。郭沫若呢，至今還躲在重慶，掛着什麼文化主任的銜頭，後期的『創造社』幹部馮乃超也跟着郭沫若工作，做了郭氏的祕書。

作爲另一幹部的陶晶孫，現在上海的『自然科學研究所』裏工作，有時也爲『大陸新報』寫些文章。據張先生說，陶氏的日文很好，他的寫作，一向都是用日文，就是發表在『創造季刊』上的『黑衣人』（戲曲）等，也是先用日文寫成，然後由郭沫若或張先生代他翻譯的。關於這些事情，假如張先生不說，恐怕還有大部份的讀者也不知道吧！

「王獨清是死了！」這是讀者所知道的，但是『成仿吾又到了什麼地方呢？』也許讀者對於這個疑問還不清楚吧？是的，當年曾在上海熱烈地喊着『革命文學』的成仿吾，是久無關於他的消息了，如今能够知道他的行蹤的，定然不多。因此，筆者也插嘴問問張先生，據答：成仿吾現躲在赤都延安，依然天天在喊着口號，重慶的作者對他頗爲不滿。

讀者之中，不知張先生是文學家而兼地質學家的，也許大不乏人。說來也難怪，因為讀者之中，十有九都是爭讀張先生的小說的，對於張先生在贛南等大學的地質學的研究論文及講義，大多是忽略了。現在我要向諸位讀者報告的，就是：再過幾天，張先生便前赴蘇州考察地質去。（十一月四日午後）

田 漢

迅 侯

田漢原名壽昌，湖南人，他的夫人漱瑜，也是一個女作家。他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幹部作家之一。「創造社」未成立之前，他曾爲「少年中國學會」的主幹并編「少年中國」月刊。稍後，因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拉攏，加入「創造社」，於「創造季刊」上發表其『黃金的翅兒』，像要和創造社同人一同飛翔於這個唯美的藝術之天地。可是，爲了他和成仿吾交不下去，到第四期的季刊出完，他便退出「創造社」了。

他脫離「創造社」後，便赴日本遊學，從事戲劇的研究。歸國後，創「南國社」，先與其妻漱瑜二人，合辦「南國半月刊」一種，除夫婦二人之稿件外，并拉來了沫若及達夫等人的通訊，由第二期起，附加「南國新聞」，注重電影，戲劇等批評。出到第四期，因其妻心臟病，護送歸鄉休養，半月刊便停止出版。

一九二四年重回上海，以老友左舜生之勸，復刊「南國」，附於左主編的「

醒獅週刊」上，但終以政治見解不同，與左氏脫離，而復刊後之「南國」亦告停止。繼「南國週刊」停刊後，田氏又與「新少年影片公司」的主人姚唐二君合作，將其在「少年中國」月刊上所作的「梵華琳與薔薇」拍為電影，同時便另組「南國電影劇社」。後來，「南國電影劇社」改組為「南國社」，擴大範圍，為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部，社員亦較前為多，由一九二七，二八……起，繼續在上海，南京等地上演，直至一九三〇年春才告解體。一九三一年以後，田氏不復再從事社團之組織矣。

綜觀田漢的著作，以戲劇為多，如「梵華琳與薔薇」，「獲虎之夜」，「卡門」，「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及「田漢戲曲集」五卷等，電影劇本則有「三個摩登女性」（聯華公司）「母性之光」（同上）等。此外，尚未編集的劇本甚多，而散文詩歌，亦復不少。田氏實我國戲劇界不可多得的幹才。

白 采

悅 華

在中國詩壇中，白采的名字，似乎比較陌生，是的，他遺留下來的詩歌並不多，他是個短命的詩人，和徐志摩，朱湘遭着同一的命運。怪不得很少人知道他。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詩集」中，白采只有一篇長詩入選，可是我們從這僅有的一首詩中，便可看出他的思想來。白采「思想完全受哲學家尼采的影響，他的詩沒有郭沫若的雄偉，沒有王獨清的浪漫，徐志摩的香豔，有點像聞一多的沉着有力，却比聞一多更有情感。」

他在「羸疾者的愛」中，寫的一個女人愛戀患着「疾者」的青年，誠意招待他，願意與她結為伉儷，這殘疾者並不貪戀這女郎的美，不羨慕那片快樂的乾淨土，情願過着孤獨流浪的生活，因他不願將他的缺憾遺傳給子孫，使後代變成同樣的衰弱。這是優生學的問題，以這種問題作為詩歌的材料，似乎除他以外，沒有

第二人，這完全站在人類偉大的愛的立場上，根據哲理和優生學而寫成的。

白采對詩的技巧，並不在聞一多朱湘之下，通篇充滿靈感，那患殘疾者的青年，一股幽怨的情緒，回答女郎時婉轉多情的詩句，細膩的描寫，實在令人神往。

爲了他是詩人，同時崇拜尼采的哲學，他的人生觀又與其他的詩人不同，他有着招世的觀念，十足地可被人稱爲書癡，據他的友人說，白采寫作的案頭放着一個骷髏，在別人必認爲是不祥的，白采却時時撫摸牠，玩弄牠，這雖是一種小事，却充分的表示出他獨特的性情。敏銳的靈感。

他有着堅強的意志，致力於哲學及詩歌之研究，可惜天不使其完成偉大的作品，遽爾夭折，他生平不畏死，死神却纏繞他，使他與徐志摩朱湘等，遭遇同樣的命運。

憶朱自清

野 丁

還是剛踏入初中的時候，國文課上讀到一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當時一顆小小的心靈，被那深摯的描寫深深感動了，一連好幾天，在我的腦筋裏都盤旋着一個年老佝僂的背影，不知怎的他老使我聯帶記起我的父親，覺得那充滿自然感情的流露，正像自己的表白。

等到我開始能閱讀書報時，我最歡喜讀散文，而在許多名作家中，我特別愛好朱自清的作品。

在我的想像中，我爲朱自清描畫出一幅面影，他該是個慈祥，纖細，柔和，溫柔的文人，這不但因爲他的文字清雋，逸放，而且那裏面還潛藏着一種足以扣動讀者心弦的威力，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拘着與我類似的觀感吧！

後來炮火瀰漫到家鄉的角落裏，我不得不拖着一雙脚步離開那曾待過十餘年故鄉親切的土地。當輪船的汽笛在長空中拖過一聲漫長的聲響，我聽見父親踏着

踉蹌的脚步手頭抱着一包水菓匆忙地趕上船艙裏，以後船在惡濁的江中漸漸蠕動——暮色蒼茫中，我也瞥見一個年老佝僂的背影，冷風中我不免打了個寒噤，我的心緊緊被痛苦嚙咬着「這當兒又使我記起朱自清那篇「背影」，於是他的名字對我更變得十分親熱起來。」

在昆明，這南方冷靜的山城，我終於有機會一見爲我仰慕已久的文壇宿將，那時他正擔任「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主任。照理不是文學院的學生，要聽他的課程是不可能的，但那年學校裏對新生國文一課特別施行一種新的教學制度，凡是文學系的教授都有份擔任兩三禮拜的課程，所以雖然像我們成天搬弄算尺忙著微積分習題的工學院學生們，也能染着點福氣，從聽這批文壇前輩的教益了。

我第一次由同學的指點辨識朱自清的面影時，雖然是短短的一瞥，但已足夠將幼年那種最私的觀感一古腦撕得粉碎，朱自清並不是一個如我所料想的一個慈祥，纖細帶有女性溫柔的人，相反地，倒是個冷板，嚴肅，頗有點帶英國紳士式的人物。

每天清晨，當學校的第一遍號聲響過沒久，朱自清先生那清癯的身影已經在

街角出現了，每天到學校照例很早，漆亮的皮鞋踏在石板道上索索的聲響爲清晨靜寂的街頭作着有規則的節拍，他走路挺直腰步履整齊，透過那墨晶眼睛的，是一雙鎮定堅毅的眼光，他臂下夾着的那隻黑皮公事包，也伴和着他有規則的步履，前後幌動不停，他照例着得很整齊，雪白的襯衫，藏青的西裝，那上面照例燙得勻勻正正不起一絲皺。

無論如何，瞧見這副神情，我絕難想像出像「背影」一類清雋的小品，會出自這樣一個外表冷漠嚴肅的人的手筆，但自古在文壇的逸史上，像這類例子又太多了，偏是那些剛僻孤傲的學者，倒能寫得一手美麗的抒情詩，反之那些歌頌英雄偉大的詩篇，倒也許是個纖弱多病的文人寫下的，明瞭這種史實，那末對朱自清這種不相稱，也就不再感覺奇異了，誰曉得呢？隱藏在他那冷漠嚴肅的後面，安知不是一顆纖細易感的心呢？世界上本有不少人外表顯得很冷淡，而實際倒是個頂具有熱烈情感的多情者呢。

上朱自清的課，並引不起什麼興趣，相反地倒有點感覺沉悶，西南聯大本着過去清華北大的制度，雖說做作文一定得用白話，但教的書倒是一些頂老的古董

差不多都是關於先秦兩漢時的學術思想一類的經籍，唐宋以後的文章，可說全都付之闕如，依我們想，朱自清如果講授點明清的小品，倒一定會動人得多，但他擔任的部份，偏是戰國策那樣沉悶的史籍，他講書並沒有特別引人入勝之處，永遠是那單調平板的口音，以是到達暮春節氣，坐在教室後面一點的簡直爽性伏在桌上打起瞌睡來了。他本是南方人，雖說在故都也住上好幾年，但南邊的口音依舊很重，他自己似乎並不十分覺得，他最歡喜操京話，如其逢着講「那兒」「幹嗎」一類的字眼時，他決不放棄機會在後尾的「兒」「嗎」上特別加重轉上一轉，那結果弄得很可笑，他對北京話特別愛好，依他說京話的許多句尾最能顯示出一種諧和美。

關於朱自清的歷史，我們曉得的似乎很少，我們祇知道他是南方人，家境不是很富裕，後來入北大唸書，因為那時在北京各報的副刊與雜誌上時常發表些短篇的散文與新詩，頗為讀者所愛好，以後他就入清華教書，由助教，講師，教授，而最後一躍為主任，他並沒去外洋銓過金，但英文程度極好，對西洋文學有極深的造詣，以一個苦學的青年，能獲得如此的地位，我們除感佩外又能說些什麼

呢？

朱自清不但是個出色的散文作家，他小品裏所含有的雋永，平和，沖淡，也許祇有周作人俞平伯可同他相頡頏，但除此以外，他還是個卓越的詩人，他的詩也與散文一樣，具有同樣的風格，他的詩是經過高度藝術修養的產品絕不是晚近那些祇曉得嚷嚷幾聲的可比得上的。

事變後，最初在蒙自，後來就一直住在昆明，他因為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所以外間不大看見他的作品，倒是為學生編的壁報上，倒不時還寫點關於如何寫作及研究新詩的文章，除此以外，他偶而也為本地報紙的副刊上寫點短文，我祇記得他在平明副刊上寫過一篇「是那嗎」。頗轟傳了一下，這本是雲南人的口頭禪，他們說話結尾總要拖長這麼一句，外省人來到這兒，別的雲南話，也許還學得半調子，但極少有不曉得講「是那嗎」的，一半的原因，是因為這聲調好笑，有滑稽意味，自己也覺得鬧着好玩，於是這一來，簡直也就成為一個習氣，以後一個外省人見着個雲南人，別的話還沒開口，可「是那嗎」就不覺沖口而出，對方起初也不在意，可是聽久了，覺得不免受侮辱，有的甚至惱羞成怒而鬧出全武

行來，朱自清這篇短文即根據字源剖解這三字的真正含義，他並着實讚揚了這三個字，照他說這算不得是侮辱，倒有點近乎恭維呢，我們的雲南人看了也不免怒火中消而啞然失笑了。

朱自清擔任的課程很多，但極忙中，他還擔任一課學生作文，他對學生寫作有特別的教法，凡是經他指正的，都能於短期間有極大的進步，他出的題目多是屬於小品描寫一類的，每週批文卷時，對於幾個最優的作品，他照例要用他那不高明的京話大聲朗誦出來，他說這會對學生有不少的幫助的。

朱自清在外表雖然有點嚴厲，但學生們仍願意同他親近，特別遇到寫作的難題時，都想法到他那兒求點教益，他總會多少教給你一點什麼，總之當你向他伸出一張求援之手時，他是絕不會令你失望的。

俞平伯的散文

迅侯

在一般人們的心目中，對於俞平伯的散文，大約都會異口同聲的說道：「平伯的散文倒很像知堂老人的」。這個看法，我也可贊同，因為俞平伯的散文是屬於「沖淡自然」這一流派的，而且他又是周先生的高足弟子；但在文質上却有分別——自然，我在這裡所使用的「分別」一詞，并非就是「大不相同」的意思，而倒說在共同的文風中，有着氣質上的不同而已。

誠然，在我們現今的文壇上，所謂「沖淡自然」這一流派的散文作家，除了領導者知堂翁而外，真的要數到俞平伯了。在以往，南方的散文作家鍾敬文氏，也曾自評其散文的作風似知堂翁，但在我個人看來，與其默默地同意鍾氏的自評，倒不如改說俞氏的文風恰似知堂翁的較為得當而切實吧。——這個信念，至今我還是保存著的。

對於俞平伯的散文的評語，最為正確的，我想唯有周作人先生在俞氏所作的

散文集「雜拌兒」(開明版)的「自序」中所說：「本伯所寫的文章，具有一種獨特的風致。這風致是屬於中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這寥寥數語，不但道破了平伯散文的「風致」，就是連他的新詩也在內了。倘如不信，那麼請翻回往昔的「新青年」或「新詩年選」，尋找平伯的新詩而重新閱讀一次，那麼你便會親切地感到他的「風致」是那樣地舊，同時又這樣地新了。

以前，在許多批評家的筆下，都說周先生的散文，自「語絲」停刊之後，便走到「逃避現實」的路上去。這個評法，其實是極不得當的，我很不以為然，原因就是他們對於周作人先生後期的散文沒有澈底的了解，而只看見了皮毛。就個人看來，周先生的散文，非但絕對不「逃避現實」，而倒無時無刻都與黑暗的社會中各種現實對抗。倘如不信，我馬上可以隨手抄些給你看。

如「苦竹雜記」一書中的「後記」所錄致友人書云：「不佞非不忙，乃仍舊弄文字，讀者則大怒或怨不佞不從俗吶喊口號，轉喉觸諱，本所預期，但我總不知何以有非給人家去戴紅黑帽喝道不可之義務也。……唯凡奉行文藝政策以文學作政治的手段，無論新派舊派，都是一類，則於我為隔教，其所說無論是揚是抑

；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爲少信的人，對於信教者只是敬而遠之，況吃教者耶。國家衰亡，自當負一份責任，若云現在吶喊幾聲准我免罪，自愧不會學會畫符念咒，不敢奉命也。」

看過了上面所引的一節，便可以知道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并不如那些批評家所說，反過來，則從周先生的散文中，處處都可以找尋到他對現實的不滿的流露。但倘以這個角度來衡量一下俞平伯的散文，便會覺得大不相同了；說得明顯些，俞氏的散文，倒有些「逃避現實」，全回復到「故紙堆」去，因爲在他的散文中，差不多都是談書報，說往事，考故事的，能像「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這樣的散文是很少很少了。

知堂老人的散文，除了談論社會人事者外，雖然也還有關於書報蟲魚的在，但他的態度是十分冷靜的，敘事說理的成分多，談論風月的成份少，甚至無心多談風月。他在「苦竹雜記」一書的「後記」有云：「我何時才真能專談風月講趣味，如許多熱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還不大容易。」但平伯呢，却大不然，他非但喜抒情而不說理，抑且頗多傷感，如「雜拌兒」，「雜拌兒之二」及

「燕知草」等集子，我們都可隨處找尋得出來，但他的文風，仍是沖淡自然的。所以我在上邊才敢說：平伯的散文在風格上是逼似知堂翁，但在文質上却又有分別——便是根據了這一點而來的。

馮文炳的小說

余 拯

馮文炳的小說，就其文體上來說，是極其沖淡而平易的，無可多言。其受周作人的影響甚深，成為他的作品成立的要素，用同樣的眼，同樣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纖細處生出驚訝的愛，馮文炳也是在那愛悅情形下，用自己口筆，把這纖細的境界畫出，成為創作。

在創作積量上看，馮文炳是像吝惜到自己文字，僅只薄薄兩本，不過在這兩個小集中，所畫出作者人格的輪廓，十分顯明，這可從「竹林故事」及「桃園」二書中看得出來。

馮文炳的作品，充滿了農村寂靜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個我們所熟悉的農民，在一個我們所生長的鄉村，如我們同樣生活過來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農村少女動人清朗的笑聲，那聰明的姿態，小小的一條河，一株孤零零的長在菜園一角的葵樹，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氣味

的鄉村空氣，也是彷彿把書拿來就可以噴出的。

作者所顯示的神奇，是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畫一切風物姿態輪廓，有時這手法早年天去的羅黑芷君有相近處。然而從日本文而受暗示的羅君風格，同時把日本文的瑣碎也捏着不再放下了，至於馮文炳君，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節制中見出可以說是慳吝文字的習氣的。

作者生長在湖北黃岡，所採取的背景也仍然是那類小鄉村方面。譬如「小溪河」，「破畫」，「塔」，「老人」，「小孩」，這些這些，是不會在中國中部的江浙與北部的河北山東出現的。作者地方性的強，且顯明的表現在作品人物的語言上。按照自己的習慣，使文字離去一切文法束縛與藻飾，使文字變成語言。

凡是生長在兩湖四川的人，而馮文炳的作品中（尤其是對話言語），看得出作者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記述言語」的一個人，同一時是無可與比肩并行的。

趣味的惡化（或者這只是我個人的見解），作者方向的轉變，或者與作者在北平的長時間生活不無關係。從北平所謂「北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

散文採雜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從而非意識的或意識的感到寫作的喜悅，這一趣味的相同，使馮文炳君以廢名筆名發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覺得是可惜的。這趣味將使中國散文發展到較新情形中，却離了一樸素的美，越遠，而同時所謂地方性，因此一來亦已完全失去，代替這作者過去優美文體顯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態一事了。

創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應當缺少拘束的。但一個好的風格，使我們傾心神往機會較多，所以對於作者那嶄新傾向，有些地方使人難於同意，是否適宜於作者創作，還可考慮。

把作者與現代中國作者風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認，最相稱的一位，是沈從文。一則因為對農村觀察相同，一則因背景地方習俗習慣也相同，然從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單純的文體，素描風景畫一樣把文章寫成，除去文體在另一時如人所說及一同是不講文法的作者，外，結果是仍然在作品上顯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并列，略舉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園」（單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廟和尚」。

「河上柳」(單篇)

「雨後」(單行本)「夫婦」，「會明」，「龍朱」，「我的教育」(單篇)

則馮文炳君所顯示的是最少一片的完全，部份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築到「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鬱，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慾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衝突。作者者是詩人(誠如周作人所說)，在作者筆下，一切皆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下出現，作者文章所表現的性格，與作家所表現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點在此。「雨後」作者傾向不同。同樣去努力為彷彿我們世界以外那一個被人疏忽遺忘的世界，加以詳細的註解，使人有對於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認識，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種，皆有一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後」作者的興味與成就。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語言，粗澀的靈魂，單純的情慾，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係下形成的苦

樂，「雨後」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炳君爲寬而且優。創作基礎成於生活各面的認識，馮文炳君在這一點上，似乎永遠與「雨後」作者異途了。

沈啓无印象

果庵

雷迅兄畫了一幅沈啓无君的速寫像，是當沈君在中大附中演講時畫的，惜當時我沒看見，雷兄也始終沒告訴我，最近我才在美術室看到了，覺得很有一類上添花之妙，因此將此畫寄給元德兄，轉刊中副，但又一想，沈君已回去很久了，刊此難免有冷飯之嫌，不能不配上一點文字作爲說明，這便是寫這篇短文的動機。

此番全教會講，使我重會到別離多年的師友，并認識了好些心儀已久的人物，如沈君殆即其一。對於沈君，我不是在語絲上認識的，還是因爲「現代」上刊出的知堂翁日記裏，有「啓无來」的字樣很多，才引起我的注意。又我對於沈君的散文，沒有對他的詩印象深，而我的老友，如常在「現代」「文飯小品」等處發表散文與詩的「南星」君，又是沈君的學生兼同門，南星的詩，頗與沈君有近似處，蓋田園風味中，加以冲淡之趣，若比古人，或韋應物孟浩然最切近也。民

國廿七年冬，沈君在知堂翁書齋遭池魚之殃，使我受很大衝動，後來聽說他并沒有受多大影響，方始釋然。那時在「朔風」或「中國文藝」上還偶爾見到他的詩，我由詩篇的風格推斷，以爲他一定是屬於肺病型的頹長瘦削的江南才子，那知這回在中央大學第一次遇見，却是滿面健康色的丈夫，面唇上又鬚鬚頗有髭，馬褂穿得很整齊，如果不說是教授，倒頗可算一位簡任官更了。

那一次初遇，是在樊仲雲先生宴請華北各教授的席上，他是第一位來客，我推開客廳門去招待時，一見面就說：「果『元』吧？我是×××」。我好像也有了什麼特別的標記，一下就被他喊出名字來。在宴會的酬應場面上，大家是不好談甚麼的，一連開三天會，大家聽膩了八股式的議論，和許多慨當以慷的牢騷，老實說，我還是抱著「說開會」一文的态度，對於會議本身，并無若何敬意，倒是看看那些早已知道了名字今日才有緣相會的面孔，比較還有點意思。好像第一天會議後，我到中央飯店去拜訪他，順便還看幾位老同學舊師友，適逢日本文學家林房雄也在，林君是個兵士型的人物，說話很率直，光頭，與我倒老同志，中國話學了不多久，馬馬虎虎能說幾個字，但那種天才本就相當佩服。我同啓元說

了許多關於舊朋友的話，以及許多人的消息。啓无說在飯店住很囑，開會完了，擬到滬一行，可以會見上海諸友，回來也許住到我的學校裏，我表示竭誠歡迎，并即說定到時必請他講演。

我的亂七八糟的事很多，啓无走時，也再打招呼。過了差不多一星期，我晚間被一個人約了去洗澡，在南京洗澡也是不好解決的大事，去早了浴室尚未燒水，去遲了等不到盆子，所以有人定好座位請去沐浴，倒是很難得的，不能辭謝，我連晚飯都沒吃，就去赴「浴」，回家已十點，才知道沈君從上海回來了，親自到家中來找我，因不在，又回到福昌飯店去了，福昌算南京第一等旅館，茶房等都是北平人，沒有海派惡習，我很奇怪沈君何以不住在我的學校裏而住在這樣奢侈的地方。次晨，打電話去找他，正碰到一個最熟識的在餐廳服務的茶房，他一聽語言就知道是我，所以很快的便把沈君請了來，我才知道他已經到京兩天了，并且已在樓上看見我從樓下經過兩三次，原來我每天去中大上課，是必須經過此地的。

我立刻到飯店去訪他，他的房子向東，正可以看街道上的車馬。房金不過日

金十元，比起中央來，實在不算貴，可是環境要好得多了，至少在我們書呆子是有此感覺。這一次會面，可謂長談，由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不停止的談着，從南京的風土談到許多「新的掌故」，由事變後談到事變前，這種話，只有在談着的時候，感覺有意思。若想在事後追記，恐怕很難的。總之，我從沈君話中了解許多想要知道的北方現狀，如大米賣到四百餘元，麵粉在一百四十元以上，金平伯郭紹虞諸先生的動靜等等，同時我也告訴了若干他要知道而恰爲我所清楚的問題。十二時左右，以酒量著稱的陳柱尊先生來了，我約了他們兩位到泰山飯店吃午飯，後來我們是戲稱此次爲「一登泰山」的，因爲第三天晚上又去過一趟。啓无的酒量也是有名的，這天特別要了「洋河大麴」，可惜店家沒有，於是只吃四兩白酒完事，陳先生照例在晚間吃酒，中午絕對不吃。飯後我和他步太平路而南，把舊書店巡禮一週，在上海書店買了好幾本我們認爲很八股的刊物，但連來人却看了還新鮮，又在翰文書店買了一部支那內學院版的錢函心史，印的還不差，價至十六元，薄薄兩本，竹槓不輕。

謝他講演就在次日，因啓无好像有點要辦的事情，所以在京至少還有兩三

天勾留，我約好時間是十一點半，派了車子去接他，不意他打電話來說車子未到，要自己來，我很急，親自跑到學校附近一條巷口去等，結果他還是坐了去接的車子來了，講演是對了初中二三年級的青年說的，故沒什麼學術上的議論，只是平易懇切的幾段話，却也很感動人。這天午餐在我家裏，菜很簡單，酒則是黃酒，前幾天陳柱尊先生宴錢稻孫先生，我曾在座，錢先生講在北平買酒也很困難了，好的南酒尤不易得，於是錢翁開懷而飲，頗有盡量之意，我的酒是太不行，不比陳先生是飲中八仙，平日所儲佳釀甚夥。好在啓无正要在下午有事面洽，不喝也算得體，便勉強強強吃飽了而去。再遲一天的晚上，是樊仲雲先生在泰山飯店請客，同座有龍榆生先生，龔持平先生，不但吃得淋漓盡致，談得更其淋漓盡致，我們談到女人的條件，第一還是要美，於是去過東京的，都回憶起帝國大飯店的女給來，說那真是漂亮，可惜是可望而不可即，真乃美中不足。歸途我們大家都是走的，想不到中山東路西半天竟下起雨來，大約他們都會淋濕，我因為回家中途分手，遂不知下回分解。此次泰山，稱爲「兩登」，我戲言，沈啓无兩登泰山而小南京，他爲之莞然。今天啓无所要洽辦的事已竟完全辦好，故精神格外暢

快，並且決定最短期間，就要回去了。

果然，我於翌晨去看他時已在準備行裝，當時他正在給雨生寫信，彷彿是說到廢名和章叢蕪等，對於中華副刊某君所記之文，頗有辨正，蓋自沈君去滬後，中華幾每天有他的消息，但旅館無此報，故沈君特別向我要了，詳細的閱看。

我去上課回來，他的房間已退了，有劉詩孫君在座，我們一起到同慶樓去吃午飯，這是小得像北平的「穆柯寨」「烤肉宛」一樣的菜館，但那個胖子堂倌老李的舉動和天津口音實在有誘惑性，而菜也格外便宜，可算是「物美價廉」。飯後，我們送這位詩人飄然坐上一輛三輪車，叨上一隻雙斧牌走了，好像并不是相距有三千里；而同時我爲他拿着的兩聽茶葉，他竟忘記帶走，當我聲嘶力竭的追上還給他時，他却輕輕的笑了，「等下次我來時再拿不是一樣嗎？」

大約這詩人不久又會飄然地來了。

懷 茅 盾

志 堅

憶自廿七年之冬，茅盾携眷飛往新疆，曾從昆明給我一信，我於翌年春覆他一函，從此魚雁不通已有四年多了，歲月催人，我倆均年將半百，此生重會，未知何日？撫今追昔，萬感交集，懷念良友，情不自己，特記此文，以留鴻爪，并以告一般文學青年。

一 少時同學

烏鎮（浙西一大鎮），我們的故鄉，已大半成爲瓦礫之場，染滿了鮮紅的血，我家早毀，而茅盾的老家尙獲保全，與那靈秀的壽聖塔一同歸存。但是北宮那裏的烏青鎮公立植材高等小學校，却也化爲廢墟了。這學校，規模相當完備，程度也相當高深，我與茅盾同在這學校裏讀書。我年十五，讀於高等三年級，他少我一歲，反在四年級將於年終畢業了。我們因爲同是寄宿生，日間雖不同課堂，夜間則同室溫習睡覺，所以常在一起切磋琢磨。久相與處，意氣復投，遂訂爲昆

弟之交。屈指算來，已有三十餘年了。當時他的國文成績，已爲全校冠軍，教師張之琴先生嘗撫其背道：「你將來是個了不得的文學家呢！好好地用功吧！」他聽了這種獎勵的話，益加奮勉。以異日之文豪自期，便對我說：「我能著作一兩部偉大的小說，成一名家於願足矣！你意如何？」我道：「我的志願也跟你一樣？——我倆遂日以閱讀新舊小說爲樂。他喜歡踢毽子着象棋，而我對此等玩藝不大感到興趣。我喜習字繪畫，他則於書畫外，兼能鐫刻圖章，總之他處處顯出有其特異的天才。」

下一年，我到嘉興浙江第二中學肄業，插入二年級，他也考入吳興浙三中校二年級。我們因交誼甚篤，以同學一校爲樂，到第二年春天，他聽了我的慫恿，也轉到二中來求學；却不料於下半年，有數同學與監學陳鳳章大鬧，都被開除，茅盾以會題了幾首罵陳的詩，亦記大過。於是他於民國元年春改入杭州安定中學，我因受校方免學膳費待遇，無力從他轉學，從此我們就又分離，不再在一起念書了。但是其後每年暑假中，我常訪他，與他討究文藝，獲得不少新的學識；當他把西洋文學史滔滔不絕地講給我聽，我只覺得他于文學已很有造詣，萬非我所

能及，願思加緊努力迎頭趕上，可是他繼續尋覓甚大，我則困於家境，讀了一年大學不得不中途停輟終於當了一個教師。

二 壯年同事

茅盾於民國五年秋即入商務印書館，在國文部編輯童話及爲各大雜誌寫文。至民國八年，介紹我入商務校四部叢刊，我以薪給止三十元，不就。越二年，他見我教書學殖益荒落，又勸我入商務，我受到這種熱情，自然立即允諾。於是他又介紹我進商務的編譯所，助鄭振鐸氏編兒童世界，從此我們又做了同事。

我對於兒童文學，素無研究，至此他又力勸我多讀西洋各種兒童讀物，可是在那時已經寡人有疾，寡人好雀戰，以致並沒有把安徒生童話各國的童話，細加研討，辜負了良友的一片好意！今雖悔恨，却已無及！不過在當時，我每次到他的寓所，見了他將借來或買來的大部書籍，勤奮閱讀，且知道他每日朝晚必翻譯或作論說幾百字，我的心上輒起了一個波動。想想他那麼樣努力，而我却這樣荒嬉，未免自覺慚愧，便在回家後，也多讀些書多寫些文這纔於兒童文學略窺得

一門門徑。但是我因未能戒除惡習，用些苦功，却終不能把自己有所造就。從可知人之成功與失敗，決非偶然。我與茅盾在中小學至大學時代，學力都相差不遠，但彼從大學預科畢業後仍埋頭苦學，而我則做了教書匠竟拋棄了書本，所以他有成而我終於失敗了。青年學子讀我文後，當可知所警勉。

又，茅盾在致力寫作文藝論文，及翻譯小說和劇本的時候，我常勸他寫創作小說，他只是笑笑，搖搖頭道：「我還沒有力量呀！」我當時以爲他故作謙虛，很不相信，直到後來，方纔知道這正是他對於文學抱着一種謹嚴態度與一般率爾操觚者不同。一般青年學生，初得小說門徑，就要創作長篇巨著，結果徒被譏爲尚未成熟之作家。而茅盾就不是這樣，他必待至民國十七年用了十年苦功後，才開始創作他的「蝕」——幻滅，動搖與追求三部曲，無怪其能一鳴驚人了！

三 難中聚散

一九三六年之冬，我隨商務諸同人赴長沙，突然和茅盾在長沙相遇了，我們已闊別兩年，一旦他鄉遇故知，歡喜自不必說。過了幾天，我到白鵝塘一號他的寓所看他，暢敘別情，他夫人出外買菜回來，堅留我同吃中飯，我却以茅盾會客

很忙，不久就告辭走了。

下一年四月，我被調至香港，他也來了，寓於九龍太子道一九二號。當我知道他的行蹤，又立刻去訪他，他把此次來香港的經過都告訴我。那時他爲廣州生活書店編「文藝陣地」，已出了二期；又爲立報主編「言林」，每月要去廣州三回，而所得待遇，生活止二百港幣，立報百五十元港幣，大有入不敷出之概。他把「文藝陣地」送我兩冊，又將各作家的來稿給我看，一面對臧克家，歐陽山等各個新作家大加讚美。我想他還像從前一樣，對於新進作家，多方獎掖，以求中國之文學大放燦爛，難怪一般前進的文學青年都要集其門下而奮勉起來啦。或許他能爲魯迅第二吧？因此我又回想到茅盾那種不妥協態度，也有些像魯迅。記得他和學衡派筆戰的時候，鄭振鐸先生勸阻他，何苦斥之過甚？他說：「我爭的是理論，不是爲情感！」仍攻擊如故，又印度詩人泰戈爾東來講學，徐志摩，鄭振鐸等，都熱烈地歡迎，茅盾却以泰氏不是反英的詩人，獨表示反對。這都是他的態度嚴正，不肯隨便妥協之處。就是那時候，他的生活很不寬裕，港粵的出版家和各報主編都約他寫稿，在他人正好藉此多得稿費，而他却推說無暇，均置之

不理。其實他當時每月不過寫二三萬字，頗有閒空，所以不理人家，便是他對於自己本派外的報紙刊物，向不輕易投稿之故。記得從前他爲小說月報等不惜連夜寫起文來，而對於宗旨不合的小說世界，儘由主編葉勁風再三懇求他絕不應酬敷衍，我覺得像他這種嚴守自己的立場，不輕遷就，也不愧爲一革命的文學家吧！

自從這次會晤以後，又見面數次，終於在廿七年十一月我們分別了。現在地北天南，相見無日，恨無雙翅，唯有寸心，讓我遙望雲樹祝他平安吧！

記 葉紹鈞

希 平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他是一八九二年生的。中學畢業後，擔任過多年小學教員，他的文學，就在那教員生活中修養而成的。民六在北京大學擔任研究所通信處爲研究員，到民十才擔任中學國文教員。所以他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可以驚異之處，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却很大，在文壇上佔了光榮的地位。

他擔任過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的編輯，後來又編「小說月報」，在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誌，同時擔任上海各中學國文教師多處，並大學教授。

創作很多。短篇：如「隔膜」「火災」「線下」「未壓集」「平常的故事」「一個青年」；長篇：如「倪煥之」；童話：如「稻草人」「牧羊兒」；戲曲：如「懇親會」；散文：如「劍鞘」（與俞平伯合作），論文集則有「作文論」，文筆詳細精到，深刻生動。初作小說，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描寫到小市鎮及鄉村的生活，擴大至於社會與時代。關於創作題材大多取之於教育方面，尤爲作

者所特長，因此大家公認他是一個現代中國的教育小說家。

酒和文人的關係，甚至認為開門七件事外的一件事，到了現代，就是掉掉筆頭的人而和酒不發生關係的，幾乎可以說是百不得一了呢！據酒壇批評家說，郁達夫與葉紹鈞兩位正是惟酒無量，不爲酒困的了。縱然在酒的名聲上，郁達夫要比葉紹鈞有名，但是在實際的酒量上，郁達夫却不如葉紹鈞呢！

筆耕所得，生涯不惡，前幾年在蘇州城內滾繡坊春石弄建了半西式房屋數椽，孝養太夫人，極爲和順，就是他的太太胡墨蘭也是從無違言。太夫人含飴弄孫（紹鈞有子二人一名至誠一名至善女一人名至美），天倫之樂，有逾尋常。文人而能衣錦歸鄉，倒不在多數吧！致富之源，當然在他的寫作了，寫作致富，未必人盡然也。主要之點還在他自己說的：「每爲一文，不肯率爾從事，必克盡其力而后止。」這是他在文壇上成功之訣，也是他致富的原因。現在聽說他在重慶教書。

記老舍

慶餘

一個住在上海二十五年以上，閒下來常歡喜翻翻報紙看看副刊的作者，他可以在當時申報的「自由談」副刊裏找到一個名叫「舒舍予」的，這人是民國九，十，十一年間的老投稿者。「自由談」在當時是和新聞報「快活林」一樣為讀者們所愛好的消遣讀物，在我所收藏的十八冊合訂本中（自民十年到民十四年），可以看到這副刊所登文章都是些被後來新文學家稱為「鴛鴦蝴蝶」舊文爛調的文字，一大半是文言稿件，「舒舍予」就是專寫文言短稿的一個，他寫些什麼呢？戲片語（當時留聲機片正風行一時），遊記和劇評。另外，「半月」雜誌上也有他的稿件，都是老式文調。

誰知道？十二年後，跟着張天翼，宋春舫（他在民國九，十年間在歐洲為「自由談」寫維也納通信）之後，從舊文章裏翻身，一躍而登中國新文壇，被林語堂稱為「中國最佳的幽默諷刺作家」，就是這個「戲迷」舒舍予——老舍。

老舍在「自由談」寫稿的時歲，僅有二十多歲，他是北京人，二十歲到二十歲間住在北京求學，他自己說：「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枵腹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因為窮，從北京到上海混了幾年，一度在南開中學教國文，在南開時曾替校刊寫過一個短篇小說，但他自己並不承認這是他始作小說的第一篇。他以為二十七歲在英倫留學時所寫的長篇「老張的哲學」才是他的處女作，那時他常看潘樸斯和尼革里勃的作品，不知不覺受影響很深，「老張」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寫了一年才成功的，由許地山的介紹，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發表，因為讀者們批評不錯，又化了一年寫「趙子曰」，這本書除了挺拔利落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全書只有一個女角，而且始終沒有露面。「老張」「趙子曰」後來全由商務文學研究會出版。有了版稅，生活也慢慢安穩了，在返國之前，又替小說月報寫了一個長篇「二馬」，全用北京字眼，生動跳躍，他用幽默的口氣嘲笑紳士型的英國人，另一方面刻劃中國前一代和後一代思想上的衝突。

之後，他到歐洲玩了三個月，再到南洋，在新加坡的途中寫了一篇長四萬字

的戀愛小說「大概如此」，以倫敦為背景，但到了新加坡，看了印像種種，終於把這小說撕掉，在當教員的餘暇之時，寫了一本最使他滿意的作品「小坡的生日」，他在「老牛破車」上敘述本書，認為：「我對這本小書，仍然最滿意，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我深喜自己還失赤子之心……有了「小坡的生日」，我纔真明白了白話的力量……此書中有中國小孩，馬來小孩，印度小孩，而沒有一個白色民族的小孩」。由此可知老舍在倫敦時看穿紳士的假面具了。

不久他返國，住在北京，三四月後，到濟南大學教書，在濟南，他改變了作風，寫下了「大明湖」，自己印了張大格大的稿紙，當寄給小說月報時，一二八發生，這束稿子就此被火燒光，以後就一直沒有重寫，大文壇上，這是一個損失。民二十二年，「小坡的生日」由生活書店出版，老舍也應施蛰存之約，為現代雜誌寫「貓城記」，這作品新穎得很，但他自己認為是失敗的作品，同時幽默雜誌在上海大盛，「論語」稿子，老舍每期幾乎都有，他正在濟南教書，生活很優裕，他題全家福照片的詩上可以看出：「爸笑媽隨女扯書，一家三口樂安居，濟南山水充名士，籃裏貓球盆裏魚」。他的「牛天賜傳」也開始動筆。

民廿四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風創刊，主編約他寫了一篇連刊八期的創作經驗「老牛破車」，很受讀者歡迎，而另一個長篇小說也由良友出版，這就是有技巧有控制的「離婚」，用北平做背景，這本書是在熱天的濟南僅以一個多月時間完成的十二萬字小說，創作力的偉大，老舍也可算是一個了。

老舍擅長寫長篇，因為「短篇想要見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長篇有偷手」，但老舍的短篇也很出色，從「趕集」，「櫻海集」到「蛤藻集」的幾十篇小說，每篇都有獨特作風，譬如「寫山大王拜訪偵探長」的「上任」，寫「爲兒子娶還是爲自己娶」的「老年的浪漫」，像「月牙兒」，「斷魂槍」，「大悲寺外」等，都有潑刺跳動的字眼活躍在紙面上，在作家羣中，老舍有獨特的作風，純粹的北平口語，這是別一位作者所够不到的，無怪林語堂說出「愧我沒有老舍那樣善用北平話的才能」的話來了。

老舍生得很清瘦，常穿長衫，有時也穿西裝，患近視很深，愛喝點酒，他的照片曾在青年界和論語週年紀念號刊出過。他寫作的態度非常認真，稿子整齊清楚，一篇小說完成，總要在幾個好朋友面前朗誦一下，請求批評，他寫「趙子曰

「完畢後，給朋友與恩承讀一遍，這位寧先生看時笑得把臉當作了網，放到茶裏，鬧了笑話。」

七七之前，他一度在青島執教，戰事起後輾轉由武漢而桂林而重慶，一度曾傳說他在辦詩歌朗誦會，大概他現在依然很活躍吧！

老舍

虞城

關於老舍，我知道得很少。他的原名叫做舒舍予。他本來是不大寫批評或頌揚人家的文字，一向都是很謙虛的，我們只要一看他的自述「老牛破車」便知道了。

前年許地山先生逝世香江，去年我發表了一篇「憶許地山」紀念他，而老舍先生也會在重慶發表「追悼許地山」一文，洋洋數千言，絕沒有一點恭維許先生的意思，祇照事論事，觀此可知他絕沒有頌揚人家的。

許先生未死的時候，我和他在廣州談談文壇，提起老舍先生，許先生說，「老舍是我的老朋友，在文學研究會的時代，我們常在北平見面。他昔年住在北平，沒有讀過什麼書，也沒有進過什麼學校，但能說出一口極流利的北平話。後來得到了一個機會，到英國住了幾年，回來便在大學教書了」。

老舍被人稱為「幽默小說家」，是的，這個街頭他可以當之無愧。林語堂被

人譽爲中國的「幽默大師」，我想那是不對吧。當時林語堂以獨當一面爲「論語」及「人間世」主幹，發表了很多所謂幽默的文章，其實當時在「論語」寫文章的，個個都是寫幽默的能手，如魯迅，知堂，老舍，郁達夫，伏園，邵洵美，簡又文，陶亢德等，均是表表者，不過林語堂發表的文章較多，又是主幹而爲讀者最注意吧了。我想林語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帶滑稽，老舍則幽默而帶嚴肅，文學方面有相當修養的功夫。

林語堂現在已遠走國外，并得賽珍珠竭力的推薦他的書向美國讀者，坐收美金版稅，已面團團作富家翁，沒有興趣再寫幽默文字了。而老舍則在重慶，除了教書外，仍大寫其幽默文字，努力不懈，據前時滬上某報說他寫了一篇萬行的長詩，我們遠居海上，無緣看到，可惜，可惜！

記 趙 景 深

希 平

趙景深字旭初，四川宜賓人，年齡大約和葉紹鈞相彷彿，也都從小學教員生活中過來。

他的文章寫得很多，而且範圍也很廣，小說有「囍子花球」，詩有「荷花」，歌曲有「天鵝歌劇」，研究民俗民間民歌等類的作品尤多，如「民間故事研究」，「民間故事叢書」等都是。對於童話，亦甚有貢獻：如「童話學ABC」，「童話論集」，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恕我不一一開示書目錄了。有人稱他爲無所不知的專家。

他有一本「中國文學小史」，銷數很盛，可算是他的代表作了，很合於中學的國學常識。他在小說月報寫過外國文壇的消息，寫得天花亂墜，有聲有色。又翻譯過「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八冊，開明出版，奠定了文壇翻譯的地位。開明當局，至今還很感激他。他曾在開明書店主編「文學周報」，「現代文學」，又擔

任過北新書店總編輯。他又擔任過復旦大學中國公學上海大學藝術大學等教授。據他的高足們說，他們的課卷，是用洋籐子的，鋼筆橫行書寫。文言的，就在卷後批個閱字，白話的，間或改一二字，大都保留原句。他們說時似乎嫌景深貪懶，其實大學生的文課，真要一字一句的改，未免太看不起大學生了。不改決非貪懶，真要貪懶，那裏有暇寫「閱」字呢。

民國廿九年和李小峯的妹妹結婚，汪馥泉做的現成媒人。北新書局和趙景深打成一片了。

關於中國新文學文藝的收藏是值得贊揚他的。倘然你需要一本市面上不大看見的中國新文學書嗎？那祇要去向趙景深借好了。他的藏書，大都是價值不賈，非常平民化的，所以借了不還，也不要緊，不過他的那些大作，失去了考證和研究的資料，熟識的朋友，也不忍出此，祇有他的幾個不識相的高足，向着他借書糾纏罷了。

李 金 髮

穆 爾

我國近代文壇上的「詩怪」李金髮氏，是沒有一個詩歌愛好者所不知的。他是廣東梅縣人，和張資平是同鄉。早年曾留學法國，研究雕塑。但他在法時，非常愛好義大利的象徵詩作家，如鄧南遮等人的詩篇，他是常常朗誦不止的。

十年前，據李氏在廣州時語筆者云：他的作詩，早在一九二〇年，後來收在『微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詩篇，多是那時的作品。繼『微雨』後，他又寫了更多的詩，後來編成『爲幸福而歌』（北新版）及『食客與凶年』（商務版）。一九三〇年後，回粵就任「廣州市立美專」校長，卜居於東山的百子路，這時詩作已很少了，只有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的『現代』什誌，才有他的詩篇。

就中國近代的詩壇上說，他是中國象徵派的鼻祖，戴望舒等人的詩作，都在李氏之後。同時，他的雕塑，也很著名，尤其是銅雕和石塑。陳濟棠主粵的時候，曾請李氏爲其母雕一銅像，酬金奉敬廣東毫洋十萬元。此外，廣州中山紀念堂

前的總理像及廣州觀音山麓的伍廷芳像等，均出自李氏之手。李氏除從事雕塑及作詩外，也有翻譯，世界著名的『古希臘戀歌』的中譯本，便是李氏譯的。此外，也曾爲商務書館主編過『美術雜誌』，圖文並茂，可說是新文藝運動以來，在中國現代的藝壇上，一本權威的美術雜誌，可惜曲高和寡，僅出三期便告停刊了。最近我，曾在某小報上，看到一些『文化報導』，云李氏已客死他鄉，但願這個消息是假的吧。

朱 湘 的 詩

余 拯

朱湘的性格，生來就是傲骨。他在安徽大學教書的時候，對同事都看不起，目之爲繡花枕頭；所以一班同事都對他沒有好感。然而學生却很歡喜他。當他上課的時候，學生無不擁滿了教室，甚至別級的同學也跑來聽他的課。這並不是他說話動人，其實他的學問確是高人一等的。他除了上課的時間外，從不外出，從不交際，祇守在家裏看書。他什麼書都看，因此有人以爲他讀書太濫，其實這正他學問淵博的根源，同學問他什麼問題，他一問即答，沒有什麼思索，絕沒有對同學說改日再答復你的話。

在安徽大學時，因他看不起同事，又不擅交際，不久他的職位便調掉了，於是他到上海來。

在上海這個的大社會裏，生活是多方面的。倘沒有職業，生活便成問題，正是爲此，朱湘在上海一直失業下去，幸而他還能寫得一手好詩，不致餓死。爲

了生活的壓迫，他曾向一般出版商示威過：「作詩的稿酬，每行以五元計」，但終爲出版商人拒絕。以後加以妻子大吵特鬧，左要朱湘給費用，右要追朱湘離婚。一個人失了業，環境自然很惡劣，同時走到家庭無理取鬧，朱湘受不了這種刺激，結果憤而投水自殺了。

他的詩歌，我們可以看見他能以清明無邪的眼睛，觀察一切，無渣滓的心，領會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悅目的調子，爲詩人所接受，各樣的音韻皆以悅耳的調子，爲詩人所接受，他的詩作，代表了新文壇第一個十年中的格律派。愛，流血，皆無衝突，皆在那名詞下看到和諧的美，因此他作詩，是以同這一時代要求取分離樣子，獨自存在的。

他第一本詩集「夏天」，在一九三二年出版，自序內有云：「朱湘優遊的生活既終，奮鬥的生活開始，乃檢兩年半來所作的詩，選之，可存半數得二十六首，印一小冊子，命名「夏天」，取青春已過，入了成人期的意思。我的詩，你們去吧！站得住自然的風雨，你們就存在；站不住，死了也吧。」

這集子是他第一期詩作的結集，在時代的風雨陰晴裏，是誠如他所意識到的

成爲與同一時代其他若干作品一樣，到近來，已漸次爲人所忘懷了的。

在同一的時代，同一的題目下，周作人所寫的「小河」，和朱湘所作的「小河」意義却完全不同。周氏的「小河」是樸素的。一條小河的存在，象徵一個生活的鬥爭，由憂鬱轉到光明，使光明由力的抗議中產生。使詩包含一個反抗的意識，「小河」所以在當時很爲人所稱道。但朱湘的「小河」却完全不同，詩由散文寫來，交織着韻的美麗，但爲當時習氣所拘束，不免用了若干纖細比擬，「月姊」「草妹」，使這詩無欲脫去那第一期新詩的軟弱。欲求「親切」，不免「細碎」，他在「草莽集」裏，這缺點，是依然還存在的。

但在「夏天」裏，如「寄思潛」一長詩，已顯出他的詩是當時所謂有才情的詩，與聞一多之長詩「詠李白」一篇，可以代表一個詩的新型。又如「早晨」，那種單純的素描，則爲他所有作品中表現寂寞表現生活意識的一首詩。這寂寞，這飄上心頭留在紙上的人生淡淡的哀感，在「夏天」集裏尙不缺少，在「草莽集」裏，却不能表現了。

「草莽集」出版於一九二七年，這集子不幸得很，在當時，使人注意處，尙

不及焦菊隱的「夜哭」或于廔廔的「晨曦之前」。「草莽集」總能代表他在新詩一方面的成就，形式的完整與音調的柔和，達到詩的高點。詩最高的努力，便是形式同音節，他在這集子裏，有了不少新同成功。

以一個東方民族的感情，對自然所感到的音樂與圖畫意味，由文字結合，成爲一首詩，這文字，也是採取自己一個民族文學中所遺留的文字，用東方的聲音，唱東方的歌曲，使詩歌從歌曲意義中顯出完美，「采蓮曲」在中國新詩的發展上，也是有意義的。他是主張詩可以誦讀的人，正如同時代作者，聞一多，徐志摩，劉夢章，饒孟侃一樣，在當時，便是預備把「采蓮曲」在一個集會中，由他讀唱，做一個勇敢的試驗的。在音樂方面的成就，在保留到中國詩與詞值得保留的純粹，而加以新的排比，使新詩與舊詩在某一意義上，成爲一種「漸變」的聯續，而這形式却不失其爲新世紀詩歌的典型，他的詩可以說是「一本不會使時代遺忘的詩」。

他所習慣的是中國韻文所有的辭藻的處置。在詩中，支配文言文所有趣美的，具彈性的，具女情的複詞，由於他的試驗，皆見出死去了的辭藻有一種機會復

活於國語文學的詩歌中。這屍骸的復活，是必然的，却仍是由於他一種較高手段選擇而來的。中國新詩作者中，劉大白，劉復，皆對舊詩有最好學力，對新詩又盡過相當的力，然而從劉大白的「郵吻」的各樣作品中去看看，却只見到劉大白擺脫舊辭藻的努力，使新詩以一個無辭藻，外衣的單純形式而存在，從劉復的「揚鞭集」去看看，這結果也完全相同。這完全棄去死文字的勇敢處，多由於「五四」運動對詩要求的一種條件所拘，他的詩稍稍離開這拘束，承受了詞曲的文字，也同時還承受了詞曲的風格，寫成他的「草莽集」。

在「草莽集」上，如「貓語」，以一個貓爲題材，却作歷史的人生的嘲諷，如「月游」，以一個童話的感興，在那詩上作一種交縱的描畫，如「王嬌」，在傳奇故事的題材上，用一枝清秀明朗的筆，寫成美麗的故事詩，成就全都不壞。其中「王嬌」那種寫述的方法，那種使詩在「彈詞」與「曲」的大衆的風格上發展，採用的也全是那稍古舊一時代所習慣的文字，這個試驗是尤其需要勇敢與才情的。

不過在「草莽集」上，那些值得提及的成就，却使他同時便陷到一個失敗的

情形裏去了。他運用詞藻與典故，他的詩，成爲「工穩美麗」的詩，缺少一種由於憂鬱，病弱，頹廢，而形成的獲得與奮氣息，與時代所要求異途，詩所完成的高點，却只在「形式的完整」，以及「文字的典則」兩件事上了。

他在生活一方面，所顯出的焦燥，是中國詩人所沒有的焦燥，然而由詩歌認識其人，却平靜到使人吃驚。使生活慾望，衝突，意識於作品中，由作品顯示一個人的靈魂的苦悶與糾紛，是新文壇第一期文學其所以爲青年熱烈歡迎的理由。只要他所表現的是自己那一面，總可以得到若干青年讀者最衷心的接受。但「草莽集」中却缺少那種靈魂與官能的煩惱，沒有昏瞶，沒有粗暴。生活使他性情乖僻，却並不使他在作品上顯示紛亂。他那種安詳與細膩，因此使他的詩，仍在一個帶着古典與奢華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去整個的文學興味離遠了。

王 統 照

章 則

有着中型的身材，在鼻梁上架起一副中年人的眼鏡，長其衫，而皮其鞋，走起路來，頗爲文雅，說話還有山東口音的「國語」，這些特點，使人一望而知他是個山東產的文學家，新詩壇上初期的詩人——這便是我現在要說的王統照。

王統照，一署「劍三」，這名很少用，只和老友通候時才寫上的，發表詩文，都多用「王統照」三字。他是「文學研究會」的老會員，同時也是該會的幹部作家。最初，他也曾主編北平的「晨報」附刊的『文學旬刊』，爲五四運動後的新文藝健將之一。一九三六年春，接傅東華之手而主編『文學』月刊。

他在「文學社」的陣營中，是最溫和的一個，從沒跟旁人吵嘴，所以很少人罵他，也免去了無謂的筆戰。他對於讀者的來稿，虛心拜閱，并不像傅東華那樣，一見到陌生人的稿件，如無郵票附來的，就直往字紙簍一扔，不管你死我活。事情正是爲此，所以王統照在人們的印象裏，實較傅東華爲佳。

王氏不單是寫詩，也寫小說，散文。長篇小說計有「黃昏」，「一葉」，「秋實」等；短篇小說集計有「春雨秋夜」，「霜痕」等；散文集只出了一冊「片雲」，而詩集則有「童心」，「這時代」等。在新文壇上，他已是爲一般讀者所熟悉的一個。他的詩文，都很平衡，從沒有粗製濫造，跟其他僅僅剪抄了一些中國文學史而自稱大文豪的人，大大不同。

王 任 叔

余 拯

王任叔的初期作品多登在『小說月報』上，該報都是由『文學研究會』幾個中堅份子如茅盾，鄭振鐸等所主編的，王任叔那時還是一個無名小卒，當時『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展開革命文學論戰，旗鼓相當，甚至二三流的或無名的作家也加入，搖旗吶喊，故做成文壇上空前筆戰的盛舉。那時王任叔已加入『文學研究會』為會員，自然也參加文學研究會的一邊了。於是他寫了很多關於革命文學的文章。

他的文章發表後，其名漸在文壇露面了。後來他便將其論文刊行單行本，名為『革命文學論文集』。

他在文壇有了地位後，便又用「趙玲」的筆名於北平晨報副刊投稿。晨報『副刊』是由孫伏園主編，由魯迅在幕後支持的，晨報『副刊』在當時能雄壓一切副刊，完全是魯迅之功，所以當時孫伏園很感激魯迅的幫忙，尊以師禮。直至

魯迅死後，孫伏園寫了很多的文章來紀念他。

任叔寫小說並不多。有一時期編過「山雨半月刊」，並不見得精采，不久這個刊物也停刊了。

時海上的雜誌，正風起雲湧的出版，也就是中國出版界的黃金時期，他寫了很多的小說在各刊物上發表，如「捉鬼篇」的在「申報月刊」，「苦木君底煩惱」，「茶社里」等的在「新生週刊」便是，但這些刊物不久都停刊的停刊，禁止的禁止了。此後他的文章便沒有出路，苦悶到了不得。他發牢騷地說過：「想想這古國裏各種刊物的短命，真覺得寫文章的無聊」還說這個古國是個鬼國，覺得活在鬼世界裏，常常白晝見鬼。有時連自己身上也感到有鬼氣通過，忽然成了匹「小鬼」。「捉鬼篇」裏的周小學，倒和他自己相像。一邊用良心主義的哲學去詛咒大雄鬼之類，一邊却一個勁兒努力爲大雄鬼之類服務。最後却還掉落在飯碗裏。他在這裏，正和在「文學」裏發表的「我來自東」的文字一樣，決不肯，棄自己，而光去詛咒別人的。

近來他的消息怎樣，我們却無從知道。

王 了 一

野 丁

五四運動以後，王了一是以翻譯聞名於文壇的。其譯稿大多在商務出版，與伍蠡甫齊名同位。就中國翻譯界言，王了一是最多產的。但當新進的譯者出現後，文壇上便展開劇烈的翻譯論戰，作爲前期的王了一之譯品，自然列入檢討的範圍內，論戰的結果，便分起什麼直譯，硬譯，意譯之類的門戶來。

王了一致力的譯作，多是根據法文，就他全部譯作來觀察他所翻譯的，以法國十七八世紀的劇本爲多。

也許就因爲王氏要趕緊翻的緣故，有時不免十分草率。如果在不懂原文的讀者看來，或許以爲他的譯筆流暢，但實情倒離開意譯很遠，馬宗融先生也曾在「文學」上批評過他的翻譯。

「王了一」這名字是他發表譯作時的署名，他的真名是叫「王力」他對中國的文字學有着超越的造詣，而且工作態度也很認真，在商務刊行的「文字學」一

書，便是他的力作。

王氏曾在清華教書，事變後遠走昆明，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職，所擔任的課程，并非外國語，而是陳年的古董，筆者有一次，曾聽過他講授王充的「論衡」，他講書老是那末有勁沒勁，說話也是那般萎靡無力，他那細弱的語音，再加上他在講台上那份忸怩姿態，人準會想起北方那些專門學唱花旦戲的男人來。

王氏很用功，沒課的時候，老是在圖書館檢書，據說，他有卓越的語言天才，他原籍廣西，但江浙一帶的方言他都能說。

汪 馥 泉

迅 侯

長頭髮，不常刮鬚，穿長衫，口含香烟或手持香煙，方步而行走——這個人便是汪馥泉先生了。汪氏是以文藝理論的翻譯而聞名於中國的文藝界的。如「中國文藝研究譯叢」，「現代文學十二講」和「中國文學論集」等，都是他一手翻譯的。

在以往，汪氏更主編過「新學生」雜誌，稍後則又接編過後期的「現代」。在中國近代的文壇上，汪氏是有相當的地位的；就是在以前上海大學的教授羣中，也是知名的一位。他沒有什麼嗜好，硬要給他寫下來，那末他唯一的愛好就是抽香煙，而且抽得很利害，除了上壇教書而外，香煙是不離手的。好像香煙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他頭髮之所以長長而不剪，其原因是在於愛好香煙。我也曾記得他在某大學的課堂上對學生們說過：因為香煙的美味，連理髮的錢也拿去買香煙了，因此，

汪氏對於香煙愛好的情度，也可從他自己的解說中體味得出來。

汪氏的爲人，十分誠懇忠厚，對於一般學生，不曾擺過教授的架子。就是寫給學生的信，也不叫「某某同學弟」。或「某某同學」，而必稱「某某兄」，末尾則倒十分客氣的寫上一個「弟」字來。這和一般留學歐美回來的教授們一比對，其相差真是不能以道理計了。

「八，一三」以後，汪氏遠走廣州，主編「救亡日報」，後因與該報的幹部某君不和，遂赴香港。和平運動起來後，汪氏即回滬，從事文化工作。曾主編「政治月刊」，最近則在蘇州。專心教育，閒中亦有著譯，在上海的刊物發表。

曹 聚 仁

迅 侯

在上海大學教授羣中，其衣著最爲樸實的，我想要推曹聚仁先生了；不論在教室的講壇上也好，在什麼名流的譚會席上也好，甚至一年四季，他都是穿了一件藍布長衫。因此，竟有些女生以爲他是大學裏的茶房，常常鬧笑話。曹先生爲此，也曾爲文解釋，并堅持其「布衣主義」，并不顧慮到別人的白眼。

曹氏的出現於中國文藝界，其歷史很早，但却到了主編「濤聲」時才著名。昔年的「濤聲」，其聲譽不亞於「生活」，很爲一般智識階級所愛好，其原因便是爲了「濤聲」敢說話，揭發了社會上的黑暗。而曹氏在當年，曾以「烏鴉」爲記，自認爲「不祥」之聲，一任士大夫及其幫閒痛罵，而不改其初衷。

事情正是爲此，所以魯迅先生也常以「羅撫」的筆名爲「濤聲」寫稿，因而「濤聲」的銷路也大增。然而好景不常，「濤聲」出了一年半左右，終於被禁停刊了。而曹先生也暫時沉默起來，除了教教書外，并不打算再作什麼叫喊。

稍後，「芒種」半月刊於一九三四年出現，其姿態仍一如當年的「濤聲」。這時曹先生已移居於金神父路花園坊，除寫稿教書及編「芒種」外，尚走走「回力球場」，而老夫子也和一般大學生一樣，有此嗜好，并且用心算計，往往給他勝利而歸。因此，有些上回力球場的大學生，遇見曹夫子時，大家都請教他這一盤買那一號爲有把握。

「八，一三」後，曹先生遠走戰場，過其戰地記者的生活，其作品多在香港「立報」，「星島日報」及重慶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一九三九年冬，曾到過香港一次，但不久又跑了。最近接到內地的朋友來信，說曹夫子現在桂林，仍過其新聞記者的生活。至於長篇的文藝專論，他已洗手不作了。

黎 烈 文

張祥沅

黎烈文在中國文壇上也是一位聞名的作家，曾爲『文學研究會』會員。『自由談』自他接編後，他在文壇上漸露頭角了。黎烈文爲了拉稿，曾託達夫與馬拉魯迅加入爲台柱，「何家幹」是當時魯迅的筆名。隨後，曹聚仁茅盾等，相繼加入，『自由談』添了大批生力軍。

黎烈文的文章與他的外貌一樣，宛變有少女風，但他自己雖不擅長做雜文，對雜文的提倡却不遺餘力，『自由談』後，雜文能在各種文體中自成一軍，他應該居其功。自由談出了岔子，他又創辦了『中流』，曾與沈起予的『光明』爲了某一篇譯文筆戰了好多時，那時『中流』有『中流』的健將，『光明』也有『光明』的人馬，壁壘森嚴，一時頗有難分難解之勢，這次筆戰時日之久，聲勢之盛，祇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凡爾登可以比擬。

黎烈文爲法國留學生，據說當時促成他留學的是一個拔扈

他在四川編輯某報時，字裏行間對那位軍官頗有皮裏陽秋之處，從此兩人結下了很深的嫌隙，某天冤家狹路相逢，衝突結果，手無寸鐵的文人自然屈服鎗桿之下，他甚且遭受到種種不堪告人的侮辱，以致羞恨交迸的逃出——四川，不久即與祖國遠離了。

法國留學的結果，除了文學方面獲得了高深的造詣外，最寶貴的收穫是得到了一個法國情婦，爲了情婦的一件綠絲絨外套，他睹物思人，居然寫出了一篇十分曼妙的文章來，可見他的文才與他們兩相互的愛好了。這位情婦後來是否帶回國，已經記憶不起來，不過知道後來他與她仍舊有相當情感，他的文章中也常回憶舊情，提起她的名字。

事變後，他與黃源等一起離開了上海，在內地限於物力，沒有從前那樣的鋒鏑畢露，最近黃源死了，他本「朋友妻不可欺」之義，立即把黃源妻迎接來，以盡「維護」之責，一時川中傳爲美談云。

瞿 秋 白

迅 侯

瞿秋白雖然也是「文學研究會」的幹部作家之一，但以其常常參加政治的活動，所以並沒有給讀者留下什麼特殊的好印象。要之，還是他死後，魯迅爲其遺譯稿編成了上下兩大巨冊的『海上述林』（此書係在東京代印，發售者僅四百耳）以後，才爲讀者所注目。

秋白的出現於文壇上，是始自一九二一年。其時「文學研究會」，接編了『小說月報』，瞿氏以其新俄文學的翻譯，交給『小說月報』發表，後來編成的『高爾基傑作選』及『柴霍甫小說集』等，都是他最初的譯文選集。

瞿氏除翻譯外，也寫散文及雜文。『赤都叢史』，『新俄國遊記』等，便是他留俄歸國後的長篇著述。一九三〇年左聯作家大同盟成立後，常以「易嘉」或「蕭參」等筆名，在丁玲主編之『北平』及周起應主編之『文學月報』上發表論文及短評。一九三三年，又以「何濃」爲筆名，選輯魯迅歷年所作的雜感，編成

『魯迅雜感選集』，交北新出版。書前，作一導言，詳論魯迅的雜文之價值及其時代背景。

一九三五年，秋白逃入廣西，因政治關係而被殺。一九三八年，阿英（錢杏邨）爲其選輯尚未編集的譯著，成『亂彈及其他』一書。統觀翟氏一生，與其說他的志願是在文藝，倒不若說他的志願放在政治上較爲恰當，因爲他從事政治活動，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

記 劉 穆

黎 嵐

當我寫上這個題目的時候，第一個疑問便是：「現在讀者大約對於這個名字很陌生吧？」誠然，因為劉氏不用這個名字寫文章，已經十多年二十年了。現在讀者的腦子裏的，大約只有「小默」或「思慕」這兩個筆名吧。然而，在「文學研究會」時代，劉穆是相當活躍於中國的文壇上的。同時，現在還留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大約還深深地記着劉穆這個名字吧。

「小默」這筆名，是劉氏遊歐歸來後才用的，在我個人的記憶中，知道這個筆名的署用，是始於傅東華主編的『文學』，在『文學』月刊上連載着的『歐遊漫憶』，便是劉氏以「小默」這二字發表的。繼之，他爲陳望道主編的『太白』寫文章，也是用小默這筆名。至於「思慕」呢，那似乎是專用來署在寫國際問題的文章的，爲我最初發現這筆名的，是畢雲程主編的『世界知識』。

我和劉氏的認識，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自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離滬南歸

後，爲了生計問題，我便丟開了文藝研究的生涯，而當了由滬移港的某大報的記者，因爲我是南國人，於是報館當局派我四出採訪，留港的機會並不多，而往來於粵澳（廣州和澳門）。但當我回到香港報館休息的當兒，有一天，無意中却在堅道九十三號朋友譚君的府上碰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劉穆。

爲了那家報館每月給我的薪金不能夠維持我的生活，於是到得一九三九年春，我便辭去了職，另外在一家通訊社當起編輯及在九龍某一中學兼起國文教師來了，同時，爲了要使自己的生活的過得充裕些，每夜還寫起文稿來了，而且擴大了寫稿的範圍，不論時評，雜文，遊記，小說，散文，都亂寫一通。

其時，劉氏正以「思慕」之大名活躍於香港的中國文化界，除了代金仲華主編「世界知識」香港版外，并爲「星島日報」編一「新聞記者」。因爲我常常到「生活書店」的樓上某一學會去談天，所以有時便和劉氏碰面，見得多了，也就熟悉起來。同時，「新聞記者」的稿件，似乎很荒，於是承他的好意，也叫我寫點兒稿。自然，在那時，我的筆墨是很快的，除非不叫，沒有不馬上應命的——因爲那時我很需要幾個錢來補填我收入的不足呵！

一九四〇年仲夏，我因為滬上的友人之邀，重回上海過其寒暑，剪刀，紅墨筆及燈下的生涯，便毅然地把香港的小飯碗掉去。臨行匆匆，一切朋友都來不及話別，自然也沒有時間去找劉氏辭行了。不料常為本刊執筆寫「紙片」的何若先生，却是劉氏的老友，因為他離港較我為遲（在一二，八後）於是便問起劉穆的去向。據答：他是有先見之明，早於十二月八日之前，便離港他去了。

劉氏的著譯很多，但大抵用筆名，而且多為不同的，如在生活書店出版的「歐遊漫憶」，是用「小默」，所譯的『歌德自傳』又用「思慕」，其早年介紹蘇聯的文藝思潮，則用劉穆，但「劉穆」也并不是他的真名，姓「劉」是不錯了，「穆」字也不錯，但當中的「時」字却省了。據何若先生說，他在嶺南大學讀書時，却另有名字，但我并不盡知。關於劉氏的種種，我倒希望何先生能因我這篇不像樣的小記，而引起他的「大記」或「詳記」來，以饗讀者。

如此劉穆

何若

二十九年中秋，我在九龍敲一所房子的門，要着招租的房間，裏面男女的笑語聲都很熟，不待開門便可以決定那二房東是誰了。引我進去的是劉穆的妹子；和她的哥哥緊握着手時，她的嫂嫂也含笑出來招呼我。呼伯伯的一羣都不知名，其中最大的男孩，像十二三歲了，面孔還可認。我說：「你們很舒服哩；我爲看房間而來，買賣是買賣，租錢非從實說出來不可。」劉太太答復我：「現在房租起得高，那小房間分租與人，在時價至少二十五元。」我說：「問問罷了，還可辦不到，我至多能付十元。」劉穆小獸片時，仰頭說道：「你可以多寫點文章，什麼都行，我任介紹，南洋方面更好，星加坡幣匯水高。」這時候，屋子裏如果有些什麼政治主張或什麼主義的空氣，都從窗子飛出去了吧，存在於我們兩人之間的是純真的友誼。清茶月餅完了，談話也中止，我辜負了他，因爲我早已打定主意，字不寫。臨行時他說：「如果你幾個月內不再來訪我，恐怕又要久別

我快要去南洋。一

他那時住在九龍或香港，我早知道，但一向沒有尋訪他的意圖。政治往往把最好的朋友隔離，甚至切斷了友誼；世故又教訓我，發見他人的秘密，對沒有關係的自己是無損無益的。這一次無意中敲開他家的大門，後悔不來，因而疑心到他去南洋的話未必誠實。然而我這樣的對他却真的太不友誼呀，到去年七月才生出一種更深的後悔；現在想起他，惟有自恨世故太深，不把人當人，把人當作政治用的機械，罪過莫贖！爲什麼呢？去年七月草野心平在南京告訴我，他查實劉穆在大東亞戰事爆發後還住在爪哇。

十五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時，劉穆還是嶺南大學的學生。我們聽慣了喊打喊殺的演說，看慣了故意把衣服弄得不整不潔的「同志」，對那聞名已久的上海代表沈雁冰，覺得特別有趣。長袍小褂，全身裹在絲織品中；口啣香烟，溫文閒適，比起那個號稱手握長江流域青年運動權的惲代英；雖然都一路，外表却正正相反。幾個舊日「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的會員特自去訪問沈氏一次，其中一個就是劉穆。國音說得不正，沈雁冰問了幾次才問出一個「劉

燧元」。「小說月報」全盛時，劉燧元是個不平凡的新詩作者，也寫文學理論。梁宗岱，草野心平和他都是嶺南大學的學生，都是「文學研究會分會」的要人，都愛做詩；草野到現在還做詩哩。沈雁冰當然很歡喜在廣州見到這年青而聰明的小詩人。革命重在武力，武力幾乎壓倒了文學；但沈氏仍脫不了本色，說了一句可紀念的話是，「何不重燃『文學』之火？」我們幾個人感受這提示，徒然發過不甚能夠動人的空話，文學之火終於燃不起來，因為那時青白之火正在燎原，而赤色之火也有許多人暗中玩着。劉燧元不但和我談那不合時宜的文學，他的新意識漸漸從言論透露出來。他參加工人運動，在學校鬧了一次不小的風潮，便跑上革命的第二或第三戰線。這時候，大家還叫他劉燧元（假如我明天碰見他，也是這樣的叫他），後來什麼時候起他才專以「劉穆」出名，我却忘了。

十五年秋天，他忽然對我說，要留俄去，問我去不去，我因家累很重，不能夠出國。他又勸我，最好去西北一次，而我也拒絕了。他留俄去了，以後我和他不常見面，就從這次送行開始。回國後他住在北平，我把清黨的情形寫一封未來派的信給他，這是遠別後第一次給他的信，從此以後，我在文字上也專用「劉穆

一稱呼他。

我還沒有替他作傳的想頭，零碎的劉穆，或小默，或劉思慕，筆記起來自覺無謂，而愛好文學或留心政治的人們也許識他比我更清楚。祇還有一件兩件在我值得紀念的事。某年在香港忽然接到他由特帕思脫寄來的明信片，片上寫幾行談及當地女人的眼睛的文字，我知道他離開德國，一定是不得不離開。我大病之後，收到他從南京來的信，回信很妙，祇寫一點幼時在南京的生活，別的一字不提。他逃出南京，不知何時又去日本，後來帶了不少日本書籍回香港。他學的外國語第一種是英文，次是法文，其餘是俄文，德文，日文；英文不用說，我在法國郵船上聽他居然能够對付侍役；他至少能看上述的幾種文字，能够翻譯。他的趣味由文學到經濟學，尤其愛談經濟地理。慚愧我的學問遠在他的之下，對政治却分道而馳，越走越距離得遠了。這是說，到現在為止。

我認識他在二十年前，當他初進大學的時候。那時的劉燧元，浮燥得可愛，說話俏皮得更可愛，國學有些根底，還愛刻印章；夏天穿白夏布長衫，冬天是布棉袍，但離開學校後穿的是洋服，一套衣服穿十年八年；很能喝酒而不抽煙，談

天使人忘倦。一次在他父母的家中住了兩天，原來他對老父和後母盡愛盡敬，克盡子職的，使我復見四五十年前的舊家風。他在有五個孩子吧。時常左手抱着一個坐在他膝上的幼子，右手拿着筆做他本份的工作。還說這時候烟士披里純才出來。我初時想不到他「轉變」到如此這般，但到現在還不能在所識的人中多找一個像他那麼可愛朋友。

以上是見於「中華副刊」第一九三期的黎鳳君逼我寫出來的，劉穆如此，但不止此。

李 健 吾

諸 以

當我沒有認識李健吾先生以前，聽說他在北京演話劇是扮丫頭的，又看到他信上筆力的軟弱，猜想起來，總以為他一定溫婉如女子，至少也該像和他幾乎同名的李唯建那樣的。

可是，後來在一次宴會上，見到了他，却與我的想像相反，他差不多有一點像李晴崖，大而方的臉盤，似乎鬍子不會剃，是一個黑胖子，這和他的小說裏漂亮的對話，成了反比例。

又有一次，筆者去看一位作家，他是自稱為「靈魂的醫生」，而在那時却「沉默」了，我們正在攀談得高興的時候，李先生也來了，他在沙發上一坐，就神經質地嘆氣道：

「中國真沒有辦法，什麼都是一樣，譬如話劇吧？開了許多時間，一點成績也沒有」。

我那作家朋友見這突來的話，不覺驚異道：「田漢，洪深不是都很努力的麼？唐槐秋的苦幹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呢！」早幾年我在巴黎，他適巧也來歐洲旅行，知道我在戲劇方面用力，就跑來看我，要我把這工作讓給他做，我說，好吧，讓給你做吧！這簡直是——。

我看你也不必灰心，應該給戲劇界爭點面子。譬如掀起一次有系統的運動。自稱為「靈魂的醫生」者說。

從上面這些談話看來，李健吾先生是如何地自負，而對於話劇界負有盛名的「三官菩薩」——田，洪，歐陽——都一筆抹倒，其實，李先生不僅對於「國產」作家如此，即對外國，例如法國的許多作家中，他似乎也只看得起弗羅倍爾，（Gustave Flaubert, 1827-1880）除了翻譯他的作品外，更半譯半作的成了一篇「福樓拜評傳」。同時，他更以劉西喟的筆名在大公報副刊（上海版）「文藝」上大寫其「福樓拜評傳」的批評，這一來，他不只自居於福氏的信徒，而且還可「戲台裏唱采」，自捧一下了。

記 鍾 敬 文

希 平

鍾敬文先生，廣東惠州人，今年大約四十歲。他的祖上據說是以農爲業；直到他的祖父時，才棄農就商。他的父親，在惠州附近的一個市鎮上，開設一爿小店。到了他，又棄商從學。

在他八歲的那年，進了一個舊式的書塾去念書。讀的不外乎「三字經」，「千字文」，「論語」一類的課本，在這個「子曰館」裏面混了好幾年，直到辛亥革命後第二年，市鎮上創辦了一所新式的小學校，他便從「子曰館」裏溜出來，去改受新教育了。在這小學校裏，他對於文學才開始感到興味，拼命地學習那舊詩和古文。並且把所有的零用錢，全部去買線裝古書來閱讀。

小學畢業後，在家裏埋頭用功了一年，便去投考縣立中學，不久，就渡海到廣州去，在一個私立英語補習學校去讀書，準備到上海來學工程一類的科學。可是爲了經濟關係，又回到縣立中學。在那個時期，他開始致力於新文藝，常把

作品發表在當地的日報上。中學畢業後，又因為環境的關係，在小學校裏當教師。利用公餘的時間，不斷地寫文藝作品，和購買新的刊物來看。

後來受浙江大學聘，到西子湖邊來了。一面勤勤懇懇的教書，一面和黃光夏，周六年，陳散尹，周作人，顧頡剛，許欽文等共同努力於學藝工作。陸續發表了一西湖漫拾「湖上散記」「海濱的二月」「柳花集」「民間文藝叢話」「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山海經之文化的研究」等著作，成了一位近代有名的散文作家。

盧 冀 野

海 一

盧冀野是吳師瞿安（已故）的得意門生。吳門有成就的弟子很多，要像冀野那樣能够作詩詞歌賦南北曲戲劇於一身而主持騷壇的，也不多罷。

二十年前我和他在東南同學時，承他指教的，倒不是那詩詞之類，甚至可以说不是學問方面的，而是指導我們外鄉來的同學，這樣遊夫子廟，那樣遊秦淮河；因為他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南京人呀。那時我們只覺得他有些驕傲，其實他何嘗驕傲呢？他是愛說笑話的，不過笑裏有時有話，話裏有時藏刀罷了，我們這樣的感到，大半原因還在我們對於吟詠的資格不够。假定他是驕傲的，驕而後學，學而後驕，也許是互爲因果的，也許是造成「江南才子」一個小小原因。

他追隨着吳師，形影不離；吳師也歡喜他，有教無倦，有時看見他們師生兩人，在農場（出東大後門走過成賢街再行三四十步跨過小火車的軌道就到了）的一邊靜角裏的落花生，詳細地討論宮商清濁之學。他的成就，與花生米也不無有

一些小關係。

據他自己忠實的報告，詞曲的大進，還是在擔任大學教授時，那更可想見他好學不倦的精神了。在上海，他擔任過光華暨南大夏等國文教授。西至四川擔任成都師範講席。江南才子又曾渡江而北，到了開封，在河南大學裏當教授。廿一年任教育部標準教科書審查委員，同時擔任母校的後身中央大學的課務，很受學生——後輩同學的歡迎。冀野着實紅了。他的經歷，約略的敘述是如此，先後顛倒，好在無關宏旨。那末大學教授當然是它有所成就的一個大原因了。

「三弦」「何謂文學」「春雨」「綠簾」，是我所記憶到的他的作品，寫得怎樣好，我不加批評了。廿五年夏敬觀編藝文雜誌，大部分是他主持的，（黃公渚似乎也幫幫忙的）。所以銷路之廣，無出其右。

盧前是他的名字，東亞同文館印的人名鑑，竟把他分或二個。江南才子是他爲異性作的大文裏的署名，發表在東大某日的校刊裏。

他歡喜說笑話，認得冀野的大約都曉得罷。看了葉淺予給他的速寫，正是他在說笑話時的姿態，微妙微肖，很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呢！

關於巴金

一 統

巴金的真名是叫李芾甘。他取「巴金」爲筆名之命意，因爲他崇拜俄國的作家，巴枯寧和克羅泡特金二人，將兩者的前末二字拚合而成「巴金」的，原籍四川，生性很爲激烈，當在南京東南附中求學時，就很喜活動，在學生組織中是個相當漏臉的人物。其後西渡法國，初習生物學，不成即改事研究文學。激流三部曲就是他身世的縮印，雖其本人不承認，惟在所作的幾篇散文中，已經寫述了自我的身世。

當其在法國時，曾寫了一部以戀愛與革命爲背景的長篇小說「滅亡」，後來寄回國內，想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發表，當時鄭振鐸接到那封沉重的稿件後，只看了看署名，便把它放下，一擱便好幾個月，後來多虧「小說月報」鬧稿荒，於是老鄭方將這篇擱了多月的小說檢出來，閱後認爲不錯，才將「滅亡」發表。惟當時對「巴金」的名字，知者極少，反不及其原名。因爲在「巴金」之

前，李希甘已譯了不少的譯本，如「我底自傳」一書，便是用原名發表的。

巴金寫作之餘，並喜「方城之戰」，可是絕對不准使人提及此事。至今仍使人不解。在會場或熱鬧之處，有時名作家濟濟一堂，可是要見巴金的廬山真面目，竟比登天還難，因為他的相貌頗難看，從不肯照相，故報章雜誌，從無巴金的真面目出現。

錢 杏 邨

錢杏邨是以「批評家」的姿態出現於中國的文壇上的，曾寫過一本短篇小說「義塚」；但他寫小說的名聲不如寫批評文章來得顯赫，而且也不是寫小說的能手。他是「太陽社」的主幹，與當時「創造社」的文藝批評家成仿吾，和留俄的韓侍桁成爲鼎足而三。

成仿吾寫的批評文章完全針對着當時的「語絲派」而發，尤其以魯迅爲鵠的，批評側重於謾罵，無的放矢，失去了正當的立場。魯迅亦用「以眼還眼」的手段對之。形成「語絲社」和「創造社」的火併。後來郭沫若等加入，便如火如荼荼地圍剿起魯迅來。

「太陽社」解體後，錢杏邨隨之轉變，從事搜羅古今文學史料，做整理工作。他用「阮无名」的筆名編了一本「中國新文壇秘錄」，其中多爲文壇上未發表過的文章，彌足珍貴；又以「阿英」的筆名，爲良友圖書公司編輯「中國新文學

大乘」的史料，索引」，由民國五年至十五年十年間文壇上的史料。

事變以後上海話劇鼎盛，他的興趣也移到話劇來。曾用「阿英」的筆名先後作過「滿城風雨」，「羣鶯亂飛」，「五姊妹」，「桃花源」，「夜上海」等劇本。「夜上海」一劇在「業餘劇團」演出過很多的次數，但仍未爲劇壇所注目。

再後，他又改用「魏如晦」的筆名至力於歷史劇，於是有創造南明史劇四部——「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懸嶼神猿」的計劃。恰巧當時南史柳亞子先生也研究南明史實，想完成起楊秋室，錢映江，戴子高，傅節子，李越縵諸前輩所沒有完成的大事業，便連接不斷的與錢杏邨通信起來。這四部史劇第一部「碧血花」完稿後，一九三九年十月由「上海劇藝社」演出，獲得空前的好評，認爲他是中國唯一的劇作家。當時「國聯公司」曾將「碧血花」搬上銀幕。

錢杏邨在劇壇上奠定了地位後，第二部史劇「海國英雄」繼在璇宮劇院公演，結果輿論一致推崇備致，繼之第三部史劇「楊娥傳」在辣斐劇場演出，賣座久而不衰，其劇本則登在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萬人小說」創刊號，可惜「

萬人小說」以後便沒有出版了，不能窺到該劇的全豹，可惜之至！

去年十二月八日後，錢杏邨黯然離滬；而上海的文壇上也消失去他的影子。

蔣光慈

何倪

每當人們說起「太陽社」的時候，大約蔣光慈總不會被遺忘的吧。是的，「太陽社」的主幹便是他，而錢杏邨和楊邨人，只不過是他的左右手罷了。「太陽社」在當年的工作，差不多都是他和錢杏邨二人幹的。不過，他那時還叫蔣光赤，這正如林語堂之爲林玉堂一樣，是因爲原名不大好通用時才改換的。

光慈是安徽霍邱縣人，係以小說聞名於中國現代文壇的。早年曾留學俄國，歸國後，著有「新夢」。當創造社的同人走到廣東去參加革命的行列的時候，「革命文學」的口號提出了，「創造月刊」便是這一口號的大本營；同時，介紹蘇聯的文藝的，也是「創造月刊」，而唯一的介紹者，便是蔣光赤。「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一文，引起了一般革命者的注意，那年代正是一九二七。

隨着「創造月刊」的出版，蔣光赤的「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等小說，都相繼與讀者見面了，這便是「革命文學」初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後來爲了「

赤化」關係，都被禁售了，光赤也因爲「赤」字不好聽，改爲「慈」字。「太陽社」沒後，他便以「蔣光慈」之名爲現代書局主編「拓荒者」，但終也不行，不數期便又被禁止了。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到得一九三一年，他便在上海病死了。

他的小說，除上面說過的「少年飄泊者」和「鴨綠江上」之外，還有「野祭」，「短褲黨」，「菊芬」，「衝出雲圍的月亮」，和「田野的風」等。而在「創造月刊」上發表過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後來也編入「俄羅斯文學」一書裏。一九二九年，曾到日本漫遊，成「異鄉與故國」一書。此外，他翻譯的作品，計有羅曼諾夫的「愛的分野」及「里別」。丁斯的「一週間」。

關於蔣光慈

楊劍花

蔣光慈原名光赤，嗣因嫌疑爲當局注意，遂改名光慈。我們看到他的小說時，直覺地以爲他是一個無論在思想上，行動上的革命人物，不知他竟是一個十足的羅曼諦克底小資產階級。光慈早年到過蘇聯，回國後，即著書於上海。我們要認識蔣光慈，首先要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意識行動完全相符的人，而是一個憧憬着曙光的，並絕對同情着勞苦階級的「作家」。近來在文壇上所流行的兩句：「I am not a fighter. But I am a Writer」，大可爲光慈所吟。

光慈在平日，除創作文學外，仍逃不出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圈子，并想參加一些實際工作，然而那真實底，尤其在這過渡期間的實際工作的途上，是遍生着荆棘和艱難的。所以光慈又對着這實際行動表示 Escape，在他的作品里隨處都可看出，「我是一個詩人」，「我是一個文學家」等句子，表示他並非一個戰士。但是一個作家的作品的內在的質地，是和他自己的行動是有聯繫的密切關係底。

光慈自對於行動上發生幻滅，聯帶地對於作品上立刻發生動搖。同時，他在那時對於戀愛上又發生波折。（按光慈自前妻宋若瑜死後，即和南國社社員吳似鴻結婚。）兩人之結合；大半的要素由於情感，因蔣喜吳之活潑，而吳則慕蔣是「文學家」，到了後來，日子久了，互相不滿，逐漸暴露。光慈仍不減其終日埋首著作之嗜好，而似鴻則喜涉足於社會活動。

於是雙方之個性遂漸漸分離，終至決裂，是時，光慈既感政治之幻滅，又遭戀愛之打擊，內心之苦痛已莫可言宣，爲聊以解悶計，乃東走日本和樓適夷輩爲伍，並訪問友邦諸權威作家，但大半的時間，仍消磨在寫作上，「衝出雲圍的月亮」等便是在東京所作。那時蔣屢致書於國內友人錢杏邨洪靈菲等，宣告其極端之苦悶。

在這種苦悶的由來，在他的作品中，是可以考究出來的。他的作品是感情氣分多而理智氣分少，雖然表示對於革命發生渴需，但他終究不瞭解社會大眾之實況，所以他的作品終逃不出羅曼司的紀錄。并且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最容易幻滅，只須幾次受了現實的打擊，便覺得曙光之到來還是一「漫漫長夜」，而不禁動

平之情，洒滿於文章的字裏行間。我們在他那「求索」的序言中可以體味到：

「須知天才之與民族，如受箭傷之牡獅，歸穴哺其稚子，而忘其身世之危殆

」

這位受箭傷的詩人，永遠就在事業奔走間，懷著一股同人難言之痛。華詩人最愛讀離騷和神曲，素仰屈原與但丁，他在求索中有說：

「浮士德是英雄，是人生之戰士，他欲在痛苦中，領略最快樂之滋味，他欲在最短促之人生中，探求最長久之宇宙，他是永遠不失望的。他的高傲，和上帝一樣，宇宙陳設在他的面前，都成極大之變化。人生之悲歡離合，明月之陰缺圓全，一切變動中，自有不變者在，不變者就是浮士德熱烈之感情，堅強之意志，和不滿足之知識，他因為是他自家之主人，永遠能接受世界給與他的教訓。浮士德之悲劇中，有這樣的力量，所以能影響到近代文藝。創造一種新生命，好像但丁之神曲，開創復興時代一樣」。

華詩人因為受過箭傷，所以不管宇宙的劇烈變化，愈是邁步，以接受世界給予他的教訓。他把生命一半獻給社會國家，一半獻給那位曾經嫁人的她，因而短

記 華 林

頁 公

華林，是文學革命中一位以詩成名的健將，他的文章，許多地方蘊儲了豐富的詩的意味，所以有些人稱譽他是「沒有詩的詩人」。其實，這位沒詩的詩人，寫出來的詩倒也不少。

華林，長着瘦削的臉龐，嶮嶮的個子，嘴唇留着短髭，時常架着眼鏡，是那樣的嚴肅與精神，由他的談吐與文字中可以看到，是一位熱情的失戀者。

談到他的羅曼史，先要把他的那一本「求索」牽引起來：「求索」的封面裏頁，印着一行小字：「此書紀念我友×××，和她生長美麗的山國土」。那個她字的人，從前和華詩人十分相好，華詩人在南洋辦革命報紙，曾爲了她專誠回國，又知道她愛吃枇杷，所以中途在上海停下來，跑到杭州買了些塘栖枇杷，再帶到天津去。豈料事出詩人的意外，她結果已嫁給別人了，因而這位熱情的詩人，掃了一大把興，相思之苦，一直遺留至二十餘年以後，時刻都懷着鬱鬱的悲憤，不

搖着。那時光慈處於極端的孤寂的包圍中，而一種嚴重的SEN TIM ENTAL不得不侵襲他。光慈於是再度帶着創痛，回到上海，不久，就病倒在同仁醫院。

光慈的病，本來僅僅是些肺炎，照理只要稍稍醫治，便可全愈。然而政治和戀愛的苦悶，也是增加他病重的原因。當光慈病重的時候，似鴻追憶舊情，馬上趕到丈夫的病榻前，晝夜不息地看護着他，然而光慈已是病入膏肓了，在極端痛苦之中，幾次要求醫生給他安眠藥吃，以求速死，上海許多友人對着他愁眉地唏噓着。

• 在某一個早晨里光慈終於死了。

吳似鴻聽說至今尚未嫁人，當然並不是說爲了光慈「守節」，但她常常在思念念着光慈，是無疑底。光慈髮甚長，眼近視，下巴很尖，面容蒼白，真是一個「苦悶的象徵」。（完）

髯的臉龐，永遠支持在嶙嶙瘦削的軀幹上，他不會肥胖，他的心靈够痛苦的。

他著有「枯葉集」，「求索」，「藝術文集」等書。近年來，好像遠隔了文壇，好久沒有聽到他消息了。

關於華林

何若

余始識華林於北京，時在民國六年；八年五月之末，相值於上海，後不復遇矣。袁世凱死後，國人思想不變，華林爲無政府主義者，與蔡元培，李石曾爲同志，事李猶師；蔡氏長北大，華林亦居北京，然不能入北大，則任理留法儉學會所辦之預備學校事務。時亦爲報紙撰短文，宣揚其信仰；猶憶其「陳述」一篇，中有謂吾人撫歐洲古代鬥獸場遺迹，詫爲野蠻，焉知後世人見今日文明國議會，法庭之遺構時，不目吾人之世界爲野蠻乎！余許爲敢言，華林亦自得，不料已爲當局注意，遂被傳訊，從寬令自動離境。華林赴津稍留，旋復入京，寓余所居舊民房一小室，寢同炕焉。自是簡出，不復爲文，貧困益甚。其失戀事，世多知之，故不復述。華林操江北口音，以咖啡爲「佳妃」，見譏於劉復；若從心理觀察，其性的苦悶，可想見也。余與別二十餘年，僅一通問，去歲聞人言，事變後已客死西南。文壇上喪一前輩，思想界亦少一異人，思舊黯然，因讀「中華副刊」第二一四期頁公文。追憶平生，略記一二。

穆 時 英

迅 侯

鬚頭髮，畢挺的西裝和現代風的文士的品格，這是穆時英先生的外貌，滿肚子掘口大學式的俏皮語，有着橫光利一的小說作風，和林房雄一樣的在創造着簇新的小說的形式，這便是穆時英先生的內容。事實正是爲此，所以他才能給中國的新文藝留下第二個「十年」的好成績。

我國有句古話，說：「文如其人」。這拿來說明穆時英和他的小說，真是萬分恰當。自從他的照片給施蛰存在「現代」登載後，一般年輕的女學生，幾乎都在朝夕地想看看他。因爲他頂受上舞場，因此一般年輕的女生們爲了要看看這位名小說家，也就有了上舞場的嗜好。

不過穆氏的上舞場，和一般的公子哥兒大有分別。穆氏之對舞場，并不把它作爲享樂的場所，反之，倒是他寫作的書齋。所以穆氏雖然常常上舞場，但他并不多跳，而且是躲在舞場的角落的桌子上，一枝鉛筆，和幾張碎紙片或一本小小

的拍紙簿，古怪地在寫着。

當穆氏還在「光華」讀書的時候，女同學中追求他的，大不乏人，可是我們這位英俊的名小說家，其戀愛對象并非「千金小姐」式的女學生，而倒是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舞女。他對於這種被人任意玩弄着的「可憐蟲」，是寄予萬分同情的。

在中國的文壇上，穆氏是被譽為「中國的新感覺派的聖手」的，就是最先介紹日本新感覺派的小說的劉呐鷗，其小說的技巧，也遠不如穆氏。但穆氏的成功，并非偶然。在其尚未開始寫作之前，早就讀過不少外國的名著，其基礎實較一般後起的青年作家為深。

記劉呐鷗

一統

穆時英，與劉呐鷗，同是中國文壇新感覺派的健將者。呐鷗曾經被人稱他爲文壇的「技巧至上主義者」。因爲他對當時中國左翼作家所倡導的「內容高於一切」的文藝理論最爲反對。他認爲技巧應與內容並重。故左翼作家對呐鷗以致有以上稱謂。可是他自己也曾被列入左翼作家之一的。

呐鷗曾經獨資創辦過『水沫書店』。『水沫書店』亦出版過不少新文藝作品。如魯迅，丁玲，姚蓬子，馮雪峯等譯著，最先都是在該書店出版的。對中國文壇的新文藝運動曾盡了不少的力量。此時，也造成了不少新進作家，如詩人戴望舒，杜衡，施蛰存均在該書店任過經理與編輯之職。

日本左翼作家作品的盛行，曾給『水沫書店』受了不少的影響。呐鷗自己也翻譯了俄國左翼文藝理論「藝術社會學」及創作「都市風景線」的短篇小說集來。當時的『水沫書店』是被認爲左翼作家大本營的，因左翼作家時常在書店的樓

上召開會議。後因出版「新文藝」與「無軌列車」等雜誌被當局封閉。當時他的損失約在三萬元左右。

稍後又創辦「現代電影」。從研究電影藝術所得，在該刊上發表過「電影節奏簡論」，「關於作者的態度」等文。可是不久祇出了七期，便中途夭折了。

聶鵬原籍台灣，幼年在東京「青山學院」專攻文學，對於日文及英文根底甚深，後又在上海「震旦大學」攻讀法文，所以對法文，也有相當成就。

聶鵬對中國方言也很擅長。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以及廈門話，均能應答如流。

關於冰心

露 璣

冰心原名謝婉瑩，是福建福州人，她幼年的時候，常和澎湃的海水爲伴，海對她的影響甚深。和別的女孩子祇知調脂弄粉的大不相同。她的父親名寶璋，曾在海軍部任職。在冰心三歲的當兒，她父母帶了她到山東芝罘島的海邊去。在她的智慧剛開的那時，終日見到驚濤駭浪萬頃奔潮，漸漸的使她的思想轉變。在她的四週見到的除了無邊的海外，便是崢嶸的青山，或在幾隻灰白的軍艦。聽到的也只是海嘯，風號，嘹亮的軍操口令，寒夜寂靜時驟然來的喇叭聲。在這特殊的環境下，造成了今日的冰心。

四歲時，她開始了幼時的教育，而她的舅父楊子敬就是她的教師。她最初念『三國演義』接着看『水滸』『天雨花』『紅樓夢』一類的書，七歲時，就能滔滔不絕的說講『三國演義』。很得人們的寵愛。

辛亥革命後，她搬家頻繁，她沒有機會上學，直到一九一四年的秋天，她才

考入了北京的「貝滿女中」讀書。這校是基督教教會所辦，所以無形中潛成了她愛好哲學的嗜好。在「四五」運動的時候，她是一位活躍的健將，那時已在「協和」，讀書（此校後併入燕京大學）。辦雜誌，并任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長，於是造成她寫作文章的機會。恰巧晨報的副刊提倡文藝，引起了她創作的興趣。她的處女作「兩個家庭」便以冰心二字爲筆名，繼之又寫了「斯人獨憔悴」「去國」「國旗」「魚兒」等。到「文學研究會」主持「小說月報」時，她的小說寫得更多，她以橫溢的天才，精澈的筆鋒，驚動了當時的文壇。大有成爲全國獨一無二的女作家了。

冰 心 小 評

劍 青

首先我們來說冰心的創作：

提起『寄小讀者』，誰都會想起冰心來。『寄小讀者』給予中國兒童對於人類之愛的啓示，確具有非常之功。

『寄小讀者』可以說是冰心的代表作。我們單看它『通訊十』裏面對於母愛的表現，就會感應到作者愛的熱烈胸懷了：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有普天下的母覺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他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喜歡感動得伏案痛哭』。

『寄小讀者』是冰心在『晨報副刊』的『兒童世界』欄上所陸續發表的。共

分『通訊』與『山中雜記』兩部，計二十七篇，一部份是描寫她赴美國的經歷及生活狀況。對於景色渲染非常之好。其他如啓示人類對生物的愛憐與對兒童偉大的真情，都如荼如火地充滿字裏行間。

一九三〇年，她曾以『往事』一書而轟動讀者。內容當然側重於母愛與博愛的描寫。

一九二三年，冰心有『繁星』和『春水』兩本詩集出版，這兩部創作也不外乎是讚美自然，歌頌母愛及一些人生的嗟嘆底結晶。同年出版的短篇小說又有『超人』，據『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的作者毅真君對本書評判說：『是與神話極相近；不過我還以為帶有散文詩的氣味，是幾篇秀麗的文章。……』事實，冰心在許多作品裏，往往主張絕對自由發揮，不爲主義派別所限制，以致找不出有系統的思想和固定的作風，因而犯上了盲目去摸索社會的短處；並容易使作品本身枯澀板滯。但是，雖則如此，以對於歌頌母愛的勳德，及揮發兒童偉大愛的真情，她在中國兒童教育上確具不可泯滅之光輝的。

冰心本婉瑩，姓謝，是福建閩侯人。父親是海軍軍官，對她一向都非常寵愛

。當她讀書於燕京大學的時候，已常常在『晨報副刊』上投稿，後來，遠赴美國留學，獲『衛斯萊』大學碩士，回國後與吳文藻君結婚，一度任燕京大學教授。另一篇小說『第一次宴會』，是她婚後的創作，描寫自己婚後宴客的情形，並沒有什麼令人法意的地方。

一九三〇年以後，冰心的小說漸漸少了，就是散文也像不願多爲別人執筆。直至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於北平出版，才應鄭西諦之聘，爲該刊編輯委員，并寫小說。然而一般的讀者，對於她的文章，已沒有以前的好感了。

其他，還有『先知』一書的繙譯，及散文短篇的發表。總之，她的文字，雖到處含儲着幽清的詩意。可是却每每會使讀者感到離開實際的社會生活太遠了。

關於蘇雪林

孔 尊

在初期馳譽一時的許多女作家，到了現在，活着的大都已是兒女繞膝了，蘇梅的丈夫是個建築師，冰心的丈夫是個社會學家，她們的生活都是極幸福的。

關於冰心，因為她的丈夫吳文藻是個社會學家的緣故，所以時常可以在刊物上得到一些消息，至於蘇梅，提起的却少。其實蘇梅的戀愛經過，在她的『棘心』中，寫得極其詳細；而冰心，却始終沒有在她自己的筆下寫出來。但她們有一相同所在，就是她們倆都是嬌小的身子，而她們倆的丈夫的個子都是很高大的。在一般庸俗人的見解裏，一個嬌小的女子，配着一個雄糾糾的丈夫，那是人生的幸福。但這究竟是不是幸福，那只有當事的人才會知道。冰心的丈夫個子高大，那是我們在刊物的照片上看到的；至於蘇梅，我們却是從她自己寫的文章裏看來的。

在她的散文集『綠天』中，她有一封寫給建中（是她丈夫的名字？）的信。

信裏有一段這樣說：

你在家時，曾將白鵲（雄鵲名）當了你的象徵，把小喬（雌鵲名）比做我，因為白鵲是只很大的白鵲，而小喬却是帶着粉紅色的一只小鵲，他們的身量，這樣的大小懸殊，配成一對，這是有些奇怪的。我還記得當你發見他們匹配成功時，曾異常欣喜的跑來對我說：

「鵲兒也學起主人來了；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結了婚！」

從此許；鵲兒之中，這一對特別為我們注意，後來白鵲和小喬孵了一對小鵲，你便常常向我討小鵲兒。

「要小鵲兒，先去預備了巢來。」我說：「白鵲替他妻子銜了許多細樹枝和草，才有小鵲兒出現呢？」

「是的，我一定替你預備一個精美適意的巢。」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兒說。就在我的手背上輕輕的親了一下。

真的，親愛的靈犀，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居處，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巢呢。

照文中所說看來，他們倆個子大小的懸殊，一定也是異乎尋常的，否則這對鴿兒怎會引起他們倆特別注意，他也不會叫出「鴿兒也學起主人來了」那句話呢。

以作品豪放出名的蘇梅，在她的筆下的小品散文却是這樣的旖旎，正和宋代豪放詞人蘇軾所寫的抒情小詞一樣，大概因為都是不可掩飾的真情流露的緣故。其實蘇梅是個國學家，所以她的貢獻却在國學研究方面，她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完全揭破了唐詩人李商隱千餘年來未經揭破的祕密，成為讀義山詩的一把鑰匙。此外，『青鳥』，『蠹魚』（即蠹魚生活的改編）二集，也是二個貢獻很多的國學研究論文集。只有她的舊詩確是極豪放的，但是不多見，我還是在『真美善』號外「女作家專號」上看到過幾篇，確是和她遠祖蘇軾有着同樣的作風。從這些詩裏，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有着男性的豪邁的個性女子，在現代女作家中是別無第二人的。

黃 廬 隱

蕪 南

偶然展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讀到了黃廬隱女士的一篇「海濱人」，對於這位亡故八年的作者的影子；又不禁在腦海裏浮動起來！

廬隱在女作家中，與冰心一同成名，雖然她沒有像冰瑩，丁玲，一樣強硬的個性，但也絕對不是個弱者，而是個勇於反抗舊禮教的新女性。

廬隱原名黃英，生在福建閩侯縣的一個村鎮裏。因為她剛一墮地，她底外祖母便死了，她母親就認她為不祥的孩子而忌視她；把她寄養在一個奶媽的家裏，廬隱是在這樣的命運中長成的，她一生的遭遇也概可想見了。

當她在八歲的時候，她底父親在湖南做官死了，全家都遷移至北平，就把她送入當地教會辦的慕貞學院去讀書。許是她幼小的心靈，受了刺激的緣故，對於讀書是分外的用功，尤其是特別愛好文學。所以卒業後，就考取了女子高師的國文系，拼命研究舊小說，舊詩詞。

她曾與一個姓林的少年訂過婚，但那個姓林的很窮，她母親不願意，而她却堅決地愛他，結果由她母親出錢去培植那個姓林的；直至他在工業大學畢業，她却又厭他志趣各異而解除了婚約。

後來，她與北大學生郭夢良結了婚。雖然夢良是有妻子的，她却不管，覺得有了愛情；什麼都不成問題，這種獨斷獨行的自信態度，倒很像易卜生筆下的「娜娜」，可惜不到兩年，郭夢良患腸胃病死了，身旁還遺留下一個女孩，這時蘆隱的精神上，頗受了刺激而變常態，竟日裏喝酒，吸煙，大哭大笑，她底「曼麗」和「歸來」，就在那時出版的。

最後，她終於見棄於郭家，挈着三歲的孩子——薇萱，漂泊到上海來。在上海，認識了青年詩人李唯建，那時唯建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是個樂天派的青年作家，和蘆隱是氣味相投的；她倆便由愛情而開始同居，同時蘆隱也由劉大杰的介紹，擔任了工部局女中的國文教員，這時差不多是她生活史上最快樂的一頁。「象牙戒指」「玫瑰的刺」「火焰」「女人的心」等甜蜜的作品，都在這時期裏產生的。

這樣安定的生活，度了四年，惡劣的命運又主宰了她，在廿三年五月六日，她在大華醫院因難產而逝世了。死後却很冷落。一個傑出的女作家，便草草的完結了一生，如今追憶起她生活的片段，也够令人起一種哀思呢！

白 薇 年

白薇是生在湖南的一個小村裏。她母親得嚴厲，只天天迫她做女紅。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思想新些。她幼時身體很弱，但却天生剛毅，十三歲時就開始了她的奮鬥生涯，因為要進她父親辦的小學，曾和父母大吵了一次。讀了一年多，因父親生病就輟學了。她一面看病，一面讀書，而革命思想也漸漸長成。

但以後，厄運就開始了。因為未婚夫的害病，她被強迫出嫁，去沖喜。然而她嫁後受到虐待：拳擊，口咬，還拿斧頭斫，她急得逃回家，而父親又強迫要她回去，二重壓迫之下，她只得穿了男裝，剪了髮，逃到百里外的一個師範學校去。她那時只有十七歲！在學校裏，她的國文最好。然而她不滿於「骸骨的迷戀」，曾糾合了同學，要求先生讀白話文；考試時她也堅決的交白卷。因此引起了學校新舊衝突的風波。但是到畢業的時候，她父親因為怕她再出走，便賄了學校當局，把學校包圍起來了。她急得沒法，跳牆，跳窗，而終於從一個出糞的舊孔道

，逃出了學校。

她身上只有六元錢。在輪船上遇到個校裏舊僕，感動地給了她二元錢。於是靠了這區區八元，從長沙流浪到了日本橫濱。接着到了東京，沒法生活，只好去當日本旅館的下女。後來，她終於由官費考進了東京女高師的理科。這時，她的弟弟也來到日本了。不久，她的弟弟生病，她賣光了所有衣服書籍，送弟弟進醫院。自己幾月不嘗米飯，只吃紅薯延命。因此，弟弟病好，她便病倒了。然而這時有誰來管她？病了幾月，官費用掉了，只好進貧民醫院。向父親要錢跟本休想，弟弟又常託故不來看她。舊制度和金錢勢力的刺激，因使她下了學文學的決心，來對它們宣戰。

她認識了田漢，又認識了日本著名研究法國文學的中村吉藏。她拼命讀名著，學習寫作，民國十五年她回到了中國的另一大城——廣州，開始寫作生涯，一直到现在。郁達夫說過：「白薇的成功，是她奮鬥的結果」。我想這句話是很不錯的。

鳳子

何倪

「鳳子」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知了，我想，就是友邦日本的國民，也許還在他們的腦子裏烙印着鳳子的印象吧。誠然，由於日本的名戲曲家秋田雨雀氏的援助，曹禺的「雷雨」也會在東京上演過，而且獲得友邦人士的好評。其中飾「四鳳」的便正是我這文要說的鳳子呵。

倘如拿一般人的眼光來批評鳳子的臉樣和姿態，我想各人都要說上一個「好看」或「美麗」的評語吧。不錯，嬌小玲瓏的身段，蛋型的臉孔，兩隻烏黑的眼珠，正直的鼻管和一隻笑口常開的小嘴唇，這都是引人注目的要素。當她還在江灣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的時候，追求她的男同學，大不乏人，然而結果都沒有一個男同學能够追得上手，其眼界之高，也可於這一點上想見。

「鳳子」只不過是她的「藝名」，演話劇或電影時才用的。而「禾子」呢，才是她的筆名。但她的真實姓名并非「禾子」或「鳳子」，而倒是叫做「封季

壬』，禾子之名，乃是折自「季」字，上下截斷，便成了「禾」「子」。但今日能够知道她就是封季壬的，我除了昔日和她同過學或是認識她的人之外，便不會再能找到了。

封女士畢竟是個好孩子，既聰明而又勤學。在復旦的時候，她跟趙景深先生念文學史，每次的試卷都爲趙老師寫上「一〇〇」分。趙老師雖然是個好好先生，但同學中的分數，能有一百分的，畢竟還是少數。而她却常得，可見其在學時的用功了。

姚名達主持「女子書店」的時候，封女士也曾一度進入該書店任編輯職。她的認識姚名達，也是因爲復旦的關係，姚氏是「近百年史」的教師。但和鳳子最親切的，還是洪深教授，他弄的「復旦劇社」，鳳子便是台柱。而鳳子之聞名全國，也是爲了這個劇社的緣故。

戰後，她也曾一度回到她的故鄉廣西，但旋即去港赴渝演各地。關於她在內地的種種，我不甚清楚。好在本刊前些時也曾發表過野丁君的「鳳子與孫毓棠」一文，詳述她在滇渝各地的近況。因此，我這篇小文，只翼作關於鳳子前期生活的補充，大約讀者也樂聞吧。

沈茲久

梅邨

中國文壇上的女作家，有一個不願做官太太，而在婦女界活動最力，個性最強的女作家，那就是幾年前「婦女生活」的編者，已故名導演沈西苓的姊姊沈從九女士。

她生長於杭州，在留學時期，便開始文藝戲劇創作，寄回在上海所出版的雜誌發表，返國後，得李公樸夫人的介紹，給申報附刊編「婦女園地」，不久，又受聘於生活書店，主編「婦女生活」。

因了「婦女生活」內容文字的警惕和激烈，常常接到當局的警告，她爲要維護刊物底本身，不惜向各方面奔走呼籲，使「婦女生活」從艱難苦鬥中度過。

她在中山文化教育館任事時，便與徐慶譽結婚，但她終過不慣官太太的生活，便學「娜拉」走出了！

記得爲了這事，她對「太公報」女記者蔣逸雪的訪問，曾這樣說過，「我平

生不願意做丈夫的附屬品，我倒願意丈夫能服服貼貼聽我的指揮，幫助我做點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這就是她的人生觀。

沈西苓在世時，他們姊弟倆都有同樣的嗜好，歡喜搜集舊劇上的各種廢譜，朝夕研究，戰後分了手，各奔前程，直到去春西苓逝世了，姊弟還不曾會過一面呢！

記 子 岡

任 川

子岡，原名彭雪珍，蘇州人。民國五年生，起初居於北平，十五年秋，因其祖母之命，舉家南回，因此完畢她中學的歷程的，是蘇州振華女校，那時是二十三年夏。

自幼對於文學便特殊愛好，常手不釋卷，津津有味吟咏着，因此常將其他功課置諸一旁，草率敷衍過去，對數目字尤其感到頭痛，通過高中畢業時數學獨未及格。十二三歲便已開始寫作，初期作品，多在『中學生』等雜誌發表。但那時，她還用原名『彭雪珍』發表。

在振華女校的最後一學期——民國廿三年春，可以翻做她一個新的時期，這時她開始用『子岡』為筆名，在『中學生』出現，對青年婚姻寫了坦白的話，對升學就業寫了重圍。畢業後，獨自離家北上進大學，并繼續為『中學生』寫稿，但當地發現了學校制度的束縛時，便毅然地退出了嘗了半年大來學。

廿五年春，跑來上海，蔣逸霄在編『婦女生活』，她寫了不少稿件，申報的『婦女園地』與『文藝週刊』也常有她的文章。但一個少女，逗留在都市裏，靠寫稿生活，在社會上奔波，同異性接觸是不免的，因此謠言也就起來了。大公報的旅行記者徐盈初有人說他是子岡的對象。

對於婚姻問題，子岡並不如有些女子那樣怕羞，反之，她坦然的自承『是個和常人一模一樣的有一顆血與肉交織成的心的姑娘』。她的婚姻觀是『自己是個承認婚姻基於戀愛，而戀愛是該基於志趣的合一的人，這是理智中的情感，戀愛的無條件中的有條件。從理智的鎔爐里鍛鍊出來的情感是永恆的；我詛咒小姐姐兒們的迷在優越的享受中的買賣式的戀愛，我鄙棄那無聊的一股勁兒纏綿的戀愛。那亦是畸形的發展和社會的病態。用愛情當醒腦劑是聰明的，但如今是成了麻醉劑，戀愛被阻於\$的高檻，愛的最高潮似乎是非『這一輩子愛死你不可』似的』。基此，便可以看出子岡的個性來了。

有理智，又有信念，根據志趣與願望，畢竟跟徐盈結了婚。婚後會生下一個孩子，不幸又告夭折。子岡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里說了這樣幾句話：『……孩子，

有着知慧的大腦，可是因爲父母的年輕，缺乏醫學知識，斷送了他的前途……」

剛強，要作個沒眼淚的女兒，這時也終於由天性的啓發而不免泫然了！

然而子岡倒底是志有野心的，她不怕吃苦，不怕冒險，她不停地從這邊到那邊，不像冰心一樣，將自己限到一個生活的小圈子中去。

記 柳 亞 子

希 平

柳亞子先生，江蘇吳江北舍區大勝村人。原名慰高。號安如，改名人權，號亞盧，再改名棄疾，號亞子，今年五十有六。世代書香，自高祖以下，俱有文集行世。先生年十二，即能作五七言舊體詩，及洋洋萬餘言論，頗可觀。其後因鄉間多匪，遷至同縣黎里鎮卜居焉。

十六歲考取秀才，次年入上海愛國學社讀書，得識章太炎鄒威丹兩先生。太炎先生創辦蘇州，柳時爲之撰文，嘗讀太炎先生駁新聞報「革命駁議」一文，有「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美利堅之殖民政略矣」之斷語，蓋以菲律賓大總統阿奎納達將軍時正失敗而先生認爲失敗係成功之母，菲律賓獨立問題，不過時間早晚而已。（詳見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三日蘇報），當時有「黃帝魂」一書，鼓吹革命甚力，據柳先生云，「所有材料，都是從蘇報或其他鼓吹革命的報章雜誌上選錄下來的，編輯者，當然不用真姓名，恐怕連筆名都沒有吧。」先生府上，至今尚保

留其孤本。戚丹先生著「革命軍」爲在上海最早宣傳革命主義之作，由大同書局出版，出資相助者有金松岑，蔡治民，陶亞魂。先生爲避免「自相標榜」起見，黨務編中，未提及也。

不久「革命軍」與「蘇報」案發，章鄒兩先生入獄，愛國學社瓦解。先生輟學返鄉。一九〇四年在同里鎮自治學社讀書。越二年又來上海，入理化速成科學堂肄業，專攻化學，未卒業，應陳陶遺高天梅朱少屏約執教於健行公學。當時同盟會的機關雜誌民報，咸以健行公學爲秘密代派所。

先生既加入同盟會，另編「復報」爲「民報」之衛星。關於復報，人盡知其在日本出版。其實該報在上海編輯，而最先則在同里自治學社，先生等親自撰稿編排，寄日本付印，出版後仍寄還學校，由先生等秘密分送。此事頗足爲中國革命史上一段佳話也。後爲官方探悉底蘊，禁報發行，而封閉學校之風聲陡起，先生乃返黎里，與鄭佩宜女士結婚。鵲鵲蝶蝶，說者以陳樹人夫婦爲比。柳先生雖然禿頂，顧老健如恆，而夫人則健而更美，不知者竟誤以爲無非（先生之長女，陳麟瑞教授之妻）之姊也。

二十三歲與陳師佩忍及高天梅創辦南社，以文學鼓吹革命。革命成功，先生被任爲臨時大總統府祕書，無何，託病辭職返滬。任「天鐸」「民聲」「太平洋」「三報館」主筆，署名青兕。

閱六年南社內部，意見稍歧，先生辭主任職，專收吳江人著作，費萬元之鉅。又五年與邵力子陳望道等創辦新南社，任社長，提倡新文學與社會革命。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從事黨務工作甚力，後爲孫傳芳所迫，易名唐隱芝。在滬輯蘇曼殊全集。次年合家東遊日本，與西京名畫家橋本關雪輩往來酬唱頗多，乘桴集一卷，卽爲當時之產物。一九二八年返國，政府敦聘爲上海通志館長。對於各種文獻，以科學方法整理詳細，爲地方誌放一異彩。先生長於詩文，性慷慨，惟個性太强，主觀太深，不知者每以斯人好勝目之。

先生口吃好辯，愈辯愈急，愈急愈吃，有時竟兩手展開，張口欲語而不得，頗似梁任公先生演講至緊要處。好飲，一杯一口，頗具西洋色彩，設與周越老相遇，真是志同道合。喜寫草字，不究點劃，頗似江間漁先生書草積久而不自識也。

• 按柳先生於友朋來往信札，時以破筆淡墨，任意書寫。至撰文作稿，字極老蒼

，寫聯書屏，尤古雅可愛。

先生有子名無忌，清華出身，美國耶魯大學畢業，長於文，著「蘇曼殊年譜」，長女無非，美國留學生，次女無垢上海大學畢業後留美，嘗合著「菩提珠」附此，以見柳氏之多賢也。

記 周 越 然

希 平

一提起周越然先生，就要聯想到他的「英語模範讀本」。在十多年前，該書會上足的出過風頭，其所以享受盛名，不但「模範讀本」，他的成名也不在英語方面，不過英語是他所研究的對象之一，而「模範讀本」只不過是周先生的著作中之一部罷了。關於「模範讀本」，周氏已有專著在本刊連載過了，無須拙筆多贅。

周氏的中文，根底很深。早年考取秀才，吳興人目其爲神童，幾篇策論，著實出色。當時人佩服他的策論，正和現在人崇拜他的文章一樣。由於在外國文上享了大名，反而把本國文掩住了。大半原因，還是他逢人便說「漢文不通」，逢寫便用「萬年之筆」所造成的。

謙虛，本來是吳興人的傑作，尤其是周先生，他即使對晚輩或學生，總是恭恭敬敬，尊人作兄，有時著實有些「吃不消」。他有幾件事足以自豪的，也值得

寫出來的事，恐怕他在其「回憶錄」中要客氣地把他實放了過去。因此便借著我的禿筆，一件件的寫下來吧。

第一件足以自豪的，有三位得意高足。一位是誦經茹素號稱日本通的戴天仇，還有兩位就是研究黨務的陳氏弟兄，戴天仇的年紀，或許年齡和他差不多，可是教他「各得罵人」(Good Morning)的時候，儼然師道可尊。陳氏弟兄，那是入室弟子無疑，因為他們都到過外洋，直接吃過歐美大菜，學得「各得罵人」的本領，維然不敢說他們青出於藍，總可表示名門必出高徒。

第二件足以自豪，而周先生並不以為了不得的便是他的酒量。六七年前，他每頓必需喝啤酒呢，每飲起碼要近一打，黃酒呢，也要五六斤，「醉」字在他的字典裏是沒有的。可是現在酒價太貴了，周先生不但頓數改少，喝的時候，也加以統制了，有時竟可不喝。他喝酒的姿態是西式的，喜歡乾杯，一口一大杯，看看他的身裁，好像放不進這許多的酒，想起了「酒有別腸」一句話，疑團倒也消了。他從不臉紅，從不說錯話，依舊的操著一口湖州白而客氣，雖然他喝了很多的酒，

第三件足以自豪而周先生不向人說的，便是他不願做官。他的得意門生既久

任考試院長時，屢次請他出山，他是情願守著商務印書館的編審室而不肯去，再四的邀請，再四的不去，結果是折衷辦法，官是不做，到了高考時候，臨時聘請出題閱卷。他從不活動，因他離不開編審所，好像有商務印書館，就應有周越然。堂堂政府官，尚且不做，何況工部局呢？那一曉得華委一職，偏偏加到了他的頭上，堅辭不得，祇好半推半就的就了。

第四件足以自豪且值得介紹的，是他的藏書之富，拿書的形式來分類，一是直豎本的外國書，一是橫額本的線裝書。拿書的內容來分，有天命之謂「性」的莊嚴書與食色之謂「性」的諧謔書兩種，拿書的版本來說，有外國古本，中國宋元明版，中外絕版三種。廿一年開北大火，損失不知多少，但是現在到過他的藏書室裏的人，還是嘆為觀止，尤其是經史子集的單頁宋版和明本的金瓶梅一類的偉大收藏。

周先生原名之彥，那是應科舉時候的大名，本來可以不必提了，提了一提，不過表示我是認識他罷了。關於周先生其他的其他，一切的一切，留待將來續寫罷。

郭一岑

唐捐

郭一岑，筆名柯一岑，江西人，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早年肄業北京清華學校，以家貧輟學來滬，賃一亭子間，徬徨終日，無以爲計，偶投稿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竟蒙登載。賣文所入，亦足餬口，遂專心寫作。

時主編學燈者爲研究系要人張東蓀，氏以投稿故得識張，張大加賞識，招之入館，助編學燈，張因故離職，氏遂代其位，復以文字因緣，與李石岑，鄭振鐸，謝六逸等人論交，遂一躍而入作家之林。

與學燈對立者爲民國日報之覺悟，編者爲邵力子，常開論戰，旗鼓相當，各不相讓，此二大副刊均曾風行一時，雖其主張各異，立場不同，而於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啓蒙，均不無貢獻。

第一次歐戰結束後，德國馬克低落，氏求知心切，復得友朋之助，遂赴德鎂金，改攻心理學，回國後歷任各大學教授，曾一度主編商務之教育雜誌。

事變後，氏流亡西南，聞現任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云。

記 蔣 伯 潛

希 平

蔣伯潛先生，名起龍，以字行，世居富春江上。郁達夫先生的老友，恐怕他們還有些親戚關係。二十七年富陽失陷，轉展到了上海，頂着了愚園路岐山村一幢房子，和他的夫人，兒子祖怡，（著文章病院海天書局印行）兒媳孫兒女等住在一起，父子從事著作，姑媳處理家務融融樂樂，到也相安。從杭州避居滬上的，總算他最安適了。顏其居曰滬西鷗寄廬，仍寓有一枝之寄的意思。

他是北大畢業生的中輩，馬敘倫手下的健將，和黃人望，周遲明，壽子逸等，被人稱為四大金剛的。畢業的那年（民九）就應嘉興第二中學聘為國語教師。時校長計仰先先生（名宗型，黃郛任上海市長時，曾任秘書長）辦學以嚴厲稱。當時一班國文教員多係老師宿儒，如江山劉子庚先生（已故）和會元陸頌襄先生，名廣文鄭斐成先生（現在研究佛教）等同處一校。不免有新舊派的門戶之分。不到二年，他們一面看着老校長計先生，秉性堅強，雖然是個早年游學日本從事

革命的新進者，可是辨學方法，不採富於彈性的美國式的自由教育。他們辭職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去當教員了。國民革命後，馬敘倫做了浙江省主席，壽子逸榮任嘉興縣長，同時伯潛也榮任了嘉興中學校長。據說本來他是縣長，壽是校長，他情願做個幕後的縣長，眼光真是不小。

校長交卸，居富陽山中，着實讀了不少線裝書，著了許多關於學術方面的文章。廿二年浙江省立女子中學聘爲國文教師，非其志也。徐旭東長杭師，離開了那毫無發展餘地的女中，去就杭師國文教師了。直至民國廿六年秋隱居山中止。到上海因蔡可因介紹爲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話譯廣解四書讀本，全集七冊，有唐蔚芝先生的序，由啓明書局印行。呂思勉先生贊爲「後學津梁，即曾經熟誦者，亦資印證」。唐先生稱其書的索隱，皆有獨得之處，而分類一部，尤能提綱挈領。該書的價值，不言可喻了。

他的身裁短小，大有晏平仲的模樣，近視程度很深，可是他決不會看錯人。健談，談笑生風，善譌，人們不以爲虐，和藹可親，人人樂與之交。但是你得罪了他，他可不肯甘休。好飲茶，茶葉必選上等龍井，一早醒來，就要喝茶，據說

茶須泡在悶碗裏（富陽人稱有蓋之碗），萬萬不可泡在玻璃杯內，這是他積卅年的吃茶經驗而得到的方法。茶經三次沖後，不堪再飲，就要換了，每天飲茶，總計在二十杯左右，月費三四十元（現在當在千元左右）。好吸紙烟，非紅錫包不吸，亦不求三炮台，茄立克等名貴之品，自早達晚，手不停吸，除了上課外。據說紙烟祇有紅錫包最好，等而下，不堪吸，等而上，騙人而已。當時紅錫包做廣告，五十枝空罐五只即可換鏤製烟匣一只，他的房間裏堆滿烟匣，任人自取。至今余所用的烟匣，還是他的贈品。每天要吸五十枝至七十枝光景，月費約二十元光景，（現在算來，恐非三四百元，不得過癮。）他常說：「三咽而後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一咽者一口茶一口烟，還有一口，是空氣。否則他竟不能起身。所以吾們同事，都呼他「陳仲子的再生」。

二十六年清明掃墓，天雨泥濘，跌壞左足，以致不良於行；二十八年往大夏大學授課時，以覆車，又傷左臂。他仍很高興的說：「從今以後，蔣伯潛祇剩半個了」。此後即辭大夏及無錫國專功課，杜門著述，現在又回富陽山居了。

記潘光旦

希平

七八年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版一種周報，名叫「華年」，銷路極好，可以說打破了教會出版物的紀錄。這個周報的編者，就是潘光旦。潘氏以編時事新報學燈而爲一般人所認識，然而知道他狀貌的，則除了他的朋友和學生以外，就不很多了，

如果有人替潘氏畫漫畫，那末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和當代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可以供他參考。不同的地方，只是潘氏沒有那蓬鬆的頭髮，並且缺一條腿而已。據說潘氏在學生時代，甚好運動，某日不慎傷足，被微菌侵入，竟不能不將腿割去。可是這一條腿對於他的前途並無影響，不久以後，他便以獨脚大仙的姿態，出洋留學。在美國時候，有人曾將潘氏誤認爲乞丐，給他幾分錢，被他微笑拒絕了。

潘氏的文章，以生物學的社會學爲其立論根據，又因他中西文史都甚擅長，

所以說話句句有來歷，而且句句微妙生動，爲智識程度較高之人士所愛讀。

他在學術界的最大貢獻，便是優生學研究的提倡，和外人對中華民族性與自然淘汰研究之介紹。此外他對於中國家庭問題，也有許多發揮。可是他既不一味維新，亦不頑固守舊。他是站在優生學的立場上來看中國家庭的。他認爲中國的許多傳統，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如門當戶對的婚配，以及掃墓祭祖等一般青年學生所反對的風俗習慣，都有他們可以採取的地方。然而他總是提出許多證據，然後才下結論的。所以人們開始雖反對他，後來却也不能不表示信服。

唯一著名不信服他而且對他加以諷刺的，便是一向愛罵學者和教授的魯迅了。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曾拿潘氏來開過一個玩笑。這玩笑內容如何，我們此地也無從說起了。

潘氏還有一本愛好文藝的人所激賞的書，這就是馮小青的研究。他找出許多材料，證明這位多才多藝的薄命紅顏，有自我戀愛的變態心理。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會發生一種感想：——可惜潘氏不多談些文藝！

夏征農

任川

夏征農這名字，雖不十分響亮，亦該不會爲人十分陌生吧？以前曾任『讀書生活』的編輯之一署「夏子美」名的，便是他。

夏先生是江西人，長個子，清癯的兩頰，顴骨高高聳起，雙目很大，雖不能形容作銅鈴，但在瘦臉上配上這一對大眼，頗有點可怕，可是夏先生的本性是和藹的，他雖然冷板板的，不容易覺得着他的笑容，但對於我們幾個青年一次次的麻煩的纏擾，絮叨的請託，從沒見他說出怨聲與發怒的表情，他老是慢條斯理地替我們解說着一切文學上的質疑，聲音是瘖啞的，尾音常常幾乎捉不到。

征農先生是始終鼓勵我們的。每周一次的作文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要求他爲我們多斧正幾篇，他亦答允，於是詩，散文，雜感，小說等習作從各人的筆底下產生。當然，他是沒有這樣多的功夫來替我們修改，但並不因爲我們作品的幼稚而不屑一顧，似乎每篇東西至少粗略的看過，做一點記號，寫幾句批語，課餘

有時也特地補充解釋。這種熱忱我們是始終感激的。

征農先生固然鼓勵我們多作，但也叫我們多看。

我們辦了壁報在教室裏張貼，同市民日報上商妥了每週讓出地位歸我們出「虹光」，但似乎祇出到五期，又搬到華東夜報出「鴻聲」周刊了。不久，華東夜報停刊，又移到了華美晚報，到廿六年夏停止。雖然，廿六年春，夏先生就已輟教，但我們仍時到他家裏去請教，而初編時一番熱忱的指示還使我繫猶不忘。

國文四級是畢業班，但夏先生勸我「用不着抱分數主義，小考也無關緊要，大考時一定給每人及格分數，但結果教務處却用大小考平均分數，因此竟有好多位同學名落深山，大叫上當，之後我寫了一篇『量才學生不抱分數主義上了夏征農先生的當』，登在辛報上。夏先生看後，皺皺眉頭，表情似乎有些尷尬。

先生是復旦大學畢業生，一九〇六年生，曾任教師多年，入申報擔任讀書問答部，專答復質疑，集有「文學問答集」教文有「野火集」（包括小品，雜感，文藝論文等卅七篇，譯有「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夏先生對文學及社會科學都有很深的造詣，寫作時態度的鄭重與認真頗使我們感動。

路易士

胡蘭成

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隣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似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於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後想想，却覺得還不夠瞭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於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

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爲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爲藝術，如貝多汶爲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其對於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汶不必爲此而懊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而那交響曲却是真實地存在着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磨，與貝多汶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着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汶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而幾千年來，人們爲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磨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瞭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

，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點。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後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着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於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於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爲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爲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爲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爲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着於自己的存在，沒有變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後，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爲山寧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寧的蔑視一切，是比較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 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意於山寧，路易士有山寧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爲，山寧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後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人們彷彿是在潮汐退落後的沙灘上行走，四周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爲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這之

後，山寧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爲過去，出現的乃是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了。當北伐時期的革命已經從記憶中漸漸淡忘，而新的時代啓示還沒有顯明，社會是在經常的破落中，這之際，游離出來的就有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不止他一個，而是一羣。他們沒有嚴重的失敗情緒，也沒有魅人的時代前景供他們追求。他們只是分散地對自己的被迫害而反抗，不是聯隊的戰鬥，也沒有號筒，各人只能信托自己；對集體的戰略與戰術不需要，也不關心；看不見自己的同伴，也看不見敵人的全體。他們各個地戰敗，死亡，然而不能引起一個聯隊的覆滅的那樣嚴重的失敗情緒，偶爾也有小勝利，然而這種小勝利往往很快就消失。

路易士就是這樣，他在反抗，所以他的詩不同於吟風弄月那一套。然而他的反抗只是散兵戰，所以他的詩也不能成爲時代的號筒。有如散兵戰之於集體的戰略與戰術是隔膜的，因此他沒有學習較爲廣大，較爲深入的理論體系的要求，也沒有全面地考察環境的要求。他讀書甚少，對事實不求甚解，却並不因此感覺自己的貧乏，倒是這樣反而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者，原因在此。他沒有攻打到敵人的要害，甚至不能發見敵人的要害所在。身在戰場，而如此孤單，所以他總是恐

懼，懷疑全世界都在迫害他，而抓住任何一點，就用全副力量來攻打它，有如吉訶德先生之攻打風磨。並且因爲恐懼，他需要時時壯自己的胆，極力裝做驕傲，非常之注意自己的尊嚴。如有些人所嘲笑他的，他把他所僅有的手杖與烟斗當做無敵的武器，其實却不過等於吉訶德先生的不中用的長矛。而且也如吉訶德先生，總是戰敗的回數多，但也非完全沒有勝利。是這種不足道的勝敗，由此而生的失意與歡樂，憤怒與寬大，幻境與夢想，構成了他的詩的全部。

雖然如此，因爲他究竟是在戰鬥，而他的詩也能準確地表現這種戰鬥，所以還是好詩。這種戰鬥雖然不足道，可是這現代正有千千萬萬小市民和路易士同一命運，走着同樣的道路，不過有的比較聰明些，因此也更缺少智慧些罷了。這麼一種不足道的戰鬥，勝敗都不能驚人，而歸根還是各個地被擊倒，像蒼蠅一般靜靜地死掉，沒有同伴的鼓勵，甚至沒有牧師給他們做臨終的祈禱，他的墳墓上沒有花圈，也沒有十字架。這看來不像是悲劇的悲劇，乃是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路易士的詩，好處就在於刻劃出了這一羣人的靈魂，它使人不愉快，然而並非可笑的。

我在好幾處把路易士比擬吉訶德先生，一定很合有些人的胃口。但我請求他們明白，吉訶德先生那樣的人物，起初是使觀眾發笑，漸漸的却覺得不愉快，看完之後走散，各人的心裏還有一種不能排遣的憂鬱，爲吉訶德先生而哀傷，也爲自己而哀傷了。路易士是有吉訶德先生的可笑之處的，幸而他不是市儈，所以也有吉訶德先生的嚴肅之處。

路易士的自稱爲詩人，也和吉訶德先生的自稱爲武士一樣，很受了一些人的嘲笑的。自稱爲詩人，與自稱爲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固然同樣有礙眼的地方；但路易士還是幸而不是市儈，並非拿這來做招牌，另有所圖。他沒有一般人所有的主義，沒有宗教，也沒有任何生意經，乃至於在人間他沒有得到一絲溫情。這樣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簡直找不到一個字眼來下一個定義。然而人是不不能這樣生活的，即使不過如基茨自擬的墓誌銘所說，是「一個把他的名字寫在水上」的人吧，他還是要替自己找出生存的資格，工作的意義的。路易士的自稱爲詩人，和有些人的自稱爲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不同的地方在此。

當然，他也有做作的地方，可是做作得很幼稚，甚至於有些地方使人聯想起

阿Q式的狡獪。但阿Q的狡獪還是可愛的。因為老實人裝狡獪，不過使人笑，而狡獪者裝老實，却使人憎，使人恐怖。路易士是善良的，無害的，有時候雖然出點小亂子，也不過如吉訶德一生之烏亂了羊羣。但因為太善良了，甚至對於敵人都是無害的，這是路易士所代表的那羣人的悲哀，他們在這時代註定了只能做這樣的角色，他們也戰鬥，可是往往勝敗都不分曉，就這麼地被抹掉了。

路易士的詩，集成冊子出版的，有「愛雲的奇人」，「煩哀的日子」，與「不朽的肖像」三種，氣分有點像李賀與孟郊，却分明是現時代的產物。最近我看到他發表過一首小詩「魚」，還有「向文學告別」的原稿，都是很好的。我認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文學的分水嶺，在詩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代表作品，則是路易士的。「女神」轟動一時，而路易士的詩不能，只是因為一個在飛揚的時代，另一個却在停滯的，破碎的時代。

文
壇
逸
話

原书空白

魯迅與林語堂

亢德

當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風行一時，繼之而『太白』半月刊出版，又繼之而有『中流』問世的那一時期，凡是只讀過魯迅先生諷嘲林語堂先生文章的人，大概以爲魯林是冤家對頭，彼此間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但據我所知，則魯迅先生之對於語堂先生，尤其是語堂先生之對於魯迅先生，思想不同誠有之，個人之間似乎却沒有仇恨怨尤在。

語堂先生對魯迅先生是尊敬和了解，在他的文章上談話中沒有輕視或謾罵魯迅先生過。他敬佩魯迅先生的學力觀察之深。他認爲魯迅先生的易怒多疑，是因爲身體上的疾病所致，在『人間世』創刊前，語堂先生曾在家裏請過一次客，請的客人除曹聚仁，黎烈文，徐懋庸，劉大杰諸位之外，還有一個魯迅先生，客人十九都到齊了，只有魯迅先生還沒有來，有人怕他或會因路遠或別的不便不來，就問語堂先生要不要設法催一催。他却很有把握的說：不必催的，一定會來。隔

了一會，叫門的鈴聲響了，他就說魯迅先生來了，一面站起來往外去迎。這天的魯迅先生仍是那副樣子，不富麗的長袍，膠皮鞋，品海牌（？）香烟一支接一支的吸個不已，裝在那隻不漂亮的烟嘴上。席間有說有笑，談東話西，談到「金瓶梅」作者的方言用語，談到德國文學。臨走向語堂先生借了一冊大而且厚的什麼德國書，僱了一輛出差汽車由徐訐陪同返寓。在這次的魯林晤談中，誰也看得出他們倆不是泛泛之交，更不是什麼敵人。後來爲了什麼翻譯問題，據說魯迅先生對語堂先生大爲不滿，但在語堂先生方面，則始終認爲是魯迅先生經旁人挑撥而起致有誤會。魯迅先生勸語堂致力繙譯的信，我曾看過，大意是中國切需西洋文學的介紹繙譯，以語堂先生之英文，如能致力翻譯，不特目前有用且有益於後世，言辭極爲懇切，語堂先生的復信，我沒有看到，據他說是答以目前擬介紹中國文學到西洋，俟老年再來介紹西洋文學給中國，意思也決無向老年的魯迅先生開玩笑。後來不知怎麼一攪，據說魯迅先生認語堂的復信是罵他老了，爲之大怒。不過據說只是據說。在「魯迅全集」中沒有隻字提及過這件事。但我想魯迅先生在接到復信後的失望是免不了的；後來「論語」之外再來「人間世」，更難免引

起他的反感，因為他的信上會婉勸語堂先生不應只致力於「論語」。

魯迅先生對於「論語」和「人間世」的態度，似乎較取「論語」而更不取「人間世」。他在「論語」出版之初，曾以「何干」筆名寫過幾篇文章，有一篇記得題爲「從中國女人之腳推想到孔夫子有胃病」。後來也寄給「論語」以「古香齋」的材料；介紹過一個青年託他賣錢的稿子。在寄古香齋材料來時附有一信，可見他一生嫉惡如仇態度之一斑。

「奉上剪報一片，是五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三個怪人』之中，兩個明明是畸形，即紹興之所謂『胎裏疾』；『大頭漢』則是病人。其病是腦水腫，而乃置之動物園，且謂是『動物中之特別者』，真是十分特別，令人慘然。」

在另一信中，他說「我並非全不贊成論語的態度，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我看來有些無聊」。他的並非全不贊成「論語」的態度，原因恐即在於「論語」有不少文章暴露和諷刺政治社會的醜惡。至於「人間世」則以過趨沖淡悠閒的沉痛之處，他就自始不以爲然，手頭有他一封議論小品文的信，摘抄如下：

「我實非熱心人，但關於小品文之議論，或亦隨時涉獵。竊謂反對之輩，其

別有三。一者別有用意，如口口君，在此可弗道，二者頗具熱心，如「自由談」上屢用怪名之某君，實卽一泥沙雜拾之作者，雖時有冷語，而殊無惡意，三則先生之所謂「杭育杭育派」，亦非必意在稿費，因環境之異，而思想感覺，遂彼此不同，微詞睿論，已不能解，卽如不佞，每遭壓迫時，輒更粗獷易怒，顧非身歷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參商到底，無可如何，……先生自評「人間世」，謂談花折春光之文太多，此卽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無話說之故，亦卽空虛也，爲一部分人所不滿者，或因此歟？」

魯林的不同之處，是魯迅先生對於現世界現社會的醜惡處處抗戰抗戰到底，所以他視筆如刀，視小品文爲匕首，語堂先生却有點不同，他以爲人生或世界不無靜觀自得之處，所以他不是沒有寫過戰鬥文章，如『剪拂集』所載，但也會視「浮生六記」若不朽至寶。魯迅先生愈老而救世之心愈熱，語堂先生則覺得可勿動肝火時樂得說說笑笑一番，直到魯迅先生逝世，語堂先生沒有踢過他一脚，而魯迅先生則似乎可惜語堂先生的寄沉痛於悠閒，所以當他與高采烈提出小品文之際，就來兜頭給他澆上幾杓冷水，蓋卽「雖時有冷語而殊無惡意」之舉也。

魯迅『兩地書』的鑰匙

孔 宣

中國古來有句很風雅而又含有惋惜的口氣的名言，叫做：「英雄難逃美人關」。其實，英雄難逃美人關，未必個個英雄都是這樣，如把這句名言改作：「文豪難逃美人關」，那才完全切合於事實。不信，你們只要看現代文豪，魯迅，茅盾，郭沫若，郁達夫……等氏，他們多少終有些桃色新聞，給文壇上的同人們做酒後茶餘的談資，這是一種顯然的證明。

說魯迅也有過桃色新聞，如果給一班魯迅崇拜者看見了，一定會說：「這又是造謠，希圖減低人們對於他老人家的信仰。他雖然寫過『兩地書』，但『兩地書』不是情書集，他既沒有寫過情書，那麼那裏會有什麼桃色新聞呢？」話說來也對。可是『兩地書』雖不是情書集，但『兩地書』中偶然有些字句，他的肉麻竟有超過於一般情書集的，因為用得少，讀的人不大留意吧了。

在二十大冊魯迅全集之外，還有一本也是魯迅所作而為許廣平編印的『魯迅

書簡』，裏面有一封影印的魯迅親筆寫給章素園的信，這信是魯迅和許廣平同居在上海時寫的，在信裏有這樣一段的話：

「至於『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島到廈門以後，才聽見的。他見我一個人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搗了密斯許同住於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也隨他們去罷。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麼都不管的。後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裏——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時，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潑頭，真是沒有骨力。但是，說到這裏為止，疑問之處尚多，恐怕大家都還是難於『十分肯定』的，不過我且說到這裏為止罷，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罷。」（見該書一一——一二頁）

這是一段魯迅很坦白的自供，所謂「傳說」，所謂「流言」，不是一桃色新聞是什麼？「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

憑壓沒了對手。」這是已婚的中年人常有的戀愛觀，只是沒有人敢這樣坦白地說過。「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血來，是什麼都不管的。」這也只有魯迅才有這樣坦白告人的勇氣。魯迅之所以爲魯迅，從這裏已可見其一二了。但統觀信中的口氣，還不免有些誘過於人，好像他的和許廣平同居，是被激而然，否則不會這樣的。

所以，我們讀了『兩地書』而不明白他們的究竟，我們不妨到『魯迅書簡』裏去找，他至少可以告訴你們那重要的一部分。他簡直是『兩地書』的一把鑰匙。

胡適與哲學史

如 蠅

「羅馬非一朝一夕可成功」。這是說，大凡做一件事，須經過相當的時日，相當的努力，相當的探討，才能够得到成功，不是馬虎急就章？而能得到成功的，世界上也沒有這樣容易的事。譬如以寫文章來說，英國作家喬易士，他寫作的態度是非常拘謹的，輕易不肯發表作品，更談不到粗製濫做了。所以他的「青年藝術家」寫了十年，一攸力栖斯「寫了七年，而於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費尼根醒來」竟寫了十七年之久。又如法國作家裘爾曼的「好意的人們」由一九一四年起寫，一直寫了二十七年之久才出版，再如美國作家桑德堡的偉著「林肯傳」：寫了數十年才出版。

胡適過去貴爲渝駐美大使，最近則調回任行政院高等顧問。他的政治立場怎樣，現在放下一邊不說，無疑地，他是世界著名的學者。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册自出版以來，打動了全國學術界起了一個新的波瀾，中國有了一部比較完

著的哲學史，於是大家很熱烈希望看到他的中下卷快些出版；可是等來等去，却沒有一些消息，大有『祇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之感，所以大家已經由熱烈而冷淡，由冷淡而快要絕望了。但胡氏却不然，他並不因為讀者的急切而馬虎的寫一本來應其需要，他仍一點一滴地慢慢的作精細的研究，絕不理會外間的誹謗。爲着研究哲學史大綱中卷，他在他的客廳裏堆滿着佛經，在其中搜集材料，王禮錫有一次去訪問他，和他談起哲學史大綱中卷是完成了，準備是印油印本一二百部，分給朋友們徵求意見，將來再收回油印本重加修改一次才正式出版，在這樣一無三年不毀之版，無十年不刊之論的時代，這種治學的精審的精神，是很稀有的，這是值得我們治學的人來效法。

胡適在廣州

粵士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我的朋友』胡適之爲了『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學位』，便乘搭哈更遜總統號郵船南下香港。因爲胡適是美國哈佛大學出身，而且曾與羅斯福同過學，又是中國在英美文壇上的作家，所以備受英國的學者William Hornell和L. Forster（前者爲港大副校長後者爲文學院長）的歡迎。胡氏於笑微微接受了港大的『名譽學位』之後，便到廣州去，也想在廣州『賣膏藥』。（即演講）

但是，胡氏在港『賣膏藥』出了毛病，廣州當局大爲不滿，一般冬烘顧問見其在港抨擊『讀經』，於是告密於陳濟堂。陳氏對於『讀經』與否，本無主見，只是爲了身旁的冬烘顧問主張讀經可以保守廣東天下，於是他也就主張『讀經』了。如今胡適既然在港反對讀經，陳氏便以爲這就是反對他，所以立時下令各校，禁止胡適再『賣膏藥』，以免擾亂廣東的人心。

陳氏對胡的不滿，胡適自己事前是不知道的，當其坐在泰山輪船的頭等房裏而想着由港專程進省（廣州）抵埠時備受歡迎之熱烈（？）的時候，他是并不知道廣東的當局早佈下了陷阱在等候他的。及至船進廣州，泊在西濠口碼頭時，他首先在歡迎者的羣中接到一位老友的信，打開一看，原來是『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但他仍不能了解這信的含義，及抵羊城，下榻太平南路的新亞大酒店之後，從茶房爲他買來的一份『越華晚報』中，才明白了那封信的含義。

原來那天的『越華晚報』上所載的某一段政治新聞乃與胡適來粵有關，內容正是『西南政務委員會』諸公在昨天下午召開的常會中有案討論及胡適在港『賣膏藥』的對策。但又并不很明白的說出來。稍後，中大文學院長吳康的信也叫人送來了，是勸胡即夜乘車離省，以免發生糾紛。

胡氏閱信之後，雖然知道事情不妙了，但爲自己的面子計，并不離省，依然住在新亞的精緻的客寓裏，和朋友大談其天，以作消極的對抗。

胡適之所以仍敢逗留於廣州而不逃回香港者，并非是靠其學者的招牌，而倒靠了他的兩位北大的學生：林雲陔和陳遼才。在當時，林是廣東的省府主席，陳

是廣州地方法院院長。所以到得第二天，他便和陳達才到公園前的省府去訪林雲陔了。西南政委會林氏也有份去參加的，對於前天下午的議案之一，他心裏明白但又不好意思直接的對胡適說明，於是打了一個彎子。這彎子在林雲陔的心裏原是的，但不識想的胡適却不知林氏的用意，於是事後弄得更糟了。

這彎子是什麼呢？便是拜訪陳濟棠。林雲陔之介紹胡適去見陳濟棠，原是希望胡氏對陳氏有所解釋其在港的演講；可是，事實上胡適在見陳濟棠時，非但沒有解釋，而且倒質問起陳氏為什麼要主張讀經，以及讀經有什麼好處來？陳濟棠原是一個軍人，學問是不多的，要他拿出讀經的理由來答胡適，自然是不易辦到。所以胡適的一問，更引起陳氏的不滿了。

自從胡適退出了總司令部之後，陳濟棠便馬上打電話到省黨部去，囑人即刻通知鄒魯，明令禁止胡適講演。於是當晚中山大學出了佈告：除叫學生照常上課外，并在佈告內大罵了胡適一頓。同時，青年會以及其他事前約好了胡適演講的地方，也接到了禁止胡適演講的命令。於是四出通知，宣告解散，賣了的聽講票子，也紛紛退了回來。胡適欲在廣州『賣膏藥』的夢想，至此完全破碎了。

第三天的上午，胡適知道在粵不宜久留，否則必將吃苦，於是靈機一動，便和劉毅夫乘機入桂，冀在廣西各地再賣其膏藥。胡適走後，第二天（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廣州各報都把中大中文系主任古直等聯名上陳濟棠的電文登了出來，該電是懇請陳總司令『電令截回，徑付執憲』的。事後雖然『截』不『回』胡適，但那電文却十分『可觀』；現在不妨把它抄出來，以見我們這位以『閉戶自修不從師教』這八個大字寫在他的履歷片中的『出身』一欄內而自豪的古直先生的文風：

『廣州分送西南政務委員會，陳總司令勛鑒：昔顏介庾信，北陷虜廷，尚有鄉關之重；今胡適南遊故土，反發盜憎之論，在道德爲無恥，在法律爲亂賊矣！又況指廣東爲殖民，置公等於何地？雖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遙法外，造謠惑衆，爲侵掠主義張目哉？今聞尚未出境，請即電令截回，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否則老口北返，將笑廣東爲無人也。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等叩。眞辰。』（標點是我加的。原文抄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廣州越華報）

胡適之尊重女性

孔尊

胡適之是個極尊重和愛護女性的人，這可在下面三樁故事中看見，第一他也曾寫過一本「終身大事」（劇本）。這是他唯一的劇作，這劇是寫一個女子爲了反對她父母的包辦婚姻而終至出走。當公演時因沒有人敢飾這個女主角而竟未演出；但他對於一般青年女性的影響，却是很大。

第二，他有一天在北京大學上課，那時是嚴冬才過不久的春天，春風吹在人們的身上還覺寒顫。他趁學生在抄他寫在黑板上的札記時，下了講台在教室中踱步。偶然看見一個坐在窗口近旁的女生，身上穿得非常單薄，雖然她的頭一俯一昂地在專心抄寫札記，可是掩不住她的身子微微顫動。胡適之回頭一看，原來窗子正開著，他皺了一皺眉，便走上去輕輕把窗子拉上了。這樣一來，等到一下課胡適之愛護女生的新聞，就遍傳全校了。

第三，他曾替專門提倡女權的李汝珍所作的鏡花緣作跋。鏡花緣作者對於歷

史上那位著名女性皇帝武則天的特別尊敬，確是歷來不曾有過的大胆，而他又主張開女科，反對纏足，確是極端爲女性說話的。當亞東圖書館把鏡花緣加上標點符號而出版，胡適之便替這個本子做了一篇敘，把書中好處廣泛地介紹出來，特別注意於提倡女權上。一般人由此認識了鏡花緣的真價值。因爲在此以前，一班讀鏡花緣的，都把他當作山海經，神異經一類的書看待，都沒有懂得作者的中心思想和他主旨是什麼？

亞東本鏡花緣出版後，有位署名老蒼的和他通過一次信，大意如下「鏡花緣一書在我們家鄉海州出版的，明明標着『海州許喬林著』的，並且紙張很好，字非麻沙，決不是翻版。因此有許多傳說：（一）許李兩家雖有親戚關係，但許家後裔爲了李家篡奪他的版權，在揚州會和他家打了一場官司。（二）許因自己是個經學家，不願意以小說家污其盛名，故借李汝珍之名以行世。在家鄉版本標著許名者，乃是其後裔保護版權之故。（三）鏡花緣確是李所著，但李氏音鑑是許所著，他們是互相交換著出版的。至於書中的人名，多九公是影射李松石（汝珍字），因爲「松爲十八公」是一句古話，「多九」卽是「十八」，唐敖亦影射李

氏，因唐朝姓李之故。而林之澤則影射許喬「林」。以上云云，均係幼時得之先君及父執許先生，雖無從證明——却也未去考據——各說孰爲確實。但可供先生小小參攷，倘能考得「水落石出」，也是先生所謂「等於一座星的發現」啊！」（二十五年，七，二十一。時代日報）

老晉後來曾得到他的復信，是：「候再版時當爲補入」。可是現在鏡花緣不知已有多少版了，可是他答應人家補入的，始終不見他補入，因此引起了老晉的無限牢騷。可是，我想，這大概老晉不是一位女性的關係吧！否則像胡適之那樣尊重和愛護女性的人，一定會奉命惟謹，決不會這樣的怠忽過去的。

郁達夫一氣走南洋

孔 尊

只要一提起郁達夫，你便會想起他的夫人王映霞。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他們一結婚，便住在西子湖邊，這是郁達夫有生以來的黃金時代。郁氏的一生，都爲生活所鞭策，又加上婚姻的不幸福，這在他只有頹廢和消極。他一直生活在頹唐苦悶中。自從遇見王映霞後，才從絕望中拔出來。他的「日記九種」便是寫他和王映霞戀愛的經過的作品，在那裏我們看到的，是郁達夫已得到了新生。這新生的給與者就是王映霞。

從前有人拿女子的性格比做「水性楊花」，這口氣似乎是有點侮辱女性，如果把他換做「意志薄弱」，那就不會引起多數知識女士掀起嘴唇了。不幸我們這位大作家的愛妻王映霞，終也免不掉棄家私奔。

郁達夫在杭州，已是成名之後，文人不成名則「門無車馬跡」，一成了名，也不啻於商人發了大財，頃刻一門庭若市。如果你在「無貝之才」外，更有了

「有貝之財」，那你儘可做到天天「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

在已飽經世故的郁達夫，他和那些豪華的人們來往，只要不礙於他的生活，他也樂得周旋，以抬高自己在客卿的地位。但在他的那位「窮書生中狀元，真才子享榮華」的思想還未脫盡的愛妻王映霞，一見他丈夫雖然文名遠颺，人物溫柔，然獨少地位，總欠資財，不能和那些豪華的男士們爭一日之長，未免相形見絀，感到美中不足。她的芳心才這樣的略一顫動，便好像一座堅固高大的圍牆上有了一個小小的間隙，「涓涓不塞，終成江河」，外來的引誘便如影隨形，如響斯應，初而移愛，繼則私奔，終乃脫輻，又終乃在報上互登廣告，大肆謾罵。假使有一個機會，能够請他們兩位對著面，把那本「日記九種」揭開來從頭到底細細重讀，不知他們心中將作何感想？

恕我來一個不客氣的斷語，對於他們的誰是誰非。如果在講「愛情絕對自由」的立場上，那我不必有什麼話說。如果「愛情」也可以其他「道德」的範圍，那麼王映霞的意志不定，一受當時教育廳長許某的引誘，便不顧丈夫與兒女而甘願私走，無論怎樣，終不能造出她正當理由的謊來的。文人們或許各有他的怪癖

但一個真能愛她丈夫的妻子決不會借此吹毛求疵，而且據一切的記載看來，郁達夫始終愛著她，別無外遇，那麼她的棄絕丈夫，可云完全不是爲了虛榮，便是爲了私慾的關係。

郁達夫因此而出走南洋，至今杳無消息，雖是只有一面之緣的我，也是十分惦念著他。我們不願新文壇上這樣地失去這樣一位已經有了光榮的歷史的作家。

達夫與金縷曲

張祥沅

「兄等平安否？記離時，都門擊筑，漢皞賭酒，別後光陰駒過隙，又是一年將舊，怕說與說來病瘦；我是無能甘命薄，最傷心，母老妻兒幼，身後事，賴良友。半身積貯風雙袖，悔當初千金買笑，量珠論斗，往日牢騷今懶發，發了還愁無醜。且莫問文章可有，即使續成「秋柳」稿，語荒唐，要被方人呪，言不盡，弟頓首。」

上面抄錄的是郁達夫在一九二七年所作的一首『金縷曲』，距今已有整整的十六年了。

十六年中，給予郁氏的是迷戀，是興奮，是消極，是傷感。十六年前，郁氏做這首金縷曲的時候，在教書編書，獨力支撐創造社之外，還認識了一位惹人憐愛的王女士，他一面對他的在北京特地寄皮袍子來的妻子荃君表示感謝，一面却苦苦追求王女士，得到了她的片言隻字，便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倆的戀愛經過了

若接若離的階段，便踏上了坦途，以後，郁達夫與日名作家佐藤春夫出外遨遊的時候，王女士也一步不離的隨侍在側了。

這些事郁氏都記在『日記九種』中，我們除了同情他如癡如顛的愛情飢渴外，更可憐他受着愛情的播弄。

他們倆結合之後，怎樣過悠閒的生活，怎樣在杭州築起風雨茅廬，怎樣夫婦間生了芥蒂，以致在『思想腐化』與『行動浪漫』的理由下，拆放了已結合十數年的鴛鴦，一切事大都爲外人所知悉，郁氏今日已過不惑之年了，眼看茅廬已毀，愛人被奪，而自身徬徨失意，仍然是兩袖清風，回顧曠昔，能不黯然淚下？設若郁氏遠居異地，再填一首金縷曲，將又是一種如何淒婉的筆調！

且不說郁氏現在有否第二首金縷曲即以上面抄錄的那首金縷曲而論，已可見郁氏才華橫溢，名士氣息已在寥寥數字中流露無遺。郁氏雖爲新文學的健將，但舊學造詣頗深，對日英名著亦多所涉獵，平時執鞭與寫稿所得，爲數已甚可觀，除維持個人開支外，最大的支出便是飲酒與買書，這二者對於他的寫作有絕大的幫助。這首金縷曲是他看了顧梁汾的彈指詞後所作，所以無論格調方面，文筆方

面都模彷彿前作。顧梁汾因爲友人吳季子謫戍寧古塔，所以填了一首金縷曲寄給他，音調鏗鏘，滿紙充滿哀怨之氣，真是名副其實的金縷曲，郁氏的作品雖較爲遜，但能保持前作的神髓已屬大不易了。

廿六年戰事爆發至今，郁氏始終過着流浪生涯，福州，星島，香港，重慶，甚至窮鄉僻壤，無不有這位名士的足跡，正不知今月今日，在何處飄零？據某雜誌傳出，郁氏將與巴金一同返滬，我們都期待着。

新斷腸詩

張祥沅

半個月前，我寫過一篇「郁達夫與金縷曲」，因爲匆促作成，急就章總做不出好東西，深覺辱沒了這位遠在千里之外的名作家。

郁氏一生坎坷，潦倒半世，至今垂暮之年，設若翻閱十數年前的舊作，回憶往昔迷戀於愛的癡情，落拓不羈的作爲，正不知如何心境？最近郁氏作了一首舊詩，哀感欲絕，令人淚下，詩云：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猶宿，荆風荆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爲哀社，總覺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我不負卿卿負我，郁氏思念情人的癡心，至今未泯，所可惜者，舊日情人今
陌路，王映霞讀此詩後，即使有憐惜之心，但爲虛榮所迷，環境所限，也未必肯
勒馬回崖。覆水難收，將成郁氏的千古之恨。

因爲關山遠隔，郁氏的近況不能得聞。偶有友朋相告，祇知郁氏曾在星島，
主輯報務，現在寄居桂林，開來意志消沈，難得有作品問世。郁氏在情場失敗，
在政界也不甚得意，以前曾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拿二百元一月的薪金，掛名差使，
自無大作大爲，戰後，郭沫若任職第三廳，沈起予做感化院長，曹聚仁背起武
裝帶，洪深從事電影事業，林語堂大發洋財，其他如茅盾，巴金，雖仍握筆寫文，
但一字數十金，稿酬優厚，生活相當舒適，獨有郁氏跋涉東西，未獲一官半職，
更且心境惡劣，萬念俱灰，即使有做萬戶侯的機會，也已無意於此。郁氏在文
壇上享名甚盛，而境遇艱苦，長日無俚，重讀郁氏的「一個人在途上」，在我的
腦海中又出現了那位儀表瀟灑的作家，長而不理的頭髮，充滿風塵之色的臉容，

深黃色的華達呢長袍，與白底黑面的緞鞋。

郁氏在創造社時代，日寫萬言，吸大前門每天五十枝，白天一人編輯刊物，晚上在帆布床上與臭虫同宿，今日創造社已風流雲散，社員服官者有之，操舊業者有之，或得回家優厚俸祿，或享家庭天倫之樂，然而曾做過創造社首領的郁氏，却仍是兩袖清風，一肩明月，更以家室之變，使他滿腔哀怨，無處發洩，觀乎「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娘真個幾時歸」之句，我們的郁氏真是太可憐了。

謝六逸在神州女校

孔 宣

說起謝六逸，他雖然在新文壇上也是位老將，因為他是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是位很早的會員，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遠不如茅盾，鄭振鐸，周作人，葉紹鈞……等那樣受到注意。我曾經研究他的原因，原來他的著作雖多，可是都在「編」與「譯」的方面，他對於兒童文學也會努力過，可是所作不多，最後，他又因職務的關係，完全萃心於新聞學方面，而且從此遂不大寫作。在重視創作過於研究的中國智識社會裏，他的聲望，自然難以像一班人的顯著了。

其實，我們與其說他是位中國文學家，毋寧說他是位日本化的學者。無論是研究，是介紹，他的文章總是傾向於日本方面的。像周作人，他也好談日本，好介紹日本，可是在他的文章裏，有他自己的個性，有他自己的風格，謝六逸就不是這樣，我們讀他的著作，有時疑心是在讀日文課本。其日本化的程度可想而知。這，吾想，可以說是他的譯作所以不受讀者歡迎的第二個原因。

大約已在二十年前，那時文學研究會已經成立了好幾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已做了他們的同人雜誌，鄭振鐸已開始編譯他的「文學大綱」，按期在「小說月報」上登載，葉紹鈞則在主編「文學週報」，謝六逸却在北四川路的神州女校當教務主任及復旦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說起那時新文學家的身份，比了現在可云有天壤之隔。那時各大學的文學教授，還都是些樸學家或古文家，新文學家還沒有得到一般大學校長的青睞，但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却是例外。所以謝六逸能以大學教授而兼中學教務主任，已經變料的一關。其他一般新文學家，在寫作之外，至多只能兼任中學的國文教員，而且也要看機會，像校長先生是不是歡迎新文學家即是其一。神州的校長是張默君，她是當代有名的女革命家，所以神州的教員很多新人物，如鄭振鐸，周予同，王鍾麟，錢智修，都在那裏當過教員。而鄭振鐸的第二夫人高君箴，就是這校的學生，他們由認識而結合，也都在這學校裏。

說起來令人有些莫測高深，謝六逸在神州也擔任教一班國文，可是他教的是那一班？是高中文學科？是初中？這樣猜去，那你永遠猜不到。原來他教的却是

附屬小學的六年級。以堂堂一校的教務主任，而擔任附小六年級的課程，誰也會感到奇怪的，可是他是接連的這樣擔任下去。我想：這或許是因為他歡喜研究兒童文學的緣故吧！

他後來就在神州女教員中找到了對象，他的眼力確不差。原來他的夫人是商務印書館大股東鮑某的女兒，那時在校裏擔任音樂教員。當時就有人說，他很可以與鄭振鐸先後媲美。因為鄭高結合在先，而高女士的父親，高夢旦先生，也是商務印書館的大股東。他們有着同樣身分和同樣地位的泰山，的確可以自豪，而且也有利的他們本身事業的發展的。

神州停辦後，他一直做復旦大學的教授，直到現在。

編者按：民國二十六年秋，以滬戰關係，謝六逸回返其故鄉——貴陽，除擔任「大廈大學」文學院課程外，并為中央日報主編副刊。

鄭振鐸與「版本」

孔尊

以前文人有一「愛書癖」的，真可說得嗜書若命。我們看了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她和她的丈夫往往不惜典質衣物以買書的情形，覺得天下的樂事，都爲她夫婦倆所佔盡，而決不是我們這班庸俗的人所能享受到的。

新文人中最歡喜搜藏舊書的，當推鄭振鐸和錢杏邨。但他們兩人所搜藏的，目的各各不同，恰似他們兩人代表着的兩種文人的身份。鄭振鐸因際遇較好，他過着的是知識的貴族生活，雖沒有大量的資產，但經濟來源尚易，所以他所藏的都爲宋元明珍本，錢杏邨呢，却又不然了，他既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助，而常常過着流亡的生活，他那有大量的資金來搜買古代珍本？所以他專注目在那些清末的書籍和什誌，用極低的代價，換到許多世人早已忘却了的珍本。因此，他對於晚清文學的發掘，却創了空前的成績。但他們有一相同所在，就是他們都歡喜別人所不注意的通俗文學，而共同替中國文學史增添了不少的新發現的材料。

本來，舊書店對於舊本的小說，彈詞、戲劇一類通俗文學書籍，是不當珍本看待的。所以在從前，在舊書店裏買一部木版小說，往往價錢比了新的鉛印本還要便宜。但自從經過鄭振鐸的專門搜求後，舊書店老闆也「居奇」起來，現在舊板通俗文學書籍的價值，有時反比經史詩文集爲高。

近來鄭振鐸也染上了一般舊藏書家的惡癖性，就是一遇罕本，不惜用重價買下後，便不肯再給人家看。因爲這樣，可使書價無形抬高。有一次某舊書店的老闆想影印一部明版的什麼戲曲，他知道這書海內別無第二本，連忙請老闆停止影印，他願用重價購下。從此，這部戲曲便失去了得到多數讀者的機會。

但他因此也上過大當，大約是去年吧，上海半齋出版社編印每月古書，其中有一部和國色天香，燕居筆記同性質的傳奇雜俎集，叫做秋夜月。這確是部從來連書名也沒有聽到過的明版書。他一聽到消息，馬上又去要求半齋主人，把這書停止出版，而把原書賣給他。誰知半齋主人本是不以他的壟斷珍本書籍爲然的，當面因爲情不可却，他又是書店的老主顧，不能隨便拒絕，果真把原書定了個重價賣給了他。但這時他早已把原書攝影完竣，過了一時，照常付印出版。鄭振鐸

立刻提出質問。半版主人答道：「這是我從新近又買進的本子影印的。難道秋夜月在當時刻成後只印得一部，一定沒有第二部會流傳下來嗎？」鄭振鐸只好啞然而返。

汪靜之寫「北老兒」

孔 尊

朱自清曾在『新文學大系』中的『詩集』的導言裏論到汪靜之的詩時說：『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他的新詩集『蕙的風』中，發表了幾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於性的苦悶，要想發抒而不敢發抒的呼聲，向舊社會道德投下了一顆猛烈無比的炸彈。當然難免的是會立即引起衛道先生們的反響，但新的思想界因此也引起了一文藝與道德』的討論。』

汪靜之是這樣地顯名於文壇的。後來他與潘漠華，馮雪峯，應修人三位同寓在西子湖邊，在春天同爲愛情而放情謳唱，出版了湖畔與春的歌集，同受『湖畔詩人』的雅號。後來他又從事於創作小說，全同他的詩歌一樣，內容也充滿着性愛的氣氛，把性的苦悶大胆地盡情發露，因此也博到無數的讀者，尤其是讀者中的青年人。

那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有一種綜合性的通俗雜誌叫做『一般』的，文章的確

篇篇都是不苟且之作。開明書店出版的書籍雜誌，向都以態度謹嚴出名，『一般』當然不在例外。但在某一期上，忽然登載了一篇汪靜之的「北老兒」，裏面寫的是杭州地方的有一個名婦，在某一年軍閥戰爭中遭到了一個北方兵士的強姦。起初她恐怖得了不得，後來因為感到了遠過於他自己的丈夫的性的滿足，便不但不抗拒，不但不驚怕，反自動地快樂地迎接上去。像這樣關於人性真實的暴露，如果發表者個人的小說集裏，那麼至多同他的『蕙的風』一樣，雖受譴責與反對，却絲毫無損於他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但『一般』是個通俗雜誌，是個供一般人讀的雜誌，問題便不由不發生了。接着便來了批評家的大肆攻訐，不久又來了當局的禁止，因此使開明書店受到了一筆意外地極大的損失。可是我們詩人的名，因此又重新在文壇上大大地廣播開來。

詩人成名時，年紀還很輕，便有人介紹他到湖南某大學去當教授。那時校中學生，震於詩人之名，在他約定到校的一天，特地爲他開了一個歡迎會，而且雇汽車到碼頭上去接候。大約是錯過了時間，汽車再也不見回來，而某大學却來了一個身穿青布袍的年青人，看來似乎比一般學生都年青的年青人，說是要見校長

。門房似理不理地叫他拿出名片來，幾個在門口等候他的學生無意地瞥見了他名片上的三個字，不覺爲之愕然，原來上面印著的就是：「汪靜之」三個大字。

許欽文與「無妻之累」

孔 尊

在一九三二年，文壇上發生了一件驚人大奇案，就是陶思瑾姪殺劉夢瑩，因此連累到許欽文吃冤枉官司。當劉被殺時，陶亦受傷暈去，等到許欽文回來知道了向官廳報告時，官廳因許不合容留年輕孤女在家，就也把他羈押入獄。等到陶受傷治愈，案件真相大明時，許已在獄中白關了多時。

陶思瑾和劉夢瑩爲什麼會住在許欽文的家裏呢？說來話長。大約十多年前，出版界正盛行一種法國式的毛邊書，如北新書局所印行的，幾乎完全是不切邊的。在其所出各書中，如魯迅的譯著，許欽文的小說，封面都印着從來少見的怪圖案，下面具名是「元慶」。這一元慶——就是陶思瑾的哥哥。他和許欽文是同鄉和同學，有着極深切的友誼。不幸元慶中年天逝，欽文爲了紀念亡友，特地集資在杭州西湖上建屋數間，專門陳列元慶的遺作，以冀垂久。思瑾既是元慶的妹妹，欽文也把她當做自己親妹妹相待。那時思瑾正在上海讀書，上海發生戰爭後，便

來杭州，寄寓在欽文家裏。

陶思瑾是個體格魁偉有着男子性情的女性，在上海某女校讀書與同學劉夢瑩非常莫逆。夢瑩是個嬌小可愛的林黛玉型女子，多情善感。兩人相識後，竟結成了牢不可分的同性愛侶，大家立誓不再嫁人，同生同死，比了兩性間的結合還要濃厚。這次思瑾避難到杭。她也借着避難之名，與思瑾同蒞，而且也就同居在欽文家裏。

慘案發生後，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官廳勘問欽文，欽文也始終莫名其妙。官廳在無可奈何他之下，又因有仇家在內中傷，於是借獨身無伴的男子，不合容留年輕少女在家爲名，控他以引誘未成年少女背棄尊親的罪名，向法院控訴。於是他不能不被羈獄中，聽候法院的偵查。當時有一最近情理的傳說，是陶思瑾忽與許欽文發生戀愛，劉夢瑩以其背約嚴責，數語不合，遂致動武。思瑾一時失手，將夢瑩擊斃，等到發覺，知道已惹了大禍，遂也暈絕過去。一說兩人同愛欽文，因彼此不能兩立，遂起爭執，思瑾力大，一時失手，遂致巨禍。但後者已爲法官因欽文一其貌不陋一而先告否決；最近於事實者大約還是前一說。

後來思瑾定罪，欽文被釋出獄，他在憤慨之餘，已在獄中寫成無妻之累及獄中雜記諸稿，陸續在語絲等刊物上發表。他出獄時，他的作品早已風行遐邇，沒有人不知道了。

關於「無妻之累」

陶亢德

「中華副刊」第六十二期上有篇孔尊君的「文壇逸話」，追記一九三二年文壇上的驚人大奇案——陶思瑾妬殺劉夢瑩——，文末說：「後來思瑾定罪，欽文被釋出獄，他在憤慨之餘，已在獄中寫成無妻之累及獄中雜記諸稿，陸續在語絲等刊物上發表。他出獄時，他的作品早已風行遐邇，沒有人不知道了。」這里孔尊君記錯了兩點，其一是無妻之累等作發表時語絲已經停刊，其二是他的記牢獄之災的作品如無妻之累還是在他出獄以後才發表的，風行遐邇更在以後。

無妻之累全文登在民國二十四，五年的宇宙風上。此刊創刊之初，曾函約許君撰稿，他寄來了一篇題為「獄中與弟婦論燒肉書」的文章。不久在一張小報上看到了一則記許君將寫一個長篇記述陶劉慘案及其本人獄中經過的文字，我就寫了一封快信給他，問他有沒有這回事，如有，請給宇宙風寫，沒有，也大可寫得，宇宙風一定發表。結果就寫成了「無妻之累」，共十章，前面有一篇序，後面

還有一篇「關於無妻之累」，是爲答復一個宇宙風讀者要求他「以與此案最有關係的地位，寫一篇關於這案主要人物性格及殺人動機的最公正的描寫」而寫的，後來印成單行本，封面用的陶元慶君遺作，銷路不壞，可惜出版不久，八一三戰起，到現在連紙型也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

民國二十七年我在廣州，約他寫稿，却寄來了一篇「萬里尋妻記」，敘他在八一三戰時從杭州赴嵗縣跟他夫人一同逃難的經過。這個爲無妻受累的人，原來已經有妻子，他的妻恐怕即在受無妻之累時就有了，無妻之累序原是一一九三五年秋寫於品兒的吵鬧中一的。但也許是受盡了無妻之累，感悟前非，出獄後趕快有妻的。

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家去杭州，曾往蓮花涼亭負債室訪問過他。彼此還是第一次相見，覷面不能識。我又素來不大帶名片，他又正在作午睡，千把度深的近視眼鏡放在桌上，一見我進去，就說是達夫吧。等我道了姓名，這才戴起眼鏡，和我握手，「分賓主坐下」。大家談得來，就「一見如故」。他以後寫信給我，就常用「亢兄德嫂」這個有趣的稱謂了。

南國社中的茶花女

孔 尊

田漢的創立南國社，正同劉海粟的創立上海美專一樣，在當時都受盡人們的攻訐，歷盡種種的苦難，幸虧都有著百折不撓的精神堅持下去，才能達到最後的成功。

但是南國社的創立，田漢却有一個很好的幫手和同志，就是他在第一次和郭沫若通信裏稱之爲「知己愛人」的他的表妹易漱瑜女士。易女士出身世家，父親易梅園是湖南的名士。當田漢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易女士便和他同學同居。他們倆的生活是很美滿很幸福的。

不幸後來易女士因病故世，成爲田漢的終身之恨。田漢的作品，一般人都批評他富於感傷的情調，大概就爲了這個緣故。易女士死後，田漢爲了紀念死者，並且繼承死者遺志，更加强南國社的組織，努力於新劇運動，又創南國藝術學院，自爲院長，以造就新劇人才。

南國社社員的生活，在那時的確可稱得極浪漫的，男女演員往往同室而睡，不以爲奇，有一次，到某地去演戲，幾遭當地警察局的驅逐，罪名就是爲了一男女混雜，有傷風化」。這就令人會想起劉海粟的上海美專，因雇用「不着褲子的姑娘」爲模特兒，而爲孫傳芳大帥下令通緝，真是五十步與百步。由此可見人類智識程度的距離，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後來，田漢在廣州無意中遇到一位姓白的交際之花。他回到上海後，忽然又接到了下面這樣的一封信：

「田先生，你接到了我的信，大概你會覺得奇怪，爲什麼我會寫信給你呢？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姓白，名娥，西湖人氏。我是剛出世不久的孩子，現在還不滿一歲咧，哈哈！

我來上海的宗旨，是想找一個仁慈的媽媽，田先生，我希望你能够很爽快的答覆我，說「好，我就做你的媽媽吧！」那麼，我真不知多麼暢快！今天已是二十七了，上船的期間快到了，你想一個孩子希望他媽媽的心多麼急切，可是夏天的日子又是多麼難挨啊！也許會是你女兒的白娥上。」

田漢初接這封信時，不免十分詫異，不知他那來這一個女兒？後來他又接到另一朋友徐君的信，才知她的來意，是專誠參加南國社的。這女人也够有勇氣，自從來上海後，竟一改她在「南國」時豪華奢侈的生活，一每天蓬着頭髮，穿着短衫大褲，赤着腳，拖着一雙廣東拖鞋，手裏挽着菜籃出門去買菜。「田漢看了十分感動，就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勉勵她，譽之爲茶花女，勸她爲着自己的光榮而奮鬥。她看了他的信，也大爲感動，立即極誠懇地也復了他一封長信。在那信裏，她很坦白地告訴了他過去的一切。這兩封信後來都成爲青年們最愛讀的作品，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白娥就是南國社的演員黃白英。不久以後，便和田漢同居。她本來是來找媽媽的，不料竟找到了丈夫，而且成了她最後的歸宿。所以她前半生的經歷確似茶花女，但後來的結果，却很不切用「茶花女」這一象徵的名字了。

孫毓棠與鳳子

野 丁

祇要稍爲留心一下中國近代詩壇的人，大概「孫毓棠」這名字或者不致於顯得太陌生吧！至於鳳子就是封禾子（真名封季壬），在中國女作家中，也算是相當著名的一個，當她於復旦大學畢業後，曾旅居日本演過「日出」。給予東京觀眾以深刻的印象，一致推爲具有天才的優秀演員。我所以將他們兩個人拉在一塊說，是因爲他們在過去有個時期，曾爲夫婦，不管他們舉行過婚禮與否，但同居已是事實。

說起孫毓棠，其成名也不過是近年來的事。照樣子，也不過三十左右，一張清癯微黃的臉，兩個顴骨像胡桃般地隆起，頭髮一直像稻草似地散亂著，看起來像永沒有好好地梳洗過，個子很高，但因此益發顯得瘦削，一襲不合稱的衣裳，上面有好幾處已沾滿了油污，褲管的直線也縐成一團，他走路迂緩，說話聲音很輕，老像懼怕着什麼似地，嘴角一天到晚都歪吊著一根煙蒂，頭總是低著，像似

沉思著什麼，他給人的最初印象是孱弱和靄，一個屬於詩人典型的人。

他最初是在南開讀書，後來轉入清華，讀的是歷史系，但刻板枯燥的歷史學並未曾影響他詩人的氣質，在學生時代就歡喜弄筆桿，還組織過詩社，學著中世紀的歐洲行吟詩人的風韻，唱出心靈之歌，他在同學中比較要好的有曹禺，教授中他似乎很歡喜那會以「死水」一書轟動文壇的老詩人聞一多，他的作詩或許就是受了聞一多的啓發。

孫毓棠寫詩的態度可說是一種美感的激動，在他的詩裏，你所能嗅出的，是一種柔和與清逸之氣，那美麗動人的詞藻，確會給予讀者不少暫時的溫馨與快感，但不可否認的，他究竟離開羣衆太遠了。在他的詩裏，尋不出忿怒，也尋不出醜惡與貧窮，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自然會有機會接觸現實，但他担心現實陰暗的影子會破壞他詩人心靈的和平，也許他正是一個經不起現實殘忍襲擊的人所以才去設法躲避，爲著要歌頌那崇高之美，所以他竭力表現一種飄逸清高的樣子，但透過那動人的文筆我們也能體驗得出作者濃厚的憂鬱，一種對現實不滿及追求美夢的幻滅之悲哀。近年來，他一直住在昆明，因爲他是研究歷史的，所以也教

起歷史來，起初在雲大任教後至聯大，他這一階段中也寫下不少之詩與創作，大都刊登於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及「今日評論」上，此外他還經常為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撰稿。某次他提出『純詩歌』之口號：他說，詩歌在最崇高的文藝，一切醜惡的描寫都將破壞它『純真之美』一個詩人應當為詩歌而作詩，自他此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全國詩壇之騷動，他首先遭到極其難堪無情的痛擊，那時一般前進詩人如穆木天蒲風等，都斥他為時代的落伍者，說他是新式風花雪月派，一切最難聽卑鄙的字眼，都加到他身上，因此他便接受了『桂冠詩人』的雅銜。

鳳子這名字是封季壬女士演戲時用的，他寫作的署名則是封禾子，（禾子兩字，是由季字上下分離而成）以前在『婦女生活』『文藝月刊』等雜誌上，時有創作發表，她的文字，清逸雋永，略帶憂鬱氣，在當時的女作家羣中，她算是比較有希望的。事變後，她的興趣似乎轉移到話劇上，她從前本是復旦劇社的基本演員，入桂後，在桂林一國防劇社一混過一陣，當時的合作者有歐陽予倩等。隨後她就去昆明，她與孫毓棠同居也是在這期間的事。關於他們倆如何愛起？如何因彼此結合而同居？這在外人都一直是個謎。在山城，憑著她的一副靈活交際手

腕，她開始給山城市民以強烈之印象，她是個中等身材，有著一雙大眼睛的女人，她的臉蛋相當美麗，那濃黑的眉毛及微圓的嘴唇都給人以誘惑，她說話軟抑，北京話講得十分流利，音調有一股媚勁，所以動人。她在昆明第一次露臉，是加入「聯大劇社」以後的事。『祖國』一劇，使她在沉寂的西南話劇中，奠下堅固的地基。當時這齣戲的導演是陳銓，舞台監督就是孫毓棠，至於全部舞台設計則是出自老詩人聞一多之手筆，這齣戲連演半月之久。以後昆明之話劇壇所以能呈現相當蓬勃氣概，我們也可以說是以此為嚆矢的。半年後，昆明為著慶祝戲劇節，特請曹禺乘機來昆明，演出相當盛大，所有留在昆明的話劇人員，均全部動員。『原野』一劇，由曹禺親自導演。鳳子飾金子，孫毓棠也加入客串，飾老頭子，演來維妙維肖，他那副勁勁，做來一絲不過火，為觀眾讚譽不止，他們這次夫婦合作，也可算應做「夫婦隨」吧。

封禾子隨演戲外，也不時動動筆桿，她曾一度做過『平明』副刊的編輯，因為靠著她外子的協助及她本人手段，一時作家為此刊撰文者極眾，當時昆明報紙雖有五六種，但副刊方面則得推『中央日報』一家最整齊，也最得學界擁護，她

本人的創作也散見各雜誌期刊上，『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也經常有她短小的『案頭小品』出現。

她同孫毓棠同居，最初生活很圓滿，他們的住處是山城圓通路一所精緻舊式房子，佈置得很美觀，他們也不時挽著肩去靜謐的翠湖畔踱上一陣子，誰個看見了能不羨慕地讚一句：「多麼美滿的一對啊！」但他們在氣質上，彼此有著顯然的距離，鳳子是個好動的女人，日子短一點，也許還沒什麼，可是時候一長，就不免是美滿生活的致命傷，果然不久鳳子對於眼前的生活覺得厭倦了，他需要去那兒換一換空氣，頭一天她在自己所編的副刊上寫過一篇「飛」的短文，她嫌山城的空氣太沉悶，要飛得遠遠地，她要去尋找一個理想的英雄，第二天她果真悄悄地乘飛機走了。她飛重慶，自然那兒有不少人在熱誠地歡迎她，有人說她所崇拜的理想英雄就是曹禺，這也不過一般人說說而已，不過真實地，她確離開了孫毓棠，她到重慶後，不久就加入中電製片廠，接著開始拍攝「白雲故鄉」。於是鳳子便由話劇演員一變而為明星了。

失去鳳子的孫毓棠，心靈是極端的苦痛，那時他連詩也不寫了，有人說：「

詩人的歌喉啞了」，真的自此以後，我確不會再見到他有任何創作詩篇，祇還是去年初頭回到上海後，在新出的西洋文學雜誌上，看到一兩篇他的譯作，於是一幅詩人經過刺激後憔悴的面龐又輾而輾地在我眼前浮上來了。

顧頡剛與古史

余拯

顧頡剛是以其「古史辨」一書成名的。這書是他和他的老師胡適，錢玄同等通訊稿合之而成，嚴格說來，并非是他本人所作的，不過他博學好問的精神，則很有可取之處。

他對於國學，頗有研究的苦心，當時他除了研究古史的真偽外，同時還大規模地計劃整理周秦漢各代的古書，將這些古書切實而慎重地下一番標點，索引，和注釋。總名為『周秦漢古書彙刊』。

我們知道，在周秦漢古書中，有中國學術上最可寶貴的密藏，這些古書，到現在有幾千年了，而且又因為古今語言文字的不同，所以研究的人往往所發掘出來的寶藏換不回打破文字障礙的艱辛，這實在是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原故。假使把各人研究的經驗積集成為大眾的經驗，使讀古書的人誰都可以享用其中的寶藏，而不必費研究的艱辛，這是何等偉大的功績！

自提倡整理國故以來，爲時不可謂不久，但我們却沒有見到什麼著名的研究產生。蓋國故的整理，是件浩大的工作，決不是一二人所能爲，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就以前研究國故的人來說，所發表的都是見仁見智的成績，誰都不願做造橋修路方便來人，像標點，索引，注釋等可以使人直接讀古書的笨功夫。而這笨功夫之難千百倍於見仁見智的成績，因爲後者儘管有深淺左右的不同，發表的是研究者自己的見解，簡單可以說是自私，若標點注釋的功夫，則大大的不同了，一方面錯了，便坑陷了古人，另一方面則貽誤了讀者，所以這一翻工作，是需要對國故有精深研究的學者來做，才能達到完善之境。

顧氏不惜下了一番功夫來整理國故，這是值得我們稱許的。周秦漢古書彙刊包括「史記」，「山海經」，「竹書紀年」，和疑古玄同先生標點的「新學僞經考」；將「史記」的本書分爲甲部，「新學僞經考」等研究周秦漢古書之重要典分爲乙部。這彙刊一出，信屈傲牙的古書，大眾可以和專家一般的享受了。

馮淑蘭與陸侃如

孔尊

在夫婦作家中，馮淑蘭與陸侃如是最很够稱得上一對兒的，此外怕也只有王禮錫與陸晶清。馮陸除共著『中國文學史簡編』（大江百科文庫之一）外，陸侃如著有『中國詩史』上冊與中冊，馮淑蘭却替他續成下冊，後來兩人又合著『南戲拾遺』，對於戲曲方面，尤多特殊的貢獻。王陸却合編『物觀文學史叢稿』，王禮錫寫過『李長吉評傳』，陸晶清却寫了本『唐代女詩人』。這四位，除去陸侃如，却又都是文藝創作家。

馮淑蘭老早就用淦女士的筆名，在『創造週刊』上發表許多短篇小說，其中『旅行』和『隔絕』等篇，大胆地暴露出一般女性所不敢寫的女性的毫無隱飾的戀愛，很引起當時衛道先生們的反感。『旅行』中寫她同她的戀人出去旅行，而那次同居時的情形和她自己心理的轉移，真可稱得妙入細微，但令人讀了却絲毫不致引起猥褻的感念。現在把她所寫第一夜同居的一段抄錄在下面：

「這是很自然的，彼此都有些害羞，兩個青年男女初次住在一起的時候。我所希奇的就是，我們既經相愛到這樣程度，還是未能免俗。當他把兩條被子鋪成兩條被窩，催我休息的時候，不知爲什麼那樣害怕，那樣害羞，那樣傷心，低着頭在床沿上是足足坐了一刻多鐘。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贖最裏面的一層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說，「這一層我可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聖尊嚴的監督似的，同個教徒祈禱上帝降神給他一樣極虔敬的離開我，遠遠的站着。我不用說，也是受著同樣的感動——我相信我們這種感動是最高靈魂的表現，同時也是純潔的愛情的表現，這是有心房的顫動和滴在襟上的熱淚可以作證據的。他把我抱在他懷裏的時候，我週身的血脈都同沸了一樣，種種問題在我腦海中彼起此伏的亂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況，別人知道了這回事要怎樣批評，我的母親聽見了這批評怎樣的傷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但另一方面我好像獨立在黑洞洞的廣漠之野，除了他外沒有第二個人來保護我，因而對於他的擁抱，也沒有拒絕的勇氣。到底此時他發生了些什麼感想，他也不曾告訴我。但依據我的感想，他至少也要同Tagore所做的尊嚴之夜裏的主角「我」

所謂此時此際Surabala脫離了世界而來到「我」這裏了。」（文見卷施）

你看，在她以前，有過那一個女性，敢這樣地大胆地盡情暴露的嗎。她的隔絕和隔絕以後，則寫她被她家庭禁錮時的苦悶，及不屈服的心情，終於從隔絕中脫逃出來，重走入她戀人的懷抱中。這大概都是她自己親身經歷的寫照。但不知她的戀人，是否就是後來同她在上海結婚而至今相守著的陸侃如「先生」？

有一次，不知兩人中那一位到安徽大學去任教授，另一位却仍留在上海。在睽隔得這樣遙遠的時期裏，大家爲預防發生意外起見，尤其在男的方面，在信裏常常是信誓旦旦的。有一次，陸侃如在信中寫了一句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隱語，是：「兔永在籠中」。不料這信爲軍事當局所檢得，以爲這是什麼黨人的暗號，就派人傳寫信的人去問。一經他解釋明白，當然無罪釋放。但這「兔永在籠中」一語，却已轟傳遐邇，成爲文壇上不朽的佳話了。

錢杏邨亡命著書

孔 尊

錢杏邨是現代作家中最平民化的一個，他對於文藝的見解，始終一貫，單是這一點，是值得一般人欽慕的。

他起自創造社，最初他和周毓英，葉靈鳳等的地位相同，後來自創太陽社主辦太陽月刊，寫了許多「革命文學」的作品，於是便在文壇上大露頭角，與蔣光慈齊名一時了。

但他雖然獲得了許多讀者，却引起了政治當局的注意；在好幾次破警告後，他的真姓名漸至不能在作品題目下署出。但他是一位窮作家，不寫作便無從生活，於是只好換了姓名發表作品。有一時期，他編了許多供給青年學習寫作用的理論與方法的書，都用錢謙吾這一姓名出版。後來又用張若英，魏如晦等姓名編過許多東西，弄到連本姓也改去了。但是他對於某類著作，必用定某一筆名，也完全是隨便的。比如張若英一筆名，往往用於編纂的書籍，魏如晦則專用於創作

劇本。另有阿英一名，却用之於考據和研究的文字。偶然也有例外，但這也沒有固定的必要。

約在六七年前，那時上海所謂左翼作家都遭到當時的政府通緝。錢杏邨也不能例外。其時有幾個比較有見識的當局，却用招撫的方法，挽人勸告他們改變宗旨，同爲貫徹三民主義而努力；當時如顧鳳城等就因這樣而一躍爲上海市社會局編譯室副主任。至於正主任的位置，却虛左以待另一位極希望他也來「歸化」的作家。這位作家就是錢杏邨。當局挽人勸他說，只要他肯答應就這個職務，就是不到局工作也不妨，並且每月送他薪水三百元（那時三百元薪水已算很高級）。但他還是不答應。

後來通緝令益急，但那時的租界全是英美人的勢力，一受他們的包庇，中國當局便無法可施，所以錢杏邨那時還得在旅館中插足。他那時正在替良友圖書公司編新文學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還沒有編好，中途逃亡，便將已成原稿散失。但他爲了責任起見，一面逃亡，一面繼續搜輯，在千辛萬苦，困難重重中，到底仍將散失了的稿子編好。當時新文學大系係分冊出版的，其他各冊都在民國

二十四年出版，獨有他這一冊却遲之又遲，直到明年才和讀者相見，就爲了這緣故。可是這却爲難了書局方面，一面受盡預約本書者的催促和譴責，一面却不能把這原因公開，惟有吞聲忍受而已。

直到「七七」事變發生，政府解除黨禁，以各黨各派合作相號召，錢杏卹才得恢復自由。從此他便改用魏如晦一筆名，寫了許多民族歷史劇本，風靡一時。後來他因看到話劇大可發展，不願僅僅在劇社老闆手中拿到上演稅就滿足，於是自己也來組織劇團，自己做老闆來演自己編的戲。自去年一二·八一變動後，他便離開上海，重新走上他流亡之途。

劉大杰寄情春波樓

孔 尊

在湖南系的許多新作家中，劉大杰和胡雲翼都以溫和派著名。這當然和他們的生活與際遇有莫大的關係，因為他們全和葉紹鈞一樣，都是吃粉筆飯出身的。

可是關於胡雲翼，從來沒有聽人講起過，或者在書報上看到過，有什麼關於他的浪漫故事；至於劉大杰，雖然他的夫人李輝羣也是位智識的新女性，可是在他所作的春波樓詩詞中，却使我們看出了，除了他自己的夫人之外，一定還有着另外的戀愛對象。

他的另外的戀愛的對象是誰？在春波樓詩中有遊南通寄蕙君一律云：

細柳新條看不休，風光明媚到通州。雙鷗有意添離恨，孤客無心訪舊遊。日暮城空人不在，情深酒冷水東流。申江相憶天涯遠，欲寄魚箋無限愁。

這裏，蕙君雖似是一位女性，但是照詩中的語意看來，也不過是普通的友誼，毫沒有戀愛跡象可尋。他另有綺懷七絕二十六首，那麼首首都寫的是他的餘情

殘戀，寄寓着無限的輕憐密愛，全是超出於友情之上的兩性隔絕後的追憶，我們只要讀了下面幾首：

年時曾認識君初，裊裊婷婷二十餘。幾闕新詞驚絕艷，可憐從此病相如。

（其一）

絲絲煙柳夕陽天，樹下橋頭憶往年。願把長江齊作淚，行行流得到君前。

（其三）

秋水明眸柳樣眉，鬆鬆雲鬢半低垂。當年不識落花恨，幾度橋頭唱我詞。

（其十）

相逢一笑太匆匆，幾度愁心托斷鴻。今日高樓休獨倚，梵王渡口夕陽紅。

（其十八）

征衣落落不勝寒，舊事真如夢一般。爲問天邊今夜月，伊人曾也倚欄干？

（其二十四）

不是便好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嗎？此外如無題七絕七首中的——

滿眼離愁不舉觴，曉風殘月總淒涼。勸君休唱陽關曲，一字傷心一斷腸。

(其一)

黃花不減昔年姿，別後纏綿懶賦詩。我有深情君有淚，從今日日是相思。

(其三)

葉落花殘怕舉杯，秋來無意上樓台。誰知一別無消息，腸斷江南百事哀。

(其五)

飄零江海一扁舟，今夜何從問驛郵。月自團圓花自落，此生紅淚爲君流。

(其七)

也是因思念他的隔絕了的戀人而發出的呼聲，也寄寓着無限的深情。但這些詩我們却無從考查出他真實的對象，大概也同李義山的無題與錦瑟一樣，必須留待着千百年後的人再來考證才能考出吧。

在春波樓詞中，尤多這一類的作品，現在只能選錄臨江仙一首爲代表。

舊恨新愁千萬疊，春來心事模糊。年時曾記識君初。偷流千點淚，珍重一封書。

昔日謝橋曾夢到，而今好夢全無。憑欄猶自計征途。多情懷杜牧，冷雨病相如。

這首詞顯然也是爲憶念他的天各一方的情侶而作。

黃廬隱迷戀小丈夫

孔 尊

黃廬隱是女作家之一，她與冰心同時出現於新文壇上。她在女作家羣中的地位，正如男作家中的葉紹鈞，作品都以老鍊著名。

她開始寫作的時候，也同冰心一樣，還在北平讀書。那時社會主義者郭夢良在北平組織「奮鬥社」出版「奮鬥」刊物，竭力宣傳無政府主義。不知以何因緣，兩人有了會見的機會，廬隱遂對他生了愛意。不過那時她雖然「羅敷未嫁」，可是郭夢良已經「使君有婦」，這却有些爲難。但這是正在新思想初入人心的時代，他像洪水猛獸一樣，一經染傳，無不如風魔了一般。廬隱遂不顧一切，與郭夢良結婚。那時的法律還沒訂立重婚罪，所以雖也引起社會攻訐，但倒不是犯法的。

我要在這裏借此說說當時一般青年對於父母代定婚姻的態度。不用說，這時正是青年們初脫禮教枷鎖的時代，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謂的婚姻，無

論對方滿意與否，他們都是不願承認而要求解約的。但這裏面有一難題：便是多數的女性却還不願接受男方這樣的要求。不但已結婚的寧死不願承認與接受；便是已訂婚的而想解除也須大費周折，但青年們是不顧一切，非達目的不休的。於是在那時風行了一個折衷辦法。就是女的以男的妻的名義居在家裏，而允許男的另找相當的對象同居在外面。那時如鄭振鐸，郁達夫等，都是用這方法來解決他們不願承認的婚姻。廬隱與郭夢良也採取了這當時流行的辦法。

可是不幸得很，當郭夢良南來上海當中國公學的教授時，突然病故，她的傷感當然不說也知。後來她到清華大學去任事，忽然遇見了學生李唯健。她的久已靜止了的愛情，不由地「古井重波」起來。但她這時已經是個中年的寡婦，而李唯健還是個青年的學生。在任何人看來，這樣的結合多少有些兒不相稱的。況且中國的舊習慣，夫婦的年齡如有相差，往往是男長於女，那麼至多四五歲，不大有十歲以外的，否則便會引起社會的反感，認為是不正當的結合，而不肯予以同情。但廬隱終究不是一位尋常的女性，她竟不顧一切，與這位年齡幾乎小於她一倍的「小丈夫」宣布結婚了。

雖然「小丈夫」之名成爲文壇上的話柄，但他倆的生活却過得十分幸福，而且接連又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這是廬隱一生最幸福的時代。但在當她第×個愛情結晶成熟而出產時，忽然因產後不慎致疾，在她沒有離開醫院時，遂和她一刻不能分離的「小丈夫」作了永久的離別。

初期及第二期的女作家都是有自己的靈魂的，廬隱是其中有名的一個。此後的女作家，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她們的生活和作品都已缺少勇氣和自己的靈魂，所以文壇上便少獨樹一幟的女作家了。

謝冰瑩與顧鳳城

孔尊

謝冰瑩與謝冰心或謝婉瑩（冰心的學名）從姓名上看來，好像她們是親姊妹，或者至少是堂姊妹。可是冰瑩是湖南人，冰心是福建人，他們一在天涯，一居海角。

但她倆的個性恰相反，冰心是貴族的智識女性，冰瑩則是平民化的女性，湖南本是全中國最出平民人才的地方，以女作家而論，如丁玲，白薇等，都是生在湖南。當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湖南的健兒都加入了前線，建立了許多血的功勳，冰瑩也在這時投身軍隊爲女兵。她偶然地寫了一篇從軍日記，在刊物上發表，便得到了林語堂的拔識，於是引起文壇上的注意。林語堂又把從軍日記譯成英文，替她大大地宣傳，她從此一躍而成爲中外馳名的女作家了。

國民革命成功後，她退居上海。以新女作家的身份，在社會上出現，到處受人歡迎。當時「南社」的柳亞子恰巧也寓居在上海，他本來是位革命先進，對於

這個女孩子不禁也起了相當欽佩和憐愛，不但作文揄揚，而且也時常加以物質的援助。冰瑩這時以孤零之身，遠來客地，有此照顧，其樂可知。於是小鳥依人，時與亞子逗留在一處，白髮紅顏，相映成趣，像是嫡親父女。

那時顧鳳城在光華書局編「讀書月刊」，還沒有聲望。恰巧柳亞子和高爾柏等所辦的中學生書局，附設在光華書局裏面，以是因緣，也得與冰瑩時時相見。顧鳳城是個略帶女性態度的美男子，在「同性相拒，異性相吸」的物理原則之下，不禁引起了具有男性性格的冰瑩的愛戀。於是顧鳳城乘機進攻，柳亞子也從中撮合，兩人遂宣佈戀愛成功，定了日子結婚。

這時候，冰瑩曾寫過一篇關於他倆戀愛生活的小說，寫得十分肉麻，他把顧鳳城當做他的小鳥兒看待。一切的描寫，猶之普通男性作家寫他所戀的女性，處處在於被動被愛的地位。她是不愧是位女性中心的作家，後來不知是她玩弄顧鳳城得厭了呢？還是顧鳳城不願常受她的玩弄，遂宣告離了婚。

冰瑩和顧鳳城離婚後，便到福建去，重新投入軍伍。她在那邊不久便又找到了愛她又是她所愛的人，而且也正式結了婚。那時上海的文壇上還不時傳播着她

的消息。「八一三」後，顧鳳城別娶王女土，冰瑩據說又已和她第二丈夫脫離，而隻身奔到陝北去。這一個本來十分天真的湖南女兒，在歷經滄桑之後，不知她還有當年的豪邁否？近已多年沒有消息，又不知她是否已另外找到了歸宿？這是一班關心她的人都很懷念着的。

鍾敬文自願入獄

孔 尊

佛教徒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鍾敬文的自願入獄，雖也是有與佛教徒同樣的犧牲精神，不過動機與作用却是截然不同的。

大概是十年前吧，上海四馬路上曾有過一片「青年書局」。跑進裏面去看看，全都是從前「北新書局」所出版的書。於是大眾都知道他就是北新書局的替身。但過了幾年，「青年書局」忽又不見，北新書局却又在四馬路上復活。「北新書局」爲什麼要這樣的變化呢？原來却有它的原因在。

「北新書局」的前身，本是北京「新潮社」，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佔着首要的地位。後來改組爲「北新」後，總發行所遷到上海，專門出版教科用書。那時他們正集中於編印兒童補充教材，出版了數百冊的小朋友叢書及其他。誰知岔子就出在這小朋友叢書內。忘記了是那一位寫的，有一冊叫做「小豬八戒」的童話，裏面忽然講到回教徒不吃豬肉的原因，無意中說了許多使回教徒看了

不高興的話。那時政府正在力謀全國民族大團結，回教徒遂將此事擴大，認為這是對於整個回教的大侮辱，向政府提出嚴懲書局的要求。政府恐怕要引起民族間的仇恨，就下令將北新書局封閉。北新書局的禍是無心闖下的，政府未嘗不知，可是愛莫能助。後來北新書局再三陳請，才許啓封，換了照牌復業。

回教徒在得勝後，於是遂專注意於出版方面。舊小說中有一部「年羹堯平西」，其中本來也有不少侮辱回教的話，可是從未引人注意。這次他們在天津找得了廣益書局的標點本，遂又向廣益大興問罪之師。廣益是專印標點小說，「年羹堯平西」是舊有小說，廣益當然不負什麼責任。但當局也爲融和民族感情起見，除了任書店被擊毀外，還叫他們登報道歉，銷毀成書了結。

現在快要說到本題了。在南方的浙江，有一本民俗學的誌雜上，忽然給他們找到了一篇鍾敬文的文章，其中也有侮辱回教徒的話。他們就提出來向地方政府交涉。鍾敬文那時大概在教育廳任職，得到了這消息：知道這事多麼使政府爲難，便慷慨自言，願受禁錮以贖罪。政府極諒解他的好意，便准如所請，鍾敬文遂被捕下獄。他這次當然是極受優待的，所以他在獄中仍能照樣著書，對於肉體精

神兩無所損，僅僅失掉了多時的自由而已。

中國本是一個與人不同的國家，後來又有教育廳的祕書易家鉞，寫了一本閒話揚州，據說因爲其中有了對揚州人的不恭敬語，於是也激動公憤，向省府遞狀請求嚴懲。結果，易家鉞免職，原書全部銷燬，出版者中華書局因此蒙受了極大損失。這也是小豬八戒一案的餘波。

鍾敬文在獄中過了相當時日，也就放了出來。

茅盾的小舅子——孔另境

芍生

孔另境，是茅盾（沈雁冰）的小舅子，而私淑魯迅先生的。他是浙江桐鄉鎮地方人，當于右任先生創辦上海大學時，他是該校中國文學系學生之一。

我說他私淑魯迅先生，是爲了他筆底下寫出來的東西，篇篇都在學着魯迅味，辛辣，爽利，而且簡潔有致；他的筆名有時是「另境」，有時是「東方曠」，而後一個筆名，曾鬧過有趣的筆戰。當魯迅翁逝世後不久，「東方曠」不知寫了一篇什麼文章，引起了「阿英」等人含有猜疑性的文字，以爲那篇文字是茅盾寫的，「東方曠」就是茅盾化名：阿英所作的一首詩中有「魯翁一死東方白」之句。他也不慌不忙地，向別人大施進攻，他的筆端攻勢很銳利，而且運用奇妙戰術，使別人始終摸不清「東方曠」究竟是誰。所有那些筆戰文字，後來都收在他個人的單行小本子「秋窗集」中。

他雖說是私淑魯迅的，但魯迅對於所有文學部門裏的東西，如小說，詩，戲

剝，散文和雜文等，統統來得，而他則除雜文一道外，其他都不行。

他有一點與普通人不同的脾氣，那就是他不啖四足獸如牛、羊、豬等的肉食；他平時輩的東西方面吃的是禽介類如雞、鴨和魚蝦之類。蟹尤其愛吃，而且吃得異常精細。他因爲不啖四足獸的肉食，所以他每別遇人邀宴，必定把他的一雙銳眼，將宴席上有的菜看看個仔細；免得吃錯了。但是，牛奶和豬油他還是要吃的。他這種怪脾氣，別人都弄不清楚，因爲他既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又不是其他教的信徒；他的所以不啖四足獸的肉食，在他另一本單行小本子（名詞已忘）中曾有一段文字說起過，似乎是由於他幼年時逐漸養成的習慣使然；至於由怎樣原因養成他這種習慣，他並沒有說明。

他也和其他文人一樣，愛抽捲煙，他什麼牌子的煙都吸，不管它是高貴的，或是蹩腳的。他也愛叉馬將，空下來就要邀他的知友到家裏叉起馬將來。

他今年約三十八歲，在四年總理誕辰紀念日在上海娶了一個鄞縣籍的女子爲妻，年紀很輕，而且漫亮；當時替他倆做證婚人的，就是英語專家周越然先生。他倆婚後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建嬰」，似乎是有些在學魯迅，因爲魯迅翁與

京宋女士的愛情結晶品也叫做「海嬰」呢！

他除了寫文章以外，還獨資創辦了一所戲劇學校，造就了許多劇壇人才，像電影女演員上官雲珠和上藝劇團演員馮羣，金陵等，都是他一手培植出來的。但他對於戲劇本是門外漢，以戲劇的門外漢而辦戲劇學校，當然大家都要嘆為「奇蹟」的！去年事變後，他的學校停辦了，他也於去年年底帶了嬌妻稚兒遠赴他處從事經營商業去了。

章衣萍談編輯心理

孔尊

以情書一束蜚譽文壇的章衣萍，他後來曾經到過上海，做國立暨南大學的祕書兼教授，所以一提起他的名字，一定不會人人都覺得十分生疏。

情書一束初出版時，曾轟動一時，北方有許多中學竟用作國文教材，與紅樓夢同樣看重。因此，他的歡喜偷摸女人屁股（書中所寫），戀態性慾，也鬧得幾乎無人不知，成爲文壇上千秋罕有的桃色佳話。後來他又有情書一束二集出版，可是便沒有像第一集那樣惹人注意。

當劉半農榮任北平『世界日報』副刊編輯的時候，向他索稿，他回復劉氏一信，大發其稿投者常常受到而沒有人會這樣大發過的牢騷，把一個刊物編輯者的心理，揭發得如照愛克司光鏡一樣。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不妨錄一段下來大家共賞：

普通掛着「歡迎投稿」的招牌的雜誌或副刊，可依編輯先生的心理，而把投

稿者分爲四等。第一等可稱之曰「元老投稿者」，這些投稿者在社會上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無論東西是好是壞，是鳳毛是狗屁，但在文壇上總有了一個位置。他們的稿子是一寄來就登載，題目是大號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欄。第二等可稱之曰「親屬投稿者」，這裏面包括的是編輯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愛人，他們或她們是與編輯者有切膚的關係的，他們或她們的稿子當然也不會攔下，理當提前登載，以示親熱。第三等可稱之曰「投機投稿者」，他們或她們是懂得編輯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紅信封或綠信封，而且稿紙上也不妨洒幾滴香水，或者是信封裏還夾着一兩朵鮮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有了什麼女子大學和女子師範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個鮮艷婀娜的別號。於是編輯先生，軟坐沙發椅上，掀鬚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節所說，全有事可以證明，先生若不見信，不妨打個十萬火急的專電給孫伏老問個明白，小弟是從來不會說謊的。）第四等是「無名投稿者」，「無名」却並不是沒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會上尙無人知，故稱之曰「無名」。此輩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學生，窮困青年，他們創作心熱，發

表心健，稿子揮筆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現在要呼冤的，就是爲了這一等人。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會上的虐待，不是活該嗎？普通投稿者對於第四等投稿，以我所知，也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南方的鄭振鐸式」一種是「北方的孫伏園式」。——對不起，現在姑且請他們兩個做了代表。鄭振鐸式的辦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來堆起來，捆起來捆起來，在上面批上「不用一兩個大字，於是一切都完了。孫伏園式的法辦，倒還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總得看一遍，遇着以爲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一兩個紅字，不用的便批上一不用一兩個紅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所以記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又擱了下去也許一擱永無消息。……

像這樣痛快的把過去編輯先生的心理及其手段在文字上發洩，可以算得是「前無創始後無來繼」的。但這些已是過去了的事，我們希望現在和將來，都不再會有這同樣的事。

向培良與邵惟

緒 聲

誰若以中國話劇運動的主備者爲問，幾無一不以田漢，應繼之以洪深，熊佛西，歐陽予倩……諸人。但是，帶住，向培良和邵惟也是兩個不可健忘的功臣；尤其是後者，這位默默無聞的藝人，他爲中國話劇運動播撒了有益的種子，雖然沒有一但知耕耘，不問收穫，那種近乎消極的態度，而他以戲劇工作的一螺一釘自任，作本位的努力。

向培良是一位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劇作者，「狂飈運動」是最好的證明，同過致力的有柯仲平，高长虹等人。他在北平多年，與魯迅先生過從甚密。嗣因不耐故都的沉悶，咒之爲「古老的虛偽的大城」，於是提棍而去，前往河南辦報，講學。「狂飈運動」只成了他個人「響亮的戰叫」。一九三二年携眷來滬，蟄居江灣，除主編「青春月刊」外，復組織「紫歌戲隊」，公演的劇本，有「黑暗中的紅光」，「從人間來」及邵惟的「尋水」，演後且作遠征廈門。

培良於主編「青春月刊」時，曾發表「人類的藝術」一文，與提倡狂飈運動的主張及精神，一以貫之。「一二八」後，轉赴內地，率領「怒潮劇團」作旅行公演，已不復當年的豪邁氣概了。

邵惟亦係一無政府主義劇作者，經歷不詳，且不知爲何地人。除「尋水」外，似少他作。但邵之長不在劇作而在演技。一九三二年蟄居江灣，與培良同爲勞動大學及立達學園學生劇團的導演。公演的劇本有「白茶」「黑暗中的紅光」「從人間來」「嬰兒殺戮」「檻之中」……等。某晚，邵惟一時興至，強挾培良粉墨登場，合演柴霍甫之某劇，邵惟憑其豐富的舞台經驗，竟應付裕如，不類臨時登場者，而培良雖係配角，而一再漏詞，狀極狼狽，事後查詢，始知此劇爲邵惟所譯，而培良僅代過目，略加潤色。附記在此，也算是中國話劇外史上的一段佳話。

記常白和沈洛

路易士

常白和沈洛二詩人，皆鎮江籍，和我相識已有數年，我們的友誼始自何年何月，確實的日期記不起了，大約總在一九三五年光景。彼時，我住揚州。鎮揚一江之隔，交通便利，以是我們時有謀面晤談的機會。「詩誌」（我主編的）和「新詩」（戴望舒主編的）兩詩刊上，曾發表了有他們的作品不少。他們的作風各有其可愛處。他們二人的交誼亦甚深厚。常白有一訪沈洛一詩，寫得很好。

事變後，沈洛會來上海一次，宿於我家，盤桓數日，又回鎮江去了。現在他在廣州，前幾天有信來。至於常白的消息，則至今依然杳不可知。我很懷念他。

下面的信，其一是摘自我復沈洛函的最後一段，另一便是寫給常白的無法投遞的信。不知他能看到否？

致常白

每當我曳着兩條沈重的腿，疲憊地回到我的棲所時，我首先凝視一下的，便

是那懸在壁上的，幾年前你爲我書了的橫幅，「雖有大難不廢吟哦」八個字，還有你爲我刻的印章，我也時常從書桌的抽屜拿出來仔細玩味的。

現在我手邊沒有你的作品在，但「白木窗」，「白板門」等這一類的字彙，却常留在我的記憶裏。記得你在有一首題目好像是「別古屋」的詩中，會用到它們。那朽壞了的白木窗，你稱它是多年的老伴，而當你遷入新屋後，你又愁恐着將再無一白板門爲你遮斷路人的眼目了。你淒涼地表現了一種人苦悶，一種生命的坎坷，在你的詩裏。

我對你的作品及你的爲人的第一印象是有老杜風。這個印象，至今尤深。哦，常白，你是在何方？

致沈洛

你存我處的稿本，惜已因戰亂關係在港失落！這個，我太對不起朋友了。但也沒有辦法。除了你的，還有鵬外鵬在其離港時託付於我的全部原稿，以及常白和李白鳳的一部份作品，也遭了同樣的命運。真是恨事！但記得青山在，你是仍

不愁寫不出更好的東西來的。死了，那就什麼都完結了。但你依然活着，和我一樣。望你不要因此灰心。

我常在你的作品中嗅到一種魅人的泥土香。我喜歡你那單純的，素朴的農民氣質。你很可以成爲一純粹的農民詩人，如果你老是住在鄉下，和驢子，黃土路爲伍的話。可惜生活使你東奔西走，損害了你的詩心！

文藝社團史料

原书空白

新青年社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由第二卷起，始改用「新青年」。爲新文學運動時之發難刊物。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陳獨秀（仲甫）主編，由上海羣益書局發行。每月一期，每半年爲一卷。一九二一年十月，「新青年社」解散，由十卷一期起，改爲政治性的季刊，仍由陳獨秀主編，不數期，即告停刊。

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成立編輯委員會，委員共六人，爲陳獨秀，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錢玄同，高一涵。自六卷一期起（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由以上各委員輪流編輯，每人負責一期編務。自編輯委員會成立後，每月定期集會一次，出席會議者，除各委員之外，并函請主幹參加（如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共同討論編務。

一九二〇年九月，正式成立「新青年社」，「新青年」月刊獨立發行，并發表「宣言」及組織章則等，編輯委員會取消，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參加此社爲

同人的作家，計有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沈兼士等。及至一九二一年十月，該社因其同人之意見分歧，而有些則早已另行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如周作人等），於是便告解散。

新潮社

「新潮」月刊，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初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同人刊物，由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人主持。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北平召開社員大會，準備擴充為學會，並改訂社章等。

查該社的組織，原分兩部：一為編輯部，一為幹事部，各部設主任一人，其他職員，均由主任就其社員中推定之。但經過這次的大會之後，便改為置編輯一人，經理一人，記錄，校對等各若干人。及至一九二〇年八月，周作人等相繼加入，於是「新潮社」又再三改組，回復以前的二部制。

由於傅斯年，羅家倫，楊金甫，徐子俊等幹部的紛紛出洋，同時又以周作人，孫伏園，顧頡剛等人的加入，於是社中的職員又來了一次改選，結果以周作人為主任編輯，孫伏園，毛準，顧頡剛，陳達才四人為編輯；又以孟壽椿為主任幹事，孫伏園（兼）王星漢，高尚德，郭紹虞，李榮第，宗錫鈞為幹事。但至是年

末，第一因前期幹部已經出洋，後期幹部另行組織「文學研究會」，中樞無人主理，遂告解散。而「新潮」亦僅出至二卷三期止。

少年中國學會

繼「新青年」之後，而於一九一九年突起於上海的文化界的另一簇新的雜誌，便是「少年中國」月刊。此刊出版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至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停刊，共計兩卷（每卷十二期）廿四期，由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每月十五日出版一冊，版權頁上印有「少年中國學會主編」，但事實上乃田漢，左舜生，宗白華等人主持編務。

作為這個學會的主要幹部人物，計有田漢（壽昌）宗白華，康白情，鄭伯奇，左學訓，黃仲蘇，易家鉞，左舜生等。他們的宗旨原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不過這學會雖說是本科學精神，而對中國的改造并不會規定一種科學的方法去做，大體上他們仍是注重情感的結合。

「少年中國」月刊，便是他們的機關誌。為這刊物寫文章的，除了他們的同人外，也有非會員的作品，并無什麼門戶之見。及至一九二一年，在南京召開社

員大會，出席者共有二十三人，爲討論該學會的主義問題，而引起大大的糾紛，以各會員思想的不同，意見分歧，遂致決裂。查該會當時的情形是：要主義的十七人，不要主義的僅六人（照理可以會議的慣例來解決的），但結果是解散了。

文學研究會

（附『文學旬刊』及『詩刊』）

「文學研究會」以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成立於北京。作爲這個會的發起人是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葉紹鈞，孫伏園，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朱希祖，蔣百里和瞿世英等十二人。一九二一年一月，由在上海的茅盾接編商務的「小說月報」（自十二卷一期起）發表「宣言」及「簡章」。爲「新青年」後之最大的文學團體。

其簡章第九條有云：「京外各地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一分會」，因此，同年五月，由茅盾，葉聖陶，謝六逸，趙景深，鄭振鐸等，成立上海分會，并發行「文學旬刊」（是年五月十日）最初附於「時事新報」上，八十一期起，改爲週刊，半獨立發行，但仍附於「時事新報」上。一百七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

日)起，收歸獨立發行，由「開明書店」出版。第八卷起，改於「遠東書店」行。第九卷起，再獨立發行，但至九卷四號，即告停刊。

該會同人，除編有「小說月報」及「文學旬刊」外，尚有「詩刊」一種，此刊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創刊，由鄭振鐸，葉紹鈞，俞平伯，劉延陵，朱自清等人主持，由「中華書局」出版，至二卷二期即停刊，時爲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其中以「小說月報」之壽命爲最長，自一九二一年起，直至一九三一年止，頭尾垂十一年之久，而「文學研究會」的無形解散，亦爲一九三一年一月「小說月報」停刊後也。

「文學研究會」的工作，除發刊定期刊物外，尚有「文學叢書」的編印，其作家之多，影響之大，亦爲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僅見者。單就其翻譯之範圍言，計有日，德，法，美，英，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蘇聯，奧大利，波蘭，比利時，印度，新猶太，愛爾蘭，義大利，荷蘭，波利維亞等二十餘國的作品。而參加這一團體的作家，亦不下百餘人，而且每個都是著名的作家。

民衆戲劇社

「民衆戲劇社」的前身是北平的「實驗劇社」，這個社團是成立於一九二〇年，由陳大悲，李健吾，何玉書等所組成，但并無刊物發行，且不久便告解散。一九二一春，陳大悲南來上海，再度組織「民衆戲劇社」，由陳大悲，歐陽予倩，蒲伯英，汪仲賢，徐半梅，宋春舫等組織。同年五月末，於上海發刊「戲劇」月刊一種（由中華書局出版）爲新文學運動以後最初的第一個戲劇的刊物，至一九二二年四月末停刊，合共兩卷，（半年爲一卷計六期）計十期（出至二卷四期止）。由發刊至停刊，一年不滿。

該社於一九二一年春在上海成立後，曾發表「宣言」及「簡章」（均見戲劇月刊第一卷一期末尾附錄）他們的宗旨是「以非營業的性質，提倡藝術的新劇爲宗旨」。他們的工作，一方面是翻譯或改編世界各國劇本，以作實驗的上演，另一方面則從事自我創作劇本，并爲藝術的戲劇宣傳。這在我們新文學運動的初期

，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戲劇團體。

爲他們寫稿的社外作家，也很不少。魯迅曾爲他們介紹過蘇聯的歌劇團，茅盾也在「戲劇」月刊上發表過對於改良中國戲劇的意見，此外，如「文學研究會」的鄭西諦，王統照，葉紹鈞，瞿世英，周作人，許地山等，也爲他們的刊物寫過不少關於戲劇方面的文章。基此，也可使我們見到當時的文藝社團與文藝社團之間的感情是溶合無間的。

綜括來說，「戲劇」月刊之在當時，是十分超羣出衆的，就是它的內容也很充實，每期的份量，固然不少，就是質的發展，也很平均，多方從事各國名劇的介紹，自己的創作，舞台技術的改進以及導演論的翻譯，都是爲後人借鏡。所可惜的，只是還未滿一年便停刊了。

創 造 社

（附『洪水』與『幻洲』）

以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現於上海文壇上的『創造季刊』，便是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王獨清，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穆木天，陶晶孫……這羣留日學生所組成的『創造社』，他們拉上了『爲藝術』的大旗，明顯地和『爲人生』的『文學研究會』對立，抗爭文壇上的位置。而中國新文學社團的對立交鋒，乃以『創造社』之成立爲開始，以後門戶之見日深，相爭亦日甚。

次年（一九二三）五月十三日，『創造週報』繼『創造季刊』後出版，鄭均吾，周全平，倪貽德，白采等相繼加入。稍後又有『創造日』之發刊，附於『中華日報』上。一九二五年，創造社同人紛紛南下，參加革命行列。一九二六年春（三月一日）達夫回上海，主編『創造月刊』，漸與蔣光赤，葉靈鳳，楊邨人等

之『太陽社』合流，而廣州又成立了分社於昌興街丁卜書店樓上，直到清黨後，始因政治關係而解散。

『創造社』由始至末，整整五年，於此期間，曾做了不少的工作，與『文學研究會』相比，亦各有千秋。後只以其幹部，多由文藝而政治，致思想紛歧，郁達夫和張資平的退出，完全是爲了不滿他們的參加政治所致，而『創造社』之消滅，亦由於參加了政治，而將刊物停頓。郭沫若的亡命日本，成仿吾之深入赤都，都是政治的魔力使然。

『創造季刊』共出六冊，（每三月一冊）由一九二二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夏，共一卷（四期爲一卷）又兩期。『創造週刊』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起，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止，凡一年，共出五十二期。『創造日』發刊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至是年十一月一日停刊。『創造月刊』發刊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二七年六月末停刊凡一年又三月，共十五期，至二卷三期止。

創造社的刊物，除以『創造』二字爲名的一如以上所述者外，尚有『洪水』一種，亦爲創造社幹部所主編，此刊發行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共發行三卷，

計三十六期，爲不定期刊，有隔半月刊行者，有隔十日刊行者，有隔一月刊行者。作家除創造社之老社員外，尚有葉靈鳳，蔣光赤，楊邨人，周毓英等。稍後，又有『幻洲』月刊一種，計分兩部，一爲『象牙之塔』，另一爲『十字街頭』。前者爲葉靈鳳主編，後者爲潘漢年主編。

彌灑社

繼『創造社』稍後，以一九二三年三月突起於上海的『彌灑社』（此名係Nuse的音譯，即Nuse的拉丁寫法）是以另一個新的姿態出現了。其對文藝的態度，可從該社的主幹之一胡山源的『彌灑臨凡曲』見之。而陳德徵的編後餘談，更標明了他們的特色：『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祇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

據胡山源自己的述說，則謂該社并無什麼組織，只是先由他個人提出要辦一個文藝刊物，錢江春也同意，而且獲得陳德徵，趙祖康，唐鳴時等人同意，於是便出版了『彌灑月刊』。但過得半年，也就枯死。所謂單憑靈感而創作的彌灑，首尾只有六期而已。

『彌灑』雖已枯死，但得錢江春的努力，在商務書館找得一個小小的地盤，另起爐灶，出版『彌灑社叢書』，但所出版的，除了『彌灑社創作集』一二集，

及『風塵三俠』劇本外，便也僵死了。其最大的原因，便是爲了主編人錢江春的去世，其他幹部，亦紛紛另謀他途，以至無人繼續。

南國社

南國社最初是沒有什麼「社」可言的，所謂南國社的初期「社員」，只有田漢及他的妻子漱瑜女士兩人罷了。「南國半月刊」的創刊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初，其時，田漢還忙著爲中華書局編輯「少年中國」。初期的作家，只憑田漢一人之力，拉來了郁達夫，郭沫若，宗白華等人的通信稿，但這只是因爲他本人與創造社的關係。「南國半月刊」由第二期起，增多了一「南國新聞」，注意戲劇，電影的批評。但出到第四期，便告停刊了。

一九二四年仲夏，田漢新由湖南回到上海，因受『少年中國』同人左舜生的邀請，於左氏主編的「醒獅週報」上復活了南國，改爲「南國特刊」。但終爲了政治上的主張不同，出到二十期便又告停刊了。自從「南國特刊」停刊後，田漢便從事電影及戲劇工作，不再幹文藝刊物了。於是南國社又改名爲「南國電影劇社」。一九二八年夏，田漢兼任上海藝術大學教職，冀從此而多拉幾個幹才，作

爲鞏固他的「南國社」的基礎。

一九二七年，「南國電影劇社」改組，正式成立「南國社」，并擴大範圍，爲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部，并以「團結能與時代共痛養之有爲的青年，作藝術上之革命運動」爲宗旨。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首次在上海公演，劇本是「古潭裏的聲音」，「蘇州夜話」，「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劇」及「名優之死」等。一九二九年一月，又到南京公演。一九二九年七月起，又作第二次之公演，地點仍爲上海，南京。

一九三〇年夏，因政治主潮之急變，田漢亦由無政府主義者變爲左傾，并參加含有濃厚的政治意味的文藝運動。社員因爲過於複雜，且已不再上演，於是「南國社」便無形解體。以後，田漢亦不再從事文藝社團的組織了。

淺草社

（附『沉鐘社』）

以一九二四年春發祥於上海的『淺草社』，出了一本『淺草季刊』。每期都要「顯示着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营养，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裏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但出至年底，以中樞移入北京，而社員亦有些分散，所以便告停刊。『淺草』首尾一年，共出四期。

作為『淺草』的幹部作家，計有林如稷，徐丹歌，韓君格，孔襄我，高世華，胡絮若，顧璫，莎子，亞子，陳翔鶴，陳煒謨，竹影，馮至，王怡庵，陳承蔭等。『淺草』停刊後，曾由王怡庵，陳承蔭二人，以『淺草社』名義，為上海『民國日報』主編『文學旬刊』一種，但不數期即停刊。

一九二五年春，「沉鐘社」突起於北京。照陳翔鶴的說法，他不承認「沉鐘」就是「淺草」的後身，但以其同人均係出自「淺草」，所以我在這裡仍把他們混爲一談。一九二五年秋，「沉鐘週刊」出現了。據陳翔鶴云：「沉鐘係從Hermann 名著上借用來的」。他們所以要用這個字的理由，是一因爲我們想，爲作文藝而出版的刊物的緣故，就縱然向深淵往下更沉沒一點，也是可以的，祇要將來，不至於果真如『亨利』般的因聽見了一聲由於一個死女人的手將『沉鐘』敲嚮時，而至於百事皆廢就行了」。

「沉鐘」創刊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每週出版一次，由北平「北新書局」發行，至第四期止，因北新不大重視，收歸獨立發行，至第十期即停刊。一九二六年秋，繼週刊而起者，又有「沉鐘半月刊」，仍由「北新書局」代印，至十二期爲止，因北新總店移滬經營，又告停刊。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八月，曾由「北新」印行「沉鐘社文藝叢書」四本，爲：（一）馮至的『昨日之歌』（二）陳煒謨的『爐邊』（三）楊晦譯的『悲多汶傳』（四）陳翔鶴的『不安定的靈魂』。

一九二七年秋，「沉鐘」二次停刊後，楊晦另編『新中華報副刊』及『華北

日報副刊」，沉鐘同人，仍集合在一起工作。一九三二年以「淺草」之主幹林如稷歸國，『沉鐘』再三復活；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出至十二期而告終止。

語 絲 社

『語絲』係創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社址設於北大一院『新潮社』內，由北平『北新書局』發行。每星期一出版一冊，係週刊。一九二六年，曾爲『張大帥』下令禁止，北新亦被封。啓封後，出至一五六期，遂移上海『北新書局』發行，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始停刊。共十二卷，凡七年之久。

此社之設，乃爲不滿於當時思想界的沉悶，而欲集合一些人，以突破『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其實呢，倒是爲了不滿於『現代評論社』那班人，而另行辦一週刊，以作對抗的。其主幹乃爲孫伏園，李小峯和川島等人，同時得到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支援，每人先出大洋十元，作爲『語絲』的經費。編輯是伏園，印刷出版等是小峯，發行及兜售則爲川島（據魯迅說：他們曾將『語絲』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

一九二七年末，魯迅由廣州回滬。由李小峯出面向魯迅請求，主持『語絲』

編務，迅翁以師生關係，且爲「語絲」之支援者，公私兩難推却，遂接編上海版的「語絲」（由四卷一期起，這時已改銀色的封面，較初期爲美觀得多了）半年而後，以時局關係，且社內份子亦甚複雜，魯迅辭去編輯之職，另由其弟子柔石代編，但亦僅半年，柔石也不願意編下去了。最末，歸還小峯。

所謂「語絲社員」，除當年十來個同人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界限。只要投上幾次稿，也就算是「社員」了。同時，凡是「社員的」稿件，編者沒有選擇之權，有時連原稿也不會過目，便印成了書。（據魯迅說：當時有些社員的文稿，逕寄北新發排）這也可算是「語絲社」的特色了。

關於「語絲」的命名，據說并無什麼意義，在創刊之前，只是幾個同人，在一家茶館裏談天，隨便拿一本書翻開，閉上眼睛，用手一指，指着那個字就那個字。而「語絲」二字，是恰被指中的。這也可說是「語絲社」的特色之二了。

未 名 社

『未名社』的起源，乃始自魯迅所主編的『未名叢刊』。一九二四年，魯迅執教於「北京大學」，餘課之暇，兼爲北平的「北新書局」主編兩種叢書：其一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其二爲『未名叢刊』，專收翻譯。但那時文壇的風氣：重創作而輕翻譯（當時人們的見解是：「創作」是處女，「翻譯」則是媒婆）。因此，『未名叢刊』特別冷落，北新老闆恐怕虧本，不大願意繼續出版下去。

正當『未名叢刊』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偏偏有幾個文藝青年倒願意拿出金錢和氣力來從事文藝翻譯的工作，這幾位青年文士便是章素園，李齋野，章叢蕪，臺靜農，曹靖華等，因此，魯迅便和「北新」的老闆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給那幾個青年來接辦，小峯因爲「叢刊」的銷路不佳，便一口答應了。從此『未名叢刊』便與「北新」脫離，獨立發行。而『未名社』的招牌也就掛起來了。

負責掛這個招牌的，是『未名社』的主要的骨幹章素園。他們並沒有什麼宣言，組織之類，只是在魯迅領導之下，集合了幾個同志，埋頭苦幹。稿件是他們同人的，另外籌了一筆錢，作為印刷費，他們的出版，便從此開始了。

據魯迅所說，『未名社』的同人們，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從一九二四年末起，他們便在這個共同的意趣之下，切切實實的幹起來了。他們的工作除了從事文藝翻譯之外，也代發行過魯迅主編的『莽原』半月刊，直至魯迅逝世以前，『未名社』仍然存在於文苑之中。我想，『未名社』現在雖然已沒有了，但『未名社』這個文藝社團的名稱，則將永存在我們的文壇的。

莽 原 社

（附「狂飈社」）

「莽原社」的由來，是在孫伏園脫離了北平『晨報』之後，那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的事。它的組織，據魯迅所說，是爲了「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羣，另設『莽原週刊』，却仍附於『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見「新文學大集」中之「小說二集」導言〉。他們之「不滿」，是爲了徐志摩的借了勢力而登場使到以前常在「晨報副刊」發表作品的人們不快，爲了要和徐志摩對抗，於是便結集了這個文藝社團。

參加這個文藝社團的作家，計有高長虹，黃鵬基（後來用『朋其』爲筆名，今已故）尙鉞，向培良，李霽野，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小醅，青雨等。而魯迅是被推爲領袖，并主編『莽原』的。但出了一個月（即四期），到得十一月

初，「京報」便要停止了副刊以外的篇幅，以打擊「莽原」。但以魯迅的關係，「莽原」和魯迅另行主持的「未名社」合流了，由第五期起，「莽原」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印行。

一九二六年夏間，因北平「女師大」等風潮，當地政府下令捕捉大幫教授，魯迅南逃，爲廈門大學執教。魯迅一走，「莽原」內部大起衝突，因素園之扣押向培良文稿，高長虹大興問罪之師，惟以魯迅遠在南方，不理，遂結集了向培良等遠走上海，另立「狂飈社」，「莽原」至此，因內部的分裂而告解體。頭尾僅一年耳。

「狂飈社」以其「曇花一現」，壽命過短，暫附於「莽原」之後，不另分節來說，其實「狂飈」亦僅能附在「莽原」之尾巴而已，蓋狂飈之起，乃起於「莽原」，以高長虹一人之狂飈草案不能在「莽原」發表，故不能不另扯旗幟了。

「狂飈運動」之宣言，早於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在北平晨報副刊登過，不過那時高長虹尚未以「超人」自命，而對尼采主義的宣傳，也不那麼深，及至一九二六年秋初，在上海發動的狂飈運動宣言，也正是前一草案的改作，但除向培良及

黃鵬基二人參加這一運動外，響應者無人，因而不到四期，「狂飈」也就完了。高長虹從此影息文壇，向培良改爲從事話劇運動，黃鵬基改名「朋其」寫些小說，但不久便病死。統觀「狂飈運動」，以浪漫派出場，而以悲劇結束。

奔 流 社

（附『萌芽』）

『奔流』是一個純文藝的月刊，創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魯迅主編，由上海「北新書局」發行，每月出版一期，每年一卷，每卷十二期，至二卷五期止，曆時一年有半。

『奔流』每期的內容，翻譯多於創作。魯迅於『凡例五則』中有云：『一：本刊揭載關於文藝的著作，翻譯，以及介紹，著譯者各視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譯，以供同好者的閱覽。二：本刊的翻譯及介紹，或爲現代的嬰兒，或爲嬰兒從出的母親，但也許是更先的祖母，并不一定新鮮。』我們單看了這「宣言」似的「凡例」，便可明白『奔流』的內容及編者的意見了。

『奔流』並沒有什麼同人之類，要之，便是『未名社』同人及郁達夫，楊騷

，白薇等。「奔流」的稿件，每期以特約的爲主，間中也用外來的稿件。每期之末，均由魯迅執筆作「編校後記」，籍以說明該期各作家的歷略（但以外國作家爲限），如遇有讀者問疑時，亦以「通訊」之形式在卷末發表，并解答。

一九三〇年春，魯迅因光華書局之邀請，他爲了要答應那邊的請求，於是便把「奔流」停刊了。而與郁達夫合編另一個文藝月刊「萌芽」。這時，因爲「左聯」已告成立，「萌芽」也算是一「革命文學」的機關報，爲着色彩過於濃厚，半年以後，即被禁而停刊。「萌芽」頭尾僅僅六期。此外，魯迅尙爲「大江書店」主編過一冊季刊，叫做「文藝研究」，但只出了一期，即被禁停刊。

朝花社

朝花社是一九二八年秋後，才在上海結成的。作爲這個文藝社團的領導者，便是魯迅。其時，正是魯迅由粵（廣州）回滬不久的時候，他爲了要回復其在北平時代領導『未名社』各幹部從事埋頭於文學的工作起見，便又集合了在滬所認識的青年文士柔石，白莽，殷夫，也頻等，而組成了『朝花社』。

自從『朝花社』於一九二八年秋天組織之後，到得年末，便先創辦了一個『朝花旬刊』（同年十二月四日出版）次年（一九二九）一月起，又多了一個定期畫刊『藝苑朝華』，均由魯迅主辦。此刊每期十二輯，每輯十二圖，由朝花社自費出版。此刊總目如下：（一）近代木刻選集之一，（二）諸谷虹兒畫選，（三）近代木刻選集之二，（四）比亞茲萊畫選，（五）新俄藝術畫選，（六）法國插畫選集，（七）英國插畫選集，（八）俄國插畫選集，（九）近代木刻選集之三，（十）希臘瓶畫選集，（十一）近代木刻選集之四（十二）羅丹雕刻選集。每

輯前後，均有魯迅自撰之『小引』或『附記』，說明編選經過及作者傳略。

但以銷路不佳，僅出至四輯，即告停刊。而『朝花旬刊』，亦僅及半年耳。稍後，左翼作家大同盟（一九三〇年）成立，柔石，白莽，殷夫，也頻等朝花社幹部，均簽名參加，并從事實際政治活動。後以政治關係，而被逮捕槍決。『朝花社』遂告解體。時爲一九三一年春。

太陽社

（附『海燕週刊』）

「太陽月刊」創刊於一九二八年一月，蔣光赤主編，由現代書局發行。每月一期，每半年一卷，每卷六期。出至二卷六期被禁而停刊。

太陽社之主幹爲蔣光赤，錢杏邨，楊邨人，孟超，迅雷等。彼等因鑑於「創造社」之爲青年熱烈愛護，故於「創造社」解體後，即成立此文藝團體，并發行「太陽月刊」，以發表其同人對文學的理論及見解。

「太陽月刊」出版後二月，又有「海燕週刊」一種，出至十七期，亦因被禁而停刊。及至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大同盟結成後，蔣光赤另在現代書局主編「拓荒者」月刊，舊太陽社之人物，如錢杏邨，楊邨人等，再次集中，也可說是「太陽社」的復活。但未及半年，亦以被禁而停刊了。

現代社

『現代』的起來，是始自一九三二年五月。其時正值文壇荒蕪的時候，（『小說月報』於是年一月停刊，『北斗』，『文學月報』，『拓荒者』等早已被禁）所以它的起來，引起了大部份讀者的重視。

此刊最初由施蟄存一人主編，（後由施邀杜衡加入担任編輯）每月發刊一期，由現代書局發行。每半年爲一卷，每卷六期。六卷二期改爲綜合刊，施蟄存及杜衡脫離，由汪馥泉接編，但不數期停刊。

作爲這一個文藝社團的幹部人物，除施蟄存與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時英，劉呐鷗，葉靈鳳，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雋等人，他們雖沒有什麼形式上的組織，但對於文藝的見解及旨趣，則大抵是共同的。因此，他們這一羣，對於後一年以『文學研究會』的幹部另行結成的『文學社』，是存在對立着的狀態的。

查施蛰存邀請杜衡合編『現代』的原因，乃爲避免『文學社』的矛盾之拉攏計。但自杜衡參加編務以後，『現代』大部份的理論稿件，均操諸杜衡之手，尤其與胡秋源的『文藝的自由論』等問題的提出，引起施蛰存不滿，但施以早年同學關係，且屬知交，所以也不出而干涉，一任由之。

稍後，施蛰存以『現代』危機日深，社內對文藝的意見，亦漸分離，遂另行主編『文藝風景』月刊一種，亦爲純文藝刊物，撰稿者仍爲現代社同人。一九三五年，又創辦『文飯小品』半月刊一種，亦係施蛰存主編。撰稿者除現代社同人外，兼有京派作家參加。『現代』停刊後，此二刊亦先後滅亡。

文學社

「文學」創刊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社主編，由上海生活書店發行，每月出版一次，每半年爲一卷，每卷六期。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後改出三十二開本的小冊子，未及一年，即告停止。由創刊至停刊，歷時三年有半。此爲文學研究會同人之最後的刊物。

「文學」的發刊，可說是「小說月報」的後身。蓋自「一·二八」後，「小說月報」停刊，「現代」雄據上海文壇。文學研究會之幹部，不甘於寂寞，於是乃起而組織「文學社」，傅東華對內，茅盾對外，并由茅盾拉攏魯迅，陳望道，夏丏尊等參加，組織編輯委員會，委員計有魯迅，茅盾，陳望道，郁達夫，鄭西諦，葉紹鈞，夏丏尊，王統照，徐調孚，傅東華等。

一卷二期，因傅東華的「休士在中國」一文引起魯迅之不滿，遂即退出「文學社」，其間雖經茅盾代表「文學社」同人向迅翁陪罪，仍無結果。於是自二卷

起，由傅東華負編輯之全責，并拉同遠在北平之鄭西諦具名於版權頁上。五卷一期起，又以新人文稿的被刪事件，西諦不願徒掛編輯空名，遂改由傅東華一人具名主編。

七卷一期起，傅東華因爲各方所攻擊，無法連任主編之職，遂改由編委之一的王統照繼任，直至一九三七年九月停刊。稍後，與中流，譯文，文季三社聯合出版三十二開之『吶喊』（後改『烽火』）一九三八年初，『文學』再次復刊，改爲三十二開的小冊子，仍爲每月一冊，但不及一年，即告停刊。至此，『文學社』遂告散體，而早日的幹部，亦分散各地了。

太 白 社

「太白」創刊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陳望道主編，由生活書店發行，每月出版二期，係半月刊。半年一卷，每卷十二期，共出兩卷，計二十四期，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止。由創刊至停刊，爲時一年。

此刊以小品散文爲主，每期內容計有（一）短論（二）速寫（三）漫談（四）科學小品（五）讀書記（六）風俗誌（七）雜考（八）時事隨筆等，爲新文學運動以來之唯一小品散文雜誌。

「太白社」除設有編輯委員會外，并無若何組織，編委會以十一人組成，計陳望道（主編）郁達夫，葉聖陶，鄭振鐸，朱自清，傅東華，黎烈文，徐調孚，曹聚仁，徐懋庸，艾寒松（以上十人均爲委員）。

此外，尚特約有魯迅（註）夏丏尊，孫伏園，周越然，謝六逸，陶知行，落華生，周予同，洪深，劉穆（即小默），胡愈之，朱光潛，李健吾，巴金，章靳

以等四十餘人，爲該刊長期撰述。

該刊創刊，并無發刊詞，而終刊亦無宣言，惟該刊之主張及其同人對於文學之見解，均可於該刊所載之短論中見之。

註：魯迅自一九三三年起，即用種種不同之筆名，以發表其短論。其在一太白半月刊所用之筆名，計有：公汗，黃棘，長庚，且介，杜德機，旅隼，趙令儀，姜珂等。但公汗，長庚，且介，旅隼四名，當時亦爲讀者共之也。

論 語 社

（附『人間世』）

「論語」乃林語堂所提倡的一個專載幽默小品文的刊物，發刊於一九三二年夏，係半月刊。參加這個集團的文士，大部份爲前「語絲社」同人。所謂「寄沉痛於幽默」，乃爲「論語」的特色。該刊的主要作家，計有周作人，俞平伯，廢名，簡又文（即大華烈士），徐訐，陶亢德等。

一九三四年春，林語堂再於良友公司主編「人間世」，提倡清逸的小品文，一時京派作家，大多與之唱和，而其蓬勃之象，亦不減於「論語」當年。稍後，以陳望道主編的「太白」繼起，提倡科學的小品文，與之對抗，頗受影響。至一九三五年春，「人世間」出至第二十四期而停刊。

繼「人間世」之後，林語堂以趣味略有不同，改爲介紹西洋幽默趣味，而與

黃嘉音，嘉德合編『西風』月刊，從事西洋小品之翻譯。陶亢德，徐訐等，則與語堂的令兄憾廬，合編『宇宙風』，藉以承繼當年的『論語』及『人間世』。至戰爭爆發後遷港，稍後上海亦復版，而成兩地刊物。

初期的『論語』，魯迅亦曾參與撰稿，但多用其他筆名，如『何干』之類。但自『人間世』半月刊一出，即對『論語』不滿，蓋此時的『論語』，已無諷刺，亦無幽默，要之，除沖談外，只剩下無聊的哈哈一笑。而『論語』之消沉，亦由於此耳。

譯 文 社

「譯文社」乃魯迅繼「奔流社」後之另一文學社團之組織。「譯文」創刊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係月刊，每半年爲一卷，每卷六期。一九三五年十月起曾停刊數月（即二卷六期後之「終刊號」），及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始又復刊，後出至是年末停刊。曆時約兩年餘，共四卷又二期。

此刊專載翻譯，計有論文，小說，詩歌，散文……等，舉凡外國之作品及論述，均有翻譯。而其取材，亦不以時代爲限，「古典的」外國作品有之，「現代的」外國作品亦有之。

創刊號，有魯迅作的「前記」，略述其辦「譯文」之主旨。停刊時，亦有「終刊宣言」，復刊之時，又有「復刊詞」，均爲魯迅所撰。至於每期，則有「後記」，但并非編者一人執筆，而係集合各譯者之「後記」而成。

「譯文」由黃源具名主編，但每期校稿閱樣，均經魯迅過目，由生活書店發

行，復刊後，則改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

此刊係同人雜誌，其同人計有：魯迅，茅盾，許遐（廣平）傳東華，沈起予，小默，曹靖華，郁達夫，巴金，胡風，黃源，孟十還，孫用等。

魯迅在此刊發表之譯文，其筆名除「魯迅」二字之外，尚有樂雯，張祿如，鄧當世等。

文學季刊社

一九三四年一月突起於北平之「文學季刊」，實「文學研究會」之支流，亦在上海印行之「文學」月刊的姊妹刊物。該刊創刊於一九三四年春季，每季一期，每年一卷，每卷四期，出至二卷四期止。由北平「立達書店」發行。

此社由鄭西諦，巴金，李健吾，謝冰心，劉西渭，章靳以，李長之等組織而成，并以此幹部爲編輯委員，而由鄭西諦綜理編輯事務。而曹禺之劇作「雷雨」，即在此刊發表。

一九三五年秋，李長之因巴金妄改其論文，引起爭論，繼而相與退出。巴金與靳以脫離「文學季刊」後，當即偕同南來上海，另設「文季社」，并託良友公開發行「文季月刊」，率領北方作家曹禺，齊同，何其芳，蕭乾，麗尼等，以示對抗。西諦既因李長之的退出，後以巴金，靳以的南下，集稿大感困難，遂迫得停刊。

文季社

一九三五年冬，巴金與靳以等脫離北平「文學季刊」南來上海之後，積極籌備文季社，以繼「文學季刊」。一九三六年一月，「文季月刊」在上海出版，由良友公司發行。此刊爲純文藝月刊，每半年爲一卷，每卷六期，至二卷六期而止。

『文季月刊』編者爲巴金與靳以二人，巴金對外，靳以主理社務。其特約撰述人，計有蕭乾，沈從文，胡風，曹禺，何其芳，麗尼，楊剛等，多爲北方青年作家。此外，如歐陽山，草明，聶紺弩等，亦爲該刊長期撰述。

「文季月刊」停刊後，巴金乃另行組織「文化生活出版社」，以繼承「文季社」之使命，除發刊「文叢」月刊一種外，并廣集各名作家之文稿，出版「文化生活叢刊」及「文學叢刊」等。實爲「文學研究會」以後之一大文學團體，對我國文藝出版界，頗多貢獻。

社團史料附錄

原书空白

記創造社

陶晶孫

近來全不看什麼雜誌，可是有許多朋友很親切，往往送雜誌來給我看，所以倒也多少知道一些社會上文學作品。

有一次，文友社送給我一本「文友」上面寫着創造社的事體，提着某報紙上我與日人內山老人的對談，他發表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實，因為我在創造社中沒有他那樣熟悉，所以得到知識不少。

最近，忽的又有一個女子帶來一本「風雨談」，我纔知道龔冰廬把我沒有承認他發表的話發表了，他寫的漫語，有碍正史，況且又忘去寫張資平的事體，於是我在此地來補充幾句話，順便把我的口供正經地抄出。

我在創造社不是重要人物，原不敢多話，文友上某先生也提到這個事體，我老早說，吾輩老朽，青年之鐵椎未下之前，早已酥倒，況且創造社已解體，我們要不可以從棺木中掬出來討論，不過念到幾個重要人物的學識，作品，成績，又

不得不從創造社外面來表彰一下。

(一)真正小說家張資平

有一天，郭沫若從東京回來了，因為我們是同學，我照例到他的住所去看他。原來我同他沒有談過文學，雖說他很喜歡把他的處女作登在學燈者給我看，把田漢和他的信件給我看，但我有十七歲少女的害羞，沒有使得他知道我寫過幾篇小說，此刻他從東京回來，很高興的把他的一包東西拿出來，叫我看，一篇一篇都是小說，他很得意，強迫要我看，我沒法，橫臥在窗口，看了半天，他在旁給我說明，他說這些文章要去出一個雜誌，雜誌的名稱還沒有題好，他想把他叫做創造，有人說創造兩個字太自負了，或許設法用更客氣一些字，我急急的說創造兩個字最好沒有了，不必客氣，只要留心造些好點文章好了，我第一次開口我的文學話，就是向他說，那麼有什麼方針辦，他說一句：新羅曼主義，我知道一切了，因為關於我的幾篇文章，我自己能批評都是屬於羅曼主義。但我不多響，他又說回來，向他給我看的小說的意見了，這使我困難，因為我喜短篇，不愛長篇，長篇使我成為莫名其妙，現在幾篇都是長篇，雖說讀完了，但沒有一篇在讀

了四五頁之後成爲非讀不可，讀了一段即欲放下，不過沫若在解說說，這些文章中以張資平的爲最好，因此我即刻再讀，的確資平的文章很好，我們把幾個小說調查之後，決定資平是真正的小說家。這些原稿大部份登在創造第一期。第一期因爲我沒有應沫若的要求，所以沒有稿子。這時候在東京的仿吾，資平，都沒有曉得我。資平是真正小說家一句話，此刻我要說明一下，我們合意，第一，小說家要觀察社會，資平把他辦的，可是沫若達夫只講自己的話，第二，小說家要寫萬人易讀的文字，資平把他辦的，可是達夫有許多古典文學字句之引用，沫若有醫學或古典之引用，第三，小說家要耐心寫作，不住生產，不然讀者要成如翻頭待桑葉之蠶兒，資平也把他辦的，所以，沫若在末了，說創造要能够編得成功，資平很須注意，因爲字數不夠時，非有他的文章不可，我就說對了，我們贊成那好像米飯與菜的關係。

（二）創造社之骨郭沫若（附輾帶成仿吾）

第一期出版了，沫若有一天在我的桌上發見一篇小說，他定要拿去，我不給他，好像害羞的十七歲少女，但是他拿去了。過兩天，他給我看新出版之一女神

「我贊他文章之美，他不幾天即去上海，之後，我在博多街道上，得一曲湘累之歌，把他抄上五線紙上了，在抱洋閣上試過幾次，給安娜夫人聽過，過幾天沫若從上海回來了，我給他看，他正是急急在編第二期，他說要把這歌曲登進去，結果登進去了，從這個動機，創造全本變爲橫排，我畫了幾張木刻圖，那時候的創造社同人對於裝訂都沒有什麼意見，現在第二期有很多進步，我有一個小小高興，其實那不值錢，重要的是中國文藝雜誌成爲橫寫的是以這第二期爲初次，沫若說把第一期再版時也要改爲橫排，但我還沒有看見，沫若是最初提議創造社者，當然他在博多海岸上與資平談過文學後，一度到東京，京都，名古屋去勸誘，仿吾，何畏，達夫等人，表面上是大家合作，主力免不了是他，但他的骨格上，不裝資平之肉，不能成爲人格，所以我們學醫者嘗研究過創造社之解剖學說：沫若爲創造社之骨，仿吾爲軀帶，資平爲肉，達夫爲皮，我正經說，沫若的文學素養在諸人中最爲圓滿而高深，第一他精通中國古典，不像以中學畢業程度中文來寫小說者輩（如我），他通各國古典文學很平均，所以指導地位不得不讓他了，他還有一個絕好幫手成吾，仿吾的事體不多講了，一句話，軀帶之譬喻，說得最

對沒有了。

「做人是最有幸福的，天生是我們五官百體，還給了我們一個思想，一個感情，從思想中我們能分別「善」與「惡」。從感情中，我們能表示愛與憎。」

這些話，不但是富於詩意，而且還含有着哲學上的意味。像陸女士樣的人委實是我們理想中的新女性的典型。由此更使我們感覺到作者寫作的技巧實在是高妙不過的。

「雪茄」和「酒」二篇都是諷刺着凡是有嗜好的人——即使是烟和酒樣的小嗜好，日久之後要想戒掉也是不容易的，這二個主人公雖有勇氣的立志戒除，但是結果他們看見了剩餘的雪茄和別人送來的酒，不覺爲之心動，便在棄之可惜，送人嚙人要的情緒下，倒不如自己吃了來得受用些。

這裏使我想起了，凡是做隨便什麼事情，要是自己沒有堅強的決心的話，那末結果未有不失敗的。

「求婚」這一個故事很是曲折，像郝文理這樣求婚的方式確是聞所未聞的。此外像「傘」，「微波」，「照像」等都寫得非常細膩，生動。使人每讀完

一篇，有一篇新的感覺，美的回味。

（三）創造社之皮郁達夫

希臘人說人之美，在乎人體，因此他們乃除去人的衣服，作許多不朽之美術作品，創造社中，文學之最美者，要算郁達夫了，他精通歐美德法文學作品，這是切不可忘去記錄的，他是真正的羅曼主義者，不過他的皮，只有美好於青春時代，青春過得太快，一下子誰都不理他的年老之皮了，不成創造社的裝飾了。

我對一個年少者說過，你不要光以中學國文程度來弄文學，如果那樣來弄，觀察不能超過一點兒，描寫不能出作文的範圍，我自己，因為從中學讀德文，很有經驗曉得我偏着日耳曼文學，因此不喜北歐及俄國文學及南歐文學了，不過我乃精着一個德國文學，我常佩服達夫，他能够把英德法文陸續的讀，讀得考究仔細，文學不比講話，不是容易的事體。這句幼稚話至今覺得是真實。

（四）眼的感覺何畏（耳的感覺陶晶孫）

近視眼的何畏又是創造社的眼，他在第一期已有一段詩，沫若看見何畏，和陶晶孫一樣，沒有很期待於他們二個人，因為前者話多文章少，而所講的話離開

編雜誌的話太遠了，後者話少文章少，對於編輯出版出風頭全無興趣。

何畏學的是文學（？），但是後來以社會學畢業東京帝大，他不能全在文學之中，他愛論社會問題，可是因為他有些文學思想，不能成為政治家，所以他的談論最為有趣，後來在中山大學教書，成為紅教授，也有道理。

陶晶孫有個主張，中國文學如要普遍大眾，須要減少字數，不用老句子，用淺近白話，因此他有意不讀老文章，可是他不知道中國社會不合羅曼主義，自己的作品為不合中國大眾胃口的羅曼主義作品，他往往以日文寫作品有特穎之處，日本的雜誌上往往見他的作品，受贊詞。何畏和晶孫對於創造社，沒有主人感覺，前者有社會科學的觀察，後者有自然科學的觀察，兩者都有奇妙文章，如前者之上海幻想曲，後者之木犀，都有非古典的美，兩者在日本時所做的戀愛，也有奇特可報告之處。

兩者對於社會，文學，同人的觀察很犀利，離開創造社的中心，一個繼續弄戀愛，一個遠去弄科學，所以沒有多參加，股份不能多領。

（五）創造社之髮田漢（創造社之冠鄭伯奇）

創造第一期有田漢的戲劇，他和屠模等爲演劇愛好者，對文學的創造，多少有距離了，沫若對他很知道，不過在沫若苦悶無文友之時，他們還有文學上信件的發表等等，田漢沒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精神，只對於演劇的進步努力，所以他不能和創造精神相合，所以棄創造最早。

上面諸人，是創造社在日本還沒有渡海回國時的人物，等到渡海，就有鄭伯奇參加，他是有意識地要成作家的，努力作劇本送來的，所以不比渡海前作家之有日本明治文學影響，古典影響，那時創造已有名於國內青年，在這時候，沫若爲創造社盟主，把田漢之髮剃光之後，達夫編了一期，不管創造而專在映霞傍飲酒，資平去開樂羣書店出版小說，何畏的近視眼不知去看什麼，晶孫的耳聽不見上海的事體，沫若把伯奇的冠忽戴忽脫，略爲感覺寂寞。

（六）交感神經王獨清——迷走神經穆木天——（一朵花白薇）

因爲我不懂詩，很不敢談詩，但我知道創造社中最初的詩人爲沫若，沫若的詩，重要點在他的形式之新及字句中古典之美。獨清和木天，在這一點不及他，不過兩個人之努力向詩人，都可指摘。

交感神經在人體中是個植物性神經，說不出何處向何處作傳達的作用，迷走神經制止着心臟，不如其名詞之什麼迷着，這兩個不甚明瞭的神經在人體中雖不甚出風頭，但也重要，像加在葉中之醬。

獨清孤住着，因為有一個緣故，許多人不去交際他，他的最後數年，幸有個伴侶，我知之，怕他不喜發表，此刻講正經話，也再不談到了。木天也有些戀愛的話，但我再也不敢講給別人聽了，怕要發表的。

一朵花，叫做白薇，白薇不是花花嬌嬌的，創造社頭上的這一朵白薇，象徵他不白要有喪事的樣子，可是白薇是走向上的，有自我意識的一個羅曼主義者，因為創造社同人很不願意她，不如歐洲人之騎士服侍王女，她過着寂寞的日子，在苛烈之天日下，還靜靜的鞭她的肉體而弄文學，我們沒有從她得女子的溫和女子的美，但她也是唯一一朵為創造社開花的象徵。

七，創造社的愛人（創造社的生殖器）

創造社渡海到上海，出了好幾期，名譽海內，諸青年文士都知道他了，從此有許多人，抱各種不同的思想，有的熱忱地，有的熱鬧地，有的功利的，來接近

了，舊人之中田漢去辦南國月刊，達夫出全集，渡海前之舊戚脫落之時，新愛人來了。這些名姓，論創造社者大都不忘舉出之，此刻也不再多述。

創造社和那幾個愛人，產生許多眷族，此刻不說，那幾個愛人，是很好的少女，不過因此創造社爲了生產而很可憐，因此停止他的性命了，當然，關於生殖器的話，有礙治安，不敢講。

八，創造社的精神

創造社的肉體講完了，還留着精神應把他診斷一下，創造社的精神爲「意想奔放」——原來國人抱固定因循的思想，至多亦投稿二三於學燈等（沫若先投學燈），或模倣鴛鴦蝴蝶書留東外史之類。可是創造社因爲他們遠離故國而生懷鄉病，同時不像留歐美之不忘功利，創造社的幻覺，幻視應可注意。

原來，羅曼主義是國家意識昂揚時代的國民的熱情之反映，所以羅曼主義者慣以飛躍的精神，走前向之路，也不忘自我之意識。羅曼主義者對於永久和無限，有非功利的憧憬，有綜合全體的欲求他們不舉空洞的理想，他們在現實，但也知道現實之苛酷，因此作自己的架空，雖在逃避於架空之中，但也切實供給

自己以出路，未若爲創造社提出羅曼主義，我此刻把他說明如右，這個真理永久能止於真理。

· 同人之離合，不必把他約束，也不必規定創造社定須是羅曼主義，不過創造社中，論功利者去了，擱在現實者去了，不飛躍不向上者不能跟上去了，沒有自我意識者亡了，空洞理想者翻了，到末了，精神雲散了，你要找他，羅曼主義精神永不會亡，但創造社沒有了。

現在創造社棺已蓋，人已去，靈魂昇天，僅留骨骼。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從棺本中匍伏出來論創造社，報紙新聞喜歡把他說說，好像談談光緒珍妃而論論清朝，那是一種生意經，凡是在創造社多少有過關係的人，誰都知道創造社可以不必把他說了，甚至於創造社熱鬧之時，功利的趕來者，不知逃避而知出風頭者，更不好的是「造社的兩個開喪者。鄭伯奇辦藝術劇社，陶晶孫辦大眾文藝的時候拉出來的人，和創造社精神離開太遠了，棺已蓋，趕到已來不及了。

記得該賽的「轉變」中彷彿有這一段文章：

伊達：呀，是你麼？

男：是我。

伊達：我們是從墓中出來，你知道麼。

男：是的，我們到了夜裏，就可以從墓中出來看一看蒼空。

伊達：你爲什麼死的？

男：我爲打仗剛死的，可是你爲什麼死的？

伊達：呀！你忘去了麼？我本來十八歲的美麗女子，那天你對我太過份了，你弄死我，你忘去了麼？

男：給我們在晚上，向蒼天憧憬，談情樂，言熱情。

已經死滅的創造社，似乎各位可不必再論他。

關於「未名社」

楊之華

(一)

凡是關心中國新文學史料的人，我想，誰都知道「未名社」這個名字吧。然而所謂知道，恐怕也僅限於知道這個文學社團的名字罷了，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起源及其變遷以至消滅的，我想，除了魯迅先生以及「未名社」的同人而外，恐怕再沒有他人了。這也并非我的故意誇張，其實倒是實情。因為「未名社」之在現代中國文壇上的出現，并不像「文學研究會」或「創造社」之張揚，既沒有發表什麼宣言，也沒有什麼章程出現，只是「在默默中生存」，也「默默中死去」，「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却至今沒有枯死」」（引魯迅先生語），因此，「未名社」的種種，却已成為關心中國新文學史料的人所不能忽略的事了。

當阿英先生爲「新文學大系」編選「史料·索引」一書時，也曾想「設法請

該社幹部李霽野寫一篇』，『以補闕典』，然而却『因值華北事變發生未成』，結果『遺憾一得很，無法『找到足以說明這個組織的文字』。因此，關於『未名社』的史料，就是『新文學大系』裏也沒有。近半年來，因為所擔任的職務較輕，空閒的時間也多，遂把往昔存下來的，將近二十五年來的各種文學專著及期刊來整理，并且着手編述『中國近代文藝思潮論』一書（第一章『新文藝思潮的起源及其流變』已給新近出版的『東方文化』第一期發表）以消永日。偶於社中閒談，無意中與梁先生談起這書的編著，因而引起他的拉稿。并且希望我能在新文學的範圍之內，找些較為稀有的史料爲文。我與梁先生，雖係新近才認識的，但梁氏的學問文章，早爲我所欽佩，既蒙索稿，自當如命；何況我現在也是『中華』之一員，那就更有寫稿的義務了。

不過，我一向最怕命題作文，尤其是政治的論文。現在的題目，雖然與政治無關，但也相當的不易下筆，（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便又把答應下來的文債迴避了。直至前幾天，繼續動筆編述『中國近代文藝思潮論』的第二章時，才又記起前些時梁先生的拉稿，於是便把一些與『未名社』有關的書籍檢出來，預備動

筆。今晨起床，即接到「藝術月刊」的催稿電話，早餐後，即爲其寫續稿，脫稿之後，時間還多，而且仍有寫作的興趣，於是便拿出上日整理好了的有關「未名社」的書籍，繼續寫下這篇東西，以了却以前既已答應下來的文債。

(二)

大約是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吧，魯迅先生任教於「北京大學」，每於教課之餘，常常抽出休息的時間來著譯。其時，他正爲「北新書局」編輯兩種叢書，其一是『烏合叢書』，其另一是『未名叢刊』；前者專收創作，後者均爲翻譯。但是，那時中國文壇的風尚，正是重創作而輕翻譯的時候，因此「未名叢刊」便特別冷落，幾乎無人過問似的。事情正是爲此，所以當「北新書局」受到銷路上的打擊後，便不想繼續出版「未名叢刊」了。然而事有湊巧，就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偏偏有幾個青年文士想來幹幹翻譯的工作——而這幾個青年文士就是章素園，李霽野，章叢蕪，臺靜農等，因此，魯迅先生便和「北新」的主人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爲那幾個青年去接辦。因爲「叢刊」在當時出版界的銷路不佳，所以小峯便一口答應了，於是『未名叢刊』從此就與「北新書局」脫

離，而獨立發行了。

『未名叢刊』脫離了「北新」以後，便馬上由章素園移到北京的一家小客店裏去，默默地躲『在客店的一間小房裏計劃着出版』的事情，而『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自從章素園在北京的小客店裏掛起『未名社』的招牌之後，既沒有起草什麼章程，也不發表什麼宣言，只是在魯迅先生領導之下，集合了幾個同志，埋頭苦幹，從事新俄文學的介紹。「稿子」是他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以上所引，均見「憶章素園君」一文，見「文學」三卷二）此外，曹靖華，李霽野，章叢燕，臺靜儂等，也是「未名社」主要的幹部。

『未名社』的命名，爲什麼要叫「未名」呢？魯迅先生對此，曾有簡要的說明：「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了』似的」。誠然，魯迅先生的解說也太謙了；誰都知道，「未名社」對於中國的翻譯文學——尤其是關於

新俄的文學，如果戈理，高爾基，安斯退以夫斯基，盧那卡爾斯基等，是有着十分重大的貢獻的。而中國翻譯文學之能走上正軌，也還是靠了「未名社」這幾位青年文士的努力。

及至一九二五年十月，「莽原社」突起於北京。其時正是段內閣得勢的時候，徐志摩打入了『京報』，繼孫伏園之後而任「副刊」的編輯。而「莽原」的起來，正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指徐志摩）的一羣，另設「莽原週刊」却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在這個文學社團裏，其中「奔走最力者爲高長虹，中堅的小說作者是黃鵬基（後改名朋其）尙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爲編輯的」（見「新文學大系」的「小說二集」序言）不久，相繼爲「莽原社」寫稿的人，日漸增多，除了「未名社」的幹部李霽野和臺靜農二人外，又有馮文炳（廢名），沅君，小酪，青雨等。但延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篇幅了，「莽原週刊」無法繼續附在『京報』發行，便由週刊改爲半月刊，并由『未名社』出版。

自從「莽原週刊」歸併了「未名社」之後，二者都以均爲魯迅先生所主持而

告合一，社務固然日漸擴大，而內部的衝突也開始結成了，只是因為魯迅先生還在北平，高長虹，向培良等尚不敢與章素園等人正面衝突。及至次年（一九二六）夏初，『北京的狐虎之威』，正是無窮無盡。段內閣的幫閒章某派兵接收了『女子師大』之後，繼續下令捕捉『激烈』的教授，魯迅先生等，相繼南逃廈門，廣州；而還留在北平主持『未名社』的社務之章素園，便因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而引起內部的大衝突。高長虹代向培良大起問罪之師，三次上書魯迅先生，但魯迅先生却遠在廈門，一時不知誰是誰非，置之不理。這麼一來，便引起了高長虹的不滿，以為魯迅先生偏愛素園而不理，遂結集了向培良等南下上海，揭起了『狂飈運動』的旗幟，高歌尼采（Er Nietzsche）的哲學，而以『超人』自命，創設『狂飈社』，并發行『狂飈週刊』。

緊接着『激烈』教授的捕捉，而來了『激烈』書報的查禁。自然『未名社』所出的叢書，正是查禁的對象。於是『未名社』被封了，同時也捕去了幾個人。幸而那時章素園生病，於西山休養，可得幸免。但後來，却又查明了，知道那幾位青年，并非『共產黨』，只不過是因為個人的愛好文學，而弄弄筆墨，并翻譯

一些新俄的并非政治性的文藝作品罷了。他們經過官方的審查無罪後，便釋放出來，而『未名社』也啓封了。後來魯迅先生由廣州回到上海的時候，對於『未名社』的無故被封以及『未名社』的同人無罪被捕，會對幾個老友說：「忽封忽啓，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兒」。基此，我們也可見到當時段內閣幫閒們對付文學界的手段之一斑了。

『未名社』啓封以後，其在當時的文壇，表面上更加沉默了（雖然『沉默』向來却是『未名社』的特色）但在沉默中，却不聲不響地在埋頭苦幹，困苦地在支持着風雨飄搖的『未名社』。就在這個困鬥的期間，居然給他們斷斷續續的著譯了不少的書籍：如臺靜儂譯了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的『父與子』，曹靖華譯了愛倫堡（I Ehrenburg）的『煙袋』，韋素園譯了拉夫列涅夫（B L Lavrenev）的『四十一』及『外套』，其他同人也譯了安特來夫（I A Andreev）的『草葉集』（F Van Nedem）及果戈里（N Gogol）等人的小說，至於創作的刊行，則又有『未名新集』，如魯迅的『朝花夕拾』，章叢蕪的『君山』，臺靜儂的『地之子』及『建塔者』等。而這些著譯，多少都給予後來的文學界以助力。如

後來「作家」的刊行，「譯文」的出版，都可說是「未名社」的精神之再現。

如今，「未名社」是早就消滅了，然而他的社名却至今還存。他之所以能爲後人如此敬愛與懷念者，其中，魯迅先生予以全力支持的苦心固然無法抹殺；然而章素園，曹靖華，李霽野，臺靜儼，章叢燕諸君子的刻苦困鬥，以及「十年如一日」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然而又會幾何時呢？當年曾以「狂飈運動」而不可一世的高長虹，早已消聲退却，就是只說明了半着綏惠略夫(Shervierov)式的「憎惡」文學的向培良，如今又安在哉？因此，更使我們對於這一羣「在默默中支持着未名社」未死的幹部，遠致無限的敬禮。希望他們重爲業已荒蕪了的現代中國文壇，不斷地努力本位工作。

記現代社

楊之華

現代社的解體距今快將十年了。但回顧十年前的『現代』，則它是雄據當時的文壇的，至少一九三二至三三這兩個年頭都是『現代社』紅極一時的時候。就是現在許多優秀的作家，如已故的穆時英，現在內地的章靳以等，都是因『現代』雜誌而成名的。

同時，一談起『現代社』的人物，首先就會想起施蛰存，接着便是戴望舒，杜衡，劉訥鷗……等人；因為施，戴，杜，劉四人單是『現代社』的主腦，而且他們四人之間都有着同學同班的關係呢。

『現代』雜誌雖然是始自一九三二年五月，但在『現代』創刊之前，施，戴，杜，劉四人早就辦過雜誌，開過書店和出過叢書。因此，今日要談『現代社』，則至少都要從開設於北四川路公益坊的『水沫書店』始。但又以『水沫書店』尚未開設之前已有了『水沫社』，因此，要談『現代社』，還須從施，戴，杜，

網際人的由認識而結合始。

x

x

x

x

那是民國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的事，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和劉吶鷗四人正在震旦大學的法文班讀書，在他們四人之中，施與戴同一班，杜與劉又同一班。他們投入震旦唯一的目的，是準備將來留學法國。而那個時候，適值革命的高潮，什麼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之類正在風起雲湧，爲了愛國的熱誠，目擊五月卅日南京路之慘案，遂使他們『走到十字街頭』，從事革命工作。但以文弱的學生，那里真有能力去參加實際的政治工作呢？但要他們都躲進『象牙之塔』裏又不可能，結果他們唯一的出路便是寫文章，辦刊物，至低限度都要做到『文藝與革命』這個情度。

由於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施，戴，杜，劉四人便以同學的關係結合起來了。『瓔珞旬刊』（民十五年末出版）便是他們從事文藝工作的第一聲。但當年的『瓔珞旬刊』小得有些可憐，僅是三十二開小本樣的刊物，而又以作者均係青年，所以銷路甚爲不佳，只出了三期也就夭折了。

繼『瓔珞旬刊』後的第二個同人刊物，乃爲『文學工場』，當時答應爲這個刊物出版的書店，乃是『光華書局』，但初校打起送給沈松泉老闆檢閱的時候，大大反對，因爲這個刊物的內容，文章過於激烈，實在有點左傾。『左傾』在當年（民國十七年）已大爲不妥了。沈老闆爲了避免書店關門，遂決定拒絕出版，而那本已經印起了的『文學工場』也就不了了之了。

與『文學工場』同時發動的，他們還有『螢火叢書』及『才子叢書』之編輯，前者乃由光華書局發行，後者則由開明書店出版。如杜衡的『黛絲』，戴望舒譯的『少女之誓』等，都是該叢書之一，在版權頁上便有了『水沫社』字樣了。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秋，劉呐鷗創辦『第一線書店』於橫浜橋寶興路口，同時創刊『無軌列車』，爲該刊長期撰稿者，除施，杜，戴，劉四人外，馮雪峯，姚蓬子，徐霞村等亦爲該刊的幹部作家。但出至六期（半年），以『第一線書店』的改名而停刊。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春，『第一線書店』改名爲『水沫書店』，移至北四川路公益坊，仍由劉呐鷗主持，邀請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參加編譯工作。

其時恰值馮雪峯（又名畫室）由北平南來上海，施等也就約其加入，從事編譯工作。

作爲『水沫書店』叢書的重心，不是劉呐鷗的『色情文化』（這書是集日本新興文學作品之大成），而倒是由馮雪峯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如盧那爾斯基的『藝術論』，蘇聯的『文藝政策』等，都源源出版。又以雪峯與魯迅在北平時的關係，於是魯迅的譯本，也源源送到『水沫書店』出版了。而魯迅的拼命翻譯科學的藝術論，乃是爲了對付當時太陽社及創造社等『圍剿』的緣故。

繼『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後，『水沫書店』又有一『馬克思主義文學論叢』之出版，由戴望舒主編，編譯的對象，仍是新俄的文學理論，如戴望舒譯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劉呐鷗譯的『藝術社會學』等。這時馮雪峯所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已停止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施蛰存主編的『新文藝』月刊出版，穆時英的處女作『黑旋風』即在這個月刊上問世。接着時英第二篇小說『南北極』，也由施蛰存介紹給鄭西諦主編的『小說月報』發表。在『新文藝』月刊上，除了穆時英之外，還

有章靳以等新起之秀，都是該月刊的小說作家。

以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三二年初爲止，『水沫書店』終於「一二八」的砲火聲中宣告閉業了。『水沫書店』關門唯一的原因，乃是爲了劉呐鷗不善經營，年積月累起來的，放出在外面（各書坊）的債務無法收回，而本身的開支又無法節省，在這內外交攻之下，『水沫書店』便無法維持了。

自從『水沫書店』閉門之後，劉呐鷗遠走日本，施蛰存回到他的故鄉松江執教，戴望舒與杜衡則同赴西子湖邊。在這烟消雲散的過程中，施蛰存不免感到舊朋雲散的寂寞，於是又想有所活動。

爲了「一·二八」關係，那時的文壇異常消沉。『小說月報』既因商務的損失而停刊，而舊有的『文學月報』，『北斗』，『拓荒者』等都以思想關係而相繼被禁停刊了。這時能夠出現於當時的文壇上的，只有王平陵，徐仲年等右派的『矛盾月刊』，『中國文藝』之類存在。但這些刊物都不足以適存於當時的環境，銷路十分不佳。

在這個過右不行過左又不得的時候，唯有不左不右的刊物才能立足其間。而

『現代』雜誌便是基於這個環境而產生的。

『現代』的出現，雖然是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但在這以前的施蛰存早就有了再辦一個刊物的想念了。那時施蛰存還在松江中學教書，有一天，他把他要辦一個文藝雜誌的計劃寫信去詢問光華書局的老闆張靜廬，但以該函寄出不久便遭遇着「一·二八」事變，因此辦雜誌的事情只好暫時擱下來。到得一九三二年三月，施蛰存存在松江突然接得張靜廬的覆信，約施在可能的範圍內到上海一談。

施蛰存接到張靜廬的信後，便去上海找張。原來張靜廬已脫離光華而加入洪雪帆與盧芳合辦的『現代書局』了。因此，施蛰存主編的雜誌，也就決定在『現代書局』出版。

自『現代』雜誌的事情決定由現代書局出版後，施蛰存即回到松江，分函遠在杭州的戴望舒及杜衡要稿，并函達在上海的穆時英，囑他趕寫小說，以爲『現代』創刊號之用。由決定至出版，頭尾還不足兩個月的時間。

由於『現代』以既不右而又不左的新姿態出現，遂轟動了當時的文壇，更以馮雪峯，姚蓬子與水沫書店的關係，魯迅的文章也拉到了，矛盾於『小說月報』

停刊之後，也有文章在『現代』發表。其他如遠在北平的周作人，前創造社的主幹郭沫若，郁達夫等，亦相繼爲『現代』撰稿。

次年（一九三三）春，前文學研究會同人亦不甘於寂寞，多方拉攏生活書店把『小說月報』恢復，但以商務關係，生活書店不允取此舊名，於是另變花樣，定名爲『文學』。由茅盾，鄭振鐸，傅東華等人出面拉攏魯迅，陳望道，郁達夫，葉紹鈞，徐調孚，王統照等，作爲開場的台柱。

一九三二年末，戴望舒出洋，留學法國，於通信中有『第三種人』的口號之提出，當即引起魯迅的批評，而有一論『第三種人』及『再論第三種人』之發，後一文即刊於『文學』創刊號（一九三三年七月）。但以『文學』二號上傳東華化名伍實的那篇『休士在中國』引起魯迅不滿，遂告退出。後雖經書面道歉及請客陪罪，亦無可挽救。

自魯迅退出『文學』的陣營後，一時的著譯，多送『現代』發表，如『爲了忘却的紀念』『論小品文的危機』，譯稿『果樹園』等均先後於『現代』發表。而『現代』的全盛期亦於一九三三年到達飽和之點了。

一九三四年後，林語堂另辦『人間世』，陳望道也主編『太白』，各據一方，互相對壘。於是當時文藝界中人的視線多集中到這方面去。同時大眾語的論戰已起，『現代』『文學』等雜誌漸向下沉。『文學』以與魯迅言歸於好，於一九三五年七月號起重振旗鼓，而再接再厲，『現代』一則以洪雪帆之死引起現代書局的改組，再則以施杜二人對於編輯的方針日漸分離，終至一蹶不振，而以六卷一期『美國文學專號』收場。

但於『現代』行將停刊之前，施蟄存以光華書局之邀，另行主編『文藝風景』，杜衡則與路易士等創辦『星火』。稍後，『文藝風景』出至二期而停刊，施繼此而另與康嗣羣主辦『文飯小品』，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同時更有『古代珍本叢書』之編印。至此，現代社同人業已星散，而『文飯小品』及『星火』等刊物，亦以半年左右的壽命而告終。以後他們仍雖有來往，但已不復再有昔日合辦雜誌之舉了。

後

記

原书空白

後記

把本書匆匆地編完之後，覺得仍有幾句話要在這裏說一說的，便是：本書編選的範圍，僅限於『中華副刊』及以前的『文藝』這兩個小小的副刊，因此，材料的稀少是難免的。如今且把本書編輯的大略說一說。

第一輯『關於魯迅』，乃是選自『中華副刊』的『紀念魯迅先生特輯』中，因為所選的文章原是紀念特輯中的文章，所以也把特輯上的『導言』選入了。至於附錄一，原是周作人先生的『哀啓』，但在這『哀啓』裏邊有着許多的記述，是與魯迅幼年有關，而又爲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收了入來，作爲『關於魯迅』這一輯中的附錄之一。自從『魯迅全集』出版以後，魯迅的著譯大部份齊全了；但除著譯之外，魯迅還輯錄并編校過不少書籍雜誌畫集等等，而且有許多是一般人所忽略了的。如今爲了要使讀者明瞭魯迅一生的工作的成績計，我便暫以個人之力，試編了這個『魯迅著譯編校輯錄表』，作爲附錄之二，以便讀者參考。

但其中一定還有許多是我個人所不知的，很希望閱讀本書的讀者，能够多多見告，以便本書再版時加入。

第二輯『作家印象』所收的文章，全是選自『中華副刊』及『文藝』這兩個小小的刊物上的。因為作者的不同，所以筆法也各異；同時因為這一類的文章，我們并無什麼規定，所以文字的長短以及文章的形式，也不能一律了。好在像這一類的文字，也不必強求其一律的。至於他們所寫的作家，大抵是新文學運動的老前輩，但也有『第二個十年』中的優秀作家，而且都為一般讀者所熟悉的。因此，也就一起收入在這一輯裏。自然，其中還有漏洩的，那就得請諸位多多幫忙了。

第三輯『文壇逸話』，則全是選自在『中華副刊』所發表過的。像這一類的文章，以前并不多見，就編者個人所知，亦僅錢杏邨先生，編過一冊『新文壇秘聞錄』而已（用阮无名編，南強書店版）但這一類的文字，又每每為一般讀者所愛好，因此也就把它編為一輯了。

第四輯『文藝社團史料』。關於這一類史料的調查，向為整理文學史家所輕視，因此，倘有人要找某個文藝社團的史料作為編著史料時的參考，往往無從入

手。但在日本文藝界，這種調查工作，却十分賣力，而且非常認真。如東京『第一書房』及『桃蹊書房』，『改造社』等所出版的『文藝年鑑』，便把一年內新興的文藝社團仔細調查，一一收入。縱令事過景遷，如有人要查考起來，也十分便當，只要記得那個社團是出現在那一年的，便馬上可以找得出來。但反觀我國，却大大不然，就是人所共知的『新青年社』或『未名社』的史料，要查考起來，也非常費事。直至一九三六年良友公司的『新文學大系』出版，才發現了一冊阿英先生所編的『史料·索引』。但這書所收的史料，僅限於零碎的剪輯，而尚無系統的編述。所以要查那個社是那時起的，那時滅的，有多少人，幹些什麼工作……之類，也毫無把握了。爲了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個人不揣淺陋，決然地來担負這項調查的工作。直至本書付印時止，共得二十二個社團，強成此輯。又因爲在『中華副刊』上登過陶晶孫的『記創造社』及楊之華的『關於未名社』和『記現代社』三文，也就順便選入，作爲此輯的附錄。

臨末，還得在這『後記』裏多說一說：第四輯的『文藝社團調查』，距離完善之境還遠，就我個人知道而竟無法調查的重要文藝社團的史料還多着，如現代

評論社，新月社，文學月報社，以及尙無社的組織的「北斗」，「十字街頭」……等，都暫付闕如了。但我却希望讀者諸君，能就所知，源源見示，務使本書確能爲研究新文學運動史料的人們之一助，則感謝無量了。

本書的編成，多賴梁式先生的督促和指示。而亢德，易士，真原諸兄也多給我有關的材料作參考。希平兄更爲我分担三四校之勞。這在我個人，對他們的熱誠和好意，都是非常感謝的。那麼就在這里，敬表我的謝忱吧。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夜，楊之華編訖并記。

編後餘談

關於本書編選的體系及其來源，我在「後記」中已經逐一說過了，本用不着我再來動筆寫此後記中的後記；但爲了後來又有一小部份的材料添入，且爲「後記」中所不及說明的，因此便不能不要借此「編後餘談」的題目來補說幾句。

第一輯：「關於魯迅」中，我們補選了魯迅先生的遺札三封，作爲附錄一，原有的附錄一則改爲附錄二，「魯迅著譯編校輯錄年表」則作爲附錄三。此外，我們於「魯迅書簡」之末，并寫了一篇「跋」，說明魯迅先生遺札在今日文壇上的價值及我們編入的理由。同時，我們爲了要保存先生的遺墨起見，遂將其影印，以給一般愛護先生遺墨的讀者留個紀念。

第二輯：「作家印象及評傳」，除保持原有者外，并加添了胡蘭成先生所撰的「周作人與路易士」及「路易士」，沈志堅先生的「懷茅盾」，路易士先生的「記常白與沈洛」，紀果凡先生的「沈啓无印象」等五篇，這給予第二輯增加了

一部分的材料。

第三四輯，一仍其舊，直至現在全稿校樣完畢爲止，我們還找不到更新的材料作爲補訂及增添，而尤其遺憾的，就是幾個較爲重要的文藝社團的史料，至今仍無法調查，如「現代評論社」，「新月社」，「文學月報社」，以及尙無社團的組織的「北斗」，「十字街頭」……等，都暫付闕如。但我們却相信全國各地的讀者，其中必有熟悉如上所述的幾個較爲重要的文藝社團的人在，我們謹在書末，以萬二分的熱誠，期待愛護本書的諸君不吝見告。果真如此，則誠不獨編者個人之幸也。

臨末，我在這裏應提出幾個爲本書給予特別幫忙的友人：日本名作家內山完造先生，爲了幫助我們編成「關於魯迅」這一輯，特別寄稿三次，并惠借其珍藏着的魯迅先生原稿及遺札給我們影印。陶晶孫先生也爲本書寫了「魯迅·佐藤·內山」及「記創造社」兩文。伯祥兄特爲本書繪畫封面。他們的摯誠和好意，均使我念念不忘，謹於本書之末，敬致我衷心的謝意。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楊之華謹識於滬濱寓樓。